



王首道回忆录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 1 |
| 求学之路 | 2 |
| 革命的摇篮 | 16 |
| 最初的实践 | 35 |
| 第二章 湘鄂赣苏区 | 49 |
| 秘密串连 | 49 |
| 游击队来了 | 58 |
| 攻打张家坊 | 64 |
| 劫狱 | 69 |
| 花轿迎亲 | 77 |
| 湘鄂赣边特委 | 84 |
| 地下省委 | 90 |
| 第三章 湘赣苏区 | 100 |
| 湘赣根据地的建立 | 100 |
| 湘赣临时省委 | 108 |

| | |
|-------------------------|------------|
| 第一届省委..... | 113 |
| 第二届省委..... | 124 |
| 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 | 133 |
| 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 | 138 |
| 湘赣苏区的武装斗争..... | 141 |
| 任弼时同志和湘赣苏区..... | 149 |
| 第四章 从江西到陕北..... | 156 |
| 关于遵义会议..... | 157 |
| 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 161 |
| 刘志丹案件..... | 166 |
| 红十五军团..... | 172 |
| 回民自治政府..... | 181 |
| 徐海东司令员..... | 187 |
| 在党中央办公厅..... | 196 |
| 第五章 南征北返(上)..... | 222 |
| 整装待发..... | 222 |
| 再见了,延安..... | 232 |
| 夜过同蒲铁路..... | 246 |
| 巧越黄河冰桥..... | 258 |
| 英雄血肉铺征途..... | 272 |
| 驰骋豫中..... | 286 |

| | |
|--------------------------|------------|
| 中原会师····· | 300 |
| 第六章 南征北返(下) ····· | 315 |
| 飞越长江天堑····· | 315 |
| 战斗在鄂南····· | 327 |
| 转战三边····· | 340 |
| 回师鄂南····· | 356 |
| 挺进华南····· | 374 |
| 八面山中突重围····· | 387 |
| 长征故道忆征程····· | 402 |
| 挥师北上····· | 413 |
| 北返途中····· | 423 |
| 重聚中原····· | 440 |
| 第七章 在东北地区 ····· | 455 |
| 军事调处执行小组····· | 456 |
| 富饶的大地，破碎的河山····· | 464 |
| 财经工作的初创····· | 475 |
| 开展对外贸易和恢复生产····· | 492 |
| 解放区的工业····· | 508 |
| 从战争走向建设····· | 527 |
| 离开东北南下长沙····· | 551 |
| 后 记 ····· | 556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我之所以能从青年时代即投身于革命，则明显是由于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当时家乡的革命环境，时代的潮流，特别是党的引导和教诲所使然的。至于其中属于我本身的主观因素，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只是由于自己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阶级的熏陶，乡亲们的谆嘱和党的教诲。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是单纯而朴素的，并没有什么“异想天开”，也许会被有些人说成是“胸无大志”吧！我只知道终年劳苦难得温饱的穷亲友们们的处境太不公平，看到工农群众在党的召唤下反抗土豪劣绅的欺压盘剥是那样的兴高采烈。这种人生道路的选择，是同我在青少年时期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求 学 之 路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十三日，我出生在湖南浏阳张坊区上洪乡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叫王问礼，母亲叫李平贞，共生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在五个男孩中，我排行第四。原名王芳林。我们家境十分贫寒，房无一间，田无一亩。张坊地处山区，竹木丰盛，开设纸坊的多，经营的多半是地主，工艺落后，一般都用竹枝经石灰沤烂制作成土纸。成品要运到浏阳、长沙去出售。张坊是个集散地，父亲每天要挑上百多斤的纸担，从上洪到张坊，往返四五十里路，靠赚点脚力钱来维持一家九口的生活，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大哥王芳庚，二哥王芳泉，三哥王芳甫从七八岁就从事放牛砍柴等辅助劳动，以帮助家里减轻父亲的负担。一九〇九年，我还不到五岁时，湖南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田毁堤决，庄稼失收，湖米涨价，百业凋零，浏阳一带贫苦农民更加难熬了，地主豪绅却乘机囤积居奇，勾结奸商运米出境，牟取暴利。一遇凶年，我们家更是苦不堪言，母亲见到孩子们啼饥嚎寒，更是忧心如焚，每天四出挖野菜觅食，煮红薯丝汤，做魔芋豆腐，用汤汤水水支撑一家大小的生命。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的母亲，她目不识丁，但有着大多数中国母亲的善良品德。她过

着家徒四壁的清贫的生活从无怨言，有天大的困难和委屈她只是由自己默默地忍受，百事不要父亲操心，也从不轻易向人借贷求告。全国解放后我把她从家乡接出来，希望她能度过愉快的晚年，但她从不闲着，总是尽量找点活干，还给我爱人纪均绣了一个手帕，並让孙女写了“坚决干革命”字句绣在手帕上以示鼓励。“文化大革命”初期，动员家属还乡，她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毫不气馁，主动回乡，并安慰我说：“农村的生活早就过惯了，现在比解放前好多了。乡亲们不会亏待我的。你们都放心好好干革命吧！”后来我打发小儿子毛毛去家乡看她，她十分高兴，但仍鼓励小孙子说：“你要好好学文化，不要老是惦记我。”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才使我当年得到了求学的机会。

一九一五年，我已经九岁。这时反封建的民主思潮影响到浏阳山区农村，学校改制，上洪小学改为新学，许多人家都把孩子从私塾中转送到上洪小学。父亲看到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总希望能有个孩子读书明理的。他和母亲商量，决定送我上学。能有上学的机会，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对父母的感激之情，自己虽然很羡慕有钱人家的孩子能够读书求学，但从来没敢奢望自己也能有这个机会，因此，时常感到上学的机会得来不易，所以很知道用功，也很受老师的喜爱。放学回家后，看到哥哥姊妹们每天勤苦地帮家里干活，很是过

意不去，便自觉地帮助哥哥放牛打柴。我看得出，母亲为操心我上学显得更加憔悴了，但当看到我年年考第一的成绩单时，又是那样说不出来的高兴。为了母亲，为了博得母亲的欣慰，我在上初小的整个四年里，几乎是年年考第一。母亲总是逢人就夸赞我“聪明”、“懂事”，直到全国解放和我住到一起后，在鼓励孙子们好好读书时，也总是说：“看你爸爸，从小就聪明，也知道用功！”其实，我並不比别人特别聪明，只要看看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就明白了。他们自以为上学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感到机会难得，不仅不肯刻苦用功，有的还不断捣蛋，惹老师生气。

当时，浏阳乡下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族里祠堂有一笔钱可以资助族里的穷困子弟升学读书。但真正要获得这种优待，却是十分不易。因为，在那种年月，每个村中掌实权的都是些豪富人家，我由于年年考第一，好心的老师又极力推荐，正好族里一位绅士名叫王德吾的，他从前家里也很穷困，本人也有些学问，懂得爱惜人才，加上父亲多方求告，总算取得了资助我上高级小学的优待。这就使我同时得到了上完高小、凭自己努力考取省城中学的机会。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三位兄长都自愿放弃求学机会，甘心在家里劳动以便支持我上学。这种手足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哥哥们上山砍柴，而山都是地主老财

的，虽然他们只是在山上砍些枯枝杂树，一旦碰上地主派人来巡山，少不了要遭到一顿毒打。我大哥则更有一番痛苦的经历。由于生活所迫，他七岁那年就被送到地主王金可家当放牛伢，起早贪黑地干，还不断地要挨打挨骂。常听母亲念叨，大哥挨了打回到家里后，只是咬紧牙关忍受着，呻吟也不敢呻吟，唯恐母亲知道后心里难受。有一次由于被打得很重，再也没有瞒过母亲的眼睛，脱开衣服一看，背上有碗大的紫瘢，手上脚上还流着血。母亲哭了。母亲常说我懂事，但我却觉得大哥比我更懂事。在我的印象里，大哥完全是为了背起这家庭重负才来到人世的。父亲有时赚了钱还要买碗酒喝，而大哥为了全家生活，为了支援我上学，一个铜板也不肯乱花的。我参加革命后，学习革命的道理，一提到旧社会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我就立刻想起大哥。大哥没日没夜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地象牛马一样的劳动，正象背着三座大山在那里艰苦而倔强地走过人生的旅途。

上洪乡十分闭塞，不仅交通不便，而且语言也不大通。附近农村讲的是浏阳土话，唯独我家那一带农民讲的却是类似广东的客家话。但由于有剥削，有压迫，民主革命的影响仍然会波及到这里的。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兴华会”，曾经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浏阳县西乡普迹市骡马大会上与会党聚集，密谋策划起义。一九〇六年，浏阳的“洪江会”首领龚春台，浏东和浏北的

洪福会首领姜守旦，联合组织数千名会党，配合同盟会在萍、浏、醴举行震动全省的大起义。十二月四日由同盟会湖南留日学生蔡绍南、刘道一领导，率领起义群众几千人，提出灭满兴汉的口号，已经打到浏阳县的上栗市，还准备直捣县城。由于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在清军赶到时，自己的火药中弹爆炸，死伤很多，最后被清军打败，蔡绍南、龚春台只好逃亡他乡。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虽说失败了，但浏阳仍是会党最活跃的地方之一，众多失散的会党和参加过起义的群众疏散在民间，留下了反对压迫的火种，对唤起民众起了不小作用。父亲虽由于家室之累，未能参与活动，但他和许多同乡谈起这些起义来，却是十分赞赏起义英雄们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五月中旬，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到长沙，和毛泽东等共同商量成立湖南学联来领导学生运动。六月三日，长沙学生在学联领导下举行总罢课，上街宣传“毋忘国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浏阳离长沙仅九十八公里，很快得到了响应。这时，我已在张坊区高等小学读书。张坊小学老师李仁溥和郑礼雄都是思想进步的年青人，他们平时在上课时，就经常向我们讲述孙中山、黄兴的革命思想，讲到中国受到世界列强的欺压时，常常声泪俱下，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同学们鼓舞很大。当听到各地学生会的作法以后，我们也在老师帮助和指导下组织了学生会。经

过同学们的投票选举，我被选为学生会会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社会职务，感到责任重大，应该怎样当好这个学生会会长，心中无数，只知道更认真听取老师们的教诲，更用心读书，更主动地和同学们共同交流进步思想。並尽量多读些课外书籍，增加自己的新知识。那时，大家心目中只知道孙中山、黄兴是救国爱民的英雄，很想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老师还找到孙中山和黄兴的许多来往书信，帮助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求革命的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兴在起义前就写下“遗书”，抱定准备牺牲的决心。那时在同学中间，对戊戌变法中被杀的谭嗣同也都由衷的敬佩。但是，不少同学对于谭嗣同得到缉拿他的信息后，为什么却不肯走，想不明白。我们就去问李老师说：“谭嗣同就是要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去唤醒民众。他认为要革命不流血是不会成功的，那就从他自己开始。”老师还鼓励同学们为了救国救民，要树立勇于牺牲的精神。总之，这一段的学生会工作，虽未参加什么重大活动，但还是使我开始学习如何做群众的工作，做思想工作，並初步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洗礼。

一九二一年春，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生陈昌，他是“新民学会”会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他回到故乡浏阳办学，以金江高小为据点，传播革命思想，进行教育改革，学生不再穿长袍马褂，同学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

进步书刊。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陈作为也来到浏阳，在金江高小教书。陈昌还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名为“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不久东乡的永和、上东也创办了女学。陈昌还组织了“浏西文化促进会”，引导知识分子开展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活动，创办了“金江农民学校”，教农民学文化，进行启蒙工作。张坊小学因此常有进步青年来校讲演，记得讲演中还有个日本留学生。民主的空气一时十分高涨。这对同学们影响很大，我们几个同学也学着做讲演，总希望把自己才开始学到的一点新思想、新知识告诉给同学们。

一九二二年，我读完高小。由于新思想潮流的推动，我很想到省城长沙去读中学。但是，作为山村的一个穷人家孩子，读完小学已是万幸，怎么还敢做此妄想呢？父亲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母亲只是含着眼泪低头不语。我去找老师商量，老师是知道省城里各种中学的情况的，普通中学无论官立的还是私立的，学费都很贵，还要交伙食钱，家里肯定负担不起。因此，只能放弃读普通中学的想法。长沙有一所“修业农业专科中学”，重点学农业，还种实习田，学费就少多了。老师从我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我只有上修业农校，还有一线希望。实际上读农校比上普通中学化费少得多了，因此一向支持我上学的父母、兄长，自然也是热情同意的。

到省城以后，能不能站住脚，心里是十分不踏实，

提心吊胆地参加了入学考试，居然考取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消息传到张坊，穷山区居然出了个中学生，也是一次轰动。曾经为资助我帮过忙的士绅王德吾，认为族中出了个“人才”，他又答应每年资助我几块银元。农校的英文老师曾惕存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也帮助我向校方申请了一点免费。到省城上中等学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到长沙读农校，确实是我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当时长沙正是全国著名的革命活动中心之一。民主思潮高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活动相当活跃。而坐落在长沙市兴汉门外的私立修业中学，又多是穷人家子弟在那里求学，所以在学校师生中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能够来到这个环境学习，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确实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修业学校比较开放，一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等都能在学生中流传。在高小时早已听到老师们提到的陈天华烈士写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中马前卒》之类的小册子，这时也可以找来阅读了。比起浏阳山区狭小的天地来，真好象从小河来到了大海。

当时在长沙潮宗街有个文化书社，门面不大，是专门经营各地进步书刊的。每天各学校放学后，总有一些学生拥挤到这里来买书或翻阅。书社除了出售青年们最喜欢的《新青年》外，还有一些宣传“五四”新思潮和

介绍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册子。这个文化书社是由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筹办的，由易礼容负责经营，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当时湖南省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外地同志联系的联络点，也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重要阵地。当时我並不了解这些背景，只是常随进步同学来这里翻阅书刊，由于经济不宽裕，除非十分喜爱的书，难得有钱买上一本。不过通过在书社里阅读，确实增加了不少新知识，並逐步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结识了一些浏阳来长沙读书的同学，了解到浏阳进步青年的活动情况。我发现浏阳的青年们也办有进步刊物，一种是由浏阳的田波阳和潘心源共同主编的《新民》月刊。这两个人我虽不认识，但刊物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我记得创刊号上的第一篇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这实际上是国际无产阶级声讨旧世界的檄文，许多内容是我从来未接触过的，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目标。还有一篇是郭亮同志专为该刊写的《列宁记》，介绍和歌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和俄国共产党创始人列宁的革命事迹。另一个刊物是《浏阳周刊》，是由陈昌、陈清河几个同乡同学创办的，也常登载些进步文章。我看到这些刊物是家乡人办的，又是宣传的进步思想，所以觉得分外亲切，因而也更容易接受它们宣传的观点。特

别是有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概念，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接触，顿时有了一种由衷的好感，其深奥的道理虽说还不甚理解，但总的感觉，它们是为劳苦大众说话的。

后来，在《新民》杂志上竟然揭发了浏阳反动豪绅的一件丑闻，说的是浏阳北盛乡团防局的一些劣绅互相勾结，把一个姓赵的扶植当了蕉溪乡的高小校长。想不到刊物揭露了这一丑闻后，那个姓赵的校长居然垮了台。因此，刊物在那些坏人眼中简直象一枚炸弹，而在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师眼中，特别受到欢迎，大家一时都成了《新民》的拥护者。我想结识一下杂志的负责人，只是没有机会。不过我因此就更注意他们的行踪，听说他们在寒暑假期间经常回到北盛乡去了解民情，协助乡民同地主劣绅作些斗争。有一次他们得知团防局向老百姓敲诈勒索，乱派捐税，就请了几位精通武术的人并带了一些群众前去找团防局讲理。副团总见事不妙从后门逃走了，不识时务的团总还想以势压人站出来打官腔，结果被愤怒的群众狠揍了一顿。此事传扬开去，青年们非常开心。

这个时期正值昏庸腐败的反动军阀赵恒惕统治湖南，搞得民不聊生，政局十分动荡。赵恒惕还异想天开，策划改选省议会，安排自己充当所谓“民选省长”。在这种形势下，湖南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久已酝酿要发动罢

工，以提高群众阶级觉悟。长沙最大的一家纱厂工人在春节前夕提出按照上海、汉口纱厂的标准年终发给工人双薪。该厂资本家无理拒绝，工人决定罢工示威，厂方勾结赵恒惕，用五万元收买军队把工人的罢工运动镇压下去。工人十分气愤，遂推选出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两人当代表，当面责问赵恒惕，为什么省宪法刚刚公布，省政府便派兵镇压工人。赵恒惕又以厂方罢工工人代表谈判为名，又秘密将黄爱、庞人铨抓走，并枪杀于浏阳门外。工人和学生知道后悲愤万分，进行了抬尸游行，湖南工界三万一千人发出通电，揭露赵恒惕的暴行。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各地。长沙工人学生纷纷出动，先后两次参加由毛泽东同志在船山学社主持召开追悼会。会上决定由毛泽东同志到上海动员各界人士抗议赵恒惕暴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也认为黄爱、庞人铨是中国第一起为无产阶级奋斗牺牲的烈士，意义重大，给予了大力支援，在长沙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当时，修业中学的同学也被这革命潮流所卷动，我和学生会长廖长顺等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并草拟传单连夜油印，在校内张贴。我深深为烈士的壮烈牺牲和广大群众的同仇敌忾所感动，经常忙到深夜也不知道疲倦。

此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浪潮在长沙掀起，如著名的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镇压造成的“二七惨案”，以及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的运动，都

在长沙引起强烈的反响。由于驻在湘江的日本军舰上的水兵，公然上岸枪杀了一名长沙学生，制造了“六一惨案”，又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抗议运动，卖国求荣的赵恒惕竟出兵镇压学生、工人，还通缉郭亮、夏曦、夏明翰，整个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我们浏阳籍的一些进步同学，感到在长沙无法活动，便利用暑假回乡，在田波扬、潘心源等人领导下，在东乡官渡镇成立了外交后援会分会。我们先后在官渡镇和张坊镇上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和军阀赵恒惕的卖国求荣。记得我们在张坊向纸坊工人宣传，并演出了《二七惨案》、《旅大始末》等自编的节目，得到乡亲们的热烈响应。在当时使我非常感动的是，许多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年，由于受文化所限，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感情非常真挚，立场十分鲜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汉奸卖国贼的决心非常坚定。

这次暑假回乡宣传回到学校后，学生会长廖长顺对我们的活动很关心。他向我了解回乡的收获，要我谈感想，最后并向我介绍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他可以做我的介绍人。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CY，对此我早有所闻，但只知道他们都是些思想很进步，做事很勇敢，很能关心别人的好青年。通过廖长顺的介绍，我才对团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因此心情格外激动。我是一

个贫苦的青年，早已恨透了这个旧社会。认识到CY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穷人求解放的秘密革命组织，从心底愿意参加。廖长顺听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说：

“你的情况我早就知道了。你愿意参加CY，我们很欢迎，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宣誓——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连你父母兄弟都不能讲。”

自从参加了CY以后，好象自己忽然长大了，觉得整个生命都有了依托，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个目标。同时，组织上经常给我看些秘密宣传材料，并时常参加团的会议，对于社会上的许多问题，都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更多了。在这期间我看了许多进步文艺作品，其中以“创造社”的作品居多，特别是郭沫若的著作，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一次周老师上作文课，没有出作文题，要同学们任意发挥。我便根据自己阅读文艺作品的体会，写了一篇散文诗，借校园中随风摇曳的松柏，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感想，用山崖石缝中长出的奇松，比喻为人民敢于斗争，不怕风吹雨打，从夹缝中顽强挺立起来的英雄形象，歌颂在困难中顽强向上的坚强意志。由于是第一次写这样的作文，心里很没有把握，不想周老师看后，还当场表扬。因此，我爱上了散文诗，可惜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再没有机会写这类作品了。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会长、作家柯蓝同志请我做散

文诗学会荣誉顾问，我才重新想起自己的这篇习作。可以说我只是出于对散文诗的格外喜爱，才欣然接受了散文诗学会的聘请。

修业学校三年的学习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学生的伙食很差，一日三餐，同学们也难得一饱。记得有一次大家饿极了，我们几个同学就带头起来向学校提出抗议，我们还冲进伙房抬出一桶饭菜当场叫大家吃了。但是在这三年中在党和青年团的领导下，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却是使我终生难忘的。我在修业农校肄业后，我被选送到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一九二六年三月，我们秘密奔赴广州，从此开始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父母、兄长对我无私地支持，他们还为我作了表率。我家因生活日益困难，经舅父李建文介绍到富西乡小洞村当了佃户。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死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脚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做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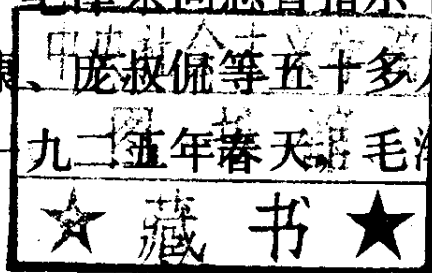
革命的摇篮

修业农校三年学习期满毕业以后，我的心情反而苦闷。我顾虑的是：三年的学校生活不仅使我学到了一些文化技术知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革命的风暴，我自信还是愿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有为青年，那么，离开自己已经熟悉的学校环境，今后怎样去继续献身革命呢？另外，离开了学校以后，我又如何在这风雨飘摇的社会安身立业呢？找个职业又该去做什么呢？正在我冥思苦想为自己今后前途苦恼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喜讯降临了，那就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到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指示，要在青年学生中，挑选三十五名优秀青年，派送到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这是党要专门培养一批在农村开辟革命群众运动的骨干。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由党组织分配工作，而且正式通知，其中有我。我听到消息后，真是不敢相信，接着就是无比的兴奋，深深感到自己今后就是革命的一分子了，自己决心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终身。当时前去入学的同志很多人都感到这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因此不少人愿意改一个全新的名字，我毫不迟疑地说决定改名为“王一分”，用王一分这个名字前去报到。农讲所在我心目中，就是名副其实

的“革命摇篮”。从此，我便正式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一九二六年三月，我们一行三十五人便秘密从长沙到武汉，转途上海，来到了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一到广州我们就为全城热火朝天的革命热潮所吸引，到处贴着革命的标语，到处是忙碌着的青年男女，有在街上宣传革命道理的，有教唱革命歌曲的。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亲自主办的。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泽东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调查。一九二一年初夏，又深入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阴等县农村调查。一九二二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亲自讲授《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具体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广大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从“土财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派遣水口山矿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回到他们家乡衡山的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于同年九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会员达四万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从一九二四年七月到一九二五年底，我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训练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有四百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运工作。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中共湖南省委选派了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等五十多人到广州第四、五届农讲所学习。一九二五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为了更好



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在他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二十多个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等十多个省、区，仅广东就有六十一个县成立了农协会，会员达到六十多万人。湖南省有四十四个县建立了农协会。一九二六年一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肖楚女等九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我们这届农讲所，共招收学员三百二十七人，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其中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三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四月举行了入学考试，五月三日正式开学。

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二十五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门课，是我们学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农讲所，他就亲自向我们作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我还深深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农、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祀祖祀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

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剥削的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五十多年来（1870——1925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

讲到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至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首先是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七十交给地主；重息，农民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一百；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捐……除去这些经济剥削外，还有

各种超经济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同志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作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

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因此，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是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一门基本功。

在农讲所，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

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同志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弃农民这一支大军。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在反复

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阔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更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

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五分钟内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

场进行操练。当时我们经常唱着《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齐奋斗！齐奋斗！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记得有一次，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在农讲所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教育和引

导我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这期间，他除了引导学员坚持社会调查外，还以学员为对象，作了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这些材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将全体学员按二十个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江西、两广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经济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二次。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次，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毛泽东同志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作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作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中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以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查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在这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参观访问，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加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同时，我们在海丰还学到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例如，怎样发动农民控诉地主，怎样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怎样安排会场，怎样开办民校，以至贴什么标语，呼什么口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我们都很详细地进行了了解

询问，并认真做了记录。

毛泽东同志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六月二十三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生活也作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斗争的环境。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毛泽东同志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

在农讲所里，还有我党许多的领导人和优秀干部担

任我们的教员，如周恩来、萧楚女、彭湃等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既是毛泽东同志办讲习所的得力助手，也是我们学员们敬爱的良师益友。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四年，他曾领导工农群众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反动的商团叛乱；一九二五年曾两次率军东征，打败反动军阀陈炯明，并回师广州平定反动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叛乱，为统一和巩固广东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坚定地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对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过坚决的斗争。东征期间，他十分注意做发动和武装农民的工作，指出：民众武装十分重要，建立农民自卫军为势所必需。在农讲所，他给我们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以他亲身参加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阐述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能把地主阶级打下去，如果没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就不能巩固农民政权。我们之所以能平定反动的商团叛乱，能够打败反动军阀陈炯明和

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队，就是因为有革命的武装，有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支援。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没有广大工农的支援，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由此可见，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时，周恩来同志在我们党内担任着重要工作，还要到农讲所来讲课，他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他那年轻英俊、机智勇敢的形象和忘我工作、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萧楚女同志是农讲所的专任教员，并负责教务部的工作。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回忆起萧楚女同志时曾说，萧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萧楚女同志给我们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等课程。记得他讲授帝国主义的产生、性质和命运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它们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除了迫使无产者趋向革命，没有第二个结果”，生动地阐明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

在农讲所期间，萧楚女同志的肺病复发了，仍带着病坚持工作。有一次，他在讲课时，突然吐血了，我们又焦急又难过，搬来椅子请他坐下，劝他休息。他激动地

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是能放光明吗？人也要象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我是不能休息的。我少上一小时课，你们就要浪费好多小时。同学们，准备上课！”说完，又以惊人的毅力，精神抖擞地给我们继续讲课。后来，他病情恶化，在毛泽东同志关怀下，住进东山医院。疾病摧残不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他在卧病期间，不能口讲，就用笔写，回答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萧楚女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他参加共产党以后，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农讲所里给我们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以他自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体会教育我们。他说，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开始搞农民运动时，穿白色学生洋服，戴白通帽，农民不愿与他谈话交往。后来，他意识到和农民格格不入的原因，一是他对农民说话太不通俗，农民听不懂，二是他的面貌服装与农民不同。于是，他脱下学生洋服，穿上粗布衣裳，把书本上的术语变成农民易懂的俗语，经常到农村讲演宣传，听他演讲的农民不断增加，很快就把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把海丰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教员中还有恽代英同志讲授《中国史概要》，阮啸仙

同志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张秋人同志讲授《各国革命史》，周其坚同志讲授《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安体诚同志讲授《统计学》等等。这些同志的讲课和他们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许多难忘的教益。

第六届农讲所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结业。学员们即将秘密返回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向祖国大地。

农民运动的兴起，“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亘古以来未有过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全国已有十五个省、区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到九百多万人。农民运动极大地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检阅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干部。在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中，我党在全国广大农村中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密切了我党

同农民的联系。这些为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投身农村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湖南籍学员黄益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参加了建设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红军长征时，他服从党的需要，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牺牲。每当回想起这些和我同学习、同战斗的战友和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时刻鞭策着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

说到我个人与农讲所的关系就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我是由青年学生直接调来学习的，因此，参加农讲所也同时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同时，我来学习时只是个青年团员，当时叫“C Y”，到农讲所以后，我才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一年也是我参加党的开始。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向党宣誓的誓词：

“服从纪律，牺牲个人；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
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六十周年，就与其他几十位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我高兴地说：“这是我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讲所学习的六十周年，同时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六十周年，也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周年。”

最 初 的 实 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活，还只是一种学习生活，回湖南参加农运，才开始实地参加了革命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

至今我还记得，到祁阳去的那一天，正好是天晴日朗，风爽宜人，我穿着一件月白的细布长衫，手提一只盛放衣物的藤篮。在祁阳县原来文庙的旧址，找到了县农民协会的办公地点。

祁阳地处湘江上游，青山绿水，风景秀丽，但是我的心情却是紧迫和不安的。虽说当时我正是年轻气盛，

有一股跃跃欲试的革命热情，可我是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不知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工作，遇到的将是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与党的祁阳县特别支部和县农会筹备会的几位同志联系上以后，就开始了解祁阳各方面的情况，除结识自己的同志和一些基层干部外，並分析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几名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同情我党的国民党左派，也有十分顽固的右派。然后我就换上白布短衣改装成农民的打扮，下乡去做些调查。当时西区的罗口岭，有个大土豪叫刘梅轩，家有千亩良田，专门豢养了一批武装家丁，並私设监牢，任意关押百姓，农民都恨透了这个大地主。东区有个大土豪蒋衍，霸占良田六百亩，当过多年乡团总，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地主豪绅象活阎罗一样，老百姓受着残酷虐待，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有半点反抗。

经过典型调查，我有了搞好工作的信心。当时已有五个区成立了农运筹委会，还派有农运特派员，公开成立县农民协会已具备了条件。我和有关同志几次酝酿，经过国民党祁阳县党部出面，开会选举，正式成立了祁阳县农民协会。这样正式打出了县农会的旗号，各区的农会也都相继成立。选出的第一任县农会委员长是雷晋乾。雷是祁阳本地人，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在学校中参加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因为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又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人运动，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一九二五年奉党的命令回到祁阳工作。公开身份是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教员，实际上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那时，正处在大革命时代，国共合作，然而共产党的组织还是秘密的。打的公开招牌是国民党。所以雷又是公开的国民党员。一九二六年六月建立了中共祁阳特别支部，雷被任命为特支书记。特支代号为“雷希阳”。我到祁阳不久，组织上又要我接替了特支书记职务。

县农会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培训骨干，我们比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模式，于一九二七年一至二月，开办了一个党务训练所，目的是培训党、政、农、工、青、妇工作干部。地址设在县城模范小学里面。有学员二百来人，教职员十七名，开设十三门课程，讲孙文主义，也讲马列主义，还有军事、唱歌、演讲等基本训练。我和雷晋乾，也经常抽时间去上课，主要讲农运工作。三月份组织上又调李镇球由湖南大学回到祁阳，接替我担任特支书记，从此我就专心从事农运工作。这时党员已秘密发展到二十余人。

正在这时，省党部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祁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份成立了惩办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县政府挂牌办公。县

长刘鹏年、县农协委员长雷晋乾、县党部常务委员蒋毓华三人轮流执掌庭长。针对这种形势，我们几个人研究一下，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镇压一下土豪劣绅，以便进一步发动群众。

为了发动群众並摸清地主的动向，我再次到达西区。经过与区农会的同志和积极分子商量，打算把当地的大恶霸刘梅轩，首先在村里进行大会批斗，再送到县里法办。由于刘梅轩十分狠毒，农民虽对他恨之入骨，但唯恐斗不倒他反受其害。因此我们又分头登门入户做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讲明革命的大好形势，有农会做主，我们一定可以斗倒刘梅轩这个恶霸地主，现在由我们农会委员长当法庭庭长，还怕不主持公道！经过同志们分头发动，群众劲头起来了，顾虑解除了，决定三天后召开大会。不料第二天走漏了风声，老奸巨猾的刘梅轩，连夜带了老婆逃到宝庆去了。群众得知了这个消息，气愤得不得了，都要冲进刘家，没收他的财产。由于群情激愤，我们照计划召开大会，控诉刘梅轩的罪行。因此，当天就召开区农民代表大会。

这真是乡间几代人从来没有开过的大会，一传十，十传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千上万的人赶来会场，实际上是开成了群众大会，而且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控诉地主的罪行，又实际开成了诉苦大会。满腔怒火的人群一致要求把刘梅轩抓回来报仇雪恨。我

们几个农会干部也为这种热情所鼓舞，当即决定：一，报请县特别法庭将刘梅轩通缉归案；二，由区农会和乡农会组织群众清理刘的家产。

群众一走进刘梅轩的高房大院，看到数不清的财物，满囤的粮食，满圈的肥猪，既气愤，又不平。按着当时的规定，猪可以分给群众，粮食则要申报上去，听候县党部批示处理。可是，当时正在青黄不接，已有十几户断了炊。眼看着面黄饥瘦的农民群众，真不忍心让大家眼看着大囤的粮食挨饿。于是我当即提议先取出几百担谷分给断粮户救急，其余粮食等批示下来再处理。这一意见立即得到干部和群众的一致拥护。

当进行分猪分粮时，农民的高兴劲真令人感动，不少老人说：“过去只知道忍着心痛往地主家里送猪送谷，从来做梦也想不到会从地主家里往自家挑谷子！这该不是做梦吧！？”我们笑着说：“不是做梦！谷子本来是农民生产的，这叫物归原主！”

这次西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是在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中召开的，是祁阳县农运的第一炮，对全县影响很大，湖南省民国日报也做为重要新闻报道了，因而对湖南各县也有影响。但是我自己却总感到让刘梅轩逃跑了总是个不足之处，应引为教训。

祁阳的农民运动，在西乡控诉会以后很快掀起了高潮，农民胆子壮了，气也粗了，倒是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首先是东乡的农民立即开始了行动。

东乡豪绅蒋衍是多年的团总，他过去同官府勾结得很紧。无论干部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感到，如果动手晚了唯恐象西乡的刘梅轩一样逃之夭夭。区农会把他们的想法向县里汇报后，我们也有同感。经过研究，我就又去了东乡。

说起东乡的蒋衍，他从前依仗自己是团总，手里有武装团丁，可以作威作福。听到西乡农会控诉刘梅轩的事以后，自己心里也早就明白，东乡农会迟早也要找他算帐的。因此，虽然一直坐卧不安，但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当时本县县长刘鹏年是他的同学，他当然幻想找刘鹏年保驾，于是连夜把两担银元送到了刘的家里，刘鹏年当真收了下來，他满以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安稳多了。

其实，农会的同志也都没有睡觉，也都在连夜商量如何同蒋衍进行斗争。有人主张先发动群众，等县农会派人来再开展斗争。有人则认为，要斗争就必须先把蒋衍抓起来，否则，人跑了还斗什么呢？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一场暴风雨起来了。

天色刚明，蒋衍家的前后门都埋伏了农会会员，就在蒋家长工开门出来担水的当时，大家一拥而入，从被窝里把蒋衍拉出来，命他穿好衣服就绑押走了。一时间从四面八方拥来了几百名农民，有的拿着棍棒，有的还

拿着红樱枪，他们紧紧相随。这支押解队伍，沿路都不断有人加入，越走人越多，队伍也越拉越长，数千人步行百余里，把这个恶霸从东乡一直押解到了祁阳县城。一进城，农会会员就高呼口号，声势浩大，祁阳县城顿时沸腾起来了。

这时，我和雷晋乾马上迎了上去，了解了情况后，立即分头准备召开特别法庭和草拟控诉材料。下午三点钟，特别法庭就开庭了。县农会委员长雷晋乾担任庭长。根据区农会的控诉和有关证人的作证，当庭核实了蒋衍的罪行，决定判处死刑，准备提交县农协召开群众大会宣判后，立即执行。旁听的群众都欢呼起来，表示赞成。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蒋衍的堂客带着二十几个家属进城手拿状子喊“冤”。原来在蒋衍被押送进城时，他的堂客也坐上轿子带着家属进了城，她仍旧派送银元的佣人找县长刘鹏年的父亲讨主意。刘父便暗示她们到法庭上来喊冤。当时，刘鹏年就坐在雷晋乾左边，开始时他一声不吭，现在看到家属来喊冤，他马上装模作样的说：“我看我们特别法庭判决以后，应该报请省政府核批，才能执行。现在先把人关押起来吧！”我当时在下边，听到他这样说，分明是企图暗中保护蒋衍，在耍手段。我想，这次开庭，是祁阳县第一次利用合法形式来和土豪劣绅作斗争，如果对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蒋衍都无法制裁，整个县的农民运动也就无法推动了。于是，我马上写了

个字条：“拖延时间，我找人去。”着人送给雷晋乾，我就转身走开了。在我走后，雷晋乾便在蒋毓华配合下，同刘鹏年争论，认为不需报省市批。当我把正在县里学习的党训班二百多学员带到法庭时，马上气氛就变了，农民群众看到来了援军劲头也来了，大家一致高喊：“我们要求立即下令处决恶霸蒋衍！”但是刘鹏年还不肯松口。这时我们又和群众中做了布置，先让学员们把蒋衍的二十几名家属统统赶走，免得她们哭哭啼啼地扰乱秩序，接着我指名揭发刘县长是有意保护地主恶霸。这样一来，刘鹏年也感到压力很大，但仍不肯松口。这时，我又同雷晋乾等同志商量。刘鹏年作为县长可以向省政府请示，我们代表县农会也可以向省农民协会请示，我想省农会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于是，一方面我们布置群众坚持在县衙门口等候，一方面立即向省农民协会发出了请示电报。

第二天，只听到几千农民一阵欢呼声，省农会的电报批示果然来了，而且确实是同意群众的要求和县特别法庭的判决。这样一来，县长刘鹏年看完电报，又看着几千名围在县政府门口的农民，迫于压力只好亲自宣布执行特别法庭的判决，就在县城的王府坪，把万恶的地主恶霸蒋衍当场枪毙了。群众亲眼看到这个大恶霸伏法，真是欢呼雷动。他们终于掀动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封建统治这座大山，出了一口恶气。这是农民运动的胜利。从

此，祁阳县农会的威信更高了，县里的农民运动也在全省农运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蓬勃开展起来。不久，西区三官塘的一霸唐月如，被数百农会会员押送到县里来了。经过特别法庭的审理，依法判处了死刑，也在王府坪处决了。四月间，归阳大土豪李浩，被东区九洲农民抓住，在归阳唐氏宗祠斗争，李家竟然纠集了两船打手跑来抢人，农民被激怒，在争抢中把李浩打死了。南区还有个南霸天，原县议会副议长郭子安，一听风声不好，就连夜逃跑了，县农会开了三万人的控诉大会。这一来，其余各区的土豪劣绅，真是闻风丧胆，纷纷外逃，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乡村中被农民击溃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事无大小，没有农会到场，事情就办不成。五月间，县农会在文庙召开了全县农运积极分子大会，总结了农运工作经验。在这次会上，我着重强调了要按政策办好农会，要帮穷人说话，要给穷人作主。

当时，在各地，只是国民党公开挂牌子，共产党的组织却是秘密的。在祁阳也是如此。因而，广大群众虽知道共产党的主张好，却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根据祁阳的大好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特支感到应该在群众中公开一两名受到群众爱戴的共产党员，以便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经请示上级组织，得到批准，决定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召开纪念大会时，正式公布两名党员同广大群众见面。

五月五日这天，天气特别晴朗，应邀前来参加大会的各界代表有上千人陆续进入县城天主堂会场，还有不少群众是听到消息临时赶来的，因而会场挤得满满的。约摸超过了两千人。工人纠察队在会场维持秩序。会场主席台上挂着鲜艳夺目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张贴着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大家都抱着迫切的心情，都想看一看共产党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十时整正式开会，当我和县农会委员、共产党员廖康国站到主席台上时，顿时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突然，有一部分群众拥上主席台把我们两个人高高举了起来。我深深地懂得，这完全是我党在广大群众中具有崇高威信的生动体现。面对着热情激动的群众，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要讲的话一时都涌上了心头：

“农友们，过去你们相信命运，其实地主的钱财也不是命里带来的，你们受苦受穷也不是命里注定的。今天的劳苦农民所受的苦难都是受地主剥削，受封建制度压迫造成的。我们大家创办农会就是为了解除农民的痛苦。因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农会，和土豪劣绅作坚决的斗争，铲除蒋衍、唐月如、李浩这一类地主恶霸，我们劳苦大众才能跳出苦海……。”随着一

阵阵“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积极性。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常常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当农运顺利得象一只顺流而下的帆船，忽然遇到了狂风暴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事变。使大革命遭受到了顶头风，大好革命形势受到了空前残酷的打击，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倒在马路的血泊之中。接着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反革命“马日事变”，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捕杀共产党。这一来，湖南省城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被抓的抓，被杀的杀，能躲的躲，省城顿时一片黑暗。许多官僚、地主、土豪劣绅趁机纷纷出笼，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长沙城变色以后，马上影响到下面各县区，在一夜之间立刻改变了形势，许多躲到长沙的土豪劣绅，和他们一伙的坏分子，纷纷回乡。

就在“马日事变”的晚上，县党部宣传委员、共产党员彭树德跑来敲开了我的房门，带来了湘潭、宁乡、湘阴等几处农会给祁阳拍来的急电，说明长沙的情况。我见到这些电报后，立即找来雷晋乾、蒋毓华等人研究对策。这时驻扎祁阳县的国民党王德光团所属一个连的连队师爷是彭树德同志的好友，他送来一封王德光的急电，要这个连迅速将祁阳的革命者全部逮捕，不得漏网，

这位李师爷把电报让我们看了一下后，马上拿走了。当时大家都首先想到我，认为我既是外乡人又是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许多人都认识我。并建议我从龙山后跳城墙走，认为那里又近便又僻静。

这时祁阳县各城门已经都派了双重岗哨，城内开始戒严，出入城都要进行严密盘查，一霎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城。当我赶到龙山后面的城墙上时，左右一看，当时还没见有人，只是城墙有六七丈高，下边是一些乱石堆，感到太高了，又往附近找了找，发现有一处缺口，只有四五丈高。这时已经听到城内的紧急集合号声和喊叫声，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即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结果从几丈高的城墙上跳下时，居然没有伤着，而且还能爬起来奔跑。

我逃出城后，想到各区农会可能还不知道消息，便就近跑到了离城十多里的二区农会所在地龙口源。这时的龙口源还是一派太平景象，外面发生的事情还一点不知道。我正在向他们介绍县城的情况时，附近零陵县农会的委员长跑了进来，说明零陵也同祁阳一样，而且已见到有同志遇害了。根据当时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看，已经不是一城一地的问题，至少说明全省形势都有激烈的变化，于是大家商定都要躲一躲，而且要迅速通知各区的农会干部。由于附近的龙塘冲，村子小只有几户人家，又是山冲，交通闭塞，来往人少，我们决定

先到那里躲一躲。临行前，我又叫区农会的同志设法派人进县城找一找雷晋乾、蒋毓华等，看有没有脱险，最好能联系上以便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就在当天晚上，我派去打听消息的人就回来了。据说，雷晋乾在乡下得到事变的消息后，知道县城不能回了，就连忙召集附近乡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准备到武汉去找左派政府，结果因叛徒出卖被抓到县里去生死不明。后来又听说雷晋乾已经被害，而且形势越来越紧，眼看工作已无法开展，住在这个小山村中，既不能保证不出事，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就同两位区农会的干部转移到东安县一个去处。不久，彭树德也逃了出来，并辗转找到了我的住处，我们见面之后真是悲喜交集，互相控诉敌人的暴行，痛斥无耻的叛徒，悼念牺牲的同志们。这时我们已凑起了好几个人，彭树德感到这么多人住在白牙市镇子上不够安全，太着人注目，我们又搬到了横塘一位可靠的乡亲家里。

横塘是个小山冲，纵横十里，村落稀少，满山满坡长满了四季长青的油茶树。白天我们就下田干活，上山打柴，挑粪种菜，寻猪草喂鸡鸭。晚上，我们给大家上课。讲农民为什么受穷，中国人为什么受洋人压迫；又讲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讲苏联十月革命。就这样我们住了近一个月左右，我总感到这不是个办法，就同彭树德商量：我们是党员，应该分头去找党组织，重

新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工作。我当时心里很清楚，不管有多大困难，党总是要战斗的，革命总是要前进的。这样住下去好象没有着落一样。于是经过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几个人便分头行动了。我便直奔长沙，去寻找党组织。

总之，在祁阳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革命工作，虽只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是给予我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在这期间我既赶上了中国革命出现的第一次高潮，也遇到了相当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正好象工人师傅把一块钢淬火一样，既经受了白热化的炉火，又顷刻间沉浸到冰冷的水中，这无疑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的严峻考验。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由衷地感谢祁阳的革命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正是由于他们曾经发挥出来的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影响了我，教育我。

第二章

湘鄂赣苏区

一九二七年，反革命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以后，我离开祁阳到长沙找组织，直到一九三〇年秋，我一直在家乡浏阳工作。后来与附近几个县组成了湘鄂赣根据地，又曾担任过湘鄂赣特委书记。因此，这一段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湘鄂赣地区活动。

秘密串连

离开东安横塘，在前往长沙的路上，我一直回忆着在祁阳那热火朝天的欢乐场面和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恨不得马上找到党组织重新投入战斗。自己心里明知长沙情况有变，但感情上总觉得离开祁阳越远似乎越安全，迫近长沙越近，好象越有希望。当我真正到达长沙以后，街市上过分的平静，立刻使我警觉起来，长沙确实和当初不一样了。来到潮崇街，远远望去，十分熟悉的“文

化书站”四个大字的招牌，又引起了我对当年长沙生活的向往，心中一阵暗喜，似乎一切又都有了希望。于是我就习惯地进到店内马上到书架上翻起书来，里面虽有店员和几个顾客，但我一个也不熟悉，很快又警觉起来，只装做没事似的，随便翻着书。只暗暗盼望能见到过去在一起开青年团会议的同志，哪怕见到一个也好。正在这时，外边一下子拥进了七八个横眉立目的人，强拉硬扯地把两个买书的人拉走了，说他们是来秘密接头的。被捉的人连声抗议，但终究必须跟着“到保安司令部走一趟”。这时，店里其他几个买书的人也给吓呆了，有的走了，有的又不敢走。我也急剧地考虑是赶紧走开，又怕引人注目；强留下来又怕有危险。结果只好强做镇静继续翻着书，但心里又不免七上八下。心想，如果长沙遇不到熟人，还是赶快回到浏阳去，在家乡总还可以找到熟人，至少先可以找到个安身的处所，住下后再慢慢找党。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终于见到书店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联系人告知我，党组织决定让我回到浏阳家乡去工作。浏阳党组织虽也遭到严重破坏，但肯定还有隐蔽下来的党员，要我马上回乡联络，重新建立党组织，发展秘密农会和秘密武装。并告诉了我一些联络暗号，并要我首先到东乡去找一个邮差，那里是党的联络点。

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赶到了浏阳县东乡永和镇。

这个小镇我是熟悉的，本来是比较热闹的，但已相当冷清了。经过打听后，很快找到了那位邮差，用暗号联系上以后，我又从贴身衣服口袋里拿出了省委的介绍信。情绪马上轻松下来，真象找到了家一样。这个联络点的邮差同志，我记得叫张启昌。这时，张启昌就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向我述说了一下。

自从“马日事变”后，浏阳的工农义勇队又调赴江西，随着土豪劣绅的还乡，白色恐怖立刻降临浏阳，到处烧杀捕捉农会会员，不少人牺牲，不少人离家出走。自党中央领导了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后，在一个月前，从安源开来的参加秋收暴动的第二团，打开了浏阳城。但是，紧接着国民党军队和浏阳东乡、平江地方上的团防局，又打回浏阳，把第二团打散了。反革命气焰又高涨起来。能够隐蔽下来的党员，已经为数很少了。大家非常盼望和上级党取得联系。因此，现在看到省委派人来了，都感到有了希望。

我首先问了永和区的情况。张启昌说，永和区几名党员组织了一个临时支部，支部书记原来就是李贞同志。张启昌把我安顿了住处以后，就带了我去见李贞。

李贞同志当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尚未见过。一见面立即感到是一位机灵的姑娘，态度从容，举止大方，说话急促，看来真爽快。经过交谈，我了解到，她这个支部只有四个人，其他三个都是男同志。李贞说，大家

选她这唯一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主要是认为女同志好活动，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我认为这是她客气，事实上我感到，李贞还是很有头脑，很有水平的。比如，她就准备了“后路”。她的窗外就是山，有情况可以立即跑到山里去。她还专门推开窗子要我看，真是个好办法。就这样，李贞就成了永和区第一个地下支部书记。从此，我就在永和周围几十里方圆开展活动，有时穿着长衫，打扮成教书先生，有时也穿农民的短衫，在乡里走动。有一天，张启昌告诉我潘心源回来了，就住在东乡和北乡搭界的山冲里。潘心源我早就在长沙相识，是浏阳在长沙读书的学友。一起在长沙搞过学生运动，他过去就是浏阳的县委书记，是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我在祁阳搞农运时，把他接到过我的家乡，张坊的同志写信告诉我说，浏阳农民运动搞得十分红火，潘心源胆大有计谋。那年春节在全县庆祝北伐胜利的群众大会上，他没有打一枪就把县警备队长康秉藩抓起来，当场由工人纠察队解除了县警备队的全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县长肖骧驱逐出境，这就是浏阳地方史上有名的“除唐驱肖”运动。这都是潘心源领导的。这个人有学识，有智慧，老百姓都佩服，亲切地称他为“博士”。听说他来了我心里当然高兴，随即问清了地名，就穿上长衫，打扮成教书先生，一直往北乡走去，按照张启昌说的地方，找到了一家杂货铺，就在铺子后面的一间屋子里见了面，

我们两个人本来很要好，如今在这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相会，更加亲切。我先把自已回东乡，找到李贞恢复党组织的情况，一五一十向潘心源讲了，潘心源听了后叹了口气说：“浏阳四处抓人！我被列为有名的‘十大暴徒’的第一名，反动派重赏通缉捉拿！许多人又认得我，弄得我没有办法出去活动，只好白天躲藏在这里，夜晚才能出去一下。你就不同了，浏阳人对你不熟悉，也认不得你，你可以公开自由活动。眼下浏东恢复了党支部，你们活动得很好，那就由你负责浏东特别支部。你赶快取个代号，以后有什么消息和文件，我写信交给张启昌，他就会转交给你，要减少我们见面的危险，你看怎样？”

北乡和东乡，相隔几十里路，来往又很不方便，给人发觉了太危险，因此我也就连声说好，只是为浏东特支起个什么代号呢？我说，现在要恢复党组织，需要一个坚守道义的人，便取名“王守道”如何？潘心源一听，连声说：好！以后有什么事，我就寄信兵马桥王守道收。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以后，我到湘鄂赣特委工作又改为王首道这个名字。

关于浏东特别支部恢复后的工作，我又征求潘心源的意见，说到这，潘心源气愤地说：“如今敌人见到我们的党员就杀，连革命群众，农会干部都格杀勿论，逼得我们只能拿起武器，刀对刀，枪对枪起来暴动。上个月我们浏阳的秋收暴动，本来很有希望，结果被二

团王新亚断送了。”说到这里，他真是满腹悲痛，捏紧着拳头用力往桌上打了一拳。

说起来，话很长，潘心源单刀直入地介绍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了秋收暴动，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的镰刀斧头红旗，在湘赣边界高高举起，第一团由卢德铭在平江发起攻势。第二团由安福农军王新亚带领连同安源的工人，由安源直攻醴陵，趁敌不备，九月十六日又攻下浏阳城。这本是很有利的形势，那时潘心源正暗藏在浏阳城，他马上出来发动地下党员配合二团农军打开监牢，放出了许多被捕的革命同志，随即，潘心源又赶到团部找到王新亚，他们曾在安源和毛泽东一起见过面，开过会，所以请他赶快撤出城外，以防止敌人反扑袭击。王新亚这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要在城内筹足粮食才走，潘心源答应地方上帮他筹办，请他还是赶快把部队先撤出城外向东接应三团。但是骄横的王新亚却狂妄地说：“我几天连克三城，反革命力量不过如此，你看，我不消三天，就能打开长沙……”

潘心源看见劝说无用，就马上和地下党组织和自卫军准备应变。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九月十七日，敌人增援部队反扑浏阳，王新亚毫无戒备，陷入敌人包围圈中，敌人炮火猛烈，王新亚在突然的袭击下，吓得丢魂落魄，只顾自己带着少数人冲了出去。潘心源眼看革命战士，四散逃亡，死伤众多，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

这时，他知道也无法挽回，只好随王新亚一起撤退，一口气跑到离县城一百二十里远的南乡岩前地方，暂时宿营，沿路一共收容了一百多人。潘心源看着惊魂未定的王新亚，又看看这些疲乏不堪的工农军战士，他自告奋勇，去找到几家老乡。因为是本县人，所以，老乡马上筹粮煮饭。潘心源想，让战士们吃饱休息后一定要找王新亚商量，把这支残存的革命武装和毛泽东取得联系，谁知饭后已是深夜，潘心源也累得倒下了。等他醒来，天上已露出鱼白色的曙光。他把同屋的战士喊醒，马上去找王新亚商量出发，谁知王新亚却在夜半人静时，带了贴身的五六个人携枪逃跑了。潘心源骂了一声：“逃兵”，回头对二团的一百人说：“我们到铜鼓去寻找毛泽东和三团去！”但是，这些战士都不认识潘心源，王新亚一走，他们也都三五成群的回乡去了，潘心源喊破喉咙也没有人听他的。他眼睁睁的看着革命队伍烟消云散的走了，他的心似刀绞。回想他冒着生命危险，东奔西走，组织队伍参加秋收暴动，偏偏这支队伍在他身边消失了。他觉得有愧，也觉得痛心，最后，他只好悄悄地回到北乡，想再组织力量。现在看见我回来，心中自然高兴。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要赶快在东乡一面发展秘密党员，一面发动过去的农会会员，组织起来，只要有火种在，我们还是要搞武装暴动！”

从潘心源那里回来后，我先在东乡永和一带活动，以

后，又向张坊镇发展。张坊是我出生和读书的地方，很快通过熟人和同学发展了党员，成立了支部。这时从外面参加秋收起义部队的人，在半路失散回乡的人中，有一个叫刘少龄的，他以前是东乡纸业工会委员长，后来担任过县总工会部长，他从部队上下来时身边还带了一支驳壳枪。还有一个叫刘先洵，原先组织上派他去三六九军当兵，参加了这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现在也失散回乡，我都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夜晚躲在山冲树林里开会，商量如何报仇雪恨，如何夺取武装。刘少龄这个人个性很强，是个火炮性子，他提出要打张家坊团防局，夺取武装。可是，我感到眼下才发展十几个，不到二十人，就凭一支驳壳枪想夺下团防局的武装，时机不成熟，还要多发展几个人才行。可是这几个积极分子心里还不服气，他们白天常常到张家坊团防局大门口溜来溜去，有的上山砍柴，也挑到团防局附近去卖柴，趁势探问情况，总想动手抢枪。为此，我心中十分着急，总怕他们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到时候打草惊蛇，于是便找到刘少龄、刘先洵，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反复说明，你们一个有枪，一个在南昌打过仗有经验，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只是团防局几十人，几十条枪，自然寡不敌众。我们要设法发展游击队，要设法搞枪支！刘少龄问：什么时候可以搞到枪支？什么时间成立游击队？我说，只要大家想办法，时间不用多久。就这样，总算把这几个

急性子人稳住了。

有一天，刘先洵来找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永和区原来的区委书记张启龙回来了，他也是参加秋收暴动掉队下来的，听说病得不轻。”我听了很高兴，过去就认得张启龙，知道他是永和区的第一任书记，地方和人头都熟悉，真是又增添了一分力量。而且，我知道张启龙这个人当过县学部委员，是个有学问的人，这次从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下来，一定有不少情况和经验。就约了刘先洵去找张启龙。

这时，张启龙躲在他伯父家里，我和刘先洵悄悄来后见张启龙躺在床上，面容憔悴，看样子病得不轻，就关心地问起他的病情。张启龙知道我是当地特支书记，也非常兴奋。当下忘掉自己身上的重病，振作精神简略地诉说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张启龙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扎在铜鼓，当三团回师攻打浏阳东门时，遭到敌人围攻，三团只好突围向南乡行动，就在这时候他因沿途受凉受热，行军疲劳，得了痢疾。行军老是掉队，随着部队拖到莲花县宿营时，把他分散住在民房里，这天晚上他打摆子发烧发冷，等他第二天醒来，部队已经走了，不知去向。他只好回到浏阳老家，打算把病治好再干。没料想这病越来越厉害，连屎尿都下不了床，加上他是浏阳上了名单的“十大暴徒”之一，全县通缉他，团防局搜捕他。

他父亲只好背着他，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他伯伯也是党员，有一天遇见了刘先洵，知道我在这里负责恢复党组织的工作，自己也要求恢复组织生活。这样，刘先洵就把消息告诉了我。张启龙比我大五岁，他在浏阳任过永和区区委书记，实际工作经验多，今后还想依赖他多挑重担，只是看到他病成这样，就安慰他不要着急，先把病治好再说。

不久，我们浏东特委就发展成立了十个支部，党的力量又从地下聚结成了星星之火。

游击队来了

十月下旬，湖南省委夏明翰来到浏阳北乡，和潘心源一起商量，要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继续举行暴动。当即在浏阳北圣沙市交界的蒿山吴王庙，召开了秋收暴动誓师大会。潘心源等八十多名党员，带了一百双草鞋，抬了一头肥猪，酒一罐，还有二十个炸弹，四支长枪，两支短枪，九十支梭镖上了山。准备大会结束后，趁黑夜直扑北圣联防队举行暴动，谁料这天下了大雨，等黑夜夏明翰讲完话开完会，天光已经大白，无法行事，只好改日行动，但是这次会议精神却传到了浏阳四乡，我便在东乡向党员传达了夏明翰在吴王庙秋收暴动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发动广大工农抗租抗债抗税，

一律不准交租交粮纳税，谁敢收租就杀谁的头。同时开展秋收暴动镇压反革命，用赤色恐怖回击敌人白色恐怖，没有枪用柴刀菜刀，他们要杀我们的头，你还犹豫坐等他来杀那还行，要通过多种办法动摇敌人的军心。沙市成立了“东山里游击队”、浏阳跃龙党员夺取了八军溃兵的百多支枪成立了浏西游击队，郭祝遐也成立了浏北游击队，我们浏东也应该成立游击队。大家都摩拳擦掌，个个都准备战斗，只是没有武器，怎么成立游击队呢？

为此，我也心急火燎，连吃饭也吃不出味来。这一天，颜启初忽然笑眯眯地进来，告诉我说：“我听平江来的人讲，罗纳川成立了平江游击队，打了几个胜仗，有三百多条枪了，我们只有刘少龄一条枪不行，得想一个办法！”我想，这位罗纳川本来是浏阳的农运部长，马日事变以后才调平江县的，何不去找他借几条枪来。心里盘算一定，就决计亲自到平江去一趟。

这时将到年关，天气特别寒冷。我带着两名游击队员，穿了一身老布棉袄，扛上扁担绳索，路上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上山打柴的穷苦老百姓，谁能猜到我们有重要的使命。从浏阳到平江沿路尽是高山大岭，这些荒山野林，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有伤人的野兽，还有土匪强盗出没，但我们顾不得这些，只知急匆匆的赶路，翻过一道山又一道山，北风吹得呼呼的，把手脚也冻僵了。

走了两天，才找到平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

平江县游击队的司令，就是平江县委书记罗纳川。他是二十九岁的青年，出生和平江猷村罗家洞，一九二四年就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家乡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团支部。第二年正式入党。一九二六年夏，他调浏阳任农民部长，第一个胜利就是处决东乡古港大恶霸周永晋。罗纳川还在浏阳当过工农义勇军的参谋长，马日事发，又和潘心源一起指挥过浏阳农军进攻长沙。浏阳的农民都很熟悉他、敬重他，后来白色恐怖严重，反动政府又悬赏捉拿他。这时党组织才将他调回平江，八月他秘密回到平江，被选为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主任。从此，他就领导平江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闹得轰轰烈烈。罗纳川身材高大，年纪比我大五六岁，只是戴上一副近视眼镜，一眼看去，还是个教书先生的风度，想不到他还会打仗。我们坐下叙谈，越谈越亲热，彼此追求的目标也一致，我便迫不及待地打问平江游击队是如何夺取枪支，开展暴动的经验。罗纳川这人搞了一年武装斗争，也有些军人的豪气，他坦率地说：“去年八月我从浏阳回来，带了一支短枪，看到县长王紫剑、‘清乡’司令阎仲儒在平江搞白色恐怖，群众痛恨，说：‘阎王清乡，百姓遭殃’。我们只有三支半枪，就决定搞暴动，先是在猷冲乡暴动，夺取了警察所的七支枪；后来在一次扑城营救被捕的同志，集中了三百多人，因为内应误事，

只好撤退，以后便改为化整为零分散起事。这样几十人的分散活动，却得到很大成功，火烧长寿街警察所，智取沙眼桥挨户团，虹板暴动，夜袭思村，策动黄金洞矿警队长等四十人带枪起义，积少成多，平江便搞到三四百人枪了。我听到这里，想起自己游击队虽然只有一支枪，可是老在东乡团防局转来转去，没有积极想办法下手，是不是太不主动了。做事情要沉着稳重是对的，却不能保守被动。现在听到平江的经验，便决定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学习平江的经验，发动群众配合，搞好武装斗争。想到这里，就接过罗纳川的话说：“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发动一下！”罗纳川笑着说：“我们有几个骨干，不但打起仗来象猛张飞，用起计谋来简直象诸葛亮……”他一面说一面哈哈地笑着。旁边一位同志，这时插上来说：“前几天，湘桂军阀混战，有不少逃兵路过平江，我们罗纳川主任就布下天罗地网，发动夺取溃军武器，邱训民就凭着一条扁担夺到敌人一挺机枪、七支步枪。还有几次得了敌人几担武器。我们还伏击押送军粮的敌人，缴到了二千光洋，二十多支枪，不过十天光景，我们就得了三百多支枪，这是我们暴动主任罗纳川的神机妙算。”

听到罗纳川从三支半枪起家扩大到现在已有三四百条枪的游击队，心里又是羡慕又是钦佩。罗纳川不但有魄力有胆量，他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我说：“我

们这次来一是向你们学武装暴动的经验，二来是向你们借几支枪做本，开展浏东游击战。”罗纳川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两县情同手足，这件事我们研究一下，再困难，也得支援你们。不过，我们这地方，敌人的压力大、任务重，反动当局最近派了一个新任县长，上个月他派兵把我家的房屋烧毁，还到处搜捕我，我家乡的人也来向我要枪，要杀敌报仇。现在老百姓吃足苦头，知道当顺民不行，非得拿起枪和反动派拚。这是血的教训，你们要枪的急迫心情，我们一定满足！”

没料到平江游击队对浏阳这么慷慨，当我们看到罗纳川派人把几捆枪放在我们面前时，浑身的热血都涌到脸上，激动地拉着罗纳川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罗纳川笑着说：“这里一共二十支枪，送给浏阳兄弟，我知道这一支枪将来会变成十支枪，祝贺浏东游击队成功！”此刻，我有千言万语想说，只是过于激动，千言万语迸发出一句话说：“我们一定用夺取敌人十倍的武装来答谢你们！”

在清凉的月光照耀下，我们细心地把枪藏在柴担中，一路高高兴兴地翻山越岭向浏阳走去，把这二十支枪，看成是平江人民对浏阳人民的支援，有了枪才能为死难的同志报仇，才能开展对敌的武装斗争，这二十支枪是浏东人民的革命资本。我一路走一路心里在盘算，要怎样才能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仗，要学习平江罗纳川，既

要大胆杀敌，又要多设计谋来一个智取张坊团防局就好了。我们穿山越岭连夜赶回到浏阳县边境。这时，李贞和张启龙按照先前约好的计划，带着好几位同志，早就在平浏交界的祖师岩等候多时了。看见我们三个人挑了柴担满头大汗地过来，几个人都欢呼地迎上前去。张启龙虽然大病初愈，力气尚未恢复，但他也忙着去接担。刘少龄急忙把他拦在一边，自己从我肩上接过柴担。他们把柴担挑过界，急不可待地就解开柴担，取出枪支，对着月光，细心地察看通亮的钢枪。刘少龄在秋收暴动的三连受过军事训练，对枪的重要，深有体会。这时，他心情特别高兴，拉动着枪栓，他不光是检查枪支，按照他火爆的脾气，真想立时对准敌人的胸膛。

我见大家情绪这么高，也满心高兴，马上提议成立浏东游击队，大家自然赞成，经过特委研究，任命刘少龄为浏东游击队队长。浏东游击队的成立，把东乡十几个支部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但是，环境又不允许这么多人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农民又不懂军事常识，虽然有几个是部队回来的，可是对指挥作战也无经验。可贵的是大家都有一颗革命的赤胆红心。有了游击队的组织，有了枪，大家都摩拳擦掌，都准备暴动夺取张坊团防局。

攻打张家坊

三月初春天气，南方的柳梢开始露出点点绿色的嫩芽，地里的油菜也开出一片金色的黄花，大地苏醒了。游击队员在地下暗暗活动，我们有了枪，目光盯着张家坊的团防局，想在东乡响起第一声春雷。

经过周密的布置，分配了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队长刘少龄，他早就跃跃欲试，他是个猛性子。党代表陈硕英，是有头脑的人，他原在东乡洞溪小学教书，算个青年知识分子，大革命时在沅江县当过农运特派员，马日事变以后回到家乡从事地下活动，是浏东特委的委员。这次组织上决定他任游击一队党代表，他心里非常高兴，他想到游击队刚成立，要打几个胜仗才可以鼓励士气，也可以杀杀土豪劣绅的威风。他考虑游击队人数不多，如果打了败仗，对工作开展不利。他连夜去发动了一百多农民，配合游击队打张家坊团防局，才能取胜。这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那天晚上，陈硕英带领农民，悄悄埋伏在张家坊附近，他把鞭炮放洋油桶内点燃，顿时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在这寂静的黑夜里，如同密集的枪声一般。这时埋伏在团防局周围的游击队员，听见队长刘少龄喊声“杀！”大家也一齐呐喊起来，真是天翻地覆。躲在团防局的团

丁，猛地听见枪声和喊杀的声音，不知外面来了多少人，吓得魂也散了，不敢出来迎战。躲在屋里还怕不保险，有的还钻到桌子底下。这时，刘少龄带领了一队游击队员勇猛地冲进团防局，当场杀了三个反革命分子，夺到了三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这第一次的杀敌胜利，象蜜酒一样叫他心醉。为了打这个团防局，他挨了多少不眠的夜晚，他经常在这团防局外面转来转去，就是下不了手，只恨自己只有一支枪，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中牺牲了多少患难战友，今天总算为他们出了一口气。他这个刚烈性子的人，如今，真正让他痛快了一个晚上。他满肚子的马到成功，首战当捷的傲气。兴致勃勃地把队伍开往山区。走到黄泥槽纸坊，大家都累了。刘少龄仗着他对纸坊很熟悉，好象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就叫大家住下休息。几十个人闹了一夜也确实困了，都横七倒八地住宿在纸棚里。陈硕英眉头皱了皱发愁地说：“这里太近了，怕不保险！”刘少龄不在乎地说：“今晚我们把团防局的人打糟了，怕什么，他们再敢来，我们再夺他几支枪。你们快睡吧！天亮就起来。”

新成立的游击队，没有作战经验的游击队员，此刻，他们信赖刘少龄，便放心大胆地倒地便睡觉了。只有陈硕英，他是一个书生，教了多年的书，现在丢掉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又疲倦，又兴奋，不安地望着木格子窗外

黑沉沉的天空，他久久不能入睡。

就在这寒冷的黑夜中，永和区联防队得知张家坊团防局被游击队袭击的消息，马上尾随而来。他们发现游击队在上洪黄泥槽纸坊宿营，人数不多，便集结了二百多人，趁着黑夜埋伏在纸坊四周，成了一个包围圈。黎明前的短暂时光，天黑得象锅底一样。狡猾的敌人发动袭击了。这时，年轻的游击队哨兵，他也象其他人一样疲倦地打瞌睡。他不知道危险正埋伏在他周围。他的麻痹大意使敌人轻易地接近了他，还没等他清醒，敌人的匕首已插进他的胸腔。

这时，陈硕英正进入恍惚的梦乡；忽然听见房屋周围的响声，他惊醒了，急忙喊起众人。大家也发现了敌情，马上拿起了武器。缺乏打仗经验的游击队员，在这紧急的气氛中，一个个心中只有拚死的决心，都等待队长下命令冲杀。平时急躁的刘少龄，他到底在起义部队打过仗。这时，他倒是显得十分冷静，他发现三面都被敌人包围，只有后山没有动静，便下令胡义淳带领游击队员向后门撤退，他自己却一个人守在前门口，向敌人射击。这时，胡义淳乘机带着一部分人向后山走了。刘少龄连发几枪，把敌人打倒了几个，后面的敌人爬在地上，躲在墙边，一齐向门口发射子弹，劈劈啪啪的枪弹，落在门口，打在墙上。刘少龄守在门后，不停地向敌人开枪，他是游击队的队长，他不在这节骨眼上守住阵地

还行吗？只是他回头一看，陈硕英还带着十几个人爬在他的后面，一齐向敌人射击，并没有撤走。现在敌人发现游击队的火力不强，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形收缩包围圈。有的敌人已经爬上屋顶，门口已被火力封锁。密集的子弹象一条火龙射向孤单的十几个游击队员。不久，刘少龄身中数弹，他高喊着要其他人撤退，看样子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这里抵挡。党代表陈硕英马上掩护其他几个同志撤退了，但在这紧急的时候，他不忍丢下刘少龄，便在他身边一起拚死抵挡着敌人的枪弹。只是蜂拥而来的敌人，把他捉住了。他看到刘少龄和四位游击队员都倒在血泊之中牺牲了。陈硕英这时也受了伤。血顺着伤口染红了他的衣服，凶狠的敌人，把他用粗绳子捆着押走了。这时，天光已经亮了，黄泥槽房子也被烧了，一片战后的残迹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凄凉……

浏东游击一队失利的消息，刘少龄牺牲，陈硕英被捕的凶信，真是象晴天霹雳一般。原想初战告捷，扩大战果，使游击队成长壮大，也不负平江罗纳川的一片心意，想不到事与愿违。这时，我想还是救人要紧。陈硕英本是洞溪小学教员，我找到洞溪小学的校长等人，请他们出面营救，他们反而到张坊团防局去通消息。张坊反动家伙李宗保和余长之听说游击队派人营救，怕关在张坊团防局不保险，赶忙把陈硕英押解到县城里去了。浏阳的反动县长几次用大刑逼供。陈硕英经受了百般酷

刑，还是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残酷地在状元洲杀害了。这是一次血的教训，也是一次很大的损失。

我正在十分悲痛的时候，游击二队的党代表何俊回来了。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正要询问二队情况，不想何俊反而往地下一蹲，抱着头哭了起来：“我对不住党，对不起你！”

原来二队自向大围山出发以后，队长冯义淳领着大家沿路打了几次土豪。这一来游击队的风声传得很远，财主们便人人自危，挨户团也早早作了提防。刚好游击队里又吸收了几个妇女当宣传员，沿路大写标语。他们不懂得隐蔽，更不懂得游击战术，当他们驻扎在邓家畷的时候，有一个女宣传队员掉队了。没想到被敌人抓去，经不住拷打，讲出了他们的宿营地点。这天黑夜敌人就来了个猛虎扑羊，把游击队打得晕头转向，人枪尽失。何俊逃出来收容了几个失散的游击队员，回到张坊来见面就哭。问他队长冯义淳哪里去了，他也说不清，只听老百姓说，他跑到江西去了，下落不明。再问他还有多少枪支？何俊说，他们的枪全丢了。说着，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作为党的领导，一队失利，二队又失利。这次教训真是太大了。我便赶快把第三队迅速集中起来，好研究总结下一步的工作。不几天第三队赶回来了，他们的情况还好，沿路打几次土豪，在东门夺得了大团总鲁鸿秋

一支手枪。自己还没有丢失人枪。不过整个游击队二十支枪，到现在只剩第三队保存下来的七支枪了。一下子丢掉了十三支枪，还牺牲了不少同志，也走散了不少同志。大家的心情好象迎头浇了一瓢冷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怎么办？找张启龙和李贞商量，大家看到当时敌人团防局的气焰很嚣张，现有的游击队员，有的消沉，有的急躁，情绪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继续公开活动，对游击队非常不利，搞得不好，连最后的七支枪也保护不住。我左思右想，干革命工作不能光凭一时热情，也不能光顾一时勇气，更不可靠侥幸心理去取胜。一定要冷静，一定要有智谋，一定要做好游击队员们的思想工作。现在到了应该彻底清理一下的时候，不能枪杆子一拿到手，就狂热起来行动。

因此，便决定把现有的七支枪先埋藏起来，游击队再一次转入地下活动。

劫 狱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把七支步枪暂时埋藏起来以便整顿队伍。不想这一转入地下，给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特别是国民党新来浏阳的反共县长，听说游击队吃了两次败仗，他便气焰嚣张提出要乘胜“追剿”，斩草除根。天天派团防局下乡来捉人，弄得一些秘密支部党员，天

天躲兵，今天躲这里，明天躲那里，大家情绪十分低落。

为此，我找张启龙商量。张启龙说起他最近看报，知道蒋介石把程潜捉起来了。程潜有一个师溃逃下来，要路过浏阳，我们可以从逃兵中搞到枪。他提出把埋藏的七支枪挖出来，再到外面去搞一些来，我们还是赶快恢复浏东游击队。

我觉得很对，要改变挨打局面，没有武装不行。当即决定到李贞家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晚上，几个黑影悄悄来到李贞家。我在会上讲出了要重新恢复游击队活动的意见。大家听了很高兴。联络站的张启昌说，他听到一个大喜讯，平江毛简青和罗纳川在古历二月十五，举行了“扑城暴动”。他们先组织了三百人的游击队，混进了平江城，又配合了四乡农民二十万人攻打平江。来了一个里应外合，竟然把城门打开了。只可惜正在和敌人进行巷战时，罗纳川得到可靠消息，敌人从省城派出的援军一个师，已经靠近平江。在这紧急关头，平江还打不打？罗纳川感到农民游击队会处在背腹受敌的困境。他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当机立断，马上命令全体军民撤出平江城，分散回家。这一次平江虽未拿下来，但打开了平江县城门，长了农民的志气。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摩拳擦掌，都说，平江能打，为什么我们不能打？连李贞这位年轻的女同志，

也主张把埋藏的七支枪，赶快挖出来用。这时我想，七支枪太少，力量太弱，我才决定埋的。便说：“光靠七支枪去搞活动，太危险，我们不能盲目的冒险。”

张启龙听了，笑笑把手一摆说：“我有一个主意，我们要发展游击队，枪是必不可少的。我在江西过来，知道排埠买枪容易，只要用光洋去买。”说到这里，便有人插进来说：“我们哪里来光洋？”张启龙不急不忙地说：

“我在江西养病时，在黄茅做了调查，哪家土豪有多少钱，我也掌握了情况。我们先去打土豪，搞到了钱就到排埠去买枪。三十块光洋一根枪，有了枪我们就可以打团防局！”

大家听了张启龙说得很有把握，一个个高兴得点头。我又问了问这里去黄茅和排埠的路线，还比较安全，放了一点心。又觉得这一次先打土豪，有了枪再打团防局，也比较有准备。这确是一个好办法，一定要把浏东游击队的活动恢复起来。至于以后如何打仗，千万要吸取上次血的教训。当场决定当夜就派人去把七支枪取出来，到明天晚上再分头到江西黄茅去集中。路上不要被人发现。

就这样散会后，我留张启龙和我一起去住。回到睡的地方，我便向张启龙打听我在祁阳养伤一个月中全国发生的情况。张启龙便把党中央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经过，一五一十地

讲了出来。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毛泽东的课，对这位老同志十分敬佩。便打问毛泽东的身体如何，现在何处。张启龙便说，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还说毛泽东到过铜鼓。当时潘心源带他到三团去，路上被团防局的哨兵发现了。毛泽东一边跑一边丢几块银元在地上，趁哨兵拾钱去了，才脱了身的。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等到睡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张启龙要回家去料理一下。按照会上的决定，张启龙和汤祥兆从施家大屋出发打前站，先到金钟湖等大家。

不想张启龙和汤祥兆才走到观音堂大路上，忽然看见前面过来七八个人。从那走路歪歪倒倒的样子，张启龙就有了警惕，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便连忙摆手示意汤祥兆，要他走慢些，留在后面装做不认识。

慢慢地，七八个人过来了。正要擦肩走过的时候，忽然其中一个姓林的家伙，反转身一把拖住张启龙，嘻皮笑脸地喊：“哈哈！老子昨夜梦见了财神菩萨，今天要发财！”同行的人还瞪着眼，他便说：“弟兄们，这位就是县里悬赏捉拿的十大暴徒首犯张启龙。我找了他好久了！快抓住他去领赏……”

这个家伙一边说一边就掏出了绳子，把张启龙捆了起来，抓着往团防局去了。

开初，他们把张启龙带到观音堂乡的一个小团总家里。这个小团总害怕游击队，待在家里不出来。姓林的

家伙把张启龙又送到一个叫古寇三的小团总家里，姓古的说：这事太大了，我管不了。他也是害怕浏东游击队将来向他要人。那个姓林的又把张启龙送到观音堂小团总林绍兴的一个店铺里。林绍兴看见是张启龙，他俩曾在永和区学务委员会同过事，两个人关系还好。便问道：“你为什么被捉到这里来了？”张启龙说：“我没有犯法。现在请你帮我办三件事：一是赶快给我的朋友王采田送信，说我被抓了。二是借两百块洋钱赎我出去，将来我负责还你。三是要他们不要打我。”这个小团总听了，便对抓人的说：“我管不了这事。”那个姓林的家伙看见这些小团总都不肯收人，便把张启龙留在观音堂街上，派人到永和大团防局去送信。大团总汤原焰马上派团丁汤由浩来观音堂办理。

这事情一下子传到游击队，一个个心急如焚。刚刚有一个活动计划，又遭到了这个意外。张启龙是我们的亲密战友，又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万万不能给敌人抓去。万万不能这么白白牺牲。怎么办？赶快营救！我想水浒传那上面就写过杀场救人的事。便立刻和游击队的人商量。大家一合计，现在第一步，要防止敌人把张启龙从观音堂乡转移出去。决定首先白天要在必经的大路上埋伏好，看见有人押张启龙过来，就拦路抢劫。

远处，在阳光耀眼的大路上，果然看见有两个穿黑衣的团丁，押着一个人过来了。躲在山坡树林中的游击

队见了，一个个如同下山虎冲了过来。两个团丁见了，吓得丢下犯人转头就跑。大家跑近一看，不对，犯人是一个老信子，由于他儿子是个过去的农会干部，逃跑了，团防局便抓了他的父亲做人质，要送往县城。这位农会干部的父亲被救了，张启龙却不见下落。

我们更焦急了。莫非张启龙已被押送到县里去了。我赶快请李贞带另外一个队员，亲自到观音堂街上去侦察，是不是张启龙还在街上团防局？现在又关押在什么地方。

恰巧这时，永和大团总派了一个团丁来到观音堂，交代不把活的送来，也要把张启龙的脑壳提来。他看见这时有许多老百姓，挤来挤去的要看张启龙是什么样子。生怕人多有乱，加上他听说上午在大路上，出了游击队抢人的事，他把那个姓林的喊到一边，打算晚上转到一个秘密地方下手。

人群中李贞也挤在中间看热闹，她看见人还留在观音堂了，便叫那个游击队员留下观察，她自己便成了飞毛腿，赶快找我报信。

我从祁阳回到浏阳，沿路知道这些国民党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是十分残酷的。出于一股热血刚性拚死也要打救自己的同志。只是，我却从来没有从拿刀拿枪的敌人手里去抢救人的经验。况且，现在只有十三个游击队员，一共七支步枪，这么少的力量，能够把人救出来

吗？

想过来想过去，现在有利的条件是游击队的每个人，都下了决心要抢救张启龙，大家都十分敬爱他，革命十分需要他。加上对团防局的仇恨，我们拚死也不怕。再就是附近的几个小团总都没有出面，说明他们还有些害怕游击队。这附近的群众也是拥护游击队，一心向着革命的。想到群众条件好，我们便决定发动一些革命群众来协助。我便要李贞和其他游击队员马上去串连群众，串连得越多越好。

于是，便决定当晚就要直扑观音堂街上的团防局，把张启龙从牢房中抢救出来。

这一回，我们想到要用智谋，要虚张声势。除了发动了大批群众，还到小学里借来了两把铜号，想在冲锋的时候，把军号一吹，敌人不明底细，就会逃跑。

一切布置停当。到了晚上，我们十三个人七支枪摸近观音堂街口，马上把两支军号吹响，分散在四处的群众，一齐呐喊冲啊、杀啊！七支枪也一齐开火。一刹时，军号声、枪声、喊声响作一团，观音堂小小的街上，顿时闹翻了天。

关在牢房里的张启龙，听见枪声、杀声，知道同志们冒死来抢救他了。他是又感激又兴奋。只是一想，他被这姓林的家伙关押在这林家祠堂的牢房里，同志们怎会找到呢？正在焦急中，只听见牢门外那个姓林的在说：

“不行了！干脆把他干掉完事！”另一个看守说：“来不及了！你听这冲锋号，他们的人全上来了！快跑吧！”说着，只听见“郎”一声，一把钢刀落地，那两个家伙丢下凶器，各自只顾逃命去了。正是这一番声势，把这些敌人吓跑了。张启龙听见门外没有动静了，便在里面大声喊：“张启龙在这里！”

这时团防局的兵也早吓跑了。游击队进团防局四处寻找，不见张启龙的影子，马上凉了半截。想不到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怎会找不到人呢？我马上叫人守住街口，再四处仔细寻找。李贞和许多人在满街上大声叫喊：“张启龙。”

最后，大家终于找到了张启龙。我们便一边撤退，一边火烧团防局。

在游击队胜利进山的路上，张启龙闪着泪花，握住我的手说：“我张启龙感谢全体游击队的同志，拚命冒着危险来劫狱救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为了感谢党和同志们的救命之恩，我以后要改名为张复生，以示不忘！”

同志们听了，也都过来和他握手，向他祝贺。

接着大家商议在观音堂烧了团防局，不如乘胜按原计划进行，到黄茅去打土豪弄钱买枪。游击队便向金钟湖前进。赶到金钟湖时，天已经大亮。只好先派人到黄茅去侦察。不久，去的人回来说，观音堂火烧团防局的事，黄茅的人也知道了，那里的团丁把土炮、鸟铳都搬

出来了，已经有了提防。我便和张启龙商量，放弃了打黄茅的计划、当天队伍停在金钟湖的山上，不想又被当地反动地主分子发现了。他们威胁了一些农民，在山下喊捉“土匪”，要上山来捉游击队。我们知道这些农民是被地主威胁、受骗才来的，便要游击队不要向农民开枪，只把队伍拉到高山深处。就这样，我们在金钟湖山上呆了一个白天，到天一黑便转移到大众岭深山里。

这时，我们发动的观音堂暴动，火烧团防局，抢走张启龙的消息，不仅全县震动，连长沙省城的报纸上，也登了这条大新闻。浏阳县反动县长马上带着人亲自到观音堂来，口口声声要消灭游击队，捉拿张启龙归案。

这消息也传到了游击队。我想张坊一带形势紧，不好回去，便找张启龙、李实行几个人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先到东门去打土豪。队伍便朝东门方向出发了。

花 轿 迎 亲

浏东游击队决定向东门出发时，正好路过张坊街上。这时已经夜很深了，只是张坊小学校里还亮着几盏灯。张启龙在张坊小学教过书，知道这个小学里有几位老师十分反动，杀过人，便马上带着游击队冲了进去。不想那几个教师中的败类，正围在灯下赌钱。游击队一个个把他们抓起，当场处决。走时留了一个条子作为审判的

告示，写了这四个人的罪状。马上熄灭火，游击队便神不知鬼不觉的走了。

游击队来到红苇假山里，有个群众报告，李家大屋有个团总叫孔昭四，又矮又胖，又狠又蠢，剥削农民血汗，整天吃喝嫖赌。要求游击队去干掉他。我也听说这家伙是地方上一霸，无恶不作，便决定带人去打。只是派人去一了解，这李家大屋扎了一队团防兵，有十几支好枪。孔昭四自己就有一把匣子快枪。白天去打他，打不过他们。要是晚上去偷袭，这李家大屋有几丈高的围墙，也打不进去。我想到上几次失败的教训，便提出不要硬拚，请大家献计，智取李家大屋。最后研究出一个办法，在地方找熟人，选派两个人到李家大屋去当团丁，来一个里应外合。结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在那天的半夜，游击队派进去的人正好轮到站岗，便乘机把几道大门打开，游击队悄悄地摸进了李家大屋，敌人的团防兵都睡着了。游击队把他们的枪全背走了，他们还不知道。地主孔昭四醉得象一条死猪，游击队抓住他，把刀架在他颈脖上，他还咕咕噜噜地喊：“不要开玩笑！”竟这样成了一个刀下糊涂鬼。

接着，游击队一把火烧了李家大屋，打开了粮仓，要附近群众把几十石谷子挑走。为地方上除了一大害。天亮之后，镇上联防队赶来捉人，游击队早就无踪了。这一回，不开一枪，就缴获了十几支枪，得到了很大的胜

利。

这是我们自从开始地下秘密斗争以来，第一次这么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预定计划。这种斗争方式，乘虚而入，里应外合，声东击西，也使浏东游击队在几个月之中就发展成了近百人的队伍。许多农运时期的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参加。

在许多参加的青年中，有一个名字叫王绍坤的，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她在浏阳洞溪小学读书时，聪明伶俐，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受到当地党团组织培养。一九二六年她考入浏阳县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北伐军来湖南，她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协助农会做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学文化。到一九二七年“三八”妇女节，她勇敢地 and 邵振维一起，带着要求自由平等的妇女，冲入孔庙，在孔庙坪举行“三八”节庆祝大会，向旧礼教进行了公开的宣战。她一家兄妹九人，其中就有五个参加革命，四个人为革命牺牲。马日事变后，她革命更加坚决，参加了浏阳县工农义勇队，随十万工农攻打过反革命许克祥盘踞的长沙城。失败后，组织上要她回到浏阳县东乡隐蔽了一段时间，担负接待过往地下党员的联络工作。就在这时候，我们认识了。后来成立游击队，有一次我和李贞、李志民到了马坳，没地方住，就住到王绍坤家里。这样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当时王绍坤的思想进步，很早在女子师范读书时，进步校长李久铭向学生灌输反

封建、主张自由恋爱的观点，她在学校里贴了一副对联：

“三从四德放狗屁，贤妻良母是猪婆”。很受到一些人的称赞。从此，我们就彼此心心相印，暗中互相照顾，互送温暖，十分要好。

我要离开她家回游击队的时候，王绍坤便毅然决心要跟我随部队走。

这是向封建势力的冲击，也是向爱情的冲击。就这样，我们便订下了终身大事，宣布结婚了。游击队里有女游击队员李贞，现在又多了一个王绍坤了。游击队的生活，虽然东奔西跑，夜晚住宿深山的小棚，吃饭也饱一顿，饿一顿，特别是下雨天还要走夜路，十七岁的姑娘王绍坤却一点也不怕，也不叫苦。她休息下来时还给大家唱歌跳舞，象一只深山中的小鸟，给革命带来欢乐。

游击队不断扩大了。在庆祝秋收起义一周年的时候，游击队计划着要攻打张家坊。

我说：“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我们这一次是三打张家坊了。”大家听了有人不懂地问：

“怎么是三打？”

我说：“我们游击队从平江借到枪，刚刚成立的时候，配合农民行动，第一次打开了张家坊团防局。只是战后不慎，牺牲了刘少龄一些好同志。这是一打。二打是杀了张家坊小学的反革命教员。现在我们人多了。这

次是三打张家坊，要彻底消灭团防队。这回一定要打好，要有计谋。”

派人到张家坊去摸情况。这个人回来报告说：

“团防局的联防队，他们有了防备。现在正是秋收时节，他们害怕又会象去年，来一个秋收暴动。已经命令联防队的人，晚上不要睡在团防局里，害怕游击队来袭击。”旁边有人听了说：

“那又不好办了！没办法下手！”

我又向侦察员打问联防队的日常情况。侦察员说，敌人的联防队，晚上都睡在外边街道屋檐下，要等到天大亮了，才放心回团防局去洗脸、吃饭。侦察员笑了笑说：“我看见那一阵子，他们才乱呢：他们懒洋洋出来，先把枪送回宿舍，才一个个挤着去上厕所，拿毛巾洗脸。”

听这一说，我想，这不正是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吗？同张启龙、李贞等几个骨干分子商量定计。我和张启龙还仔细查看了地形。

张家坊靠山修了一条青石板路，是东乡的一个大镇。路两边街上都是二层木楼，茶馆酒店连成一片，行人小贩十分稠密。清悠悠的浏阳河，沿街而过，河上有船只木排，来来往往也很热闹。街上还设了大团防局，驻扎了联防队。因为游击队活动频繁，桥头街口筑起丈多高的门楼，设岗放哨，盘查行人，使来往货商行人，格外

堵塞。

我和张启龙考查地形回来，决定要派游击队进到街上，来一个中心开花。由于是白天行事，游击队员一定要化装，才可通过岗卡。商量了半天，大家献计，最后议定游击队分成两批，一批人化装成秋收扮禾的短工，把枪藏在扮折里，每个人挑上一担箩筐，里面藏好自己做的土炸弹。三个一路五个一群，一边走一边喊：“谁家扮禾哪，谁家扮禾啊。”先混进街上准备内应。另一批人就化装成迎新娘娶亲的。其中一些人打锣敲鼓，放鞭炮、吹唢呐，走在前面。后面就跟上一乘花轿，轿子里坐上一位假扮的新娘子。花轿下面放上枪支。另外就是一些穿长袍短褂迎亲的男男女女，足足有四五十人。

这一天一清早，我和张启龙带着另外一部分游击队，守候在张家坊镇外面的山坡上。先是看见第一批化装的短工队一清早就到大街上去。接着又看见一群人拥着花轿，也平安无事的混过了街口的岗哨。

当这两批人按计划靠近团防局的时候，正好是联防队的人起来，洗好脸，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团丁们拥在伙房前，一边哼着小调一边等着开饭。他们一个个紧张了一夜，这阵子料想游击队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大白天来袭击，正想好好吃一顿饭。

不料顿时枪声喊声四起，镇里镇外的敌人乱成了一团。化装的游击队员们大家一起冲进了团防局。

不消十分钟，联防队吓得逃跑一空。整个战斗只花了二十分钟，我和张启龙冲到团防局，全部缴了联防队十几支枪，游击队还在镇上补充了一些物资，马上撤离出来，三打张家坊获得胜利了。

浏东游击队的声势越闹越大，长沙的报纸上也登出了我们三打张家坊的消息。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蒋长卿看见了，要亲自下来看一看，便和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一起来找我们。通过党的联络站，翻山越岭，在浏阳东乡张家坊和永和之间的丙子岭找到了游击队。当即召开了党代表会，滕代远在会上介绍了各地斗争经验和情况。因为潘心源已从浏阳调到湘东任特委书记，便正式成立浏阳县委，由张启龙担任县委书记，我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在会上明确分工，由我负责县委日常工作，张启龙负责游击队武装工作。这一来就着手在浏阳县全面地开展革命工作。在武装斗争的配合下，互相开展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在全县开展抗租抗税。

从此，我便离开了单纯的武装游击战争，着手从事党的群众工作，党的政权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日日夜夜出入于人民群众之中，在群众的掩护下出入敌人布置的可怕的白色恐怖之中。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我担任浏阳县委负责工作，一九二九年又担任湘鄂赣特委书记。

湘鄂赣边特委

一九二九年四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我从浏阳县委调到湘鄂赣特委工作。

湘鄂赣是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主要包括平江、浏阳、岳阳、临湘、铜鼓、修水、武宁、万载、宜春、通城、崇阳等，最多时达到十二个县。

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就与平江、浏阳等地恢复了组织关系，以后又相继建立了浏阳、平江、岳阳等县县委。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集中力量在平江、浏阳、醴陵和安源发动起义，并派夏明翰、李六如赴平江发动起义。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时我党掌握的武装已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秋收起义后，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曾攻克浏阳，因麻痹轻敌，陷敌重围，全团星散。毛泽东同志率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占浏阳东门市，后又通知各团到浏阳文家市会合。九月十九日，秋收起义部队一、三团和二团余部会师文家市，由毛泽东率领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革命力量。

一九二八年一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湘鄂赣边特委在岳阳成立，书记郭亮，统一领导湘鄂赣边的武装割

据，推动两湖暴动。三月，中央决定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但因叛徒告密，不久郭亮同志被捕，在长沙英勇就义，特委机关遭到破坏。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于平江县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也先后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敌人调集六个团的兵力扑向平江城。为保存革命力量，红五军在消灭敌人五百多名后，向平江、修水边界转移。平江起义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支援了湘鄂赣边界各县的人民起义力量，促进了湘鄂赣根据地的形成。

八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由平江黄金洞出发，到浏阳、万载边境活动，并相机南下与红四军会合。但部队行至万载大桥时，遭敌伏击。部队由二千人减至五百多人，遂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一带休整，加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逐步开辟湘、鄂、赣根据地。九月十七日，红五军进驻江西铜鼓县幽居，滕代远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和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党的联席会议。当时我是代表浏阳县委出席会议的。会议决定正式恢复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滕代远、彭德怀、李

宗白、邱训民和我，我们五人为常委，滕代远为书记。会议还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修水县台庄为中心，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时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编入红军。会后我仍回到浏阳，主持浏阳的工作。

十月，红五军和平江、浏阳等地的赤卫队员统编为十个大队。黄公略等率领五个大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浏阳、万载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率五个大队和军部直属队突出重围，再次向井冈山根据地方向运动。

一九二九年一月，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的红五军一部由黄公略任支队长，张启龙任党代表，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会剿”，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

四月十二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在平江召开扩大会议。这时我已正式调特委工作。会议着重贯彻了党的“六大”精神；决定边区工作以大围山为中心，向四周发展。会议并建立了新的特委，经过选举由我担任书记，并成立了以赖汝樵为主席的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边区统一的临时政权组织；留在边境的红五军一部改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支队长黄公略。

在新特委成立不久，约在六、七月间，湘、鄂、赣三省反动派调集五个团的兵力，联合平江、浏阳等七个

县的反动武装，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会剿”。由于边境第一次遇到敌人以这么大的力量进行围攻，因而损失较大，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群众总数在三万人以上，从而使边境斗争处于困难时期。特委精减机构，团结军民，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

八月三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决议指出，边境目前的工作是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完成边境各县的武装割据，准备实行边境的总暴动。同时，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新政策，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以雇农、贫农为中心，团结自耕农中农和少数富农。

八月底，红五军主力回到湘鄂赣苏区，与湘鄂赣边境支队在平江会合。根据省委指示，两部合编，仍称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副军长黄公略，党代表滕代远，辖五个纵队，共三千多人。随后分兵鄂东南和湘赣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恢复与扩大苏区。

九月二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芦头召开扩大会议，红五军军委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四·一二”扩大会议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新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策略原则。决定苏维埃政权组织由公开转变为半公开形式，尚未公开的地方则注意秘密割据；在土地问题上，提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纠正过去没收一切土地，

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错误做法。强调党在农村的工作路线是以贫农为基础，联合中农、中立富农，反对地主。会议选举了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仍由我担任书记。并决定在边境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湘鄂赣边境革命委员会。会后，在红五军积极配合下，根据地获得很大发展。至年底，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扩大到万载、宜春、宜丰、通城、通山等县，特委机关迁平江长寿街。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湘鄂赣边特委管辖平江，浏阳、铜鼓、修水、武宁、万载、宜春、通城、崇阳九县。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红五军接受江西省委指示，同时与湘赣边特委发生关系。

十月，红五军和平江长寿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帮助湘鄂赣苏区发展的指示，决定以纵队为单位，积极向外发展，实现向北开辟鄂东南和鄂南地区，向南争取与湘赣边根据地连接起来的任务。军部率一、二、三纵队留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通山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四纵队回湘赣边根据地活动；五纵队到鄂东南活动。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为了援助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进一步打开湘鄂赣根据地大发展的局面，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浏阳、修水、万载等县组织群众性的武装大示威，参加者三十多万人。通过示威活动，

进一步发动了群众，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与扩大。下旬，为配合湘鄂赣边特委组织的“红五月暴动”，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苏区。

五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领导边区军民举行“红五月大暴动”。红五军在赤卫队配合下，先后攻克平江、修水、万载等县城，游击于萍乡、醴陵、浏阳一带，为湘鄂赣苏区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平江、浏阳等县苏维埃政权相继恢复，各县党组织也得到巩固和发展。

五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湘阴遭到破坏，十一人被捕。六月，省委在益阳建立新的机关，调整了省委领导成员，由宁迪卿任书记，蒋长卿负责宣传，张学琅担任秘书，郭立山负责团的工作。我也调省委负责组织工作，从此，离开了湘鄂赣地区。

自从我离开湘鄂赣后，听说该地区在李宗白为书记的特委领导下，取得了不小成绩，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也遭受到不少困难和损失。记得我调到湘赣苏区工作期间，一九三一年底，在湘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不久，我们曾接到过湘鄂赣特委的各种文件，并听取了他们派来的两位代表的报告。那时湘鄂赣的形势确实十分严峻。平江、浏阳两县各有敌军八九个团之众，对苏区的进攻异常残酷。修水、铜鼓、万载等县也分别驻有敌人三四个团的兵力。除万载的一部分外，湘鄂赣苏区几乎已全部丧于敌手。群众纷纷反水，

许多斗争历史很长的共产党员也投降自首了。我十六军有二千多条枪却战不胜敌人一个团。我方干部缺少，没有指挥能力，士兵生活非常困难，子弹严重不足。现在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敌人的残酷和强大以外，就是“左”的危害。从当时材料上看，李宗白等湘鄂赣领导同志对于扩大化的肃反是给以抵制的。例如他们认为平江、浏阳等地的许多干部都是斗争历史很长的老革命，不会加入“改组派”、“恋爱社”等反动组织。在上级压力下虽抓了几个所谓“改组派”的“要犯”，以后也未深追和株连，这本来是对的，但湘鄂赣特委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另外，在军事指挥上分散兵力打硬仗，不注意发动群众和地方游击队对于红军主力的配合，也同样是“左”的影响造成的，是“左”的军事指挥思想的不良后果。

地 下 省 委

一九三〇年六月，我调省委工作后，即赶上了进攻长沙。

六月初，中共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军长李灿(后改何长工)，政委邓乾元。红五军军长邓萍，党代表张纯清。红五军与红八军又合编为红军

第三军团。军团前书记兼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共一万七千多人。七月，红三军团重返平江。七月下旬，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特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遵照中央命令，决定红三军团在湘鄂赣边工农地方武装配合下攻打长沙。会后，成立了以赖汝樵为总指挥的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各县农民武装迅速向平江集中。二十二日，数万人在平江天岳书院草坪举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二十五日，红三军团开始攻打长沙，二十七日下午占领长沙，先后歼敌四千多人。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湖南省委派张学琅、余牧民赴长沙指导工作，要求红军向湘阴、岳阳、宁乡方面进攻；同时，命令南县、华容、安乡、益阳、沅江各县举行庆祝示威运动，以扰乱敌人后方。二十九日，红三军团政治部创办的《红军日报》出刊。军团前委和政治部在报上分别发布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下午，长沙十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红三军团和赤卫军。

七月三十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成立，主席李立三，副主席杨幼麟，彭德怀、李宗白等十三人为委员。我是随攻城部队协助后勤的行动委员会主任，随军进城后，因李立三同志一直未到职，省苏主席即由我以王一分的名字为代理主席。当时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苏维

埃政纲，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并创办《苏维埃日报》。八月二日，长沙八十多个团体共十万人冒雨隆重集会，纪念“八·一”和庆祝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会上，处决了叛徒苏先骏。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我们在长沙实际只呆了十天，但工作确实做了不少，我第一次负责这样头绪繁多的工作，但由于处在攻下长沙的无比兴奋之中，所以根本想不到累。我们在公布了有关法令以后，即着手做实际工作。共释放关押在国民党反动监狱中的政治犯和共产党员三百七十多人。同时，还要镇压反革命，要查证审批。此外，还要协助红军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在十天之中，由商会、税务局出面，征集到三十万银元，缴了敌人步枪四千多支，机枪四十多挺，迫击炮二十多门，子弹、炮弹几百担。通过工会、妇联等各种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四千多人参加了红军。在群众工作方面，在各行业中成立了赤色工会五六十个，还在长沙近郊召集了农民开分田会。当时，每天群众排着队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反映各种情况，简直无法一一接谈。

八月五日，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向长沙城反扑，形势逆转，红三军团撤往平江长寿街，省苏维埃机关也随军撤往长寿街。湖南省委则在长沙附近梨梨成立省委办事处，后又移往湘鄂赣苏区。

八月间，为配合红三军团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率

红一军团从赣西来湖南，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两军团党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方面军下辖一、三两军团，共三万多人。八月二十四日，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再打长沙，並包围了长沙但未成功。九月十二日乃撤了长沙之围。

八月二十八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布置了长沙、湘东、湘西、湘南等几个中心区域和铁路、海员工人的工作。会议按照李立三的“左”的错误方针，决定组织省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省工作。行委由宁迪卿、王首道、蒋长卿、张学琅、余牧民、李宗白、刘建中组成，由宁、蒋、张、余和我五个人为常委。宁迪卿任书记，我负责组织兼管军委工作。这时又接到中共中央来信，指定宁迪卿、王首道、张学琅等人组成省委，并决定省委暂由长江局管辖，工作范围主要在非苏维埃区域，中心任务是发动工、农和士兵运动，以配合红军的进攻。十月，省委机关迁至长沙县铜官，后又转移到靖港。

这时的省委，实际上形成了设在白区的地下省委。

为了隐蔽省委机关，我们在铜官镇上开了个米铺，并将我当时的妻子王绍坤同志接了来，她的堂妹王绍兰

跟着来了。她们既要照顾米铺的生意，还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和接待联络工作。我也打扮成商人模样，充做米铺老板，以掩人耳目。当时实际工作很忙，反动派何键，又慑于红军打长沙的威势，疯狂地四处加紧搜捕共产党和一切嫌疑分子，唯恐自己反革命江山坐不牢而加紧镇压，因此，形势是相当紧张的。不断听到党的同志被捕、被害的消息。为了保护党的机关的安全，我除了提高自己的警觉外，也十分注意对王绍坤姐妹的教育工作。

不久，情况突然有变。我接交通员送来的情报，米铺有叛徒告密，国民党稽查处要派一个特务连来抓我们，因此决定大家马上分散转移。为了保证安全，我决定王绍坤姐妹要同我分开走。但绍坤不理解我的心情，总希望能一起走。由于红军占领长沙时，我是公开的代理省苏主席，经常公开露面，在万人庆祝大会上是我讲的话，叛徒苏先骏是我主持宣判的。因此许多人认识我，何键也是点名要抓我的。跟我一起走，当然是更危险的。经过反复说服，绍坤才含着眼泪勉强同意同她堂妹单独走了。可是想不到我们这一次的分别，竟成了永诀。后来得知，她们二人离开铜官到靖港上轮船时，就被坏人发现告了密。这时靖港稽查处的敌人已知道派去铜官抓人的特务连扑了空，他们认为我也很可能就在这条船上，于是马上派了一条小火轮紧跟航船到了益阳凌子口码

头，轮船靠岸后即进行搜捕，没有搜到我就狠狠地把王氏姐妹逮捕押到长沙第四路“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经过半个多月毒刑逼供，她们始终坚贞不屈，被敌人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绍坤死时年纪刚刚二十岁。

我是同省委委员刘格非一同坐长途汽车到常德的。同车上还有一些同志，我们事先约定是装做互不相认的，所以同车是为了遇到特殊情况可以互相有个关照。但是意想不到的的是发现车上有敌特跟踪。这时，我们只有互相使眼色，准备着汽车一到站就马上跑入人群之中，摆脱敌人。

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公路边的一个小镇，司机忽然把车停下来，喊着：“要想下车上厕所的，快去快回”。这时，我马上第一个跑下车去，刘格非接着也跑了下来。那个特务也沉不住气了，赶紧大喊大叫：“那个就是王首道！共产党！抓住他！”刘格非说他在这一带有熟人，要我跟着他跑，眼看那个特务也紧追上来了，我们便随跑随把十几块银元撒在路面上。因为国民党特务没有不爱钱的，看见地上这么多白晃晃的银元，哪有白丢着不要的，便弯腰去捡。我们就趁这机会拐进一条小巷，终于摆脱了敌人。这时我们也不敢再乘长途汽车了，一直从小路行走，赶到常德已经是晚上了。

按照预先通知的地点，见到了蒋长卿夫妇。据他们说，特务紧追我们跑下车去后不久，大家就鼓动司机马

上开车不等了，结果汽车顺利到达常德。

半个月以后，湖南省委书记宁迪卿来开会，决定了省委分工：我仍负责省委的组织工作，蒋长卿负责宣传，郭立三负责青年团工作，张学琅任秘书长。当即派张学琅带着省委书记到武汉长江局汇报工作，书记职务暂由蒋长卿代理，并交给蒋活动经费五千七百元，具体由省委机关唐继宗保管。在这次会议期间，我才知道王绍坤姊妹英勇牺牲的消息。同志们都很同情地劝解我，唯恐我过于悲痛。

其实，同志们的心意我也理解，但战友的牺牲怎么能使我无动于衷，何况又是自己才结成的青年伴侣。不过我也通过战斗的实践鲜明地认识到，闹革命就难免流血牺牲，这次来常德的路上我自己也是幸免了一次死难。所以全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都是幸存者，确实是如此。

这时组织工作也相当繁忙，要恢复建立从常德到长沙、衡阳各地遭到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要重新建立从常德到各赤色地区的地下交通站。我只有用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寄托我对牺牲战友的思念。

一九三一年一月，随省委书记宁迪卿去武汉的张学琅匆匆赶回常德，秘密向我和蒋长卿汇报了一个重大事件。

原来省委秘书长张学琅到武汉后，便把宁迪卿安顿

在武汉的汉口中山马路一家荣记百货商店楼上，秘密住下。这家商店是湖南省委设在武汉的党的联络站，是张学琅用党的经费四千五百元，以借给他舅舅做生意为名开设的。他们来到以后，就派省委的交通找上级联络。由于上级的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省交通员因而被捕，并马上叛变，带着敌人来荣记商店，把宁迪卿和交通都抓走了。直到晚上张学琅回到商店，看到人也没有了，店也打得稀烂，知道出了事，便连夜逃走了。

遇到这样的大事，我们立即研究了应变办法。我提出，省委书记被捕，要立即向中央报告，同时马上通知下属地方组织转移，以免发生意外。当即决定，由蒋长卿夫妇留常德，因为唐继宗有一个表亲在常德开旧衣铺，可以搞到铺保租房子。便要他俩带着几千元党的经费到常德去建立秘密地下机关。张学琅到益阳做善后工作。由我化装成商人，去上海找党中央。

省委书记被捕，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许多地下党组织名单，知道党内许多事情，只有尽快向中央报告，防止党组织遭到进一步的损失。因此，我十分心急，恨不能立即赶到上海，见到中央的同志。只可惜我还是慢了一步，事后得知，并没有来得及砍断敌人伸向湖南党组织的魔爪。

事实是，省委书记宁迪卿被捕后，由于叛徒的指认，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曾两次留学苏联，担

任过湘潭县委书记，从事过水口山的工人运动，一定掌握有我党的大量机密。于是敌人使用了一切办法，要他叛变自首。先是由何键亲自出面请客吃饭，许以高官厚禄，接着又把他解到长沙交军法处严刑拷打。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这个软骨头经不起考验，终于叛变投敌了。

叛变的宁迪卿，和敌人设计了一条十分恶毒的诡计。为了骗取我党同志的信任，他们编造了一条大号新闻在国民党报纸上公开宣传说：湖南著名共党宁迪卿（化名周荣华）日前在汉口被捕，解来长沙途中，买通看守兵相携越狱，化装潜逃。已严令军法处限期缉拿归案云云。

这张报纸传到益阳，首先张学琅看到了。他亲自带宁迪卿到武汉时使宁遭敌人逮捕的，如果宁真的能逃出来，自然很高兴。同时，在常德的蒋长卿见到报纸后，也给张学琅来信，嘱其如遇到宁迪卿，要好好保护，送往常德。

过了几天，叛徒宁迪卿果然带了一个敌人军法处的特务悄悄来到益阳，并骗到了张学琅的信任，又带他到了常德。

到常德后，宁迪卿用同样的花言巧语想再次骗取蒋长卿的信任，仍说他是用几张十元的美国花旗票，收买看守兵而逃出来的。蒋长卿随口问了一句：“你说你身上四百五十块现洋，还有一块怀表全被敌人搜走了，怎么

还有美钞？”宁迪卿则诡辩说：“我手脚快，敌人不在时，我就把几张美钞塞进肛门里，才没被搜走。”

晚上，唐继宗向蒋长卿说：“刚才宁迪卿说把美钞藏在肛门里，这事我不相信。”唐继宗读过武汉中山大学，有一定阅历，经他一提醒，蒋也对宁迪卿产生了疑问，但并未认真过问。结果，益阳、常德两处机关都遭到破坏。所有在这两地的省委同志几乎全部被捕。蒋长卿被敌人抓去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只有唐继宗装做农村妇女，敌人又找不到证据，最后讨保释放。其他被捕的人有的被害，有的自首，使湖南党组织很长时间难以恢复。

我到了上海找到党中央后，在敌人报纸上知道了蒋长卿同志牺牲，宁迪卿叛变。已知湖南省委的事无法挽救了。我也被党中央留住，进到一个短期秘密学习班学了一段时间，随即被中央派往湘赣苏区工作。

第三章

湘赣苏区

湘赣苏区，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辟和创建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前后历时八年，其间，我曾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生活、战斗过三年，参加了湘赣省委和省苏的组建工作，担任过两届省委主要领导。但湘赣根据地的实际建成，并不在湘赣省的正式建立之时，这要追溯到一九二八年。

湘赣根据地的建立

一九二八年底，湘、粤、赣敌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边界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一方面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另一方面由彭德怀、滕代远、张子清等同志领导红五军及红四军一部和地方武装，坚持湘赣边界的斗争。这就成为创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

赣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因此，可以说，湘赣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重建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经过艰苦和曲折的斗争才巩固下来的。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中共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前委、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即“柏露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决议，研究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行动方针和部署。毛泽东同志在广泛征求意见、详细分析敌情、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用“围魏救赵”的方法，粉碎敌人“会剿”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因此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转攻敌人后方，以求在外线作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外线调动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围。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行动，虽然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但围攻井冈山的敌军仍有十余个团，而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一千余人，对比之下，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仍十分严重。一月十六日，已占领莲花、遂川、永新等地的湘军，逼近井冈山根据地。二十六日午前，分五路向我井冈山的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等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军在每个哨口只有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凭险

拒守。由于红军指战员同仇敌忾，激战三天三夜，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到二十九日清晨，湘敌两个团又乘雾绕道扑向黄洋界口后方的小井，使守山红军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总指挥彭德怀当机立断，留何长工、王佐率红三十二团一部在山上坚持，其余主力迅速突围。

红五军主力突围后，湘赣边人民在何长工、陈正人、宛希先、刘作述等同志领导下，走进深山老林，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恢复和重建湘赣边各级党组织，继续领导边界人民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二月中旬，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秘密到达九陇山，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三月十一日，原湘赣边界特委常委陈正人由遂川到达永新，于十四日召开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湘赣边界工作基础已经改变，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人四面包围当中，目前应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把立足点转移到九陇山来，为建立起更大的湘赣根据地而积极斗争。会议决定取消原特委和三县联席会议产生的临时特委，另组织湘赣边临时特委，以朱昌偕、陈正人、何长工、宛希先、刘真为常委，朱昌偕为书记。不久，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来，召集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原特委恢复工作。临时特委与原特委立即领导边界人民重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逐步恢复与重建边界各级党组

织和红色政权。不久，遂川和莲花县的县委和县红色政权得到恢复，并积极开展了工作。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军阀混战爆发，敌驻守宁冈、莲花的部队撤走，湘赣边特委乘机领导各县赤卫队沿途袭击敌人，取得重大胜利，并全歼留在井冈山、茨坪的二百多挨户团员。于是先后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接着从各县抽调人枪，收集零散武装，并与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合并，成立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

独立第一团成立后，连续开展游击战争，打垮宁冈县砦市、古城之敌，收缴了茶陵和尚庄挨户团的枪支，击溃了永新龙田、路江的保安队，并广泛镇压了顽固不化的豪绅地主，使边界革命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为以后发展和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五月间，早先撤离井冈山的红五军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后，遵照红四军前委决定，重新回到宁冈茅坪，此时部队已有八百余人，三百多支枪。红五军重回湘赣边界，加强了边界的武装力量，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五月十日在宁冈古城文昌宫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上，学习研究了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增选了执委委员，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为执委常委，邓乾元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彭德怀、滕代远、朱昌偕、宛希先等均为执委。并决定将根据地中心由宁冈移到永新。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正确解决了根据地的发展方向 and 斗争策略，为了建立更统一、更牢固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进行期间，湘、赣敌军再次向根据地进逼。由于红五军远出湘南开展游击战，永新、莲花一带又受到较大损失。一九二九年七月，红五军返回赣西，一举攻克遂川县城；随后又两次攻下宁冈，接着又在安福三战三捷，对敌人震动很大。八月，红五军又前往湘鄂赣边境活动，保卫湘赣边界的任务又落到了边界各县地方武装身上。

一九二九年秋，鲁涤平接任伪江西省主席后，用全部兵力对付红四军，将原驻永新、莲花、宁冈三县的敌第十二师全部调往赣南。于是，湘赣边根据地内已无敌正规部队，只剩下挨户团、靖卫团等反动地主武装，分散防守各城镇。我湘赣地方武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收复莲花、宁冈两县城后，特委又组织部队全力拿下永新县城。

一九二九年秋，经党组织派人策动，敌吉安“八乡联防”大队长罗炳辉率部一百八十多人起义参加红军，组成独立第五团，后与红四团合编，改称红四团，仍由罗炳辉任团长。罗的起义，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赣西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促进了赣西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一九二九年秋，赣西特委机关转移到吉安县陂头。

十一月底，由中共赣西特委发起，召开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合并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为赣西特委。一九三〇年一月，两特委地方武装合编组成红六军，三、四月间改称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又称第七纵队）由红二、三团合并，柯武东任纵队司令、李锡九任政委；第二纵队（又称第八纵队）由红四团改编，罗炳辉任纵队司令、王如痴任政委；第三纵队（又称第九纵队）由永新、宁冈、茶陵等县赤卫队（原称红五团）组成，由徐彦刚任纵队司令、刘作述任政委。同时，并召开了赣西临时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

红六军成立后，继续在湘赣边界和赣西革命根据地活动。一九三〇年秋，赣西革命根据地发展到永新、宁冈、莲花、遂川、安福、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县。其中永新、莲花、泰和有县苏维埃政府，其他县均有区、乡苏维埃政府。至此，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此后，湘赣根据地内部又发生了一些波折。其一，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问题。

众所周知，袁文才、王佐出身贫寒，原为杀富济贫，与豪绅地主作自发斗争的“草莽英雄”，经红军收编，后经团结教育，由何长工同志介绍，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

批准参加共产党，曾在战斗中立过功劳，最后担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团团长。他身上难免有“绿林习气”及其他缺点。他们的被错杀经过，据彭德怀同志《往事回忆》中有叙述：

“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昌偕同志和另外一个同志，可能是王怀，也可能是陈正人同志（记不清楚），二人来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时手里拿着驳壳枪……他们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一段剪去了……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么得知‘六大’决议的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共产党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王佐非常听信袁文才的话。朱昌偕同志说：如果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五军当夜就派人到永新县城包围了袁文才、王佐部队，袁文才当场被打死，王佐逃出，又不幸落水而亡。其旧部以王云龙为首，成立反动的武装保卫团，通电反共，使井冈山地区宁冈、遂川两县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丢失了一大块红色区域。

另一问题是，在赣西根据地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赣西党内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问题发生分歧，以江西

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种)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认为，扩大工农武装不能包括在特委的总任务之内；成立红六军“未经中央批准”，不得承认；赣西临时苏维埃成立“太草率”，应于取消；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利生产，应按劳力分配等等，从而影响了特委的正常工作。

于是，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联席会议在吉安县陂头举行。会议历时四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前委代表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代表李振邦(士奇)、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王如痴、刘士奇等。会议决议肯定了特委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特委的任务应包括扩大工农武装，土地应按人口平分，赣西临时苏维埃的建立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同时也指出特委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平分土地工作未及时进行，红军应该集中，群众武装须进一步加强等。会议并决定扩大四军前委为总前委，作为四、五、六军及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色区域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中共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赣西南特委在富田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大会正式选举刘士奇、曾山、谭思聪等十七人为委员，刘士奇、王怀、李文林、肖道德、丛允中等为常委，刘士奇为书记。会后，并成立了相当于省

一级的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为了方便指挥，又在特委下设西河、中路、东河、东路、北路、西路六个分委。

从一九三〇年二月到八月，赣西南特委发动军民进行八次攻打吉安军事行动。由于吉安是赣西敌人的中心堡垒，而特委发动八打吉安未曾全面考虑主客观条件，因而一再受挫。虽然如此，但仍然鼓舞了赣西南人民的斗志，推进了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恢复了北路工作，并迫使敌人暂时收缩阵地，转攻为守。

与此同时，湘东各地革命斗争也风起云涌。湖南省委为了加强湘东地区领导，报经中央批准，于六月一日成立湘东特委，将原属湘鄂赣特委领导的浏阳、原属西路分委的莲花、茶陵、攸县，安源特区的醴陵、萍乡、株洲等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建立湘东革命根据地。并将所属各地地方武装合编为一支半地方性主力红军湘东独立师。

到一九三〇年十月，红军第一次打下吉安城以后，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据有三十四个县、四百万人口的一大片红色区域。

湘赣临时省委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认为赣西特委在工作上、

组织上、作风上存在问题较多，必须加以改组。加之当时的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使之有较大的发展，决定成立湘赣省委，并指定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我们从上海出发前夕，周恩来同志在一个旅馆里找我们谈了话，叫我们先去苏区中央局，听取苏区中央局对成立湘赣省委有关工作的指示，同时由中央苏区中央局指派其他省委委员。最后还交给我们一个中央关于决定成立湘赣省委的文件。

我和甘泗淇同志一路风餐露宿，经厦门、广东大埔等地抵达中央苏区时，已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了。中途在赣南的良口附近，碰巧遇到了从湘鄂赣苏区来的张启龙同志，他是代表湖南省委办事处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已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张启龙原是湘东特委书记，对湘东南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提出要他同去湘赣省工作，他欣然同意了。我们便一同到了苏区中央局。中央本已决定张启龙和李宗白去湘鄂赣苏区组建中共湘鄂赣省委，经我向中央局要求增派张启龙到湘赣去，中央研究后，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决定加派林瑞笙、袁德生两同志一同去湘赣苏区组建湘赣临时省委。当时还带了一个谭牛山，是协助林瑞笙同志搞肃反的，走的时候还带了许多关于解决江西富田事件遗留问题的肃反材料。

当时准备建立湘赣省的地区跨湘赣两省，但主要部

分是在江西，与中央苏区是以赣江为界，与湘鄂赣苏区是以袁水和株萍铁路为界。湘赣苏区在湖南的部分是由湘东南特委管辖(包括江西的莲花县)，在江西的部分是由赣西特委(又叫“西路分委”)管辖。

我们一行五人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到达永新，随即召开了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分委联席会议。湘东南那个班子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西路分委主要负责同志朱昌偕、左娜、马明、龙贻奎、刘天干也到了。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有战争问题(反对和平观念)、土地问题(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和成立省苏维埃问题。其中解决富田事变遗留问题的任务是秘密的，在这次会上未传达，公开讲的只是开展肃反斗争及动员群众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成立临时湘赣省委的决定，并开始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并经苏区中央局的正式决定：我任临时湘赣省委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张子意是后来的)，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易心平任少共省委书记，谭牛山任省保卫局长。不久，建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由袁德生任主席，张启龙任副主席。

这时湘赣省管辖的范围有：永新、宁冈、莲花全部，吉安、安福大部，泰和、万安、遂川一部，以及湖南省的茶陵、酃县、攸县、醴陵的大部。另外，原北路分委的分宜、新余、峡江、吉水一部及萍乡之东南乡(即东

安里、南坑、宗里、芦溪、宜风等)也划归湘赣省委直接管辖。至于游击区域就更广泛了。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立即组织湘赣军民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并于八月中旬，召开全省活动分子会议，制定了六个月工作计划。那时我们省委的任务主要是：

(1) 领导苏区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并发展苏区经济。

(2) 发展党、团、工会、共青团、妇女、少先队组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3) 扩大红军，支援红军，支援前线，消灭来犯之敌。

(4) 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

(5) 纯洁党和政府内部组织，积极开展肃反斗争。

此外，并筹备召开湘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

全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结束之后，临时省委留一名常委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接待各县来省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他委员和工作人员均下乡巡视工作。其中林瑞笙随独立一师到宁冈、遂川、酃县一带，刘其凡到北路，甘泗淇往永新，胡波去吉安，李孟弼到萍乡，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九月三日，少共湘赣临时省委召开少共

全省活动分子会议。九月十四日，临时省委召开各县工会联席会议，并分别召开了湘赣苏区的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会议。这些会议都根据全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精神，分别安排了本身的工作，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分别成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

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和艰苦的工作。在斗争中，由于受了当时统治中央的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采取了一些“左”的措施，比如：在扩大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提出了“集中注意力，巩固现存的苏区，贯通中央苏区的联系……并且与湘鄂赣苏区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过高要求；在肃反问题上，单独成立“湘赣省政治保卫分处”，秘密地进行肃反工作，并有扩大化错误；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问题上，提出了“收回地主家属土地，没收其财产、房屋、山林，分给穷苦工农，富农的土地亦同样没收，分给以较坏的土地”，“驱逐豪绅地主出境”等过左政策；在整顿党、政、军等组织问题上，过分强调在成分上“巩固无产阶级基础”，无情洗刷“阶级异己分子”等，洗刷了一些好同志。虽然如此，临时省委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其主要表现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整顿了党、政、军各级组织，有效地统一了苏区领导；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进一步发展了群众运动；为召开湘赣省第一次

党员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另外，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非常艰苦，而且作风也很踏实，经常打赤脚，穿草鞋，下乡调查了解情况，很快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一 届 省 委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以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普遍得到了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在莲花县的花塘村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共有一百六七十人参加，由我主持会议。会上总结了临时省委成立两个多月来的工作，大家认为临时省委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正式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CY问题决议案》。

在政治决议案中，肯定了临时省委的工作，同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今后的紧急任务是：“集中力量向东南发展，迅速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同时注意与湘鄂赣苏区贯通起来，迅速争取湘赣革命的首先胜利。并要求永新、宁冈苏区立即努力消灭宁冈关背残匪，向泰和、遂川推进；吉安苏区向泰和吉水推进；安福苏区与北路苏区取得联系，消灭固江、竹江各地敌人及安福白区地主武装，向吉安推进；攸县苏区应向西南发展，与

茶陵苏区取得联系。同时，应同萍西取得联系，帮助发展醴陵苏区；茶陵苏区向南与酃县苏区贯通，加强茶西的白区工作；酃县应与宁冈、遂川苏区取得联系，向东南发展，打通赣南苏区交通。”为此，决议提出十项具体工作：（1）巩固地发展苏维埃政权；（2）彻底重新分配一切土地；（3）扩大铁的红军；（4）扩大地方武装；（5）拥护全苏大会，实现全苏大会劳动法；（6）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7）发动群众斗争；（8）建立白区秘密工作；（9）彻底肃清反革命；（10）发展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提高无产阶级创造性、积极性和顽强性，使湘赣党走向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

大会通过的组织决议就巩固党组织问题，提出六项组织任务、十八项具体工作。六项组织任务是：（1）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2）彻底进行组织工作的转变；（3）普遍地进行党的列宁主义教育，健全支部生活制度；（4）改造并健全各级领导机关；（5）提拔新的工农干部；（6）加强自我批评和两条路线斗争。十八项具体工作主要包括清理内部，加强巡视工作，组织革命竞赛，加强党报，创办短期训练班，改造苏维埃，健全红军中的党组织，加强民主集中制等。

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问题决议中，肯定了过去改造苏维埃的成绩，指出工作中的不足、要求，加紧八个方面

的工作：（1）推选群众中有威信的人到苏维埃工作，清洗一切地主、富农分子、消极怠工和官僚腐化分子，彻底改造苏维埃；（2）实行向东南发展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扩大湘赣苏区；（3）正确执行平分一切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4）彻底肃清苏区的反革命分子；（5）增强武装力量；（6）加强苏维埃文化教育工作；（7）贯彻正确的政策；（8）动员每个党员积极参加苏维埃工作。

在会议通过的关于“CY”问题决议中，特别强调改造青年团的组织，转变团的工作路线，使湘赣省团的组织能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团结成千上万青年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会议通过上述决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选举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袁德生、刘其凡、李朴、刘孟弼、王震、刘锋、罗启厚十一人为省委委员，胡香美、李天柱、王豪、刘任武、刘燕玉为省委候补委员。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袁德生为常委。具体分工还是我任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袁德生负责政府工作，张启龙负责军事工作。

此外，还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甘泗淇、林瑞笙、王首道、张启龙、易心平五人为委员，甘泗淇兼任书记。

党代表大会闭幕后又召开了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大会详细地讨论了苏维埃政府工作，作了有关决议，即《湘赣苏区各级苏维埃暂行组织法》、《对全苏大会劳动法草案的决议》、《土地问题决议案》、《红军与地方武装工作计划》、《经济问题决议案》、《文化问题决议案》、《肃反暂行条例》、《婚姻条例》等。会上选举了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式成立湘赣苏维埃政府，由袁德生任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还组织了湘赣省少年先锋总队和湘赣省儿童总局，谭启龙任省少年先锋总队长，胡耀邦任省儿童总局书记（后改任少共书记）。大会还选出袁德生、王震等为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组成湘赣省代表团赴瑞金开会，由袁德生任团长，王震任副团长。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后，根据大会的决议，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1）是改造与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各基层组织都已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进一步筹备召开了有关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的有关组织。当时一些群众团体和组织是登记式的，没来得及深入发动群众通过斗争实践建立组织，因而没开展什么实际工作，还需要进

一步充实。工人群众对赤色工会还没有什么深刻认识，在工人中的影响也不大，独立劳动者和手工业者尚未按照上级指示洗刷出去，党在工会中的领导非常薄弱。由于省内根本没有什么大的作坊，劳动法令只能在省苏维埃政府管辖的兵工厂、石印局等单位贯彻。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已大部分分了田，做工的日子很少。后来我们不再给手工业工人分田，只给他们增加工资。雇农多半失业，后来也分了田。因此，一些同志就认为劳动法是“行不通”的，只是“宣传口号”。省委对这种倾向作过斗争，但未收到好的效果。

(2) 是加强苏维埃的工作。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还是没有动起来，因一般苏维埃的负责人的能力都较弱，找不到自己的工作出路，一切大小事情都还是由党委包办。天天忙于打条子接待来往人员，简直成了党委的事务处。经过省委做工作，各方面有所转变。省苏维埃各部门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也有些实际困难尚待解决。如各部负责人兼职的多，无法专心本职工作。下基层巡视工作时间太长，常委会都开不起来。省苏维埃召集了常委扩大会，专门对全省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情况很快有了好转。

(3) 是平均分配土地。到一九三一年底基本分完。但有些地方因敌人占据，不能进行分配。分配方法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一般是按照人口多少平均。省委主张富

农也按劳力和人口混合标准分田，下边未能很好的执行，仍是按富农的劳动力分田。雇农、贫农、中农按人口分田。原先按上中下三等田分别加以搭配，结果是分到的田零散，不便耕种。后来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有少数地方提出雇农、贫农分好田，中农分中田或坏田，从而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一般分田都是采取苏维埃命令的办法和平分田，未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要求组织农具站、耕牛站的工作没能实现，只是把没收地主家属的农具耕牛和抽出富农有余的耕牛农具分给了雇农、贫农。在开展反富农斗争方面有的尚未深入，有些地方又错把中农当作了富农。当时有人认为这是“AB团在捣鬼”，说是“AB团曲解利用省委省苏的指示”。其实，这种工作开展的不平衡状态，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4) 是开展了“驱逐豪绅地主反动家属”的斗争。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站在阶级立场上，坚决将这些豪绅地主反动家属分别驱除出去。“有反动能力的”在得到群众同意下大部分杀掉了。但在执行中各地并没有完全按省委指示办理。有些地方是由苏维埃下驱逐令，没有发动群众执行；有少数地方则把经济地位在中农以下的农民曾被迫“反水”的也驱逐出去了；有些地方只驱逐了豪绅，未驱逐他们的子女，则被认为是右倾表现。因而对于上述几种做法，省委都进行了纠正。被驱逐的豪绅地主及反动家属总数在五千人以上。后来敌人进攻时，

其中有不少人并胁迫一些难民到苏区来抢东西，引起群众的愤恨，被捉住的均被群众大会处决了。而对逃离苏区的贫苦工农群众，则准许他们回来，并同样分给土地。在被认为“AB团”最多的湘赣中区，驱逐豪绅地主的运动搞得更加严厉。

(5) 是贯彻经济政策。累进税大部分地区已开始征收。省苏维埃根据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征收土地累进税，并组成征收委员会。对于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价值超过百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土地税的负担主要是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红军家属则尽可能免征。商业累进税也开始征收，但隐瞒作弊现象很严重。省苏维埃为了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克服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成立了省工农银行。开始时有资金二万，并号召群众储蓄入股，计划把资金增加到十万元以上，并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

当时，湘赣苏区商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大小城镇普遍遭到敌人的抢劫和破坏。虽然通过各种办法宣传动员，白区商人总是有些害怕，不敢到苏区来做生意。因为敌人在赤白交界的路口封锁特别严，进苏区的商人、货物常被没收，甚至生命难保。经过工作有相当改进，白区的中西药和其他苏区急需的商品，时有进货。

省苏维埃过去只有一个经济财政部，后又建立了财

政经济委员会。过去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财经委成立后，对苏区经济的整顿和各种开源节流措施收到明显效果。过去苏区收入单纯靠打土豪，后来打完了，由于赤白对立，到白区去打土豪很困难，以致各县经济都相当困难。因此，必须抓好财经建设。

合作社工作也开始发展，对于某些合作社为富农把持，抬高物价，剥削贫苦农民的问题，也作了纠正。

(6) 是军事工作。湘赣苏区的红军只有独立一师、三师，枪支在二千以上。为统一指挥，有计划地打击敌人，正式组成了湘赣总指挥部，在省委下成立前委，统一指挥一、三师的行动。有些县份，如茶陵、永新、莲花，征集红军士兵的工作有不少进步，征集的志愿新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模范少先队。一般成年的赤卫队，家庭观念重，不愿到红军中工作，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做得也不充分，有些地方如萍乡，仍然存在以欺骗或强迫的办法进行扩军工作。

慰劳红军的工作有相当成绩。莲花县动员广大群众煮粥泡茶送菜送柴慰劳红军，还替红军洗衣补衣；永新的群众自动送布鞋、草鞋、茶水、花生给红军，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红色医院附近的群众在敌人进攻时也能协助医院转移。优待红军家属，给红军家属分好田，组织群众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帮红军家属解决各种困

难，举办“一个铜元运动”来拥军，群众表现得也很热烈。

在这段时期也了解和加强了对红军本身的工作。当时湘赣红军中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尚未很好建立起来。政治委员水平不高，无法真正体现党的领导，致使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相当薄弱。党员的政治素质差，政治热情低落，政治部的经常工作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另外，红军干部缺乏，独立一、三两师只有一个师长，水平不足以指挥一个师。独一师政委谭思聪阵亡，政治部主任负伤。团、连政治委员更加缺乏。红军学校虽办了两期，后又招了三百名新生，但只能培养排长之类的基层干部。因老兵伤亡较大，士兵中新兵多，影响了战斗力，无法完成重大的战斗任务。几次与周至柔、罗霖匪部战斗，虽然缴获敌人二百多支枪及其他军用品，但我们死伤也在七八百人以上，尤其是损失干部不少。红军的给养无可靠保障和固定办法。独立一师尚可支持，独立三师就困难些。三个红色医院还可维持下去，药品亦有来源，只是粮食不足，光靠税收已不够应付。这些问题，都只能多方设法，尽力克服。在当时条件下还无法谋得根本的解决办法。

(7) 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武装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敌人进攻过程中，动员了大量的群众武装担任骚扰敌人、构筑工事、流动警戒、支援红军等各项

战勤任务，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茶陵的群众武装缴获了敌人的枪支；莲花的群众武装配合红军作战取得胜利；吉安的地方武装打垮了几个地方的保安队和善后委员会，得到了许多枪支；永新动员四千多人的群众武装不分昼夜地骚扰敌人；安福的武装群众也表现得很勇敢坚决。从第一次党代会到一九三一年底两个多月中，全省群众武装共缴获敌人的枪支达二百支以上。

为了统一全省赤卫队和少先队的指挥，加强训练工作，省苏维埃决定成立了东南西北四路指挥部。为了解决群众武装武器的不足，省成立了兵工厂，可以修理坏枪，还可利用废弹壳制造子弹。大多数县也建立了兵工厂，可以制造梭镖、鸟枪等。

(8) 是加强了妇女工作。过去省里对妇女工作比较忽视，婚姻问题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经过努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做了纠正，并开始重视发动妇女参加斗争。妇女代表大会已经从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省委制定了妇女代表大会暂行组织法，规定以每十至二十多妇女选代表一人组成乡妇女代表会，各乡由每五十到一百名妇女选代表一人组成区妇女代表大会，每二百到五百人选代表一人组成县妇女代表大会。当时的各级妇女代表大会均不设办公机构，只是乡、区、县各配备组织员一人、候补组织员一人。妇女工作主要由各级党委的妇委会和各级苏维埃的改良妇女生活委员会负责进行。各级妇女

组织员在各级妇委会和各级改良妇女生活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工作。各地妇女在反对旧礼教、反对童养媳制度的斗争中，在慰劳红军、发动参军参战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9) 是白区工作，但进展不大。只是株洲和长湘区有所发展，共有一百多名党员。醴陵党组织由于出了叛徒，破坏很厉害，被敌军包围后，负责人被杀，只剩一两个干部。此外，省委派两个同志到湘南重新改造和建立党的组织，湘南特委已改为道委，指定五个同志组成临时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苏、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10) 开展俘虏兵的工作，並收到相当的成效。把捉过来的和拖枪反正过来的白军士兵进行短期训练，发动群众开欢迎会、茶话会，给他们发欢送证和各种宣传品，每人两到三元的路费，愿意回营或还家或参加红军都可以，他们非常高兴。但是对白军的兵运工作做得不够理想。许多同志怕接近白军，以致在白军和“挨户团”中的党组织未能注意加以巩固，结果只能是拖几条枪跑回来，再无法保存党的秘密组织了。有些地方对白军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还比较好，在敌人驻扎的半里路周围，散发了我们的宣传品，收效甚好。

到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时，全省党员发展到近万名；新建了几个区苏维埃和几十个乡苏维埃；开办了一期党校，培训了一百多名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各种群众团体都大有发展；苏维埃区域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二百多平方公里。

一九三二年夏，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对所属组织进行了调整，将南路、湘南两特委改为河西、湘南两道委，北路特委改为分宜中心县委。共辖有一个白区区委（长湘区）和十个县委，即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酃县、遂川。

第二 届 省 委

随着湘赣根据地建设的发展，省委领导全省军民粉碎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为了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至十六日在永新县城孔圣殿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有二百零六名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还有一百零二人列席。这时全省党员已将近三万人。我主持的会议，蔡会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蔡会文是由中央军委派到湘赣来的。当时他的职务是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治委员。和他一起到湘赣来的还有肖克同志。

会上我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指示和

有关决议，对湘赣省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和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大会认为成绩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扩大并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与北路苏区的联系已经打通，向东南发展有了部分成绩，创立了湘南游击区域和各地白区工作；

（2）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武装，一年来，红军扩充了两倍以上，地方武装平均扩大了三倍，红军与各县武装的战斗力的都有所加强，赤卫队组织也有相当的进步；

（3）群众组织工作有了进展，苏区反帝同盟会员增加到十七万人，白区反帝同盟会员发展了四万人，互济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工作有了进步；

（4）工会工作有了很大转变，会员增加了，工人斗争有部分发动，工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苏维埃和红军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也有提高；

（5）省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工作开始建立起来，如城市代表会议的建立，劳动法的初步执行，查田运动的开展，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优待红军条件的初步执行，卫生、防疫、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6）党团组织的改造与发展，无产阶级基础的加强，工作指导方法的改善，党员积极性的提高，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

同时，也从“左”的观点出发，批评了省委一年来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指责湘赣红军未积极向外发展，肃反工作表现“右倾消极”等等，因此提出了，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红军向北发展，争取吉安、赣州、樟树、南昌等中心城市，迅速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等不切实际的所谓“中心任务”。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政治工作问题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问题决议案》、《青年问题决议案》等七个决议案；制定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的具体工作计划；发出了大会通电和《实行党团员军事化告同志书》；并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签定了一周年工作竞赛条约。

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王首道、甘泗淇、张子意、张启尤、袁德生、肖伍仔、李端娥、刘士杰（此人后来在长征中叛变）、黄清龙、刘发松、贺友仁、王震、易灭非、李详桐、蔡会文、王炳生（后叛变）、刘生元、龙福、谢路生、胡香美、刘其凡、刘燕玉、谭理成、李春香、赵照等二十五人当选为省委委员；我和甘泗淇、张子意、刘其凡、王炳生、袁德生、肖伍仔等七人为常务委员；仍由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张子意任组织部长。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十月廿九日蔡会文等同志带来苏

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指示信及各种新的决议文件的背景下召开的。主要贯彻的精神是：

(1) 在中央局指示信及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的指示精神指导下，大会充分发挥了自我批评和开展了各方面的思想斗争，在所谓“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的情况下讨论了各种政治问题，并做出了有关的决议。

(2) 在极力强调成份的气氛下，代表中工人代表几近半数，即二〇六名代表中有工人九十九人，贫农九十四人，中农六人，知识分子八人。此外，还有株萍路长湘区等白区代表十一人。而且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斗争精神”强于以前的会议。

(3) 突破了以往在会议上只做决议不管实行的先例，在讨论扩大红军问题时，有二十多名代表当场报名带头参加红军，其余代表也保证每人发展三个新战士，妇女代表表示送郎当红军。这种精神立即传达了下去。在大会开会期间，永新一区一位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雇农代表十几天内扩大红军四十余人。

(4) 与湘鄂赣定了为期一年的革命竞赛条约，提高了党内的竞赛积极性。

(5) 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中心口号是：“实行战争的总动员，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完全

胜利，实现江西和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这实际上就是王明“左”倾路线提出的所谓“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但坚决保卫苏区的战斗精神还是主要的。

在二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大约是在八月初，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永新县城召开了，到会代表也有二百多人。会上是我做的政治形势报告，张启龙做的查田运动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法执行条例》等几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袁德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任副主席。

第二次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会以后，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展了工作。党代会第一次执委会期间，即由湘鄂赣无线电转来中央政府关于战争的紧急动员令，会上决定省委只留下两名常委和两名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并兼办党校，其他所有常委、秘书、干事全部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党代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开展各项工作，并配合省级机关巡视员组织了五个巡视团分赴各县，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 进行战争总动员，积极编制训练赤卫军和少先队，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向外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消灭进攻安福、吉安、茶陵等苏区的敌人，进行不断的骚扰和袭击敌军的工作。在红八军进攻吉安、官田时，游击队缴枪四十余支，击溃安福金田敌五十二师出击部队一个营，又缴枪五十余支。同时，吉安、安福、

茶陵、攸县、萍乡等县游击队、独立团都取得了胜利。在党代会前纪念十月革命运动中共缴枪二百余支，党代大会后又缴枪二百余支。

(2) 扩大红军工作,各地方武装都有了新的补充。茶陵方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师。永新中心县委所属各区都有区委书记或区苏维埃主席或委员带头参军,有的区领导干部动员和带动七八十人一起参加红军。七区送郎、送兄弟参军的有八十余人。莲花县县一级干部有二十多人自动报名参军,并带动五人、十人乃至一个排共同参加红军。同时也动员离队回家的红军士兵归队。莲花县的棠市乡有四十名逃兵都动员归队了。但据了解各地逃兵和请假回家的红军士兵总数约在三千人左右。光是永新就有二千人左右。这些人的工作比较难做。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只停留在口头宣传,领导干部和党团员不带头,就无法掀起参军高潮。

(3) 筹备战费。省苏维埃发行八万短期公债,群众购买公债非常热烈。永新城内各机关开展竞赛,有许多人卖衣物来买公债。有的人买五六十元。永新市工人有很多人买十几元的,有些挑水、打草鞋的人也能买好几元钱的公债。莲花城内的一个贫民就买了二十元。发动工作还未普及全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

开展节约运动和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暂停发服装费和每月的

五角钱零用费，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税收也进行得很顺利，造币厂制造了四万现洋。但总的说来经济还是比较紧张。

同时，重点加强了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三一年底，在省委和省苏维埃直接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人民财政委员会，次年春，县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部、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对外贸易部。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4）开展了反对敌人“改良欺骗”的斗争。敌人在进攻吉安、安福等县苏区时，使用了各种欺骗和胁迫伎俩。如利用富农带头胁迫农民群众领取白符号，组织“守备队”和“反共自新团”；用金钱收买老头小孩妇女进行反宣传。赣南甚至发生收买红军家属挑拨红军战士拖枪反水的事件。特别是敌人提出所谓“保护在家群众”、“只杀匪首不杀胁从”之类的欺骗宣传，破坏作用更大。以致金田、官田等地有不少群众被骗反水，组织守备队替敌人担任秘密通信员。为此省委发出了公开信，揭露敌人阴谋，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此外，並进行了永新中心区的工作，做为全省的试点；加强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对独立师和游击队中某些

人抽鸦片烟和流氓行为开展了斗争；对敌人占据的苏区进行坚壁清野的斗争等。

总之，二次党代表大会后，湘赣工作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正向着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大好形势却遭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破坏和干扰。一九三三年四月苏区中央局做出了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议。

改组中共湘赣省委，是苏区中央局作出的错误决议。之所以会形成这个决议，一方面，是由于王明的临时中央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根据地贯彻他们在白区实行的方针、政策，通过“反右倾”、“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等手段，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苏区中央局轻信了刘士杰关于湘赣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片面汇报。刘士杰这个人虽是工人出身，但品质很坏，去中央汇报时，名义上说是汇报，实际上是向中央告了省委的状。因为我们省委在当时虽然执行了一些“左”倾错误政策，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注意群众利益的。因此，中央认为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刘士杰这一汇报更是火上加油。于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做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保证中央与中央局的路线坚决执行，现有省委必须改组。中央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以刘士杰同

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张子意任宣传，以陈洪时、李端娥、张子意、邵德武及省工团党书记八人为常委。”

刘士杰没有到职，中共苏区中央局特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並赴湘赣省执行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议。一九三三年四月，陈洪时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后，于下旬召开了中共湘赣省执委扩大会议。会上，陈洪时传达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接着当众宣布对解除了职务的我和张启龙要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六月初，任弼时、吴德峰、方维夏等同志相继被中央派到湘赣苏区工作，並指定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永新县城召开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任弼时、刘士杰、陈洪时、谭余保等人组成的新的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刘士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这次代表大会对第二届省委的工作作出了不正确的估价，并且重新批判了我、蔡会文和张启龙等同志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思想。

从此，我就离开了湘赣苏区，到中央苏区工作。

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

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开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份夸大的估计，制造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我们临时省委审理。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时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以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湘赣苏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省委以后，由于湘鄂赣苏区遭到了严重的情况，我们错误认为这是由于领导上右倾造成的恶果，因而更促使我们进一

步接受了党中央的过“左”政策。当时湘赣省已建立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AB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投降也完全看成是AB团在“捣乱”。有些肃反委员会的委员或主任也被定为AB团分子。而肃反主要方法是运用所谓“自首政策”，“从AB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无法辩脱而直供出来”。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三一年底，全省已处决一千二百一十人，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和知识分子。此外，贫苦工农自首的或已释放的也有一千人左右。当时在押的还有五百人左右。

到了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于是才稳了一下。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肃反工作时，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过去的确也有些‘肃反中心论’的精神，以为中心工作就是肃反，事实上没有充分发展政治斗争，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积极的从下而上的肃反，工作的重心着重于‘命令，逮捕，审讯，跟踪追迹’，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教育工作，尤其是下级更把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了，甚至北路各县和攸县萍乡等肃反机关为AB团所操纵，利用来破坏肃反

工作，对共产党员和贫苦工农乱打乱杀，北路杀了六个AB团犯，内中有大多数是贫苦工农，造成群众逃跑的现象。许多地方把肃反工作代替了党内思想的斗争，只要某个同志表现了消极怠工和不正确的倾向，便简单的认为是AB团，以为除了AB团以外便没有其他反动政治派别和不好的倾向了。这样便造成了党内的恐怖现象。这样恶果虽然没有象闽西和中央苏区那样严重，但确实阻碍了我们路线的转变和工作的进展”。报告中客观地反映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恶果，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以致出现党员恐怖，群众逃跑的严重局面。但是並沒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中央对反对扩大化的意见也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照顾出身，只认成份，不问斗争经历。所谓群众路线也是形式主义，就是拿到群众中去公布一下，让群众举手表决。所以中央提出的反对肃反扩大化并未解决“左”的问题。以后肖克、蔡会文同志来了，又从中央苏区带了些“左”的气氛来，因此到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是在检讨肃反中所谓“严重的右倾消极”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间，中央专门派了人来搞肃反，他原是江西省委的保卫局长，这次被派到湘赣省任保卫局长，来的时候中央苏区保卫局又给了他一批肃反材料。

虽然在这之前，湘赣地区的肃反已经搞了很久，也杀了不少人，但一些大案的处理都是中央派人来了以后才搞的。如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朱映华、曾毅之、陈尧进、刘秉常等，这些较重要的人都是在中央派大员来了以后才处死的。记得逮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是秘密进行的。那天假说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吃饭，结果就这样逮捕了。逮捕后，对外说是袁德生调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审讯袁德生的材料有十几条，都是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审问时虽然没有用刑，但问的方法很不好，采取车轮战法，致使袁昏倒了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得到袁的口供。那时中央对袁的问题抓得很紧，每天要用电报向中央汇报审讯情况。得不到袁的口供，但又不敢确定他不是反革命，因为中央来的材料铁案如山。要突围了，该怎么处理他，请示中央后，很快回了电报，並指明电报要保卫局亲译。原来电文就是将袁就地处决。这次和袁德生一起遇害的还有黄之静。

肃反中我们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也曾持过怀疑态度。记得中央来人之前，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令。对刘其凡、李天柱的AB团问题，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当时都没捉。但也只是

暂时地抵制而已。因为那时中央局对这个问题压得很厉害，拒不执行就是引火烧身。况且肃反机关自成体系，不受党委的领导。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的是苏联革毕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又加上当时斗争环境的险恶，便在全国各苏区都发生各种反革命派问题。首先在福建闽西苏区发生社会民主党问题，在中央苏区（江西）发生AB团问题，在鄂豫皖和湘鄂赣等苏区发生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最后在陕甘宁苏区发生反革命右派问题。革命的实践证明，实际上许多所谓反革命派，大都是极“左”主义保卫局少数人主观主义，用“逼供信”方法制造出来的。所以肃反工作的路线错误，不是那一个苏区，那一个人的问题。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使多数负责人觉悟起来才能逐渐改正。我个人是从受“左”倾路线的处分，在长征中看到许多被怀疑为AB团等反革命的人，历尽种种艰辛，仍然跟着党闹革命。特别是我的战友张启龙同志，他被怀疑为反革命，被保卫局监视着，历尽千难万险，仍然跟着红军干革命。当我和王震、张启龙等同志长征胜利在延安相见时，互相述谈湘赣苏区历史时，我们都说刘士杰、陈洪时的先后叛变致死，而我们仍然健在，朝气蓬勃，这是历史的报复和考验，也是真假革命的最好的历史证明。总之我认为，当时苏区阶级斗争剧烈，反革命确是有的，问题是在“左”的影响下搞成了肃反的扩大化是完全错误的。

湘赣苏区的土地革命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湘赣革命根据地虽然经过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年两次分田，由于强大敌人的不断进攻，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群众思想上的顾虑，以及我们的经验不足，使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做出了深入土地革命，重新彻底分配土地的决议，以进一步解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

当时，重新分配土地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在农村中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协助下进行的。实施方法是：首先发动群众，划分阶级，然后斗争恶霸地主，分配土地。那时，永新、莲花、吉安和茶陵等大部分地区第一批重新分了土地，到一九三二年夏天，在边沿地区和南路、北路、萍乡、攸县等地也都分了。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少的有半石田，多的有两石多，大多数地区都有一石田左右。同时还实行了红军公田和苏维埃公田。对于红军及其家属都分好田，贫苦的老弱孤寡也分了一份土地。

但是，这次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贯彻执行了第三次

“左”倾路线的错误土地政策，对地主不给以生活出路，对富农打击过重，同时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因而扩大了打击面，树立了过多的敌人。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直觉地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开展工作的需要出发有所察觉，也尽力做了一定的纠正。如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土地问题，我们本着完全依照全苏大会土地法草案执行，但分配土地的标准，有些地方，中农贫农雇农还是按人口分配，富农则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标准分配。不过有些地方误解‘富农分劳动份地’仅按其家中有多少劳动力的分给以坏的田地，至于他家老头小孩连坏田都没分一点。现在我们认为已分过的地方也就不补，但要他们把荒田恢复起来。中农始终注意他的利益，一般的是没动摇中农，不过个别的还是有主张‘中农分中田，贫农分好田与中田，雇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这种破坏土地革命的口号，我们是给了他的攻击。最近新发展一些苏区，是要他们坚决执行土地法，但有的是敷衍了事说：‘头一次可不必分好，横直将来要再分……’。对于豪绅地主反动家属的处置问题，我们是做了群众的尾巴，犯了‘左’的错误，当莲花听到湘鄂赣边来的同志说要驱逐一切豪绅地主家属，群众就自动的驱逐起来，各地也大加仿效。省委也就发了一通函，同意驱逐，其实也未经过会议详细讨论，事实上各级执行更加糟糕，

甚至把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如酃县），不能不引起群众的怀疑与恐怖，这里不能不承认我们是没深刻了解消灭地主不是简单地肉体消灭。”

可见，我们对某些“左”的十分荒唐的东西是有所发觉並力争加以纠正的，但当时处于“左”的统治之下，而且是越来越恶性发展的情况下，是得不到什么实际效果的。到了一九三二年秋的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又有了发展，搞什么“查三代”，“查五代”，结果把一些贫农雇农查成了中农，把一些中农查成了富农，甚至把一些本来属于基本群众和同盟军的也当成了阶级敌人。记得有一个贫农，查成分查了人家七代，结果划成了地主。

由于“左”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混淆了敌我界限，以致有些地方突出了农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中农不满意自己分到的田，在查田中就要求收回自己的原来田，或者要求重新分配，而大多数贫农雇农不愿意交出已分到的好田，因而反对重新分配，结果形成了中农与贫农雇农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得采取将分给富农的一些好田收回来补给中农的办法。如果大多数贫苦农民同意重新分配时，也准许重新分配，以便尽量团结中农。但结果又加重了对富农的打击，总难得到圆满解决。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和张启龙等同志被撤销了职务以后，新上任的刘士杰、陈洪时等人把“左”倾错误推向高潮，进一步造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损失。直到六月，中央派任弼时同志来湘赣任省委书记后，才阻止了“左”倾错误路线在湘赣地区的恶性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更加强了错误路线的贯彻，特别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大反湘赣党组织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湘赣省委在路线上的错误不可能得到纠正。

湘赣苏区的武装斗争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时，正是敌人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开始。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对湘赣武装进行了整编，将湘东南独立师改为独立一师，将西路地区的独立团改为独立七团，统归省委和省苏维埃指挥。当时，虽然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已开始在湘赣根据地执行，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我们湘赣又是中央根据地的重要战略侧翼，因此，湘赣红军同中央红军一样都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同敌人作战的。

一九三一年底，敌人集中了十个正规师连同地主武

装共约八万余人“围剿”湘赣根据地。大敌当前，我们省委除在整个根据地实行战争总动员外，並组织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行动。同时将独立第七团和由湘南游击队改编的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三师，由冯建元任师长。

记得年底，敌周至柔第十四师一个营，伙同永新保安队进犯里田，妄图摧毁湘赣省级机关。我红军独立三师奉命从莲花赶回永新，与河西教导队埋伏在里田以西傅家垅一带，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立即发起猛攻，全歼了这股敌人，待周至柔率领十四师主力赶到，战斗早已结束，我们省委也安全转移到黄岗。以后还在莲花的九都、涪塘、永新的钱市街等地都消灭了不少敌人，而且每次战斗，我们红军都是主动出击，步步紧逼，致使敌人无法在湘赣根据地立脚。

湘赣红军在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独立一师和各县地方武装都大有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湘赣红军、加速发展湘赣根据地及更有效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一九三二年初，在永新成立了湘赣省军区，由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同时在军区之下，设立了四个军分区指挥部，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

配合中央苏区粉碎第三次“围剿”並打退敌人对湘

赣苏区的进攻以后，到一九三二年四月，进入湘赣苏区的白军除陈光中部尚盘踞茶陵外，其他地方已全部收复。因此，我们对敌斗争的策略是，动员群众武装对敌采取四面包围形势，实行黑夜摸哨，四处打土炮、放冷枪等打法。敌人不摸情况只好固守工事，闹得敌人整夜不能睡觉。这实际上仍然是毛主席讲的“敌驻我扰”。当时红军主力独立一、三师都集中了，找机会打击敌人弱点，时常突击敌人出击的部队和运行中的部队。如一师在萍乡苏区的新店里，缴获敌危宿中部步枪四百四十五支，机枪两挺，将敌全歼。部队还时常埋伏在交通要道口伏击敌人运粮运物资给养的交通队，也不断地缴获敌人的枪支、油粮、服装，还缴过一门迫击炮。有时在晚上派出小部队深入到敌人营地进行偷袭，也时常得手。群众则在敌人驻地附近实行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破坏交通。但在这些斗争中也有失利的时候，我们当时分析了造成失利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1）有些地方负责同志总是希望部队快些打，致情报不很确实就向部队通报，部队领导也往往轻信，以致敌情有变奔袭不成，甚至吃些小亏。

（2）一些地方同志有依靠部队的心理。正规部队不在时，就盲目把赤卫队、少先队不适当的长期集中起来，以致给养无法解决，群众武装又缺少集中作战的训练，结果一遇敌情，反而把自己人员打散了，发挥不了

群众武装的优势。

(3) 有些地方工作不深入，动员工作做得不够，骚扰敌人的行动时，离敌人很远打几枪就跑回来了，敷衍了事，根本收不到实际效果。

(4) 有些地方坚壁清野工作不够认真，粮食没有仔细埋藏起来，有的被敌人发现挖走，有的在敌人放火烧山时被烧掉。有的群众甚至认为“红军就会来，哪怕没饭吃”，而不积极埋藏粮食。

(5) 不少同志怕做白军的工作，这自然同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而未能认真动员群众去瓦解白军。倒是不少妇女自发地去动员白军拖枪反正。但就是这样，连同白军自动投诚的在内，在一九三二年一个春季里，就获得步枪千余支。另外，组织力量对俘虏进行教育，并发动群众送猪肉、草鞋、花生慰劳他们，给他们演戏，鼓动他们到白军后拖枪回来。集中训练五七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送他们回去。在这方面效果倒不错。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都做了适当的工作，加强思想动员，进行深入发动。

湘赣省军区成立后，独立一、三两师在茶陵的英江及攸县的官田又打了两次胜仗。八月间打垮攸县官田敌人一个团，紧接着在茶陵高垅打垮陈光中部一个旅，两次共缴获机枪四挺，迫击炮五门，步枪四百余条，给了

湖南敌军很大打击。此后又深入泰、遂间白区工作半个多月，直接响应红军进攻贡州的行动。不久，省委和省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独立一、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和政治委员王震分别代理军长和政委。同时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工作，调集了大批干部充实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力量，并将河西教导队扩大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还建立了一个兵工厂。又以茶陵地方武装为主，组建了一个新独立师，由谭家述任师长，曾毅之为政治委员。

八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往北路，响应红军进攻南昌抚州。八军于十月初进攻分宜县城，与敌一个团和一个旅部硬战一昼夜，结果因敌人凭工事死守，增援部队赶到，以致未按计划攻下县城，只缴得敌人十多条枪，我方却损失三百多人，死伤连排干部三十多名，王震政委挂花，只得返回新喻苏区休整。这时又有敌五十二师一个旅由安福前来向八军进攻，又打了一天，毙敌三百多人，总算把敌人打退了，但没有缴到敌人一支枪。这次战斗失利，实质上是王明路线强调红军打正规战，硬攻敌人巩固设防的城镇所造成的恶果。

八军在北路活动约有半个多月，在回防途中捉到敌十八师团长张超，了解到他这个团驻在新喻，当即动员张超写一封信招该团开来苏区投诚。但因为我军安排不

周密，致使该团开到苏区边界时遇到我游击队向他们开枪因而发生误会，又开回去了；接着就被敌十八师改编了。这时八军由于战斗减员，加以战争失利的影响，有些士兵开小差请长假，新兵又暂时补充困难，致全军实有兵员不足二千人，只相当于以前一个师的兵力，有一千支左右的枪无人背。

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后，敌人又调集了近五十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实行重点进攻，同时对湘赣根据地也加紧进行“围剿”，致使湘赣敌情转趋严重。而进攻苏区的白军也开始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首先是盘踞苏区的陈光中部四个团，师部驻茶陵，其他高陇、桃水、腰陂、严尧、湖口、坑口等重要市镇，均有敌人占据，建筑四五层的工事炮台，并经常出来骚扰。茶陵整个苏区只剩高陇还有一部分，但附近群众均能积极开展与敌人斗争，经常采取各种办法打击敌人，骚扰敌人后方，围剿敌人义勇队，捕捉回乡收租收债的豪绅地主，收效显著，群众反水的现象很少。特别在桃花、湖口一带敌人占领区的党团和群众团体组织大部分恢复了，豪绅地主不敢回乡，村里的红军公田，群众照旧收获送到苏维埃政府。攸县有敌王东原部一个旅驻扎。自八月初红八军一师在官田打垮敌人一个团后，不久即有两团敌军向攸县苏区进攻，后来一个团驻窝山周家屋一带，一个团驻柏树下。萍乡城有敌陶广部一个团，芦溪驻有敌人一个

团，宣丰驻敌十八师一个营，均筑有炮台。但北路敌人比较薄弱，分宜、新喻各县城只有一个营兵力驻守，因而北路我军有新的发展，儒延仿建立了七个新的苏维埃乡，逃跑群众大部分回来。安福驻有敌五十二师一个全师，十月初並有一个旅进驻金田舟湖一带，筑有炮台。吉安太和之敌原系陈诚之十一、十四、四十三等师，红军进攻抚州时，十一、十四师即调往南昌去了，十月初又开回吉安，部署在沿干河一带，后又调往洛安。进攻遂川大汾一带的粤军均已退却，上崇是余汉谋部驻扎。王东原部仍驻汝城桂东，经常向上崇苏区边缘地区骚扰。酃县城有陈光中部一个团。总之敌人各部均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並强迫群众组织守望队，修筑汽车路，扬言要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来进攻苏区和红军。这一期间，我们主要是采取游击战术，侧击敌人的辐重交通队，深入白区围攻地主武装，骚扰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粮道。

为加强领导，更有力地反击敌人进攻，蔡会文、肖克同志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到湘赣。十一月，八军在吉安的天河进行整编，正式成立红八军领导机构，由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肖克任军长，同时将新独立师编入红八军，此时八军拥有三个师，五千余人。並將原独立一师改编为二十二师，由谭家述任师长，王震任政委；新独立师改编为二十三师，由杨茂任师长，

谢国喻任政委；独立三师改编为二十四师，由戈勇任师长，胡楚父任政委。同时，还抽调茶陵、萍乡、莲花等县独立营各一部，共六百余人，组成新的独立第一师，由侯梯云任师长，陈韶任政治委员。这时，整个湘赣苏区的武装除各县游击队外，有一个军、两个独立师、五个独立团和七个独立营，总共一万三千余人，枪四千余支。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中，湘赣红军取得较大战果的战斗有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有九渡冲和棠市战斗。九渡冲战斗我们消灭了敌陈光中部六十三师的两个营，棠市战斗消灭了敌李觉第十九师的一个团，俘虏敌团长以下千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持续时间比较长，前后达一年之久。我们不仅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也促进了湘赣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红六军团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永新组成的。那时我已被撤销了省委领导职务，分配在北路一带巡视工作。记得军团共辖有三个师，即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十六师是湘鄂赣的红十六军改编的，师长高永生，政委温锦惠；十七师就是原来的红八军，师长肖克，政委陈洪时；十八师是原湘鄂赣的十八军来湘赣后编成的十八师的五十二团，师长严图阁，政委徐洪。军团新成立时没有设置军团领导机关，也没有向下宣布军团番号，只公布了师的建制，由第十七师的肖克统一指挥。

一九三三年底第三次党代会后，我便离开了湘赣革命根据地，来到了中央苏区工作。

任弼时同志和湘赣苏区

我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大帽子，並受到撤销省委书记和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以后，所以没有遭到进一步的迫害，並能顺利调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这同任弼时同志被派到湘赣工作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作出《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定改组省委，撤销我的省委书记职务，以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在刘士杰未到职前，由陈洪时代理书记。

五月，中央委派任弼时同志接替陈洪时，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这时，正处在陈洪时、刘士杰一伙对我和张启龙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热潮中。陈刘二人在弼时同志面前捏造了我不少莫须有的罪名，主张将我开除党籍。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由于在战斗中按照党的政策，有条件地释放了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加上在挨批斗时态度比较倔强，他们更为恼火，竟认定他是反革命，决定送保卫局法办。保卫局是陈、刘一伙控制的单位，可以任意处决“罪犯”，进去的

人都是凶多吉少。在这种情况下，弼时同志並沒有听一面之辞，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议，召开了对我和张启龙等同志的批斗会；另一方面他对陈、刘一伙的诬陷並不轻率表态，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省委的广大干部都议论纷纷，为我们抱不平。王震更为愤慨，因为他早就对陈、刘一伙有看法，曾经多次为我辩解，更为张启龙被诬为反革命而大发脾气。经过调查研究，弼时同志认为我和张启龙等都是好同志，决不是反革命，尽管工作中有一些缺点错误，但在湘赣省委几年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对敌斗争还是英勇的。当陈、刘一伙把张启龙关进保卫局去的时候，他亲自去保卫局把张启龙放了出来，但由于当时“左”的气候，张启龙同志仍被开除出党，並被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后来，在弼时、王震等同志的关怀下，张启龙仍随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並在长征中恢复了党籍。

在我身处逆境时，弼时同志对我仍然十分关怀。他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很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我被撤职以后，下放到北路分委（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患了疟疾，骨瘦如柴。弼时同志叫他的爱人陈琮英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上的关怀，内心确实感到十分温暖。后来，我要求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同意。

要知道，当时推行王明路线的党中央已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他能基本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客观地处理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告诉我，临时中央政治局也曾怀疑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四四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了我们，了解了湘赣省委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在他关怀下，召开了曾在湘赣工作过的几十位同志的座谈会，总结湘赣省委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弼时同志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作了长篇总结发言。他襟怀坦白，热情诚恳，既敢于批评别人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又严于解剖自己。一方面，他坦率地批评了我们在湘赣省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更多地是作自我批评。

他说：“湘赣苏区可以分为临时省委、旧省委等几个时期。但新旧省委都是执行了‘左’倾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地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是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在这里，弼时同志实际上坦率地承认了他主持的新省委同样执行了“左”的、甚至比旧省委时期更“左”

的路线。他接着说：

“我想在湘赣临时省委虽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並沒有充分执行。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以后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福建打出一个罗明路线来。江西虽然没有指出省委有路线错误，但也打了几个地区，如处分了邓、毛、谢、古。这就表明苏区並沒有全部执行他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认为福建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是机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说明那时的中央局的领导有问题。

“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以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极‘左’的路线，这对于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这个情况下面认为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中央的要求？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讲到旧省委的问题时，弼时同志十分公道地说：“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戴上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说一定要戴上。为什么呢？中央到中央苏区

以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上。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戴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去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以为应否定那时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个符合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

弼时同志诚恳坦率的态度，严以律己的精神，确实使我们甚受感动。但平心而论，在那时王明路线的影响下，弼时同志在湘赣的工作还是有不小成绩的。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弼时同志担任湘赣省委书记一年多的时间内，表现了他的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虽然那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在湘赣地区得到全面贯彻，但湘赣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好思想、好作风的影响还是深广的。弼时同志带来了这种好思想好作风。在军事上，他到任后不久，即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将湘赣和湘鄂赣两省的红军合编为三个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在永新沙市组成红六军团。八月，红六军团又进行整编。整编后，以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最高领导机关是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肖克、

王震组成，弼时同志任主席。红六军团经过整编和整训，部队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了加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弼时同志领导湘赣军民，配合中央红军战斗，并通过沙市战斗一役，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当时省委和军区某些领导同志采取的冒险进攻的作战方针和阵地战的作战形式，采取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和运动战的作战形式，终于取得了歼灭敌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的胜利，这是红六军团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关键一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弼时同志主持召开中共湘赣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召开的湘赣省党的三大，仍然坚持提出发展党、扩大红军、加强苏维埃政府工作、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等任务，对党、红军和根据地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在艰苦的战斗中，根据地仍然开展了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决定由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同时保留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等领导机关，以继续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人民和地方武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弼时同志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保存了湘赣边区党的骨干和红军主力，为以后红六军团的

突围西征和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合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四年十月，与红二军团会合，一九三六年七月组成红二方面军。

第四章

从江西到陕北

一九三三年我从湘赣调到中央苏区工作。最初，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帮他做些事情。记得一九三三年冬，毛泽东同志要了解苏区基层组织状况，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兴国、瑞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要经常深入下去，摸准情况，否则就当不好参谋。要想学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要从理论上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它的重要性。如果思想认识有差距，思想方法不对路，即使你下去了，仍然会走马观花，潦草从事，别想抓到真实材料。我就依照毛泽东同志这些教导，花了一个月时间，到兴国、瑞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对这些调查资料很感兴趣。

不久，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同志把我从毛泽东同志处要了去。先让我到瑞金附近做扩大红军的工作，他

见我有一定工作能力，才委派我担任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很快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关于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时，党中央机关（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我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的中央首长。当时随我们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主要是批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我当时就感到，他们正在酝酿着什么重大的问题。

我同张闻天同志开始相识是在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闻天同志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我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无理撤销湘赣苏区省委书记职务，也在任弼时、王震等同志保护和支持下调回毛主席身边。当时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宗派主义统治，极力鼓吹什么只有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才资格参与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因此，这些人在大家眼里也就特别显得盛气凌人。但其中有两位使人感到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位是王稼祥同志，一位就是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当时闻天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由于他主持政府工作，而被实际上排

挤出领导层的毛泽东同志，还保留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间，他同毛泽东同志不仅接触多，而且还很谈得来。在不少问题上闻天同志与博古等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件事。

一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福建事变的问题上，他针对博古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主张应同十九路军做某种形式的配合。二是对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的问题，表示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战略的极大的怀疑和不满。无论在他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或谈话中，都曾正确地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归结为战略指挥上的失当，抨击了李德、博古“分兵把口”、“堡垒主义”之类的错误主张。三是他能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此，闻天同志曾把我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江西兴国、瑞金等地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查资料，归纳到他的文章中，写成苏维埃基层政权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方面吸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点。

后来，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确定毛

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的同时，推举闻天接替博古的书记职务绝不是偶然的。闻天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

我和王稼祥同志最初相识也是在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那时我是湖南省委常委，省委遭到破坏后，我到上海找中央汇报情况，被任命为湘赣省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就是王稼祥同志接待我的。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他向我谈起湘赣省委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在军事上要避实就虚，打击敌人的弱点。开始我总以为稼祥同志是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知识分子干部，理论上虽然有较高的造诣，可是未必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一席话后，才发现自己的看法错了，稼祥同志具有远见卓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符合当时革命的实际情况，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这使我肃然起敬。

一九三三年，我被不公正地撤销湘赣省委书记，到了中央苏区工作以后，同稼祥同志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从而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与王明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敬佩毛泽东同志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很多问题上都能领会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和正确主张。比如当时项英等人曾经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稼祥同志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就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

能说是“守株待兔”呢？稼祥同志对王明“左”倾路线搞的肃反扩大化，随便抓人杀人，是十分反感。当时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曾尽力设法保护过一些在“左”倾路线错误打击下受冤屈的同志。他在统一战线，俘虏政策等方面，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兵器专家王铮、医务工作者王斌等同志，都是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经稼祥多方设法才保护下来的。后来这些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对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解放后，王铮同志先后担任过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斌同志长期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对稼祥同志的许多见解和作法，我是由衷敬佩的。在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这正是他多年接受毛泽东同志的积极影响，同王明路线逐步划清界限的必然结果。

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当听了三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是十分振奋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谈话，正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直到会议召开前，他们又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王稼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

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究竟去何处，无人知晓。闻天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说：“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闻天同志的这篇文章，为红军转移进行了思想准备。它冲破王明等人的只准讲进攻，不准谈退却的教条，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转移”到哪里？“新苏区”又建在哪里？不能不是参加长征的人们的共同悬念。因此，就博古、李德的指导意图来说，是要打到湘西去与二、六

军团会师的。这一意图被蒋介石所窥悉并进行了“围歼”之后，仍不打算改变。这时的中央红军由于连续硬拚已由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人，如果再这样硬拚下去前途是相当危险的。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黎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放弃会师打算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在这重重危机之际，终于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成。于是会议作出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关于新根据地的决定，即《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党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又重申渡过乌江要建立川黔根据地。

其实，问题很清楚，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尚未摆脱敌人围歼的危险，所谓建立根据地，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和号召。而随即召开的遵义会议，也只能就最迫切的军事领导权问题作出原则的决议。因此究竟应在哪里建立根据地问题，并未圆满解决。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同志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仍是如何彻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因此才有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等军事行动。唯一目的就是为迷惑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打破敌人的包围封锁。渡过金沙江后，我们才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

们的敌军甩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巨大胜利。应该说，从此中央领导同志才开始腾出手来从容考虑到哪里开辟根据地的问题。

接着，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认真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同志并同彝族部落古基家首领小叶丹结拜金兰之盟，使先遣队顺利通过彝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我和李井泉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武装，试图在伯承同志结盟之地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这一带的彝族人还处在奴隶社会。他们信奉黄教，迷信魔法和鬼神。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惧怕汉人又仇视汉人的心理，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他们还把抢汉人的东西视为殊荣。正是这样，他们虽初步认识到红军与其他汉人组成的反动军队不同，允许我们顺利通过，但并不欢迎我们留在那里。因此，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想法赶走我们，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对此，中央又经研究决定放弃原计划打算，要我们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同志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这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又说明红军北上才是出路。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我和李井泉同志随九军团北上长征过程中，我曾帮助军团政治部做扩军工作，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也是称“罗、

何、首道、井泉”。据此，有些文章和资料认为我是“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这是不恰当的。

当时，朱德、周恩来同志在指挥我们撤出冕宁时，给我们的电报也说明了红军不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电报指出：“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电报同时表明了中央的精神还是北上。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随即举行会议，毛泽东提议红军继续北上，明确指出应向东往甘肃宁夏方向移动，并且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于后来把革命大本营放在有工作基础的陕甘宁地区是十分英明的。其实，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时，张国焘是参加了的。我当时就参加了会议的秘书工作。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做的报告，明确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要求部队应集中指挥，指挥权应集中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则着重讲了应迅速北出松潘，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解决。张国焘虽曾借口困难，主张避开胡宗南，先向南进攻成都，然后向川康发展，但见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意见，他最

后也不得不赞成。接着政治局又正式通过了委托闻天同志起草《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足见把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是中央一致作出的正确决议，也是经过反复研究检验最后得出的最合理可行的方案。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怀着分裂党分裂红军不可告人的动机，擅自带领左路军南下，为了欺骗广大指战员，扬言要到川康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负责同志曾耐心地说明，到人烟稀少、物资贫乏、语言不通、毫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作法，实践已作出结论是不可取的。可是，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有苏维埃政权。并且，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这时中央才明确解决了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为了争取四方面军随中央北上，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也曾致电张国焘等，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劝他们速来与中央会合。电报热情地说：“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逼近岷州城敌人恐慌之至”，“此地物资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

变了”，“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北上，并在最后提出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刘志丹案件

我按中央的指示随九军团行动后不久，中央又调我到国家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因此，使我有机会直接参加了为刘志丹同志平反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

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

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三五年九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志丹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象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

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九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志丹同志因公到瓦窑堡去，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信员，通信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信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同通信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捕了。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

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

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

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志丹同志出狱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副主席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主席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毛主席、党中央任命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初，志丹同志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四月中旬，在围攻山西中阳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志丹同志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刘志丹同志的灵柩送

回瓦窑堡时，周副主席亲自扶柩送葬。毛主席亲自向刘志丹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一九四三年，志丹同志壮烈牺牲七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筑陵墓。毛主席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周副主席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题了词，对刘志丹同志表示深切的悼念，给予高度的评价。

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红十五军团

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解决后不久，我被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该军团是由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先期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编

入了第一方面军序列。原任政治部主任是郭述申，因他调红军大学学习，由我接任的。军团司令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下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三个师，共约七千五百多人。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央决定以红一军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组成西路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左右两路军西征，打击西北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迎接二、四方面军。这是红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序列后接受中央交给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任务。

五月十九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率领下，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长城脚下的宁条梁。此后，十五军团又分两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七十三、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后来又攻下同心城和韦州。七月底到八月底，十五军团集中到豫旺地区休整。这时我来到豫旺县城。九月初，我随军团总部留在这里，而部队开始向兰新公路挺进。十月二日，在徐海东司令员的指挥下，红军部队从西门和北门大举强攻进入会宁城。随后，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在陈赓同志的率领下也进入会宁。

会宁，是甘肃省一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环绕着城墙，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二千。会师那天，城里红旗招展，标语遍布城内各角落。当四方面军在徐

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入城时，群情热烈，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天空，军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部分部队在这里留下迎接朱德等同志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到来。十月九日朱德同志同总部到达会宁。二十二日，贺龙和肖克率领二方面军也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

在西征中，军团在完成战斗任务的同时，认真地进行部队的整顿工作。

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以后，不仅生活困难，战斗残酷，而且经历了从周围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人文状况到军事路线、政治方针、作战策略以至工作方法的急剧转变，虽然在这些古今少有的严重考验面前，红军锻炼得更坚强也更成熟了。但是，不可避免地由于管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军团是由鄂豫皖红军、陕北红军加上少数中央红军合编组成的部队。合编后，由于战斗的频繁，加之陕北红军刘志丹等许多领导人遭到逮捕造成思想紊乱而未能及时进行整训。从具体原因上讲，西征以来，由于老兵伤亡多，新兵增补快，个别不纯分子的混入，有的老战士由于工作需要，已提拔到领导岗位，基层缺少骨干，党员数量少，党组织也不健全。外地战士有某种厌战情绪，陕北籍战士又是第一次离乡作战，很不习惯，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某些

实际困难又未能得到上级的及时了解和适当解决，因此，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到一个焦点上，就是逃亡现象比较严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军团党组织给中央报告中所列的一个统计表可做参考：

西征以来的逃亡统计表

| 日 期 | 逃 亡 | 投 敌 | 合 计 |
|-------|-----|-----|-----|
| 五至七月份 | 196 | 11 | 207 |
| 八、九 月 | 64 | 9 | 73 |
| 十 月 | 45 | 11 | 56 |
| 十 一 月 | 58 | 3 | 61 |
| 十 二 月 | 65 | 9 | 74 |
| 一 月 | 75 | 10 | 85 |
| 二 月 | 120 | 24 | 144 |
| 总 计 | 623 | 67 | 700 |

当时，军团党委和政治工作机构，把这一不良现象当做总结和推动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一环，从而有效地加强了部队的工作。

西征初期，党的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是比较薄弱的，主要表现在党组织缺乏经常性的工作，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主要原因是部队政治工作机关，没有通过抓紧党的工作作为中心环节来推动全面政治工作的正常进行，

因此虽然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但并未真正落实到巩固部队，提高整个部队政治素质这一中心任务上来。从而使部队在表现上有两种比较严重的不良倾向，一是纪律松懈，二就是逃亡比较严重。

在西征胜利时期，即八、九、十月间，是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开展时期。当时提出了党的工作四大要求：

（1）建立经常的支部工作，提高支委的核心领导作用；

（2）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

（3）严密与发展党的组织；

（4）支部及时反映与解决实际问题，使支部成为巩固部队的堡垒。

这一时期，各部队一般都贯彻执行了这四项要求。特别是通过军团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形成了普遍加强部队党的工作的热潮，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工作，建立正常的党的工作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三大主力会师期间，部队的中心工作则主要放在扩红、筹资、筹粮、支援帮助二、四方面军方面；西安事变后，工作中心又放在争取抗日友军方面。总的这一时期，对于加强群众纪律，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扩大红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支部在扩红竞赛中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共扩大了一千三百多名新战士，但对于加强支部本身的经常性工作及巩固部队工作却有所放

松。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又进一步对党的工作提出了如下要求：

（1）巩固与加强已建立起来的党的工作基础和工作制度，保持工作的经常性与平衡发展；

（2）提高支部在各种情况下的核心领导作用，保证每个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3）抓紧党的教育为中心的一环，建立支部、小组的政治生活，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

总的来说，在西征中党的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都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个经验是：

（1）确定了支部成为连队政治工作中心。使连队政治工作由政治指导员个人包办，转变为一切政治工作经过支部，使一切政治任务、战斗动员、管理教育、改善给养等，均由支部加以保证。因此都能普遍深入地贯彻执行。党与群众、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2）建立了支部的经常工作制度，发挥了支部的核心作用。建立了党的各种经常的会议汇报制度与宣传制度，保证支部能有计划地从组织角度进行工作。建立了支部委员集体领导与委员分工负责制度，确定支部书记以党的工作为中心，并兼任副指导员或副连长，既提高了支部书记在连队中的威信，又能使支部书记专心注意党的工作而又不妨碍军事职责。

(3) 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定期改选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使每个党员都能对党负责。从而大大提高了党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4) 使党的组织更加适合于战斗的需要。按每个战斗排编成一个党小组，每个战斗班配备有两三名党员。使党小组和党员能更普遍地分布于各个战斗岗位，便于更好地发挥核心和领导作用。每个党员也都更便于为党的工作和过党的生活。

(5) 设立了各级党的干部党员的特别小组，吸收指挥员过党的组织生活，以加强军事指挥员的党的观念，更便于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促进军事、政治干部的团结，加强军事、政治工作的配合。

(6) 建立坚持经常的党员上党课制度和干部教育制度，并实行每上一次课，进行一次讨论和一次测验。从而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7) 加强支部在解决连队实际问题和巩固部队方面的职责。许多具体实际问题都能及时得到解决。某些干部战士的疑虑问题也能随时得到解释教育。

经过一段实际工作以后，不仅部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有显著加强，而且上边提到的逃亡现象也基本解决。七十三师已基本上消灭了逃亡现象，七十五师只发生了三个伙伙打算回家的问题，七十八师也杜绝了党员逃亡的现象。

军团党代会和党委还讨论了由国内战争转入国内和平环境的新阶段，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特点。

当时红军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

(1) 红军已处在一个由过去的战斗环境，开始转入到国内和平的新环境。过去红军所接触的外界，主要是争取和发动民众，处在很单纯的环境之中，现在就必须接触各阶层各界人物，环境就复杂多了。军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努力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和提出的新的要求。

(2) 当前我军的敌人和执行的任務都有了新的变化。过去红军打击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军阀，现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的性质则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土地革命为中心转变为抗日战争为中心。

(3) 红军经过长征以后，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同时红军中非土地革命成分、新成员大量增加，更需要加强自己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

针对上述新的特点，必须加强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1) 加强党员和干部的教育是当前的工作中心：

(a) 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使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联系起来，从阶级的立场来说明红军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

(b) 执行党课教育与经常的党的教育相结合的教

育，并加强小组讨论。

(c) 红军的革命传统教育与阶级友爱教育。如官兵平等、干部以身作则、不打不骂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等。

(2) 从加强党的教育和健全支部生活方面来提高党员的质量，使每个党员都能真正成为群众的模范：

(a) 思想上的模范。在政治上思想上最先进、最觉悟、最坚定，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不动摇。对于一般政治问题要比群众理解得更全面、更清楚、更正确。

(b) 行动上的模范。遵守纪律，刻苦耐劳，真正成为群众的表率。

(c) 战斗中的模范。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要有坚决勇敢牺牲奋斗的精神，在未来的抗日战场上真正成为英勇杀敌的模范。

(3) 正确地执行干部政策。

号召全体干部执行模范干部的四条标准：

(a) 我们的干部应当是对于工人阶级事业抱无限忠心；

(b) 应当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c) 应当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任地解决问题；

(d) 应当有遵守纪律的精神。

关于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经验，我曾写过一篇介绍

文章，经王稼祥同志改定，发表在当时军委出版的红星报上。

回民自治政府

红军西征期间，曾经在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境内，建立了陕甘宁省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在我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红军西征的甘肃、宁夏的一些地区，大部分是回民聚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回汉民族对立相当严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回族人民对我党我军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民族问题，正确对待回族群众，就成了西征中做好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处好军民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

（1）在回民中广泛地发动反国民党军阀统治和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与回民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启发回族群众的觉悟，争取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

（2）适时地由回民发动反对回族中与国民党勾结的回奸，并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回民的组织，如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回民的武装军队

和游击队。

(3) 发动广大回民要求与回军联合红军抗日，培养回族干部，造成强有力的回民的领袖干部。对于俘获的回军，要特别依其生活习惯给以优待。

(4) 必须严格执行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并在部队中作广泛的解释。

(5) 以团为单位成立回民工作团，研究回民的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与工作方法。

红军进入回民地区的三大禁条是：(a) 禁止驻扎清真寺；(b) 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猪肉）；(c) 禁止毁坏阿文经典文字。

四大注意是：(a) 在回民地区不打回民土豪；(b) 使用回民生活用具要经回民同意；(c) 要回避回族青年妇女；(d) 买粮、买菜要公买公卖。

同时还制定了红军在回民地区的口号，如“回汉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红军不侵犯回民的利益”、“回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回民抗日军”、“反对汉族军阀官僚压迫”、“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等。

此外，西征部队本身根据实践经验也制定了有关的工作守则，规定：(a) 未经房主同意不许进入回民家中；(b) 不许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和教职员；(c) 不许在回民面前骂“猪”或“狗”；(d) 不许问为什么

不吃猪肉；（e）不许叫回民是“小教”，叫汉民是“大教”。

为了开展回民工作的需要，我军团还组成了回民独立师，任命我们政治部的一位回族干部马青年同志为师长，开始只二三百人，后从当地回族青年中动员了三百多人参加，加上从马鸿逵部队俘虏过来愿意留下的回民士兵二百多人，这个师就很象个样子了。以后在开展回民工作和对敌斗争方面，回民独立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当时我与程子华政委联名发给西路野战军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和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军团领导上对回民工作的重视以及逐步开展回民工作的一些情况。如：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的电报中说：

“军团已成立回民工作委员会，并准备成立回民红军独立团，在回民中有号召作用，现已开始扩大回民红军，我们在同心城一带偏重做阿訇的工作，机械的不打回民土豪，致未能发动回民斗争，现执行转变在回民同意之下进行打回民土豪。”

七月三十日的电报中，概括了我们当时对回民问题的一些看法，反映了我们认识的不断深化：

“甲、回民不被汉人消灭和同化是由于宗教的团结，民族性的强悍。

“乙、苛捐、杂税、封建剥削、负担公差与汉人相同，文化的进步，政治的要求接近汉人。

“丙、回民杀汉人和抢汉人东西是不犯法的，形成汉人对回民的害怕与痛恨。

“丁、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特别对阿訇的尊重是争取回民的初步工作，打回民痛恨的回民土豪并散发给回民，更能发动与组织回民。不能发财物给回民时则暂时不打，但是象打汉人土豪的方式要避免。

“戊、回民土豪现正利用回汉的对立，挑起回汉民族的冲突，以转移阶级斗争，一般汉人对我们打回民土豪以报仇恨，这在工作上各种组织中要特别注意。

“己、回民的习惯、生活、信仰的不同，进行回民工作有非回民同志不可之势。

“庚、反动回民上层在政治上争取不可能时，应先在回民中暴露其反动后而攻之，不会引起回民的反对。但公开后的纪律异常重要。

“辛、组织：

1. 武装用回民红军与抗日游击队。
2. 党用革命党，最好的加入共产党。
3. 政权组织适用以前规定。因为回民历史上的痛恨，在工作中与各种组织中要特别注意之。
4. 游击队不加“回民”二字，汉人游击队不要去打回民土豪。

“壬、回民中很多加入哥老会的，更须加紧这一工作。”

九月六日电报中提到：

“索家岔、王家团庄、同心城已组织回民解放协会。除同心城外能利用阿訇运用民族解放联合战线发动回民群众打土豪。扩大回民独立师新战士共有七十余人，我们正努力扩大回民及创立回民自治区。”

九月二十五日电报，已将成立回民自治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王家团庄、同心城一带回民区域工作近日已有开展，我们意见：

“（一）以王家团庄为中心建立一回民自治县，将附近回民区域划为七个自治区，李旺堡、豫旺堡两区由刘负责。王家团庄、同心区此二区由军团政治部负责。关桥堡区由七十三师负责。另在石堡岭山西山一带建一区，由徐程派出人员，由刘晓主持该区工作。原预旺县管的区域暂不改变。

“（二）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在王家团庄或同心城开回民自治县代表大会，各区于二十日前完成区会及准备工作。

“（三）该县委县政府干部除由各区提拔外，请刘晓、富春同志派干部来。”

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领导上是十分重视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同志和我以及黄镇、唐天际、马青年等同志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同年十月二十日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当时在同心城清真大寺隆重举行大会，有各界代表三百多人参加。上万名群众来到同心城进行庆祝。大会开了三天。当地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是李德才。政府下设四个部门：军事部、土地部、没收委员会、保卫部。会议通过了《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纲要和条例》、《土地条例》、《减租减息条例》等有关议案。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火星剧社还来演戏以示庆贺。剧社在自己编写的表现回汉人民团结反对蒋马反动派的节目中，把我们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同志也编进了戏里。

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管辖有十二个区，共约三万多人口。其中同心城区、王团庄区、高崖区、马家河湾区、窑山区、红城水区、预旺区、李旺区等八个区是巩固区。喊叫水区、韦州区、惠安堡区、关桥堡区等四个区是游击区。

自治区政府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在回民聚居区进行了认真、广泛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成立回民解放会。这是回民自己的群众性组织，他们在帮助政府宣传抗日主张、反对苛捐杂税、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武装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2) 成立了县区游击队。它们的任务是，保卫新生政权，开展反霸、灭匪等斗争；协助正规军抗击敌人；保护群众镇压反革命；担任警戒、放哨、抬担架等任务。

(3) 组织抗日救国江湖委员会。是群众性武装组织，主要任务是争取哥老会，造成抗日救国声势，协助红军扰敌和牵制敌人。

(4) 镇压劣绅和回奸。

(5) 筹粮筹款支援前线。

(6) 动员回族青年参加红军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西征红军根据党的统一部署，全部撤离预海地区，成立不久的自治政府转入地下，仍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到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同志壮烈牺牲。

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存在的时间虽是短暂的，但是他的意义是深远的，他在回民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却是永不磨灭的。

徐海东司令员

我和徐海东同志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徐海东同志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

精神。他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培养了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徐海东同志正在指挥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他听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个莫大的喜讯后，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信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他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消瘦的身体和战士们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急需物资补充。他马上嘱咐陕北地方党和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陕甘边区的情况。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速隐蔽地经过保安、安塞，来到郿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部署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打的第一仗。党

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恩来、彭德怀同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郿县道路上的一个大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该镇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骡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同志等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都交口称赞这是个天然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当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

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杀声震天。东北军一〇九师从梦中惊醒，仓皇组织战斗，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都被红军由山头 and 山下卡住，纷纷交枪投降。牛部团长石世安，因见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藩亦因伤重而亡。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已被我歼灭大部。

牛元峰带着师部少数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牛元峰眼看援兵无望，当晚率残部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

“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牛元峰身边只剩下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官。当追踪的红军逼近时，他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以敌一〇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徐海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我听到他多次谈过直罗镇战役的经过，却从未提及自己。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一夜之间，我军就突破了阎锡山的天险河防，使腐败的阎锡山军望风披靡。我参加了

这一行动，先在红一军团，后到红十五军团，和徐海东同志朝夕相处，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直趋晋西北；红一军团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挺进晋南地区，“各撒一网”。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祠。

我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阎锡山进攻陕甘边区的阴谋。我军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建立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扩大人民武装。我军的抗日行动引起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极大恐慌，他们派遣了重兵阻止我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向我陕甘边区进攻。为了保持抗日实力，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我军于五月回师河西。

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五月中旬，又奉命西征，胜利完成了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光荣任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

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由于红二十五军在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派该军协助他们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令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我们从甘肃海源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地上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和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

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与西北军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依恃，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令我们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过渭水，经邠州，回到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翼这一军事行动，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因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由红军改编成的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以后，徐海东同志担任了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位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思想作风方面也堪称表率。他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一军团学习，主

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十五军团加强工作，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重和团结。我在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等作得和一军团一样。徐海东同志是从当士兵逐渐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深知伤病员的疾苦，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和爱戴。

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己，为人正派，处处顾大局。中央红军经过万里征程到达陕北时，供应比较困难，徐海东同志得知中央需要现金，即命供给部长把十五军团全部现金七千元上交五千元给中央，并把一批布匹、药品、武器、弹药送给一军团。在当时物资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不搞本位主义和小山头的高尚品德，使中央同志深受感动。他平时个人生活节俭，严格要求自己。一九三九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加之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很困难，他们生活非常艰苦，而他却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我当时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度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

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地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再未凑到一起工作。后来我从东北进关路过大连时去看望他一次，当时，他病得很重。

在党中央办公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我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工作。在职务上虽先后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处等称呼，但实际上工作内容一直未变，就是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经常性的秘书工作。包括文电收发、保管，会议筹办和有关记录、行政等服务，以及机关事务管理等工作。有时也随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视察。总之主要是为中央首长服务，接近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也较多，因此，工作本身虽然比较具体繁琐，但对中央领导同志卓越的工作作风，印象则是比较深的。

首先是对毛泽东同志认真执行的正确的干部路线有切身的体会。毛泽东同志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策，在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使革命局势转危为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我党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革命内容上将面临一次伟大转

折。当时在陕北的干部确实是名副其实地来自五湖四海，如何使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达到思想认识上高度的一致，以便团结奋斗共同完成伟大的阶级使命和民族使命，没有一条无产阶级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策，是不可想象的。如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案件，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干部问题上的光辉体现。如何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同样是关于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到达懋功地方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时，当时我已从红九军团调回到中央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一方面军首长同四方面军包括张国焘在内的领导会见和开会时，我曾担任记录。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曾耐心明确地向到会同志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讲清了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战略决策，面对毛泽东等同志的精辟分析和英明决断，张国焘当面并未提出过任何象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同意北上的根据。后来他突然擅自南下，并以种种借口欺骗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到一九三六年六月，由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同志终于违反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组织西路野战军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取得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的历史性胜利，党中央、

毛泽东同志派红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同志去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红四方面军本来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队伍，由于资产阶级野心家张国焘篡夺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大搞军阀主义和惩办主义，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肆残害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主张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或采取包围缴械、甚至逮捕的作法。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制止了这种错误的主张，明确地指出：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部队，不是某个人的队伍；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顽强的，以往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毛主席还亲切地接见了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号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

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为此，毛主席还分别找过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同志交谈，我记得曾同许世友同志进行过恳谈，帮助许世友同志转变了认识。为了使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一九三七年三月，毛主席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以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

总之，红军取得长征的彻底胜利，红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是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是同朱德、叶剑英、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多方支持四方面军的同志开展对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有效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他对广大干部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是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

的锐利武器。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都搞宗派主义。他们自立门户，结党营私，亲一部分，疏一部分，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务求置之于死地。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在会上，毛主席还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以及受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一批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使这些同志解除了思想负担，一心一意为党努力工作。

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那是一九三八年农历的除夕，毛主席邀请张启龙、谭余保和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我们高兴地走进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时，主席立即放下工作，同我们亲切地握手，请我们坐下。主席慈祥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就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我们一听，原来毛主席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我们的心情一时激动万分，回忆起湘赣苏区的战斗岁月：湘赣苏区当年在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工作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后来，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也影响到湘赣苏区。他们派去的

钦差大臣把过去的正确作法都诬为“右倾保守”、富农路线，还大抓 AB团，我们起初也受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推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但是，后来看到许多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工农干部都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保卫部门当成 AB团抓起来了，有的甚至被杀害，搞得人心惶惶。这样，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和张启龙同志商量，认为如果真有那么多的 AB团，我们在湘赣苏区能站得那么久吗？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在湘赣苏区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于是，我们对王明路线那一套进行了抵制。结果被说成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我的湘赣省委书记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对张启龙同志的处分更为严重，撤职，开除党籍，还判处了一年零二个月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同志的党籍和工作，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后，毛主席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来工作。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毛主席还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这时，我们都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主席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

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还未得到平反时，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对错案的平反，是那样的坚决彻底，不留尾巴；对干部的关怀和保护，又是那样的无微不至，这不仅是对我们湘赣苏区干部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全党干部的关怀啊！

这时，我们看看天快黑了，便起身告辞。毛主席一定挽留我们同他一起吃“大年饭”，虽说是“大年饭”，由于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质生活很困难，毛主席和大家同甘共苦，也只有极简单的饭菜，但我们吃起来是香喷喷的。尽管窑洞外正是风雪弥漫，我们坐在毛主席身旁，却感到无比幸福和温暖。

毛主席爱护干部、团结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看二帮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在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脚踢开，还是教育挽救呢？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分析这些同志犯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另立中

央、分裂党时犯过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思想负担很重，抬不起头来，她约了易纪均同志陪她去见了毛主席，她说：“主席，我在罗章龙分裂党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痛。”毛主席亲切地教导她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主席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深重的思想负担，使她心情豁然开朗了。毛主席还特别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能改正自己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如博古同志，原来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经过批评帮助，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痛改前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抓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毛泽东同志干部路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

在党中央到达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刚刚确立，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不久又面临抗日战争的严重局面，这时党的干部队伍还不足五万人，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高，有的同志还未能看清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适应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形势需要。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培养和教育干部作为党的重要的战斗任务，并着重提

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平。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延安地区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他们象革命的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也成批地成长起来。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样，全党的工作为之面目一新，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抗战初期起，毛主席、党中央就在组织路线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敌占区和蒋管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等，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六届六中全会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干部学习的机会增多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来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主席亲自在会上讲话，当时延安工农干部多，他们过去学习机会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又很忙，毛主席了解这个情况，他指出：大家在学习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军事，

学习文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觉得从此学习有了门路。毛主席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真是我们干部的贴心人。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毛主席在这时期中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选”前四卷的就有近一百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干部的头脑，他亲自主讲哲学，其中两节后来补充修改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的讲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常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问题。如他把教条主义者比作庙宇里“八面威风”但是“十分无用”的偶像，还比作终日挂在空中不踏实地的奇人。这些深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对王明一类主观主义者的有力鞭策。毛主席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把理论与空谈、吹牛混为一谈的主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啃教条，背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毛主席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

区乡的工作做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这样，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

毛主席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毛主席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主席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一些通信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主席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主席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鼓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所感染。毛主席对干部是严格要求的，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正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主席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主席教育干部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在认真看书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等等方面，他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对自己的亲属，他也要求非常严格。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毛主席就要他打起

背包到农民家里拜师，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你所学的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劳动大学，学习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

一九四〇年春，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些指示是为了以后延安整风和路线学习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影响还在党内大量存在，加上新吸收的大批党员，也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主席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这次审查干部是完全必要的，党的干部队伍从抗战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一百万党员中抗战开始后入党的

就占了九十多万人，在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都发现混入了少数敌特、叛徒和其他坏人，因此，为了纯洁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在这次审干中，一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被挖出来了，搞清了一些人的严重问题；一些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同志，经过审查后进一步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更好地为人民工作。我们还从运动中总结了审查干部的宝贵经验，审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当时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康生，却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背离了整风运动的精神，实际上继续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的部署，使审干工作出了偏差，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在一九四三年夏秋约两个多月时间中，他们搞了所谓“抢救运动”。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看不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来到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极力扩大敌情，把革命队伍看成一团漆黑，认为“特务如麻”。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搞扩大化、简单化，在各个机关中追求揪出阶级敌人的一定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如有不同意他们这样搞的人，就被指为“没有敌情观念”，甚至本身也受到怀疑，有的被因此扣上“特嫌”帽子，特别是对过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同志，不作具体分析，怀疑一切，制造了

不少冤案、假案。

在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中，我是有过教训的。对于当时审干的这些作法，我虽然一时还弄不清究竟是什么问题，但对我自己负责的中办秘书处的审干工作，我是采取了老老实实的态度，自己怎样看，就去怎样做。当时我认为，秘书处的同志都是经过党组织严格审查和挑选出来的，他们每天都接触大量的党的核心机密，即使个别真有问题的人也会很快暴露的，因此我认为他们都没有问题，就绝不望风捕影乱加怀疑。而康生抓不住说得过去的借口，也不敢轻易直接插手党中央机关的审干工作。现在当年在秘书处工作过的同志提起来也认为那时候中办秘书处的运动是很稳的，基本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现在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是迟早会顶不住的。

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立即着手纠正。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倾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毛主席说，这个方针是同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那个错误的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这是完全主观主

义的方针和方法。毛主席指出，就是对于有问题的人，也应走群众路线，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如果是被冤枉了的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同年十月，毛主席在一个材料的批示中，再次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这种政策。后来，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当听了关于审干工作的汇报时，当即表示不同意过去那种作法，他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那有这么多个特务？他坚决提出：要甄别！

毛主席对这次审干运动所出现的错误，不但及时纠正，而且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对那些冤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但是，在审干中大搞主观主义、扩大化的康生等人，却文过饰非，推卸责任。他曾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推行他的那一套，等这位同志回来汇报时，毛主席已对审干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而康生听了汇报，竟翻脸不认帐，说：“谁叫你那样搞的。”这位同志为之气极。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我党高级干部又在一九四三年冬进行了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大家以整风精神对过去各个根据地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清路线是非，分清功过，分清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这次学习，采取个人学

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扬敢于发表意见，提出问题与同志辩论问题的作法，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路线觉悟，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学习，亲自参加一些讨论会，并就党的历史问题对大家做过报告。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写了不少有关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光辉著作，这对于提高广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战略水平，指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记得毛泽东同志写出《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初稿后，曾给我批示：“首道同志，此件请油印二百余份，发与各重要干部，阅后定期收回。……”毛主席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重要著作，例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都是这样把初稿发给一部分有关同志阅读，多方听取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最后反复进行修改后，才公开发表的。

刘少奇同志也是帮助毛主席领导全党工作的中央重要负责同志之一。一九三五年冬，党中央任命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少奇同志不畏艰险，重新整顿了地下党组织，开展了白区工作，使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起来。“一二·九”运动的胜利和发展，标志着华北白区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绩。当时他总结历史经验，

写了《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阐述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明确地提出应当系统地批判、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抗日战争一爆发，少奇同志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他的信中所作的“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重要指示，在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大溃退的动乱局面里，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工作的大转变，及时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了华北民心所向的、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少奇同志在华北一直忠实、积极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卓越的成就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的正确。并且以此积极投入了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从“左”倾一下跳到右倾，鼓吹“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少奇同志领导的北方局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王明是反对的。当时我们在中央机关，知道王明把持长江局，和党中央、毛主席“闹摩擦”很厉害。在这场斗争中，记得少奇同志向我们说过：我们北方局，

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击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少奇同志尖锐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全会的结论中肯定：“少奇同志说得对。”我们当时看到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互相支持，共同斗争，是很感人的。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同志立即由党中央派赴华中局任书记，和陈毅同志一起，对项英、袁国平在东南局和新四军奉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行为坚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所领导的新四军在皖东、苏南和鄂中、淮北部分，深入敌后，不断发展，与项、袁直接领导的皖南部分因循迟疑，徘徊不前，形成了鲜明对照。“皖南事变”一发生，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受命执掌全军，力挽危局，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对项、袁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系统、深入地作了批判和清算。少奇同志为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方针，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江南北，战斗在东海、黄海之滨，使新四军成为插在敌人心腹部位的一支劲旅；广阔的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扩大，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九四三年，少奇同志又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整风运动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全党，对我党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总批判，总清算。他那犀利、深刻的批判，帮助人们提高了对王明路线实质的认识。当时王明很顽固，仍然吹嘘他那本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纲领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标榜自己是执行所谓“国际路线”。少奇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是“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少奇同志又在一次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话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戳穿了王明“国际路线”的内幕。原来，王明所谓的“国际路线”，只不过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个叫米夫的人，扶持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领导权，让他大搞宗派活动，一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少奇同志还在一些会上多次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跟随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在我党诞生二十二周年之际，少奇同志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并且指出：总结党的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的环节和部门中去”。为了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少奇同志竭尽心血，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把它称为取得我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少奇同志长期领导党务工作，是毛泽东同志抓党的建设的好助手。为了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了培育千百万好的党员，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是有很大贡献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少奇同志作讲演、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阐发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等，都是较有影响的名篇。其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他写出初稿后曾给我们看过，因此给我的印象最深。

一九三九年九月，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期间，我在马列学院聆听他讲演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听众都反映讲的内容丰富，有针对性，深入浅出，很受教益。讲演后，少奇同志撰写成的文稿由有关同志送呈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阅后，对文稿曾作了“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批示。八月，延安《解放》半月刊就开始连载这个讲演，各根据地纷纷翻印，广为传播。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运动一开始，我们中央直属系统学

委会制定的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计划中，就列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中，就附发了中直系统这个学习计划。《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批判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晶，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报告的重要辅助文件。在整风学习中，它帮助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加强党性锻炼，是一个很好的整风文献。少奇同志当时很关怀我们的学习，常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和谈心，他的亲切教诲，也使我加深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理解。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开宗明义地要求大家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少奇同志有一次热诚地对我们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毛泽东，不学王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他就有了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只是披了马列主义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论述了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粗暴过火斗争。对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早在湘赣苏区工作时，我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头，曾被王明路线执行者打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已

亲自代表中央为我们平了反，到整风期间，时隔几年了，少奇同志又找我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还有遗留的问题。他对所有受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都是十分同情和关怀的。他亲切地对我说：大家把党比做“伟大的母亲”，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温暖和爱护送到每个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心坎上。当我向他谈到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无辜地秘密杀害的情况时，他悲愤而深沉地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懂得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再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他真挚地对我说：首道同志，你我都受过打击，吃过苦头，应当看作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就绝不搞王明他们那一套，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少奇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使我难以忘怀。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干部政策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当时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主持的中央组织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与富春同志接触是比较多的。他在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过程中，把组织部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干部之家”，对团结全党干部起了重要作用，从而肃清了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形成的

组织部门的衙门作风，树立了党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的优良作风。

富春同志十分关心并不断研究改进党的工作机构的建设工作。一九三九年，中央书记处曾责成中央组织部对党、政、军、民、学各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工作检查，借此，富春同志深入调查了解了组织机构设置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切实的改进意见，他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组织工作的发展赶不上政治发展”的被动局面。主要表现在毫无计划地随便增设机构、增加人员，以致在不少方面出现了组织复杂系统太多，机构重叠，任务笼统而不明确的“多头领导”，或者由于隶属关系不明而形成的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他认为绝不能再继续维持这种“手工业的工作方式”，必须加强科学管理，有计划地根据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确定编制并合理地分配干部，“尽可能做到各适其职，各尽其能”，强调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要提倡“有简易、敏捷、切实、深入等优良传统，有不怕负责、不辞劳萃、服从纪律、埋头苦干的模范作风；没有等因奉此的繁文缛节，没有虚与委蛇的无故应酬”。从而及时调整和充实了各项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和干部管理制度，适应了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

富春同志对于干部教育工作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十分重视各个时期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思想

倾向，有针对性地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例如，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富春同志作了“肃清自由主义作风，建立集体主义革命作风”的报告。报告中对于造成当时自由主义作风泛滥的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一是在革命形势大发展中；大量新党员、新干部涌入革命队伍同时带进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二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流毒影响一直没有彻底肃清，空讲理论不务实际的作风依然存在；三是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势必增加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作用。最后一个原因，他尖锐地指出，是由于“左”倾路线实行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被反对以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少同志片面地以为实行党内无原则的和平团结就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放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富春同志的这些精辟的分析，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对同志们很有教育启发作用。

我与富春同志在领导机关生产运动工作方面也有过较多的接触。我曾担任党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那时富春同志也正好奉调主持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工作。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财经部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积极领导了生产运动。富春同志由于他的一贯的认真负责，肯予钻研问题的工作精神，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当时虽只是崭露头角，但已

经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普遍称道，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象富春同志那样学会做经济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富春同志在直接领导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运动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对此，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运动总结会上，他以《更向前一步》为题所做的报告中，生动地总结了中直机关生产运动的伟大的成绩和取得成绩的原因。他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运动中，根据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在生产与供给上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以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多用一分力量不但团体多得收入，个人也多得收入，而生产所得确能保障大家丰衣足食的生活。”“由于将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的结果，去年全年，中直运输力平均提高百分之五十”。“节约最有成效的是粮食和石炭两项，这是由于和厨房中建立了二八分红、公私两利的节约制度的结果。”报告中还概括了根据“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八个字方针，具体创造的行之有效的七种组织形式，其中包括劳动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开展大生产运动，保障丰衣足食，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曾评价说：“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的一大困难。

总之，我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期间，中央领导同志

和中央部门负责同志高瞻远瞩的伟大胸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勤俭奋斗的思想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永志不忘的深刻印象。

一九四四年十月，根据我的请求，党中央批准我参加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南征，从而使我有机会进行了又一次的“长征”。

第五章

南征北返（上）

南征，是一次艰难的战斗历程。八路军南下支队是由三五九旅组成，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准备到湘粤交界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后来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支队又奉命北返。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延安出发，挺进华南，一九四五年北返中原，至一九四六年十月重返延安，历时整整两年。全体指战员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革命意志，用自己的双脚，在北自陕西南到广东的辽阔土地上南征北战，行程二万余里，战胜了敌人的种种围追堵截，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被誉为第二次“长征”。

整 装 待 发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陕北的延安，正是一派金黄世

界。极目四野，庄稼渐渐由绿变黄；山坡远处，不时荡漾着劳动的歌声：

大生产，多打粮，
支援前线打豺狼；
油灯下，纺纱忙，
自己动手做衣裳。

……

城里城外，洋溢着浓烈的革命气氛，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歌声笑语，汇织成一支扣人心弦的革命交响乐。

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灯塔。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令，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当时，我在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经常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八月间，我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拟派遣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我向党中央请求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终于获得批准。

九月一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会议正式决定：为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派遣王震、王首道、谭余保诸同志率步兵十个连（从三五九旅抽调九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及

干部四个连到六个连（由组织部选调，其中要有知识分子，要配备财经工作干部及城市工作干部），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动身前，将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训练一个时期，主要学习、研究党的方针、政策。

为了组织好这次南征，十月三十一日，党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彭真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参加南征的各主要领导同志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八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决定增加派遣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随同出发；随军南下的干部到达我中原军区后，由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长按工作需要及发展前途分配工作；部队经费由任弼时同志与财经办事处商定解决。

党中央决定三五九旅南征，是对三五九旅最大的信任。三五九旅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主力之一，是一支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由红军时期的红六军团改编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三五九旅奉命挺进华北敌后，活动在晋西北地区，积极配合保卫太原的忻口战役，配合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战斗，参加晋西北的对日作战和出击同蒲铁路北段的战役。后来，又挺进晋察冀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

地。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防线遭到日军的大举进犯，而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枪口对内，对我边区制造摩擦和围困，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因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三五九旅调回保卫边区，守备黄河防线。十月，他们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在旅长王震同志的指挥下，和边区军民在一起，坚决地反击日军对边区的侵犯，配合兄弟部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粉碎了摩擦专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制造的多次摩擦，象一道铜墙铁壁，镇守在大西北，坚守黄河防线，胜利地保卫了边区。一九四一年春，三五九旅由绥德开赴南泥湾开荒生产，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又为今后夺取抗战胜利准备了物质条件。他们把人烟稀少、杂草丛生、一片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遍地是庄稼，到处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鉴于三五九旅长期以来不论在“背枪上战场”，还是“荷锄到田庄”，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所以，党中央决定以三五九旅组成南征部队，开赴敌后作战。

当南征的消息传到三五九旅以后，战士们兴高采烈，都为自己能够光荣参加南征而自豪。然而，按照中央决定，这次南征只是从三五九旅中挑选一部分同志，不能

全部参加，并提出三条要求：一、政治思想好，作战勇敢；二、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三、本人自愿，不能强迫命令。这三个条件，全体指战员无疑都是基本上符合的，但又只能从中挑选一部分同志参加，这倒成了一个难题了。一讲报名，大家都争先恐后，唯恐把自己拉下，各连队纷纷写了申请书、决心书，全都要求参加。怎么办呢？最后只得规定由旅党委选定，报中央批准。

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南征部队组成了，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后改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副参谋长苏鳌、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刘型、副主任李立。以七一七团两个营组成第一大队，大队长陈外欧，政委李栓；七一八团三个营组成第二大队，大队长陈冬尧，政委罗章；七一九团一个营组成第三大队，大队长张仲瀚，政委曾涤；特务团之教导营及旅直参谋训练队组成第四大队，大队长徐国贤，政委廖明。另外还有中央调赴新四军五师工作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第五、第六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同志率领第五大队，文建武、张治台同志率领第六大队。全军共约五千人，由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军事工作。

除南下支队外，三五九旅还留下一部约五千多人，

由副旅长苏进、参谋长刘转连、政治部主任李信等领导，继续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

南征，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不辜负全国人民特别是江南人民的期望，部队在出发前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四年九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南征部队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举办一期一个半月的训练班，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敌后工作的经验。

十月二十五日，训练班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同志说：同志们！你们当中很多同志不久就要到南方去工作了。大家在学习中出了一个题目要我讲，叫做我们的总方针。我们的总方针从哪里讲起呢？我想先讲一点时局。

毛泽东同志从分析时局的变化开始，深刻阐述了抗战的形势、我们的任务和策略。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没有希望，这就是国民党。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经济衰竭，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另一个大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中国要胜利，日本要赶走，中国人民要解放，只有靠我们。我们一天比一天壮大，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全国人民

现在都望着我们。同志们要到敌后去开辟工作，和你们闹麻烦的很多：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国民党。对于国民党，你们不能气一上来就要打倒它，要照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大敌当前，日本人站在面前。

毛泽东同志接着强调：就我们这一方面讲，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从抗战以来就定下的方针。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时期，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就需要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就分别派人出去，头一批叫做湘、鄂、豫，就是粤汉、平汉这两条铁路。第二批是长江下游，第三批是山东。现在可以发展的根据地，还有很多地方。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通过总结党内、军内的历史经验，着重指出加强党内团结和党与人民群众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广大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象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象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象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

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同志最后说：我讲的许多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整个党和军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为我们整个民族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内容丰富，生动具体，不断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特别是那松树和柳树的生动比喻，在我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

在这期训练班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同志也都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把长期积累的极其丰富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为我们这次南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连以下干部还组织学习《军队政治工作》等文件。全军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思想动员，使每个战士都能明确这次进军的目的和意义，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党中央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南征的同志。在物资方面，为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服装、粮食和经费。有些领到新军装的战士，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显

得分外威武。留在延安的同志甚至一些女同志，都说不出多么羡慕他们。中央组织部又派出专职干部，负责把部队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家属学校”。上午学习文化和时事政治，下午纺纱织布，参加劳动生产。这些家属大多比较年轻，思想开朗，追求进步。她们都为自己的丈夫能上前线感到光荣和自豪，看成是一项革命的义务。

部队出发前，王震同志专门到家属队去做思想动员。他说：“你们都是南下支队的家属，又是革命战士。现在交给你们三大任务：第一，要努力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中央的指示，文化低的同志还要学习文化。第二，要搞好生产。后方生产搞好了，也就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第三，要带好孩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照顾教育好。”

“没有孩子的怎么办呢？”不知哪一个调皮的女同志喊了一句，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王震同志笑着说：“那也不能拉后腿呀！”

“别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们不拉后腿，你们到前方也要多打胜仗，争当战斗英雄啊！”又是一片欢快的笑声。

南下同志走后不久，周恩来同志还特地到家属学校看望她们。那是家属学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那天下午，学员们利用清凉山下的一块平地作为会场，临时搭起“戏台”，准备会后演戏。大会刚开始，周恩来同

志就来了。他穿着一套灰色衣服，走上戏台，便向大家讲话。他微笑着说：“今天我本来想请我的‘婆姨’（邓颖超同志）一起来看看大家，但她有公事不能来了，托我代表她向同志们问好。家属学校今天开学，我向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回答他的祝贺。

周恩来同志接着说：“家属学校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同志们既是家属又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把生产搞好，把孩子带好。中央已经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了前方。南下的同志在前方也打得很好，请你们不要挂念。”家属们听了深受感动，她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中央都想到了。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出发前，党中央还在杨家岭大礼堂请了一部分南下干部吃饭。席间，中央领导同志再一次勉励我们，沿途要带领好部队，克服困难，掌握党的政策；到了前方，要英勇杀敌，开辟新区。还询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关怀体贴，无微不至。

这段时间，南征的消息传遍了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人们纷纷动员起来，把节省下来的白面、猪肉、蔬菜送给我们，还送来了一些纪念品。鲁艺、战斗剧社的同志们赶排最新节目为我们演出。从中央机关到各基层，从部队到地方，不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给我们极大支持和鼓舞。

部队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十月中旬，部队开始从南泥湾、金盆湾一线地区向延安城郊集结待命。我

除了做好部队的准备工作外，也从各方面做好个人的准备。那时候，我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却患有慢性盲肠炎和痔疮。为了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胜利打到被敌人占领的南方去，防止盲肠炎和痔疮在途中发作，便到医院进行了割治手术。有的同志对我开玩笑说：

“首道啊，你真准备‘破釜沉舟’啦！”

我笑着说：“不，我这是轻装前进啊！”

再见了，延安

十一月一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那是陕北初冬的一个清晨，延河结着薄冰，被朝霞映得晶莹闪亮；宝塔山在淡淡晓色中，显得更加雄伟。在抗日将士出征的日子里，革命堡垒延安，显得分外庄严，令人倍觉亲切。

这一天，部队很早就从延安四郊向离城约三四里的东关飞机场开拔。南下支队的誓师阅兵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指战员们现在用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胜利果实，把自己武装起来了。干部、战士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挂着新的子弹袋，背着新被子和新毛毯。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队队高头大马，排列在队伍后面，更显得威武雄壮。

飞机场的北面正中，早已搭起一座高高的主席台。台的上端，高悬着“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的大幅

横额，左右挂着两幅特大标语：“中国人民的军队胜利万岁”、“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主席台正前方的旗杆上，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各路队伍聚集在广场上，嘹亮的歌声，伴和着高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红旗和鲜花，把整个广场点缀得分外壮观。

九点四十分，军乐声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由王震同志陪同，健步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上掌声骤起，一片欢腾。

南下支队第二大队长陈冬尧同志庄严宣布大会开始。

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进行曲。接受检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会场的东边朝着主席台前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地从主席台前走过，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并表示他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完成党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

阅兵式后，毛泽东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他讲得言简意赅。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就是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象

“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衷心地祝贺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在大会上，朱德、任弼时、叶剑英、贺龙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都先后讲了话。朱德同志勉励大家英勇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解放中华民族。任弼时同志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次南征的任务，他用一句极富形象的话说：你们要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叶剑英同志介绍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望风溃逃的情况。他激动地说：不久前，日军垂死挣扎，发动河南和湘桂战役，但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却不堪一击，又一次放弃了大片国土。你们要去收复失地，解放被国民党遗弃的江南人民，把红旗插到那里去！西北局的负责同志说：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和无比光荣的。我们预祝同志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同时我们也请你们放心，同志们到了前方以后，你们的父母妻儿的生活，全部由我们负责。西北局的党组织、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和人民，一定好好地照料他们。南征指战员们听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笑了，接着报之以热烈的掌声。最后是我们部队的直接领导者——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讲话。他首先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是靠自己的双手起家的。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的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开延安以后很久，他那高举起来的两只大手，还不时呈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们不断重温我党和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

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嘱托，深深铭刻在每一个指战员的脑海中。此时此刻，我们心中有许多话要向党和人民倾吐。一位战士代表走上主席台，首先向首长们庄重地敬了军礼，稍停片刻，他激动地说：我们能有机会参加南征，这是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也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道路如何曲折，环境怎样艰苦，敌人多么凶狠，我们一定要把它赶出中国去。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南方去，一直插遍祖国的大地！我们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接受党和人民考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战士代表话音刚落，顿时掌声四起。中央领导同志也在热烈鼓掌，他们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最后，王震同志走向前台，举起右手，带领全体南征指战员向党中央庄严宣誓：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

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华南人民。我们每个人都要坚决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大会在万众一心的口号声中结束：“打到南方去！”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夜幕降临了，远近灯火闪烁，有如无数星光洒落在大地上。在一排排亮着灯光的窑洞里，许多干部、战士们正围坐在一起，畅叙参加誓师大会后的感想。

这时，我的思绪也飞得很远很远，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五次反“围剿”，直到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都一幕一幕地浮在眼前。我为自己能够投身于这一系列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幸福……现在，党中央批准了我的请求，并决定让我参加南下支队的领导工作。我又即将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经受新的锻炼和考验。想起这一切，我们心自问：应该怎样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呢？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老战士，我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最好的回答。

回到窑洞，夜已深了。我久久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起床，提笔凝思，写下了几行抒发胸臆的诗句：

北塞嘶战马，
挥师斩敌顽。

任凭风浪险，
何惧行路难。
南征拯父老，
壮志凌云端。
誓以身许国，
破敌凯歌还。

十一月五日，王震、王恩茂等同志和我一起赶到杨家岭任弼时同志窑洞里，召开了南下支队第一次军政委员会的会议。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参加这次会议。会上确定军政委员会的性质是党在支队中的领导机关，其内部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全体委员在会议上有权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一经多数通过形成决议后，都必须坚决执行。军政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决定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方针、政策以及干部调动等。会议还研究了在行军途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会议重申，这次远征，主要任务是到湘粤赣边去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同时护送一批干部到南方去开辟工作。因此，行军途中除非十分必要时力求避免作战。次日，彭真同志又给南征干部作了关于城市工作和到前方工作的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讲到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作风问题、带领干部和部队问题，并要求我们做到实事求是，照顾全局，坚持群众路线，在策略上注意争取多数。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思想上进一步得到武装。

在出征的前夕，干部、战士和家属们，没有沉溺在缠绵的离情别意之中，而是互相勉励，慷慨赴前，“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南下支队副政委王恩茂同志的模范行动，一时成为部队传颂的佳话：当时，恩茂同志的爱人骆岚同志，身边带着一个孩子，又怀了孕，多么需要丈夫留在身边照料啊！但是，党已决定恩茂同志到南方去，怎么办？他们两人的回答是坚决服从党的需要。恩茂同志担负部队领导工作，平日就难得同妻子见面，直到出发前一天，他才匆匆赶到骆岚同志的住处告别。望着妻子的苍白面色，一股惜别的感情不禁涌上心头。他笑着小声说：

“我要走了，你也不说几句什么？……”

“给我！”骆岚笑着从丈夫手里夺过笔记本去，立刻俯身写下一段深情的临别赠言：

恩茂：

你去前方，留下我和北来（注：恩茂和骆岚同志的大儿子），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但是我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执行党的决定，为了党的事业。我更了解，你会永远地爱我，不会让我失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见的。请你放心，我一定负责带好两个孩子，努力学习，照着你所嘱咐的话生活。我愿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并祝身体永远健康！

再见!

永爱你的岚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延安

随后，恩茂同志也在骆岚同志的笔记本上题了赠言，勉励她搞好工作、学习和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并坚决表示，要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红旗插到南方去，迎接胜利的明天。

多么纯真的感情!多么崇高的思想!

十一月十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了。这天上午，部队再一次集中在延安飞机场，接受中央首长的检阅。中午时分，我们离开飞机场朝东北方向开进。从东关到东十里铺的大道上，到处都是欢送的人群。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居民成群结队，站在道路两旁。人们笑容满面，挥动各种鲜艳的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送南征的同志们!”“打到南方去!”“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万岁!”部队路过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的师生们都化了装，扭起了秧歌舞，敲锣打鼓欢送我们。我们一边前进，一边频频向他们笑着挥手致谢。

部队行军三天，经过延川县境到达清涧城。宿营以后，我来到王震同志的住处，还没进门，就听见他那洪亮的嗓音传出老远。他象在批评什么人，而且很生气。看见我推门进去，他马上站起身来，指着我对他面前的那个人说：“好，政委来了。这事你对政委说说吧!”

我抬头一看，只见站在他面前的，是延安有名的劳动英雄、连长刘顺清。他的模范事迹早已被人编成秧歌剧，在陕甘宁边区男女老少都知道。我笑着问：

“刘顺清，你不是在南泥湾领导生产吗？”

刘顺清低着头，脸胀得通红。原来，部队南下时，组织上决定留下他在南泥湾三五九旅留守处领导生产，但他下决心要求南下抗日，一连打了五次报告都没有批准，最后使了个“绝招”：我们在延安还未出发，他就偷偷溜到甘谷驿，在那里等了三天三夜，终于跟上了部队。队伍到清涧，王震同志听说此事，马上把他找来克了一顿，并且要他回去。他一向自尊心很强，挨了批评脸就红了。其实，王震同志内心也很赞许他这种急切要求杀敌立功的英雄气概。因此，沉默一阵之后，换了一种柔和的口气说：

“一定要去，再打个报告嘛！现在搞一个开小差的污点，你看怎么办？”

以后，我们经过研究，还是同意了让他南下。

部队在清涧休息三天。出发这一天，在城北三十里铺的一片收获后的棉地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王震同志首先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等项任命，接着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离开延安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从各方面调来随军南下的同志也是久经革命考验的，我们要象兄弟一

样，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现在，大汉奸汪精卫已经死了，蒋介石弄得民不聊生。我们要勇敢地打到敌人的心脏地带去，坚决和老百姓一起，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他讲完以后，让我也给大家讲几句。我把毛泽东同志临别时有关“栽松树，插柳树”的革命赠言，传达给全军指战员，希望他们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

随后，部队进驻陕甘宁边区重镇绥德，在这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王震同志再次阐明了这次远征任务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整肃部队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布置了部队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最后由我向大家报告部队行军中的三大任务：一、准备打仗。我们的目的地是湘、粤敌后，日本侵略者是我们的主要打击目标，但是，如果反共顽固势力对我肆意阻挠挑衅，我将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二、宣传群众。部队所到之处，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战形势、我军宗旨，博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撒播革命种子，壮大抗日力量。三、搞好团结。战斗部队和干部队之间、战士和干部之间、战士和战士之间、干部和干部之间都要搞好团结。每到一地，还要搞好同地方党政军的关系，不能以为自己是从延安来的，多走了一些路，就把地方同志看成“土包子”，要虚心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

在绥德，绥德地委的同志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

餐。吃罢晚饭，我们司令部就住宿在绥德专署招待所。这里对王震同志来说，算是旧地重游了。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了一段有趣的往事：

“五年前，这里为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所盘踞。何绍南是一个特务头子，有名的摩擦专家，专门在边区周围闹摩擦，还经常派遣特务潜入边区进行骚扰破坏。当我们奉命调到这里的时候，何绍南就说我们是从山西那边撤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不许我们进驻绥德城。但是我们不管他那一套，不用他们来批准，我们命令部队擦亮三八大盖、九二步兵炮，脱掉炮衣，亮出歪把子机枪，雄赳赳地开进城里来，让何绍南看一看，如果我们是‘残兵败将’，那么这些日本侵略军的武器，是怎么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进城以后，何绍南又想出了一个鬼主意，给我送来一张请帖，什么‘敬备菲酌，候光’。去不去呢？不去，他会说你非礼，还以为你害怕、软弱，最后决定去，看他究竟搞什么鬼名堂。当我进入他的客厅坐了很久，还不见何绍南的影子，真岂有此理！这时，我也想给他来一个‘下马威’，拍案而起，说：‘你们请我来赴宴，怎么连人影都不见？那好，我就告辞了！’原来何绍南就躲在里面窑洞里，他听到我一发怒，慌忙跑了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失礼！失礼！’看他那个样子，我心里暗暗发笑。过后不久，我带了几位同志到街上去散步，并没有别的用意，却被一个特务看到了，飞报何绍南说：

‘王震在看地形了’。这可把何绍南吓得惊魂落魄。后来听说，他就在这天带着部属溜出城外了。可见，对付一切反动派，是要有一点革命胆略的，这对我们这次南下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绥德停留期间，我们考虑到部队长途行军打仗，必须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因此，创办了一份油印的《前进报》，请周立波同志写了一篇发刊辞。同时，我还委托周立波同志编写一本战士政治课本。由于周立波同志长期在地方工作，颇感为难。我说：“你去找王恩茂副政委谈谈吧，他非常熟悉部队的的生活，可以帮你出点子。”后来，他找了王恩茂同志，王恩茂同志告诉他说：“部队工作要依靠群众。你在行军中，就会了解到，我们的战士一定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在前方，没有老百姓的帮助，就寸步难行。碉堡周围，敌人埋有地雷，只有老百姓知道，他们会告诉你那里可以走，那里不能走。要是没有老百姓，一切靠自己，就会失去耳目。到了过封锁线的时候，会更深切地领会和老百姓搞好关系的重要。”这一席话，打消了周立波同志的顾虑，很快就把政治课本编了出来，为战士们提供了学习的教材。

十一月二十日，部队从绥德启程东进，于次日先后到达黄河西岸的螭螭峪一带。经过两天，全部从这里安全渡过了黄河。记得那天过河以后，战士们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遥望河西。是啊，河西是抚育我们多年的陕

甘宁边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就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老家”呀！我和战士们一样，怀着依恋的心情在河边站了很久。……猛然，耳边战马嘶鸣催征，我想起应该给毛泽东同志写一封信，于是匆匆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在上面这样写道：

主席：

我们离开延安整整十天了。现在，我是在黄河边上给您写信。

一九二六年您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是您的学生。在延安，我又在您身边工作，经常听到您的许多报告和得到您的具体指导。在这几年中，我参加了您亲自领导的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深切地感到您是我们党的伟大的领导者，又是我的严师良友。当我离别您进行远征的时候，好象有千言万语说不完啊！……

我们已经渡过黄河了。在离开边区之际，我将带在身边的一张照片寄给您，留作纪念。望您多多给予指导！

祝您健康！

信写好后，我连同照片一起放进信封里，让人送走了。

这时，只见一个战士，扶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

从面前走过。我身边的警卫战士说，那是一大队的战士张米贵。部队到刘家会以后，我又听随军南下的周立波同志讲起张米贵的事：他原来是临南县的贫农，参加八路军已有七年，老母亲今年六十一岁了。三天前，老人听说儿子要从陕甘宁边区过河，经过自己的家门，上前方去消灭侵略者。她拄着一根拐杖，在螭蛎峪对岸的黄河边眼巴巴等了三天，果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老人舍不得儿子离开，但她并没有阻拦儿子上前方，连让儿子回家看看的话也不曾说，只是暗暗难受。张米贵抱着枪，陪母亲在河边坐了一会。看见母亲刷刷地掉泪，他用所有能够想到的好话安慰她，要母亲好好保重，自己不久就会回家，到那时一定好好侍奉老人家。最后，这个青年战士毅然站起来说：“打日本鬼子，打那些糟害老百姓的反动派，这是大事。妈呀，你回家吧！”在当时，象张米贵同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是很能代表广大战士的心情和愿望的。

当我和王震同志最后离开黄河东岸之际，我们在马背上再一次回头遥望：

再见了，延安！

再见了，陕甘宁边区！

夜过同蒲铁路

部队东渡黄河以后，迅速通过离石和临县之间的公路，进入了吕梁山区。

吕梁山位于山西省西部，黄河与汾河之间，属于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与党中央联系的咽喉要道，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八路军一二〇师曾开赴这里对日作战。一九三八年春，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主力奉命东进冀中，仅留下独三旅等部坚守晋西北。一九四〇年以后，日本侵略者曾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四次大“扫荡”，妄图将我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困死在这里。但是，我军坚决执行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粉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在这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我们支队直属机关驻在刘家会，这里是临南县政府的所在地。村里村外都有准备埋设地雷对付敌人的土坑，到处是紧张而有秩序的战备景象。为了查明敌情，部队在刘家会停留了七天。当地政府和人民几乎天天来慰劳我们，充分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深厚革命情谊。

十一月三十日拂晓前，部队从刘家会出发，行程七十五里，当天在张家塔宿营。第二天休息一天，午夜继续前进，要通过离石和岚县之间的公路。从前一天起，

天空就不停地飘着雪花，这时竟越下越大。骡马的铁蹄踏在冰冻的山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由于山势陡斜，人和牲口不断在雪地上摔倒，有几匹骡马甚至滚下山沟摔死了。翻过第一道山头后，王震同志指着前面山岗上的一座岗楼说：那就是敌人的碉堡。如今敌人兵力短缺，顾了头不能顾脚。主要兵力都集中到铁路沿线去了，留下的少数敌人夜间不敢出来；要是白天，就不会让我们这样平安通过了。又翻过两座山，前面出现一片平川，一排排白杨和柳树，在雪和圆月的辉映下显得异常分明，不问就知道那是离石和岚县之间的公路。部队雪夜行军六十五里，天亮时到达离石县的鸦儿崖。望着东方进出的万道霞光，战士们脸上都消失了倦意，有些人还高兴地唱起歌来了。

鸦儿崖属于晋绥军区第八分区。一九四二年以前，这里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不断“扫荡”，根据地经济和人民生活都极其困难，根据地逐渐缩小，部队减员严重。一九四二年年末，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晋绥高级干部会议，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机智灵活地主动出击，在战斗中保存和壮大实力。经过充分准备，接连打了几次伏击战都取得了胜利，大大挫折了日军的凶焰，振奋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因此，我们的武工队和游击队竟能在许多敌人据点里进进出出，甚至搬进据点去住，在里面开会，也能保

证安全。

从整个山西省来看，当时的敌我态势大体是：日本侵略者经过战争初期和整个相持阶段的消耗损伤，加之战线越拉越长，其军事力量逐渐削弱。国民党方面，早就梦想在山西和华北建立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抗战初期被日军一触即溃，其主力大部退守到晋西南，大本营设在吉县一带，从消极抗战变为同日军勾结，甚至准备公开投降，妄图共同扑灭熊熊燃烧的群众抗日烈火。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度过了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严重困难局面以后，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在同蒲铁路以西，离石、文水以北，以及在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南北的大片土地上，都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并不断向敌占区扩展。

同蒲铁路，是纵贯山西省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该省最主要的对外交通线。日本侵略者在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派有重兵把守，还有装甲车日夜来回巡逻。在密密麻麻的碉堡、岗楼周围，又驻有大量伪军，称为“保护区”，附近村镇都设有“维持会”。流经铁路西侧的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两边是一百多里宽的汾河平原。敌人利用汾河这一天然的地形条件，在各重要渡口和桥梁两侧都筑有碉堡和岗楼，作为确保同蒲铁路的天然屏障。越过这道封锁线，才能取道南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反复分析了敌情和地形等各

项利弊条件后，十二月四日，我们就通过汾河和同蒲铁路问题，发电请示了中央：

一、据报，敌人似已发现我军东进企图；

二、如敌在汾阳、清源、介休、太谷间封锁加强，通过困难，我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在汾阳、孝义以西，介休、灵石间通过？该线敌顽力量均弱，且我行动突然。可否？请示复。

当天，我们就得到中央军委的复电，明确指出：

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建筑工事，增兵加岗，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事先应派便衣侦察。

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决定绕开阎锡山防区，设法从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越过同蒲线。对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我们都作了充分估计，并立即着手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一、敌有重兵把守，部队行动必须高度机动、隐蔽。为便于联系和保密，领导机关和部队首长都规定了代号，如司令部代号为“松庄”，政治部代号为“柳庄”；王震同志称“一号”，我称“二号”，王恩茂同志称“三号”等。二、地形极为复杂，部队必须尽量轻装。因为部队出发前和抵达后，必须隐蔽在山地，行军两头都要走一段山路，而进入平川后，要相继过河、穿越铁路，在冰冻雪封的情况下，如不实行轻装，就很难完成行军任务。军政委员会为此专门召

开了会议。很快，供给部骡马由二十七头减至五头，全支队骡马减少一半。王震同志把延安带来的被子和毛毯都精减了，王恩茂同志也精减了一条毛毯。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许多物品，都送给了当地群众。三、要夜间行动，加之一次连续行军路程长，动员部队做好长距离夜行军和强行军的准备。据太岳军区第一分区来电，从平遥以北穿越同蒲铁路，这一段路在平原上全程大约一百五十里左右，必须全部在夜间通过，加上出发地和宿营地都在离平川尚有一段距离的山地，因此，一夜之间的实际行程必须达到一百七八十里。这样的行军速度，在步兵史上是少见的。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早在部队从延安出发以前，王震同志就已经反复考虑了如何通过汾河和同蒲铁路的问题，预先作了筹划部署。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敌情和地形等方面的情报，我们决定：先派一支小部队在主力行动之前出发，先期越过汾河和同蒲铁路，向太行军区前进，把铁路沿线敌人的机动兵力吸引过去，以便掩护主力乘虚通过封锁线。十一月五日王震同志命令第一大队政委李铨同志率领该大队一营，携带电台提前五天出发，抵绥德后继续北上，经米脂、乌龙铺，在佳县东渡黄河，到达兔坂。当主力部队从螞蚱峪渡河抵刘家会休息时，一营又由兔坂出发，连续行军四天，经城庄、方山到达米峪镇，接着继续前进，翻过吕梁山脉主峰关帝山，两

天后到达交城县西山区的惠家庄，在这里一面休整，一面进行通过汾河和同蒲铁路的各项准备工作。十二月一日晚，他们又从惠家庄出发，途经永田，于次日晚抵达离同蒲铁路较近的东庄附近隐蔽宿营，等候主力部队的行动消息。

十二月四日拂晓，我主力部队从鸦儿崖出发了。这天的行军计划是翻过吕梁山主峰，向汾河平原前进。登上山头，眼前漫山是雪。树枝被雪压得垂向地面，道路被雪覆盖得难以辨认。王恩茂同志自告奋勇和向导一起当开路先锋。他大步走在我们前头，一脚踩下去，积雪直没到膝盖；头撞在树枝上，大团大团的雪块哗啦啦落在身上，不一会就变成了“雪人”。恩茂同志很会走山路，迈步宽稳不摔跤。特别是太阳出来以后，路上积雪慢慢融化，没有走惯山路的战士，几乎一迈腿就摔跤，有的一路上说不清摔倒多少次，还有不小心跌进坑里去的。到宿营地时都已精疲力尽。第二天部队继续在这样的山路上行军。有一段山路积雪盈尺，寒风凛冽，一步也不能停下休息。翻过一个山头，阵阵狂风又差点把人吹倒。这一天所经过的一些村庄，房屋全被敌人烧毁，满目凄凉景象，侵略者之凶残狠毒，令人发指。

部队途经阎家庄时，召开了一次全军动员大会。大家站在雪地里，听王震同志宣布通过汾河和同蒲铁路的注意事项。王震同志很善于鼓动。他用关羽过关斩将的

典故，生动而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经过几天雪地行军，现在就要过关了。我们过的不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关，而是同蒲铁路这一关。今天晚上，我们要走一百七十八里路，要准备通过五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太原至汾阳的公路；第二道是汾河；第三道是同蒲铁路；第四道是和铁路平行的另一条公路；最后，第五道是日伪军专门对付我太岳军区的一条封锁线，沿山边各交通道口都筑了大量碉堡、岗楼和据点，实际上也是敌人确保晋中平原的前沿阵地。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只过关，不斩将。我们要从敌人的那些象狗牙一样的据点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过去。至于那些据点，我们暂且不去动它，相信它的寿命也不会很长了。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信心过这个关呀？”

“有！”指战员们在寒风中齐声回答。

“好！”王震同志接着说，“但是，我们也要有斩将的准备。如果敌人出来打我们，你们说怎么办？”

“坚决把它消灭掉！”威武的回答声震动山岳。

前一晚，我们收到李铨同志率领的第一大队一营来电：他们已于十二月三日下午从东社出发，在我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太行军区第一分区以及当地武工队和群众的配合、掩护下，机警沉着地从敌人的碉堡、岗楼中间穿插而过，顺利地越过了汾河平原，在东观、白圭之间巧妙地通过了同蒲铁路，于次日晨安全抵达我太行军区

控制的东庄、窑子头地区。第二天，祈县、太谷之敌得知一营行踪之后，马上追搜，企图分路合击。一营即于当日傍晚火速向东南转移到榆社县之白北地区，有意佯作摆开接引后面主力部队的态势。随后我们从侦察中获悉：日军果被我一营造成的错觉迷惑，错误判断我主力将从吕梁山区穿过铁路向东进入太行山区，匆匆于六、七两日将同蒲铁路沿线机动兵力，大部调至祈县以北之东观、白圭、太谷地区。这样就为我军主力乘虚在平遥以北通过同蒲铁路，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十二月七日下午五时半，整个部队分成左、右两路纵队，由石脑庄出发向东南疾进。进入平川后，天幕已降下一层黑纱。战士们都处于临战状态，子弹上了膛，机枪也脱下了枪衣，前后的尖兵都把刺刀插上枪口，随时准备同敌人展开一场厮杀。队伍一口气行进七十里，不时跑步前进。到了城子村，我地下交通站早已烧了开水等待我们，还为我们找了许多向导带路。在一个叫东庄的村子里，路边一间小屋里点着油灯，生着火炉，专门为部队做向导的老乡挤满了一屋子。这些地方，敌人虽已统治达六七年之久，但是人民群众都一心向着自己的军队。

汾河平原非常辽阔。深夜，北斗星几乎触到地面。蓦地，左前方升起了一团火，星光霎时黯然失色。当那火球继续升高时，大家才看清那是月亮。这时，道路被

月光照得比前半夜清楚多了，于是大家互相催促着：“快呀！快走！”都加快了脚步，直向汾河渡口前进。

队伍越往前走，敌人的碉堡、岗楼越是密布，说明这里已是敌人屯驻重兵的地方。四周的村庄黑压压的，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只有一阵阵寒风掠过树梢，发出嗖嗖的响声。战士们一边前进，一边机警地监视着那一座座碉堡和岗楼。

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片白花花的冰滩；接着就听见走在前面的骡马滑倒在冰块上和使劲挣扎的声音。这告诉我们，前面不远就是汾河了，可大家又诧异汾河怎么会这样宽呢？司令部参谋肖林达同志悄悄告诉身边的同志：敌人知道我们的部队经常从这里经过，为了割断延安与太岳、太行、山东等解放区的陆路联系，扒开汾河的西大堤，放水淹没了这里的万顷良田，使这一带群众无家可归，无田可种。大家听到这里，无不切齿痛恨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当部队陆续走上冰滩后，只听见这里噗通一声，那里噗通一声，到处是人和牲口摔倒的声音。人摔倒了，很快爬起来继续前进；难办的是骡马，四支铁蹄一踩在冰面上就打滑，摔倒了，没有三四个人连拉带拽，休想把它拉起来。随军南下的科学家陈康白同志，平日最爱惜他的那些科学书籍和仪器，满满荡荡地驮在骡子背上，宁愿自己不骑牲口，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南方去。这天夜里，他的骡子一走上冰滩就不断

地滑倒，开始是饲养员和警卫员来帮他拉，后来其他同志也来帮他拉，可是那匹骡子摔了几跤之后，任你怎么拉也站不起来了。眼看部队从身边走过去，转眼间连声音也听不见了，他焦急地一跺脚，说：“糟糕！这匹骡子无论如何是要丢了！”急忙拣了几本书背着，抬头看看小熊星定了方位，拔腿就顺着路上的蹄印往前赶。我们到了汾河边，发现陈康白同志掉队了，赶紧派人往回找。等他拄着一根手杖赶来，才知道他丢了骡子。王恩茂同志忙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他骑。王震同志看着陈康白同志笑着说：

“吕梁山上剃胡子，
汾河岸边丢骡子。
死也不丢竹杆子，
誓与马列共生死。”

王震同志话音刚落，引起了大家的笑声，陈康白同志也哈哈大笑。

经过徐家镇后，部队从一座便桥过了文峪河，来到一处更加宽阔的冰滩上。突然，队伍的前面停止了前进，后面的人一时煞不住脚，猛地撞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我跳下牲口，赶到前面一问，才知道政治部队没有跟上先头部队，发现已经迷失了道路。这一带正是敌人的腹心地区，一刻也不能久留。情况异常紧急，我立刻从附近找到一个向导，不一会又发现了前面部队设下的路标。

走到汾河边，忽然从一个小村子后面的月荫处转出一个哨兵来，轻声喝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肖林达同志听出是自己人的声音，忙用政治部代号回答他：

“柳庄！”接着又问，“前面部队过去多久了？”

哨兵说：“过去好一阵了。前面就是汾河，到了敌人的封锁线。你们快跟上吧！”

继续走过一段冰路，部队跨过了汾河便桥。又快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同蒲铁路倏地一下横在我们面前。大家顿时更加紧张起来，有的揭开了手榴弹的盖子，有的打开了枪支的保险机，准备随时同敌人搏斗。当第二大队长陈冬尧同志率领右路纵队冲上铁路时，我军主力已接近铁路。这时，从平遥方向忽然开来一辆敌人巡逻的铁甲车，接连向我猛烈开炮。这时，王震同志突然跃上铁路，沉着地指挥前卫部队反击敌人。一时间，手榴弹在铁甲车四周爆炸，步枪和机枪一齐对准敌人射击。铁甲车上的敌人肯定有了死伤，很快就狼狈逃走了。“快走！快走！”王震同志估计敌人可能增兵再来，大声催促着大家。

左路纵队为了掩护部队通过铁路，派了一个班监视路边的碉堡。当我后卫部队通过铁路时，敌人向我猛烈开炮。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我们的监视哨前面，战士张振海在炮弹尚未爆炸的一瞬间，一下扑了上去，想把炮弹扔开，结果炮弹在他身下爆炸了。英雄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保护了周围战士的安全。班长在无限悲愤中，拣到烈士的一角血衣，珍藏在贴身的衣兜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部队主力很快全部通过了铁路线。就在这时，平遥的日军又在铁甲车掩护下，向我冲过来了，同时猛烈射击我军经过的地方。第二大队警戒部队箭似地冲了上去，迅速用炸药将敌来路方向的铁轨炸断了数十米。敌铁甲车就象只没脚的螃蟹，猛然在离铁路断轨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敌步兵没有铁甲车掩护，也不敢再追击我们，只是胡乱在后面发射了一阵枪炮，就灰溜溜跟着铁甲车回平遥去了。

部队全部通过同蒲铁路和铁路平行的公路以后，继续向东南方向疾进。战士们虽然经过一夜紧张行军，这时却忘记了疲劳，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笑起来：

“听，敌人还在放礼炮欢迎我们呢！”

“哼，放‘马后炮’，是敌人的拿手戏！”

再往前走，只见前面人影幢幢，这是平遥武工队在接护我们，他们已在寒风中整整等了一个通宵。发现大部队到达，他们立刻迎上前来：“欢迎你们！辛苦了，同志们！”一双双温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武工队同志们的接引下，又顺利地通过了敌沿山边的封锁线。

太阳出来了。

部队在一个叫坡底的地方宿营。过了两天，平遥武

工队的同志们告诉我们：在南下支队通过同蒲铁路的第二天早晨，平遥县城里出来了二十几个日军，六十多个伪军，想到附近村庄去抢掠。路上一个老百姓故意告诉他们说：“八路军来了。”敌人忙问：“八路的多少？”老百姓吓唬他们说：“少说也有三四万吧。”敌人慌忙跑回了平遥。

我们住的村子里，有个教书的老先生。他看见我们的战士，称赞说：“了不起呀，实在是了不起！冰天雪地，你们竟敢在敌人眼皮底下跨汾河，过同蒲，一夜之间走了一百八十里。真不愧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说着，向战士们翘起了大拇指。

巧越黄河冰桥

越过同蒲铁路不久，部队又向南直插，进入了云雾缭绕的太岳山区。

好大的山！

从平遥县的坡底村到杨家寺，我们用一整天时间才爬过一座山。它的顶峰上有座宝塔，早已被日军用大炮轰掉了上半截，只剩下七八尺高的塔基。给我们带路的向导愤然说道：“哼！塔是叫敌人轰垮了，可这山，如今不照样踩在咱们脚下么？你们看——”他抬起右手向远处一指。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里正是我们的

来路：辽阔的汾河平原上，笼罩着一层轻纱似的薄雾，蜿蜒的同蒲铁路，和散布在两旁的那些癞斑似的日伪据点，一起展现在我们眼底。向导接着兴奋地说：“那些据点里的日伪军，咱们在山上能看见他们，他们在山下也能看见咱们。要是前几年，他们早向咱们开炮了；可眼下呢，干瞪着咱们大摇大摆在山上走，他不要说放炮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叫我说，敌人真的象兔子尾巴——长不了啦！”

太岳山也叫霍山，在山西省中部，汾河东岸，全长约二百余公里，西陡东缓，是汾河、沁河和浊漳河的分水岭。在那些难忘的战争岁月里，我八路军在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太岳山区抗日根据地。六七年来，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整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二月十二日，我们来到太岳军区一分区所辖的绵上县。一分区的负责同志亲自率部前来欢迎，并在生活上特别照顾我们。我们的伙食标准，除按照太岳军区部队每人每天三钱油、四钱盐的标准供应外，还另发三元冀币的菜金。至此，我们从延安出发已经整一月了。为了发扬成绩，以利再战，支队军政委员会决定在这里休整三天。由支队直属机关抽出一批干部，到各大队去进行一次全面的工作检查。

三天休整结束后，李铨等同志率领的第一大队一营，完成了掩护主力通过同蒲铁路的任务后，遂于十二月十二日晚，从太行军区的沁县故城镇出发，在交口至权店之间向西通过日伪白晋铁路封锁线，到达太岳军区一分区的紫红、郭道地区，十四日在韩洪镇和程壁地区和主力会合。第二天部队出发，连续行军四天，经唐城、和川、高壁、府城、狼寨等地，到达王壁。部队走到和川，气候逐渐转暖，路上的积雪大部融化，处处都露出雪下的黄土。再往南，到高壁、府城，就进入了太岳军区三分区。一路上，村落房舍寥寥可数，满目皆是战争创伤。有的地方如府城，由于日伪疯狂烧杀，以致遍地焦土，片瓦不存。然而，就在那一处处烧得焦黑的断壁残垣上，却用白粉写着许多醒目的标语：“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人人奋起自卫，家家埋上地雷！”足见敌人的残暴凶狠，吓不倒英雄的人民，扑不灭反侵略斗争的革命怒火。

支队直属机关到了沁水县的马邑、富店一带以后，王震同志就和我一起去找王恩茂同志，共同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及有关问题。王震同志说：“下步行动的一个关键，就是南渡黄河。渡河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必须从现在起抓紧进行。”

黄河从河曲县自北而南，流经陕西和山西两省边境，到风陵渡又折而向东，横贯河南省的北部。在一个月前，

我们的部队主力在螭螂峪东渡黄河，从陕西省进入山西省；现在要从山西省到河南省，就必须第二次南渡黄河。虽然两次渡的是同一条河，但上一次是在我们根据地，这一次却是在敌伪顽区，不论自然或社会条件等，这次都不能同前次相比拟，预计是很艰难的。

我们决定部队在沁水县附近再休整三天，抓紧做好渡河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这时，八路军前线指挥部总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带着准备分配给南下支队的几名干部和电台技术人员，特地从太行山赶来欢迎我们。滕代远同志听取了我们的简要汇报之后，同意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同太岳军区党委在郎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讲了话，有针对性地向我们提出了几个应予注意的问题。他说：你们过河以后，要尽可能插入敌人守备部队各不相关的接合部，这样就能活动自如；要严守自卫原则，不主动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要开展政治攻势，尽力争取伪军，对坚决反对我们的反人民武装，在尽力争取而不成功时，则可相机消灭之；要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但不乱发委任状等。他接着又强调：军队到了新区，必须做到纪律严明，安定人心，适时发动减租减息，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最后，滕代远同志高兴地向我们报告说：“同志们！太岳军区为了使你们胜利地完成南征任务，决定支援你们伪币一百万元，冀币一百一十三万元，每人发

鞋两双，袜一双，补充棉被二百六十床，棉衣五十套，每人每日发粮一斤半，并由地方配给柴炭和牲口饲料等。”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由衷地感谢兄弟部队和根据地人民对我们的大力支援和亲切关怀。

联席会后，南渡黄河的准备工作从思想、物质和组织等各方面抓紧进行。思想方面：集中各大队军政干部二百多人在马邑开会，请滕代远同志报告华北及河南地区的斗争形势。王震同志和我简要说明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向大家明确提出准备四天南渡黄河的任务。物质方面：组织支队和当地医护人员为战士医治冻伤脚，补充鞋袜，检查并配备必需的武器、弹药、工具和物资。组织方面：支队军政委员会举行会议，为了便于渡河，决定将部队组成三个行军纵队：一、中央纵队，由一、四大队组成，支队直属机关随同行动。二、右路纵队，由二、六大队组成；六大队属二大队建制，编为第二大队第四营。以文建武、张成台、陈冬尧、罗章、贺盛桂等同志组成纵队临时军政委员会，文建武为书记。三、左路纵队，由三、五大队组成；五大队属三大队建制，编为第三大队第三营。以贺炳炎、廖汉生、张仲瀚、曾涤、龙炳初等同志组成纵队临时军政委员会，贺炳炎为书记。

从越过同蒲铁路以后，王震同志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南渡黄河的问题。在沁水县一带休整的那几天，他几乎整天都在想渡河的事，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睡觉。这天

早晨，他一起床就站在军用地图前面，全神贯注地一面思考，一面比划。过了足有一袋烟的工夫，他突然转过身来问我：“政委，昨天供给部听老乡反映，这地方有种羊浮子——，这事你晓得吗？”

“我去找那老乡问了。他说的叫羊浮子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张整羊皮，把漏气的地方都扎死，里面吹足气，就和轮船上的救生圈一样……”

他一边听我说，一边不住摇头，说：“不行不行！在这样的数九寒天，不到万不得已，怎么能让战士们浮水过河！再说，我们上上下下五千多人，到哪里一下变出那么多整羊皮来呀！”

“是啊！”我也笑着说，“看来，最要紧的，还是千方百计去找船。”

“船是真不好找啊！”他用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指着垣曲东南的马湾附近，也就是我们计划中的渡河地点，说：“昨天，我又问过一個刚从这地方回来的同志。他说这一带统共只有三四条小船，又不在一起；河里水流很急，要把它们集中起来那可不容易。就算是都闹到一起了，三四条小船，对我们也无济于事！”

“报告！”门外传来一个洪亮的喊声。王震同志说了声“进来”，只见支队侦察队的几个干部，一起走进屋来。王震同志马上指着地图，仔细向他们布置了侦察任务，最后说：“任务很紧急。你们带一部电台今天就出发，尽

快把找船和侦察到的情况报告我们！”说完，又问我：

“政委还有话嘱咐他们吗？”

我想了想，说：“现在时间紧迫，能不能索性再从各大队抽一些同志跟他们一起出发。一旦把情况搞清以后，同时就在现场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部队主力渡河！”

“一锅煮！这个办法好。”王震同志立刻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各大队抽一名大队领导干部带领几名参谋人员，第一、二大队再各带自己的侦察队，会合支队侦察队共同组成渡河先遣队，由支队副参谋长邹毕兆同志统一指挥。先遣队的任务是尽快侦察清楚下述情况：一、黄河两岸日、伪、顽军的部署情况；二、黄河两岸的地形、道路情况；三、毛田渡口（在马湾东南五里）上下游各二十里以内的船只数目及可能集中到渡口附近的船只数目；四、若船只很少，不能满足渡河需要，能否就地找到一定数量木材，扎制木排渡河等。在查清以上情况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渡河时的警戒、强行渡河时的组织指挥以及防御日、伪、顽军破坏、阻挠我渡河的抗击掩护计划等问题提出建议。

二十四日上午，邹副参谋长率领渡河先遣队出发，经灵官庙、黄莲树翻过王屋山，穿越从河南省的济源至山西省的垣曲之间的公路封锁线，连续行军二十六个小时，于次日中午到达黄河北岸的毛田渡口。稍事休息后，即分头紧张投入各项侦察和准备工作。他们为了做到隐

蔽保密，不使敌伪和国民党军队发现我军渡河意图，出去侦察水情和寻找船只的同志都一律改穿便衣。经过半天多的工作，他们就基本搞清了需要了解的各项情报。

毛田渡口位于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北岸。当时，在陇海铁路从洛阳至三门峡段，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大体以铁门、义马为界，铁门及其以东的新安、洛阳等地是日军占领区，义马及其以西的浥池、三门峡是国民党占领区。毛田正处在日伪军占领区的西部边沿上。在黄河北岸的毛田、马湾及其附近地区，都没有日伪军据点。因此，多年以来，我八路军大都从这里渡河。但从毛田周围数十里范围看，敌情还是相当严重的：正北三十里有敌邵源据点，东北三十五里有敌王屋据点，西北三十五里有敌蒲掌据点和城关据点。其中特别是敌邵源据点，由于处在渡口正北的塬地上，不仅对我军渡河是一个威胁，而且又堵在我军从横河到毛田所经过的路上。如我部队强行渡河，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部队监视以上据点的敌人。此外，在毛田渡口的对岸三里处，有一个石曲村，现驻河南省新安县伪军一个排，防守石曲渡口。再往南离石曲四里的石井村，驻有新安县伪军一个中队及另两个排。他们无疑都对我军渡河造成直接威胁，必须相机拔除之。

毛田渡口和石曲渡口地形极为险峻。当地群众反映，这一段黄河有三关，即人门关、神门关和鬼门关。在孟

津以西的河南省境内，由于高原黄土长期受到河水冲刷侵蚀，形成许多断层峡谷。毛田、石曲均处于峡谷底部，附近的制高点分别被日伪或国民党军队所控制。凡此，均对我军渡河甚为不利。

至于找船或扎制木排的问题，先遣队经过侦察，证实了支队司令部现已掌握的情报，即：毛田渡口只有一只小船，一次最多能乘三十人，往返需要一个小时。如部队靠它过河，不计骡马辎重，仅渡五千人过河就要七个昼夜。在毛田渡口上下游各二十里内，还有三只小船，但很难把它们都集中到毛田渡口。附近也根本找不到扎制木排的成材木料。

暮霭渐渐降临。混浊的黄河水，象脱缰的野马，呼啸东去。宽阔的河面上，漂着大块大块的浮冰，互相碰击着，激起一阵阵浪花。河的对岸，倏地亮起几点若明若暗的灯火，那里是敌人的碉堡。

“怎么办？怎么办？……”邹毕兆同志伫立在河边，心事忡忡地小声自语。站在他身后的小警卫员，这时也忍不住脱口说了一句：“司令员和政委，这会儿比我们更着急呢！”

就在这时，在毛田渡口以西的河边，几个反穿羊皮、便衣打扮的人走走停停，好象正在寻找着什么。他们就是先遣队派出去找船的同志。在一片朦胧的薄暮中，他们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上身穿着破棉袄、腰里系根粗草绳、

身后牵着一头小毛驴的老人。

“老大爷，是从上边来的吗？”一个侦察员迎了上去，指了指河的上游，笑着问。

“是，是从上边来的。”老人看见侦察员腰里鼓鼓地别着家伙，加上天气很冷，身上不禁轻轻发抖。侦察员见此情景忙把外面的皮袄解开，指着别在内衣上的符号，笑着说：

“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军！我们的部队想过河去，到处找不到船。你能替我们想想办法吗？”

“船，都叫鬼子抢走啦！”老人说着，脸上现出忿恨的神色。接着，他若有所思地搔了搔后脑勺子，说，“同志，我在上边河湾里看到河里结了冰，看样子，兴许能过人。”

侦察员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黄河结冰的事，中午到达以后，他们发现上游河道狭窄险峻，当时急着寻找渡口和船只，没有到上游深入侦察，这时听了老人的话，不禁半信半疑起来。商量之后，决定请老大爷领他们去看。大家一起朝着河的上游走了不远，只听见前面一个侦察员惊喜地叫了一声：

“冰！你们看，好大一片冰！”

后面的侦察员立刻蜂拥而上，试探着从河的北岸走到南岸，接着又从南岸走向北岸。顿时，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一边派人赶回毛田向邹副参谋长报告，一边

再三感谢那赶驴的老人。

他们不知道那冰上能不能承受大部队和骡马辎重通过的压力，就到冰上去用刺刀挖挖结了多厚。挖了好一阵，厚厚的冰层怎么也挖不透。挖冰的“喳、喳”声惊动了南岸的伪军。一个伪军大声喝问：

“喂，哪一个？”

侦察员们都潜伏警戒着。半晌，伪军见没有人回答，也就不再吭声了。

结冰的地方位于毛田渡口西面三里多路的黄河上游。邹副参谋长接到报告后，立即带着先遣队全体同志，趁着夜色掩护迅速赶来了。为了不惊动附近敌人，他们悄悄按计划行动起来。首先组织一批同志紧拽一根粗绳，成一字队形在冰上探索前进。随后让另一批同志携带着麦秸，在后面把凡是安全通过的冰上，都撒上麦秸。两队人员都顺利地到达南岸，然后向西横推十米，再用同样办法平安返回北岸。这时，冰上出现了两行麦秸，全体先遣队员共一百五十余人一起走到冰上，从两行麦秸中间安全到达南岸，没有发现任何沉陷征候，当即转回北岸。邹副参谋长喜出望外地说：“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冰桥！”所有先遣队员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家虽然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但是谁也没有感觉劳累。在返回毛田渡口的路上，邹副参谋长和各大队首长研究了全支队从冰桥上过河的有关问题，决定明晚在冰桥再铺上一

层麦秸，这样既可作为部队通过冰桥的路标，又可防止人员骡马滑倒摔跤；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和地形、道路、渡口等方面的情报，对全支队南渡黄河的行军路线提出了建议。他们到达毛田后，立即发报向支队首长报告。

二十五日深夜，我们支队司令部的人谁也没有睡觉。王震同志在那间只剩一堵墙的矮屋里，不停地踱来踱去，一次又一次地问报务员：“前边有报告没有？”先遣队一直没有消息，大家心里都异常焦急。

“报告！先遣队发来电报！”译电员终于把电报送来了。王震同志迫不及待地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黄河已结冰，人马均能通过。……”电报上接着报告了结冰的具体地点、附近敌情以及支队行军路线的建议等。

“好消息！好消息！”司令部的所有同志都分外欣喜。

王震同志也很高兴。他笑着说：“这就算是过了黄河吧？”

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出发，按先遣队建议的行军路线前进。次日凌晨，指战员们冒着刺骨的西北风，向着黄河疾进。当天下午一时许，大家踏着硌脚的乱石，途经康家沟、灵官庙、石磨渠等地，到达黄莲树。这时，突然飞来八架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将近一个小时，由于我们是在大山的峡谷之间行进，敌机尚未发现我军南

渡黄河的意图。部队继续前进，当晚绕过敌邵源据点，通过从济源到垣曲的公路封锁线，到达了黄河北岸。

第一大队在过冰桥时担任前卫。当一大队长陈外欧同志率领前卫二营到达冰桥北岸时，邹副参谋长立刻将对岸石曲、石井两村驻有伪军的详细情况向他作了介绍。陈大队长随即命令二营五连过河，围歼石曲村之伪军；命令二营四、六连围歼石井村之伪军。

二营五连越过冰桥后，跑步前进，迅速包围了石曲村。战士们对这些平日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二鬼子”恨之入骨。战斗打响以后，他们首先向敌人扔出一排手榴弹。猛烈的爆炸声尚未平息，英雄们就端着雪亮的刺刀，挺身冲了上去。伪军们在这些浑身是胆的勇士们面前，一个个都吓得跪在地上举枪求饶。战斗仅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当即俘获伪军十七人，击毙六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余支以及弹药等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因为夜深天黑，伪军排长和两名随身亲信乘隙逃走。

与此同时，一大队二营营长带领二、六连向石井村跑步前进。由于天黑，加上地形、道路不熟，当他们接近村边时，石曲村战斗已经打响。这里的伪军听到激烈的枪声后，早就逃得不见踪影了。

当晚，第一、二大队全部通过冰桥，进入河南省境内。

天亮了。我站在黄河岸边，久久地注视着面前的这

一幅奇景：在奔腾呼啸的河面上，巍然耸立着一座百米来宽的冰桥。它全身披着初升的阳光，迸射出千万道耀眼的异彩。

部队和骡马辎重，一批接一批地从冰桥上走过去了。我和王震、王恩茂同志并肩站在冰桥上，看见中央电影团随军南下的王旭同志从面前走过，连忙把他叫住：

“王旭同志，快给我们照张相片留作纪念！”

身边一位同志笑着补充说：“照片上还要写上一句：‘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摄于黄河冰桥！’”

据当地群众说，自从民国十六年这里结过一次冰以后，至今十几年来没有再结过冰。还有的说一百八十多年以来没有结过冰。总之，这一带黄河结冰是罕见的事。所以，老乡们都说，这是“天助毛主席！”“天助八路军！”

我笑着问身边的陈康白同志：“老陈啊，你是科学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

陈康白同志解释说：这里是个回水湾，河面比较狭窄，上游冲下来的冰块都堵塞在河湾里，前几天气温又骤然下降，堵在河湾里的冰块很快冻在一起，最后就结成了一座冰桥。

当天，我们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电，报告我们南渡黄河的喜讯。不久，就收到了毛泽东同志庆贺我们“五十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的回电。

英雄血肉铺征途

黄河南岸不远的石曲村，坐落在一座黄土高山的北麓。翻过高山，只见一条碎石小路透迤于层层壁立的高山之间。部队在南渡黄河的当天，踏着这条小路向西南行军四十余里，到达袁山村和灌子碾坪一带宿营。

在黄河南岸，不时可以看见一些用钢筋水泥构筑的地堡、掩体和交通壕。据说，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所谓“黄河防线”。一眼可以看出，这些地堡和掩体从来就没有人使用过。早已进驻到这里的我豫西支队告诉我们，这条“防线”，在今年四月间不堪日军一击就土崩瓦解了。当时，日军发动进攻的兵力不过五六万人，装备比较优良；而国民党第一战区汤恩伯、蒋鼎文的参战部队共达四十余万，又经过两年以上的休整训练，但是整个中原战役从头到尾不到半个月，即以国民党军的全面崩溃而告结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连陷郑州、洛阳，一直向西攻到新安、铁门一带。蒋军官兵则闻风丧胆，相率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逃跑中被乱枪打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被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械。汤恩伯本人窜入嵩山跑掉了鞋子，最后化装成火夫才只身逃出。遗弃在黄河南岸的这些完好无损的工事，就是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的又一个铁证。

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步步退让的国民党军，却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极端仇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军从袁山村一带出发，分两个行军纵队齐头并进，准备通过陇海铁路。下午二时许，左路纵队前卫第二大队在千秋镇东北地区，右路纵队第一大队在千秋镇北关附近，同时都遭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梧所部顽军的阻击。我先头部队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耐心向他们进行解释，说明“我们是八路军，是到敌后去抗日的”，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路给我们通过。但是，这些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顽军，非但蛮横无理地不听我军规劝，而且继续开枪向我军射击，当即打死打伤我第二大队先头连十余人。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反击。第二大队很快将顽军打垮，俘敌七十余人，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一挺，步枪七十余支；第一大队一营二连和二营四连，分别夺取千秋镇东门和西门，守城顽军惊慌逃窜，我军迅速占领千秋镇，俘敌六十余人，缴重机枪两挺，掷弹筒一具，步枪六十余支，子弹、手榴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当地群众对我惩罚这些“遭殃军”都拍手称快。他们冒着枪弹危险，为我军指引冲锋路线。战斗结束后，又纷纷拥到街头，夹道欢迎我军进城宿营。

第二天，我们在千秋镇附近的石河、峪口一带通过了陇海铁路。我跟着部队从铁桥下面走过，看见支队副

司令员郭鹏同志和副政委王恩茂同志正站在桥上向东眺望。我抬头一看，只见铁路上的枕木和铁轨全部拆除了，剩下一条乌沉沉的铺着石子的路基。王恩茂同志感慨万端地说：

“这大概又是蒋介石的一大杰作！他以为把铁路一拆，就能阻挡日寇的进攻。真是愚不可及！”

我轻轻点着头说：“这和他一九三八年下令炸掉花园口黄河大堤的结果一样，日军照样很快就攻下武汉，倒是河南的老百姓，从此受难不浅了！”

“嘻！”郭鹏同志用握拳的右手狠狠砸了一下左手的掌心，气愤地说，“老百姓说得一点也不错：蒋介石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呀！”

下午，部队行进的前方出现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在西斜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这就是自古留下许多美丽神话的洛河。这时候，洛河靠近两岸还结着薄冰，河中间的急流处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附近只有一只小船，每次仅载二十余人。支队司令部遂派第一大队充当前卫先行徒涉，一面架桥，一面掩护主力渡河。由于缺少器材，人员也不够，费了很长时间架桥没有成功，最后我们只得决定，除少数体弱和患冻疮、关节炎的同志坐船以外，其余人员一律徒涉过河。隆冬季节，当指战员们脱掉棉裤鞋袜后，顿时全身冻得直打寒颤，再低头一看河里的冰水，牙齿就禁不住咯咯作响。第二大队长陈冬尧同志

看见几个战士行动迟疑，当即喊道：“同志们，快跟我来呀！”话音未落便噗通一声跳进了河里。战士们看见陈大队长带头下水，随后也都跟了上去。

由于等候架桥延误了时间，部队过河后天已经全黑了。指战员们在河岸上重新穿好棉裤鞋袜，又迈开已冻麻木的两腿继续前进。在行进的队伍中，我看见一个连长拉出一个战士，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小马呀小马！我看你穿着这冻得硬邦邦的裤子怎么走路！”原来，在徒涉洛河时，被叫做“小马”的战士怕冷，穿着棉裤就下到水中。上岸之后，棉裤很快冻成了硬块，每迈一步都很困难。连长说着，让两个战士帮助小马脱掉棉裤，自己拿条棉被给他围在身上。大家见小马象个穿裙子的女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连长回头问大家：

“小伙子们，你们刚才在水里冷不冷呀？”

一个战士抢着回答：“说不冷那是假话！刚一下水，就象好多针一下扎进了肉里，眨眼之间透进骨心，又疼又麻，两条腿简直不象是自己的，可真难受，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洛河横直就是那么几十米宽，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连长又问那战士：“现在你还冷吗？”

“不冷啦！上岸一穿上棉裤，不一会就火辣辣地发热了！”

连长笑着象是对小马，又象是对大家说：“这是一条

经验：往后徒涉过河，天再冷，也不能穿着棉裤下水。你说对不对呀，小马？”

“对。”

王恩茂同志这时走过来，笑着凑近我耳边说：“政委，你听，大家在总结徒涉洛河的经验教训咧！”

“是啊！”我赞同地说，“我们支队司令部，更应该从战术上好好总结总结呢！”

部队踏着月光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个叫做上涧的村子宿营。这里原有六七十户人家，由于连年蝗灾，加上国民党军队肆意盘剥，村里已经十室九空、破败不堪。战士们没有惊动当地群众，啃了一点自带的干粮就睡觉了。我们几个支队干部，连夜总结出徒涉洛河的几条经验教训：从地理方面考虑，部队越往南走，江河湖汊就越多，如在行进前方的豫西和豫中，较大的河流还有伊河、汝河、沙河、澧河、洪河、淮河和颍河。因此，全体指战员今后要充分做好随时渡涉大小河流的思想准备。从敌情方面考虑，我们渡河的地方大多处于日伪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军占领区，或者是他们之间的接合部。为了避免敌人对我实行“半渡而击之”的危险，部队必须以最短的时间、最简便的方法过河。这次在洛河，我们就是在韩城、柳泉两处日伪据点之间过河的，两地离我都不过数里路程；敌占据的宜阳和洛宁两县，离我也只有五十里左右。如敌派兵前来截击、骚扰，我即便在

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延误时间越长，所受损失也就越大。综合以上两点，再考虑到我们在敌占区既不能很快找到足够船只，也很难迅速筹集大量架桥器材，对我们这样一支在冬季长途行军的部队来说，最快和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徒涉过河。事实上，这次第一大队由于担任前卫，大队长陈外欧与政委李铨和大家一起下水，全大队七百多人不到十分钟就徒涉完毕，并火速穿好衣服，占领了附近有利地形，掩护主力过河。这一成功经验说明，只要全体指战员发扬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我们就能无往不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部队进至宜阳县西南的东、西赵堡。这两个村庄相距不远，其中东赵堡较大，有一千多户人家。两地各驻有自称属于“宜阳纵队”的一个支队，每支队约有一二百人枪。他们虽然口称“抗日”，实际上专以扰民为能事，是国民党地方势力纠集的灰色武装。当我军到达西赵堡时，开始他们紧闭寨门，如临大敌；后经我派人宣传联络，才打开寨门让我进驻。我太岳军区为了在此开辟工作，也派了一连武装开赴这里，并在东赵堡建立了八路军伊洛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张坚石同志告诉我们：伊河和洛河流域原是鱼米之乡，农产品除了小麦、芝麻、花生、核桃之外，还盛产红薯。但是，在我们到达时什么东西也没有了，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轮番劫掠，这一带早已变成卖妻鬻儿

的穷困之乡了。

我们在东、西赵堡度过了一九四四年岁末和一九四五年岁首。当地群众一贫如洗，部队在附近搞不到粮食，以致元旦这天几乎连两顿干饭也难保证。早餐大部分连队是小米粥加红薯，晚餐有的拖到晚上十时甚至半夜，仍是小米粥和红薯。艰苦的物质生活丝毫没有影响指战员们的情绪。大家仍象往年一样，大清早就起来互贺新年，彼此勉励。几天以前，部队收到了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支队政治部组织全体指战员认真进行学习。晚饭后，我向支队直属队全体指战员宣读了中央关于今后行动方针的若干具体指示，接着针对当前形势讲话指出：不久以前，蒋介石密令白崇禧袭击我华中新四军，妄图以此来缓和日军进攻，削弱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看来，抗日战争还要经过一段艰苦奋斗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为时不长的一段时间，迅速发展抗日力量。

根据部队进入河南后行军、打仗的实际感受，我们又分析了伊洛办事处同志们提供的情况，初步认为，部队现已进入日伪顽纵深区域，敌情将一天比一天严重。今后对于行进前方和周围的情况，远不能象在根据地或游击区那样了如指掌，只能一边前进，一边逐段向前了解一定范围内的敌情、地形和居民等项情况，同时确定

今后前进的行军路线是：从汝阳和临汝、宝丰之间穿插而过，旋经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南进。

我们的上述分析，很快就被随后三天的行军实践所证实。一月三日拂晓，我们从东、西赵堡一线，进至古城以东迅速徒涉伊河。各连队经过向全体指战员传达总结徒涉洛河的经验教训，这次在徒涉伊河时情况就大为改观：大家一到河边，立即脱下棉裤鞋袜，依次跳进水中向对岸疾走，每人只用几分钟就徒涉完毕，完全符合战术作战要求。次日行经上店西南三里之前坪越过汝河，到达沙坪一带。第三天又经过临汝县的圪塔街到达宝丰县的观音堂、黑虎庙和上下屯一线。在这三天中，部队几乎每到一地，都遭到伪军的袭击和骚扰。如在徒涉伊河后，部队原定在南庄、芦家墩宿营，因伪军向我射击，只得临时变更宿营地点。在前坪跨过汝河到达西庄时，遇上店伪军向我开枪。绕道进至三屯、东堡后，又遭两地伪军猛烈射击。过圪塔街，伪自卫团开枪阻我前进。进至芦沟，又差一点和伪自卫团发生遭遇战。五日这一天，我们原计划只走四十里即到宿营地，由于沿途不断遭到伪军骚扰、袭击，不仅多绕道三十余里，而且走的尽是山间崎岖小路，行程艰难，使人疲惫不堪。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进入河南境内，至今十一天来，根据我军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地方党及人民群众提供的材料，进一步了解到河南西部的地理特点和地主、资本家

掌握着的地方反动武装情况：在过去较长的旧社会里，因为阶级分化，地主、资本家都集中居住在集镇里。所以豫西的集市、镇店都修筑有寨子，有的围墙很坚固。抗战以后，地主、资本家又加固这些寨子，并筑有工事，扩建反动的灰色武装，以此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这样，大量的粮食和资财都集中于镇店寨子内，广大的农村，农民家中贫困无隔日之粮。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对豫西发动进攻占领了广大的地区后，这些反动武装都摇身一变成了伪军，也是日本侵略者统治这一地区的忠实帮凶。这些伪军又和国民党顽军暗地勾结，他们确实成为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一大灾难，也是我军南征道路上一大敌人。这些天来我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这些伪军阻拦、截击和伏击，为了避免伤亡，我军也尽量不攻占这些集镇宿营。这样一来，对后勤供给工作增加了异常的困难，全军的粮食、油盐等无处购买。因此，从后勤首长到每一个伙食单位的司务长，每天在行军中和宿营地区，都忙于从农村稍富余的农民手中分散购买粮食、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同志往往整夜分散寻购粮食等，经常不能睡觉休息，次日又要随着部队行军。他们这样艰苦地工作，在灾荒严重的地区，所买到的粮食仍然不能满足部队生活需要，因此部队只得以红薯、瓜菜和杂粮充腹，有时也处于半饥饿状态中。

一月六日，部队经煤窑嘴、李窑、朱庄到达黄沟，

进入鲁山县境。据多方侦悉：早在我军越过同蒲铁路、进入太岳军区、抵近黄河北岸以后，日军即得知我将南下，于是加紧在公路沿线构筑工事，重兵防守，企图阻止我军南进。我南渡黄河进入河南以后，更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防备。据从平汉铁路沿线过来的商旅传称：最近许昌、漯河两市都已增调日军，两市之敌坦克装甲部队也在集结、调动。豫中的郟县、宝丰、鲁山、叶县等地，都驻有从铁路沿线向西开来的日伪军。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很可能计划和平汉铁路从许昌到漯河段以西地区，利用其占据的铁路、公路等便利条件，机动调遣兵力，严密布防，层层堵截，妄图将我军歼灭在这个地区。

当晚，支队司令部召开了一次有各大队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王震同志在会上简要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明确部署了各部队的行军、作战任务。他说：“现在，鲁山县城里住着日军的一个联队，还配备有坦克连和装甲部队。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敌人早就作了准备，在这里‘恭候’我们了。我们怕不怕它呢？中国有句俗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要是怕日本侵略者，干脆就不到它占据的这块地盘上来了！我们不仅不怕它，还要在它面前通过鲁山附近的两条公路，渡过沙河。敌人会不会乖乖地眼看我们从它鼻子跟前过去呢？我想是不会的，它很可能要调兵来堵截，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兴奋地说，“同志们，南下以来，我们还没有和日伪军真正打过大仗，这一次它要是送上门来，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揍它一顿，要揍得它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各大队长听到这里，都忍不住摩拳擦掌，纷纷表示：如果日军敢来较量，就一定把它打个落花流水。

为了顺利通过鲁山地区，王震同志随后将全支队分成两个行军纵队：第二、三大队和支队直属机关为右路纵队，第二大队为前卫，第三大队为后卫；第一、四大队为左路纵队，分别担任前、后卫。两路纵队同时出发，分别沿鲁山县城东、西两侧向南运动，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午夜，部队冒着刺骨的北风出发了。这时，天空黑得象锅底，伸手不见五指。地上的积雪在指战员们脚下被踩成了雪水和烂泥，溜滑难行。走了一阵，大家身上都热汗涔涔。当右路纵队前卫部队横跨公路时，突然，第二大队长陈冬尧同志低声喊了一句：“同志们注意！”指战员们一个个都瞪大眼睛，紧盯住鲁山县城方向。倏地，我们发现在前面不远的公路上，开来了一辆敌人的汽车，和我稍一接触，发现我部队正向前运动，掉头便向鲁山方向开跑了。

约摸几分钟后，部队行进的左侧传来了炒豆似的机枪声。显然，这是从鲁山赶来的敌人向我们开火了。

“同志们，快跟上！”陈冬尧同志一边发出命令，一边以神速的动作，带领部队占领了有利地形。顷刻间，夜空中又响起他那洪亮的呼喊，盖过了敌人的机枪声：

“打！狠狠地打呀！”

很久就压在指战员们心头的仇恨、怒火，这时都一下爆发出来了。一道道红色的弹光，划破夜空飞向敌群。无数手榴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升起一团团浓黑的烟雾。枪炮声、喊杀声夹杂在一起，如同山呼海啸，震动得大地颤抖……

敌人还在拚死向前蠕动。复仇的子弹，首先飞向那些蠢动的亡命之徒。前面的敌人倒下了一排，后面的敌人再不敢向前挪动一步。

“同志们，冲呀！”

战士们象突然爆发的山洪一样，向着公路猛冲下去。司号员站在山坡上，高仰着头，鼓足全身气力吹响了冲锋的号声。顿时，公路上刀光闪闪，烟雾迷漫。吓呆的敌人丢盔弃甲，哇哇乱叫。受惊的骡马挣脱缰绳，腾空跳起。敌人一下混乱了，再也支持不住，仓皇向鲁山方向逃窜。

我军乘敌溃逃之机，迅速向公路南侧运动。转瞬间，右路纵队的前卫第二大队和支队直属机关全部通过公路，渡过沙河，进入了安全地带。接着，当后卫第三大队通过时，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串灯光迅速朝这边移动。

大队长张仲翰同志机警地判断说：“这象是汽车灯！看来敌人又出动了”。他一边派通信员向支队司令部报告，一边火速下达了后卫警戒的命令。

果然，鲁山的日军重新组织了兵力，并调动七八辆坦克和装甲车，以更猛烈的炮火向我反扑过来了。

张大队长当即命令一营二连组织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占领有利地形坚决抵抗，掩护其他部队通过公路。随后，他亲自到这个排的阵地上去指挥战斗。

“同志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张大队长问大家。

“准备好了！”排长严正祥同志回答说，“大队长，你走吧，前面更需要你，这里我们顶得住！”

敌人越来越近了。等到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之内，严排长立刻一声令下：“同志们，打！”话音刚落，几十条火舌便一起伸向敌人。我英雄排同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激战。日本侵略军企图以坦克开路，用装甲车作掩护，怪叫着冲向我阵地前沿。战士杨正春盯着隆隆开来的敌坦克，轻蔑地说：“哼，好你个小鬼子！你仗着有几个铁乌龟，以为老子拿你没办法？！……”说着，他从腰里一下拔出了好几颗手榴弹，全部打开保险盖，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飞快地奔向敌人的坦克群。他在全班战友们的炮火掩护和全力配合下，先后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两辆坦克。当他准备去炸第三辆坦克时，凶恶的敌人向他开火了。他机警地朝地上一滚，躲过了敌人的射击。但是，

敌坦克这时全速向他开了过来，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杨正春脸上毫无惧色。他圆睁双目，怒视着那朝他身上轧来的坦克，从容地拉响了最后几颗手榴弹的导火索。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人民的英雄和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了。

正当严正祥排同敌人浴血奋战时，张大队长派了两个班来接应他们，但是被英雄们谢绝了。严正祥同志打得两眼冒火，大声喊道：“同志们，替战友报仇，替人民雪恨，狠狠地打呀！”战士们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英勇地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没有慑服他们。敌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紧紧箝制着七八辆坦克和装甲车，掩护大部队胜利前进的，不过是三十多名手握步枪、手榴弹的战士。

经过大半夜的激烈战斗，我左、右两路纵队都安全通过鲁山至叶县的公路，渡过了沙河。敌人企图堵截并歼灭我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在战斗中，我击毁敌坦克、装甲车四辆。在南征途中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大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东方已经发白。

王震同志命令司号员召唤后卫部队。我同张仲瀚同志一起到第三大队一营去询问严正祥排回来了没有。一营长说：“已经回来了十六个同志，还有十八个同志，其中包括排长严正祥同志没有回来。”

张大队长感情沉重地说：“他们不会回来了！英雄们开路去了。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替我们开路，也是替中国人民去开辟一条宽阔的、解放的大路！……”

驰 骋 豫 中

过了鲁山，南下支队就驰骋在辽阔的黄、淮大平原上了。

从元旦以后，纷纷扬扬的雪花一直飘个不停。当我们到达鲁山县东南的王庄时，鹅毛般的大雪，一夜之间竟积了二尺多厚。

王庄是个很小的村子，房屋很少，而且都是低矮的茅屋。白天，我们很多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又烧着木柴烤火，屋子里烟熏火燎，大家都被熏得两眼流泪，呛得咳嗽不止。这里没有盐卖，老乡们平日连野菜都填不饱肚子，当然谈不上吃盐了。周立波等几个同志住的房东刘老二是个贫农，他一家人三年没有尝过肉味。去年端午节，老刘卖掉几担柴禾，从城里带了二两盐回来，过节做豆面糊糊放进一点盐，两个孩子尝到了咸味，一下都乐得欢叫起来。年前没收麦子时，全家人连红薯叶子熬汤也喝不上了，老小五口一连四天颗粒未沾，饿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幸亏孩子的母舅送来二十斤麦子，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刘老二说：“这种年头，能凑合活

下来就不易啊!”事实上，当时河南省人民妻儿离散、冻饿夭亡者何止万千！比起他们来，刘老二不能不感到庆幸。

记得在王庄时，部队所需军粮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几个同志就地作了一点调查。我们来到一个粮食商人的家里。主人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谈起祖国河山破碎，人民骨肉离散，特别是河南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老人不禁感慨系之，唏嘘不已。他说：“人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细论起来，最凶最恶的，还是数这汤恩伯啊！”他见我们有的同志脸上现出疑惑不解的神色，接着解释说，“我们这里前年和去年都遭了蝗灾，苞米都被蚂蚱吃光了。可发蚂蚱那阵，麦子倒是收了，蚂蚱不吃红薯，有了麦子和红薯这两样，老百姓不就饿不死了吗？水灾再厉害，只限于黄河边上的那几个县；旱灾我不信能把河南全省的庄稼都干死。唯有这汤恩伯和他的军队，那才是无处不有、无孔不入啊！你们从黄河以北过来，这一路上的情景总会看见一些……”

我点头告诉老人：我们从宝丰到鲁山途中，亲眼看见许多村镇被国民党军队大烧大抢后，已化为废墟。汤恩伯的十三军驻扎在叶县，据说那里的鸡鸭，几年前就被国民党的军官们和他们的姨太太通通吃光了。现在，许多地方鸡鸭早已绝种。

老人气愤地说：“最可恨的是，国民党的军官没有一

个不吸毒的。他们天天吸海洛英，每人每天起码要一万元法币。”为了维持这种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汤恩伯就向老百姓横征暴敛。其捐税名目之繁多，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什么抢购、征购、代购，什么植树捐、教育捐、飞机捐、壮丁费，更奇特的是，在叶县，凡未嫁少女，每月都要纳三十元“闺女捐”。当地人民对国民党军队痛恨已极，他们骂国民党的所谓“中央军”是“遭殃军”，在一首民谣中这样诅咒：“天见中央军，日月无光；地见中央军，五谷不长；人见中央军，有死无生”。

我们一个同志插进来问道：“要是日军来了，岂不是更坏吗？”

老人用手擦了擦眼里的泪花，说：“谁说不是哩！可国民党口里说着人话，手里打着‘抗日’的旗子，全是骗人的把戏呀！我们老百姓只要听说谁打鬼子，情愿自己勒紧裤带，也要供他吃得饱饱的。抗战初期，河南出了个刘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日军还没来他就逃跑了。如今又出了个汤恩伯，河南的老百姓供他大吃大喝这么多年，让他练好了腿子，日军一来竟跑得比刘峙还快。……这年头的世事我经得多了。我早就看清楚，今天中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共产党有希望！”

自从进入日伪顽区以来，部队的军粮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显然，一支五千多人的远征队伍是无法自带粮食的，只能在行军途中就地取粮。过去我们取粮的办

法一般不外乎两个：或征、或购。面对河南省人民啼饥号寒的现实，我们无论如何不忍心再加重当地群众的负担，决定由政治部发布一道命令，严格规定部队必须按市价向群众购粮，一律不许采用征粮或借粮等办法；购粮要在群众自愿条件下，按照储粮情况，合情合理地商购；提倡多吃杂粮，不买农民的种子。一段时间，红薯和红薯干就成了我们的主粮，间或吃上一、两顿豆面，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部队从鲁山进至叶县西南一带，当地群众由于长期遭受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劫掠，只要听说是穿“老虎皮”（指黄军衣）的队伍过来了，一声呼哨就全跑光了。开始，当地群众把我们也当成是“遭殃军”，看见部队进村撒腿就跑。在村里找不到人，可把我们的司务长和炊事员急坏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向谁去购买粮食呢？有的战士发现有些屋里存有粮食，立即跑来报告。但是，主人不在，怎样才能动用这些粮食呢？部队政治部反复研究后作出了一项决定：部队可在驻地群众家酌情取用一部分粮食，但要留下一部分给主人维持生活；取用部分要过秤，按市价留下现金，并附上政治部统一印发的一封信：

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

本军作战敌后，瞬达八年。军威所至，日伪丧胆。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战绩卓著，中外共闻。

军纪严明，买卖公平。借物必还，损坏必偿。军中信誉，遐迩皆闻。迩者奉命南征，途经贵地，军粮缺乏，不得不就地购粮，以供军食。刻临贵府，适值外出，无法洽购。为保证军食无虞，不得不设法向贵府取去红薯若干斤，豆面若干斤，每斤以市价若干元计算，共合法币若干元，谨如数留置于柜中，尚望查收并乞见宥。

即颂

公安！

部队开走以后，老乡们回来，看到自己家里一切完好无损，粮食少了一些，却按价留下现金并附信一封。他们看信以后，才知道我们是八路军。“世界上真有这样爱民的军队！”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远近村镇。这以后，群众只要一听说我们是八路军，不仅不再害怕，而且还热情地欢迎我们进庄，甚至恳切要求我们长期住下，保护他们。

部队抵王庄的当天，新四军五师来电和我们取得了联系。电文说：“南下支队可经舞阳县东南、嵯岬山东南，到达确山县西北之大乐山，即进入新四军五师地区”。又指出，“在旧县镇以南的保安一带驻有国民党六十八军，如我经过旧县，应提防该部顽军的袭击。”司令部的同志们听说很快就能与新四军的战友们会合，一个个都高兴

得欢呼起来。第二天晚上，我们又接到五师来电话，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同志，决定亲自率部前来迎接我们。可以想见，李师长期待我们到达，又是何等殷切和兴奋。

一月八日，部队踏着齐膝深的雪地，行军八十五里，抵杨庄宿营。次日又走了五十多里雪水覆盖的道路，到达叶县西南的罗冲。据说在一个月以前，这里曾驻过新四军，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老乡们说：“新四军一进庄子就贴告示，召集老百姓讲话，叫大伙儿团结打鬼子，保家乡。他们在这里做饭，烧了点麻秸都要给钱，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们告诉老乡们：“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的军队”。老乡们都翘起大拇指，高兴地说：“八路军老好！”“新四军老好！”

在支队直属机关到达罗冲的同时，担任支队前卫的第一大队已进到方城和叶县交界的柳庄。这里离国民党六十八军驻扎的保安镇只有五里，正处于从许昌经叶县、方城到南阳的公路干线上。当一大队侦察队长带领其便衣班到达柳庄不久，发现从保安派出的顽六十八军搜索连一个班，在一名排长带领下也进到柳庄。我便衣排利用房屋隐蔽，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未费一枪一弹即将顽军一班人连同排长悉数俘获。

我便衣排在审俘中获悉：顽六十八军早在七日已侦

知，从黄河北边过来的八路军，通过鲁山附近的两条公路，插入了鲁山以南山区；估计将继续向南运动，进到方城、泌阳和确山之间山区。顽六十八军感到这对他们威胁极大，遂在保安、独树及其附近加紧构筑工事，集结了两个师的兵力，准备随时迎击我军。

第一大队又据当地群众报告得知：这两天，叶县、任店、老鸦张及舞阳县等地日伪据点都在增加兵力。无独有偶，近一周来，顽军也不断从南阳地区向方城、独树、保安一带调动军队。当天黄昏，第一大队又发现保安顽军有向柳庄东、西两侧运动之征候。

支队司令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报后，认为我军现已面临两种危险：一、顽军六十八军已在保安、独树地区预设阵地，可能在此伏击、堵击或侧击我军；二、顽军也可能与日军勾结，配合叶县、舞阳等地日伪军，在这一地区夹击我军。当晚，我们在罗冲召开了紧急会议，仔细对以上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后，王震同志综合各方面意见，着重指出：我一大队似已进入顽军伏击地带边缘，必须于今晚尽快撤出。我全军目前所处位置也很危险，唯一的战术措施也是迅速脱离这一地区，向日伪占领区边缘靠近。我和王恩茂同志完全同意王司令员的分析和决定。当即命令：全支队按一、二、三、四大队序列，支队直属机关居中，于当晚二十三时至二十四时，以隐蔽动作迅速转移。

午夜，部队顶着七级左右的狂风出发了。积雪过膝，寒风砭骨，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气力。特别是进到一些隘路口和低洼处，积雪深及腰股，前卫部队只有用锹铲除一部分积雪后才能前进。为了赶在天亮前脱离危险地带，王震同志几次下令前卫一大队加快前进速度。经过连续七小时的雪地艰苦行军，部队在次日拂晓，终于胜利地离开日伪顽军可能伏击或围歼我军的危险地带三十余里。天亮后，我们继续前进四十里，渡过澧河，到达方城所属的各河口、大曹沟和大、小辛庄一带宿营。一月十一日，我们又在雪地里走了五十里路，来到泌阳县所属的薛庄。听说新四军五师已派出一支先遣队前来迎接我们，已于十日到达武功镇西南，预计十二日可到舞阳和泌阳两县交界地区。于是我们决定在薛庄附近休息一天，并令第二大队派出一个连去接护新四军先遣部队，以期在薛庄附近实现两军会合。黄昏，我们接到新四军先遣队来电，他们在向我前进路上，为顽地方反动武装所阻，无法如期到达预定地点。我第二大队派出的一个连，也因受到顽地方反动武装阻挠，中途折回。以后两天，我们又在很深的雪地里行军一百多里，渡过沙河，进到了确山县所属的仪封镇。

从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部队都是在雪地行军，途经方城、舞阳、泌阳、遂平四县之间通过，向确山县之竹沟前进。前进方向的左侧为日伪占领区，主要有武功、

出山寨、老君庙、文城、沙河店等据点；前进方向的右侧为顽军占领区，主要是顽五十五军，他们控制着方城东乡和泌阳北乡山区，这些顽军和老君庙、文城、沙河店等日军主要据点一千余人，是我们前进途中的主要敌人。我们采取充分利用日、伪、顽之间的矛盾，走日、伪、顽接合部，可以避免大的战斗，对我军少受损失，顺利通过豫中平原是有利的。十五日决定零时出发，夜行军通过牛蹄、沙河店两敌据点之间公路封锁线，天亮前又安全的渡过了南汝河的支流沙河。这四天的行军，小的战斗时有发生，但避免了大的战斗。这里的雪比鲁山、叶县地区下得还大，对我军行军又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一月十六日早晨，部队从仪封南下，经过两三个村庄，翻山到了一个叫鸭口的地方。出鸭口就是从确山通向竹沟的公路。附近有个不大的山村，叫做瓦岗寨。第二大队刚走出鸭口，只见前面瓦岗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从寨子里传出一片粗暴的喝斥声和凄厉的哭喊声。很快，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大队长陈冬尧同志报告：一队日本侵略兵昨天从确山押运武器辎重到竹沟，今天在返回确山途中，正在这里烧杀掳掠。陈大队长一听日本侵略者糟蹋亲人，顿时不由火冒三丈。他身边的战士们也都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打吧，大队长！快下命令打吧！”战士们都围着陈

大队长，焦急地请战。

陈大队长说了声：“监视敌人，做好战斗准备！”就拿着望远镜爬上了高地。他靠在一块山岩上，仔细观察一阵之后，突然转身，高声对大家说：“同志们！鬼子既然撞到了咱们的枪口上，咱们就没有理由不打它！要打，就打个漂亮仗，给新四军战友们做见面礼！”战士们巴不得听到他这一句，转眼间都携起步枪，扛上机枪，飞快冲出山口去了。接着，各种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公路上立刻腾起浓黑的烟雾。呛人的火药味，弥漫在清冷的雪野上空。

陈大队长亲自带领三营出击，迅速展开队伍，占领了一处山地有利地形，朝着山下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死伤过半。剩下的敌人，利用公路以南凹凸不平的地形作掩护，进行顽抗。我九连战士猛冲上去扔出一排手榴弹，先把敌人的机枪打成了哑巴，紧跟着又炸翻了前面一排敌人。后面的敌人一看站不住脚，爬起来就朝瓦岗寨跑。有几个敌人逃进村边一个空无一人的老乡家里，妄图负隅顽抗，被我战士紧追上去，一顿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还有几个敌人钻进茅草丛中继续抵抗，我指战员们就从四面放火，把他们烧死在里面。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一个小时，歼灭日军数十人，缴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余支，

还有几大车无线电器材和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我们对损失茅草和炸坏房屋的乡亲们，分别给了补偿，又把敌人抢去的牲畜、大车全部归还物主。当地群众对我军无比钦佩，团团围住我指战员们说：“你们真是解救老百姓的天兵神将啊！”

当天，我们通过从确山到竹沟的公路，进到南河庄宿营。离此只有十几里路的雷家寨，就是我豫南游击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游击兵团下辖四个团，其中一、二团由新四军五师的部队改编而成，三、四团分别由鄂东独立团和淮南支队改编而成。次日，我和王震、王恩茂同志先后来到雷家寨，同游击兵团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了今后的行军路线。初步安排：十八日在原地休息一天，十九日夜全军通过平汉铁路，进入路东新四军汝南、正阳、确山边区根据地。转回驻地后，我们又商定由王恩茂同志起草一份与新四军五师会合的工作意见，抓紧在全军进行一次加强革命团结和搞好军民关系的教育。同时向各大队和支队直属队各单位发布了行军、作战命令：为了确保全军于十九日晚安全通过平汉铁路，决定第一大队除担任对平汉铁路的警戒任务外，还要调出两个连的兵力占领大冲口和小庄以东一带山梁，作为防御铁路线方向敌人袭击的主阵地。第二、三大队加强东南面明港方向的警戒，第四大队加强北面瓦岗、竹沟方向的警戒。

第一大队长陈外欧和政委李铨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各营、连长实地勘察地形，确定一营二连和二营五连分别占领驻地以东山梁之主阵地，加紧构筑工事，设置伪装。由于雪后天气奇冷，陈大队长特别交代：监视敌人时阵地上可留一排人守卫，其余暂入附近民房休息，定时轮换。一旦发现敌情，全连火速占领并扼守主阵地，掩护全大队展开进入战斗，进而保证全军出发前后宿营和行动之安全。

日军十六日在瓦岗地区遭到我第二大队痛击后，随即调动兵力，企图伺机报复。十九日，他们在平汉铁路沿线集中了七个大队约一千三百余人，加上各据点伪军二千多人，分兵三路合击我军：一路由新安店、李新店西进；一路由明港北上；一路由确山、邢店、竹沟南下。

十九日上午，支队司令部向各大队发出命令，决定于当天下午四时，按原定计划，全军分两路纵队同时出发，通过平汉铁路。下午一时许，第一大队二、五连同时报告，发现日伪军共千人，从新安店、李新店方向，径向我主阵地前进。我二、五连指战员已全部进入阵地，准备迎击敌人。陈大队长和李政委当即赶到主阵地详细了解敌情，并再次检查工事，下令该大队一、二营其余各连立即占领二线和纵深阵地。将近二时，五六百名日军展开战斗队形开始接近我主阵地，后面还有近千名伪军尾随跟进。由于我指战员利用积雪设置了天然伪装，

使整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山头看上去一片雪白。日伪军直到距我数十米远时仍未发现我主阵地配置情况。这时，我指挥员一声令下，二、五连的步枪、轻机枪和特别配备给他们的四挺重机枪一齐开火，投弹能手们又将手榴弹雨点似地扔进敌第一线战斗队形中爆炸，一时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溃退，我阵地前留下了数十具敌人的尸体。日军遭到这一突然打击后并不甘心，随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重新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均被我英雄们打了回去。接着，日军又命令处于第二线的伪军向我进攻。伪军连续向我冲锋四次，每次还没有进到日军到达的地段，就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伪军头目跑回去向日军报告：“太君，从华北过来的八路军，大大的厉害！”战斗持续四个小时，日伪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按照支队司令部十九日上午命令，第一大队原为左路纵队前卫，应于下午四时出发，当晚通过平汉铁路。眼看阻击日伪军战斗正激烈进行，支队副司令员郭鹏同志来到主阵地前沿，重新传达了王震同志的命令：支队主力将乘铁路沿线日伪兵力空虚之机，于今晚通过平汉铁路。第一大队在掩护主力转移完毕后，可利用黑夜掩护，相机撤出阵地，然后尾随支队或另选路线通过铁路和主力会合。

入夜，支队直属机关遂以第二大队二营为前卫，经胡岗、潘集、余庄到刘告庄，准备在此穿越平汉铁路。

突然，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从北开来，我指战员们立即就地卧倒隐蔽，直到火车开过以后，大家才从地上一跃而起，迅速地通过了平汉铁路。这时已是深夜，天降大雾，每个人的衣帽、须发都变成白色。指战员们由于通宵未眠，加上紧张行军，一个个都感到又冷、又饿、又累，有的人边走边打瞌睡，后面的人不断踩到前面的人的脚跟。天色渐明，部队才从后埠、杨店走到胡庄宿营。

第一大队从黄昏起，又抗击了日伪军多次进攻，直到掩护主力向东南转移完毕后，才开始有计划地撤离阵地，向南跟踪支队路线，顺利通过铁路，继续东进，于次日凌晨到达路东之大李凹。该大队二连七班，在先后掩护支队和大队转移时，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最后完全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他们在班长齐卫民同志率领下，毫无畏惧地继续阻击敌人。估计部队主力已远离阵地，这才开始突围转移。向南的退路此时已被敌人切断。他们镇定地掩埋了战友的尸体，负伤的战士包扎好自己的伤口，其余同志带上全部武器装具，借着夜色掩护，从容地向北面山地转移。在后半夜，他们疾走四十余里，终于远远地摆脱了敌人。天亮后，他们隐蔽在一个小山村里。当地老乡都是贫苦农民，恳切地留下他们休息养伤。他们在群众的掩护和照料下住了十二天，直到负伤的同志伤势好转，才依依不舍地向老乡们告别，踏着正从隆冬中渐渐苏醒的大地，向着他们久已向往的中原解

放区，大步向前。七班在班长率领下，全班九个人边走边询问，跟随我军过平汉铁路后南进的路线，沿途经历了许多艰险，终于二月七日到达大悟山地区，找到了部队，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不久和二连的同志们一起欢度一九四五年的春节。

中 原 会 师

部队通过平汉铁路到胡庄的当天，我豫南游击兵团司令部领导的路东指挥部，立即派人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据他们反映，驻在陡沟、老店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四游击纵队，近日正向我汝南、正阳、确山边区根据地加紧进攻。第二天，我军在向陡沟以北地区移动时，捉到国民党顽军一名通讯人员，从他身上搜出的信，诬我人民抗日武装为“奸匪”，声称他们正全力“准备攻奸”。我军当即站在自卫立场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三项原则，配合我边区军民连克陡沟、老店及其附近七个村落，两天中共缴获人枪各四百，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阴谋，胜利地保卫了我豫南游击根据地。

一月二十三日，部队徒涉淮河。随后踏着雪水泥泞的道路，来到信阳县所属的大、小甘园。在此休息一天后，又在王家湾与殷家湾之间徒涉沙河，到阎家嘴通过信（阳）罗（山）公路，抵罗山县所辖的朱堂店宿营。

从甘园到子路岭，有一块东西一百五十华里、南北五十华里的荒区，到处野草丛生，有的地方竟没人头顶。听人说，这里原是一片富饶的地方，经过日本侵略者残酷地烧杀劫掠，如今已变成炊烟断绝、狐兔出没的“无人区”，如果不是大部队经过，真令人心寒胆栗。可以想见，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多少同胞死于非命，多少人家骨肉离散。目睹“无人区”的惨景，全军将士都不由怒火中烧，誓将深仇大恨化作熊熊烈火，把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烧成灰烬。

部队接着向豫鄂边境进发。这里人烟渐渐稠密，矮小的茅屋，代之以砖坯瓦房。沿途山有青色，松、杉、竹等相为掩映；村边鱼塘甚多，更添几分南方景色。当部队翻过鸡公山东麓，接近鄂北礼山县（今大悟县）三里城时，新四军五师派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也即将到达。忽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前面发现日伪军一个中队百余人，企图阻止我军和新四军会合。”指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认为机不可失，坚决要求消灭这股敌人。王震同志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当即下令：“一定要把敌人全歼在鄂豫边区的大门口！”我们事先与新四军战友取得联系，分别沿三里城左右两侧运动过去，迅速把敌人包围起来。战斗打响以后，两军战友一齐向日伪军冲杀，很快就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和新四军战友们会合在一起。新四军的战友们夸奖我们：“八路军

老大哥真行，一上来就打了个歼灭战！”我们的战士说：

“今天是双喜临门：两军会合，又打了胜仗。你们立了头一功！”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朱堂店，我们看到新四军五师第二军分区印发的捷报，报道新四军北上迎接南下支队以及在豫鄂边境会合的消息。出发后，一路上我们又看到《七七》、《挺进》、《农救》三个报纸联合出版了两期“欢迎八路军”的特刊，上面刊载了许多动人的事例：两个病号听说八路军到来，心里一高兴，病很快就好了。因为天冷，五师十三旅花几万元买下老百姓一座柴山，把山上的树木柴草全部砍倒，分送到我们的宿营地。江汉地区人民推派代表，担了三十多担肉和鸡鸭，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来慰劳我们。为了欢迎我们，整个豫鄂皖湘赣边区的党政军民都动员起来了。

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到了礼山县的下家河。全支队集合在一片沙滩上，王震同志和我先后向部队讲话。王震同志兴奋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和盼望已久的新四军第五师兄弟兵团，胜利地在中原会师了！”全体指战员听到这一喜讯，都高兴地使劲鼓掌。王震同志随后简要回顾了部队从延安出发后行军作战的历程，他最后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就要同自己亲爱的兄弟部队新四军五师胜利地会合了。五师的战友们在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同豫鄂皖湘赣边区人民一起，在敌后

收复了大片的国土，创造了中原解放区。他们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王震同志讲完后，我接着向部队宣布了有关的注意事项，要求大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注意向五师的战友们学习，搞好团结，并肩战斗。

我新四军第五师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早在抗战爆发时，党中央就派李先念同志来到中原地区。一九三九年一月，李先念同志带领八十多个干部，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出发到达鄂中、鄂东一带，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组成了新四军鄂豫边挺进纵队。他们在北起信阳、西至汉水、东接安徽、南至洞庭湖畔的广大区域里，依凭着桐柏山、大洪山、大悟山和江汉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湖港河汉，发动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向武汉采取了包围的形势。从这一年的夏天到冬天，李先念同志率领这支部队连续消灭、击溃了鄂中伪军李汉鹏、马筱甫、熊克、杨青山等部数千人。特别是同年十月在湖北京山的新街之战，一举打垮了日伪军一个团的兵力，使日本侵略者对鄂中的进攻遭到了第一次惨败，极大地鼓舞了中原地区广大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鄂豫解放区也得到迅速发展。“皖南事变”以后，党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第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重组了新

四军军部。原新四军鄂豫边挺进纵队和鄂豫边区的人民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由李先念同志任师长，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从此，他们更积极地活动在豫南、皖西、鄂东及鄂中、赣西及赣北、湘东及湘北等地区，在中原土地上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树立起一面抗日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豫湘桂战役以后，他们虽然继续处于日伪顽军的包围夹击之中，但是为了解救被国民党遗弃的豫、湘两省人民，毅然同时分兵北上与南下，在豫南收复了信阳、确山以西和遂平、汝南以及平汉铁路以东淮河两岸广大地区，在湘鄂边解放了嘉鱼、岳阳、华容、公安等地，先后共收复国土一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百五十万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解放区。现在的豫鄂皖湘赣边区，已成为一个面积七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九百二十万人的大解放区。多年以来，五师的同志们和中原解放区的人民一道，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扫荡”和国民党顽军制造的各种“摩擦”，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部队来到汪洋店，只见街道两旁贴满了欢迎的标语：“热烈欢迎八路军老大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抗战胜利万岁！”部队从汪洋店到陈家湾，沿途十几华里出现了热烈而动人的场面：道路两旁，排列着新四军和当地群众的欢迎

队伍。他们手里挥动着鲜花、彩旗，口里不停地呼喊：

“欢迎！欢迎！”“欢迎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儿童团员们举着红旗，荷着红缨枪，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沿途搭起一座座彩色牌楼，设立一道道“欢迎站”。当我们走到第一道欢迎站时，口号声、军号声、锣鼓声震天动地，到处弥漫着爆竹的硝烟。到了第二道欢迎站，那里舞起一只红毛金头的狮子，旁边站着一个穿袈裟的大头和尚。红毛狮子随着锣鼓声摇头摇尾，口中不时吐出一张张标语，大头和尚接过标语，笑嘻嘻地向我们高诵：“真高兴，真高兴，热烈欢迎八路军！”“大喜事，大喜事，庆祝两军大会师！”战士们边走边看，都不禁笑逐颜开，把长途跋涉的疲劳忘个一干二净。

部队继续前进。前面出现几匹高大的战马，直向我们奔驰而来。待到临近，才看清马背上的人原来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和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等同志。他们特别从五师司令部赶来迎接我们，更使我们分外激动。当我们相互紧紧握手时，多少心里话一时都梗塞在喉头，每个人眼里都滚动着喜悦的泪花。

一月二十九日，是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五师举行会师大会的日子。八路军、新四军、边区的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共计一万三千多人，汇集在陈家湾的广场上，热烈庆祝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

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的队伍首先进入会场，在前面并

排摆好方阵。举着一面面红旗的群众队伍，从附近山沟里、大路上向陈家湾前进。青年男女推着彩船，抬着披红挂绿的猪羊，熙熙攘攘拥向会场。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同志的女儿领着几十名妇救会员，穿着鲜红的褂子，每人提着一个缀饰着鲜花和红绿彩带的竹篮，里面满满地装着红枣和花生。她们一走进会场，就把红枣、花生撒向我们的队伍。这时，军乐声、鼓掌声、鞭炮声响彻全场，人们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同志首先致欢迎词。他说：“战友们，同志们！我今天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讲了，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表达我们对八路军老大哥的热烈欢迎。当我得到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河南同新四军五师北上部队会合的消息之后，兴奋得两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同志们知道，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鄂豫边区已经有了六年历史。可是在这六年中，一直没有看见过八路军老大哥。我们天天想，日日盼，简直比想自己的爱人还厉害。今天，我们终于看见了老大哥，你说我们该是多少高兴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感情真挚，语句动人，不时引起一阵阵掌声和笑声。他接着说：

“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五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象。这一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学，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这时，新四军的战友们热烈鼓掌，高

呼口号：“向八路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们南下支队的同志也高呼：“向新四军五师的战友们学习、致敬！”“向鄂豫边区的人民学习、致敬！”

李先念同志最后说：“党中央、毛主席派遣八路军南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鄂豫边区是个突出地带，我们在日伪军和反动顽固势力的包围夹击之下，战斗非常频繁，很希望老大哥来助一臂之力。今天你们来了，我们就不是一支孤军了。你们的到来，把华北、华中打成一片，将来你们南下，又把华中、华南打成一片。这样，我们的人民抗日武装，就从遥远的东北向南摆开，一直摆到华南，摆到海南岛。”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王震同志发表讲话。他风趣地说：“同志们！今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象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个小弟弟。”同志们听了，禁不住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王震同志说：“新四军五师在李先念师长、郑位三政委和陈少敏等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你们功勋卓著，中外驰名，你们辛苦了！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这次南下和新四军五师会合，决心在李先念同志的领导下，成为五师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加入五

师了！我们决心狠狠地打击敌人，保卫鄂豫边区，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后去！”王震同志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我們南下支队全体干部、战士的心意。大家一齐举手高呼：“向五师的战友们学习！”“我们愿意加入五师当新兵！”

同志们又请我讲话。当时，我正患着感冒，但是盛情难却，便哑着嗓子说：“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同志们的真挚情谊，使我精神倍加振奋，因此非讲几句不可。在延安时毛主席说过，新四军五师战斗在日伪顽军的腹地地带，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要我们虚心地向你们学习。今天我们亲自来看了，果然名不虚传，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衷心感谢五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我们用什么来感谢你们呢？最好的礼物就是胜利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这就是高举抗日的旗帜，实行抗日的政策，以抗日的实际行动，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继续创造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现在，我们这支公开的队伍是逐渐强大了，但是我们还要建立和发展一支在敌占区和敌后城乡的隐蔽的抗日队伍。这就要抓紧敌占区的工作，抓紧敌后城乡的工作，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把一切抗日力量统统联合起来，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接着是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同志讲话：“我们过去孤军作战，受了一肚子冤气，今天要把它吐出来了。

我们两军会师后力量壮大了，但是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壮大。在我们这里，老百姓只有在生伢时才送红鸡蛋。你们看一看，今天群众挑来那么多红鸡蛋拥军，这是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多多地生伢，大大地发展呀！”在鄂豫边区，陈少敏同志不仅在女同志中很受敬重，而且在广大军民中都有很高威信，大家都亲切地称她“陈大姐”。她的几句简短的讲话，顿时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会师大会在热烈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中结束。

当天晚上，在陈家湾又召开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五师剧团为我们表演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他们还把我们南征途中的事迹，很快编成快板和歌曲，在晚会上演唱。记得其中有一个反映我们“过冰桥”的节目是这样的：

八路军，是神兵，
数九寒天过凌冰。
黄河冰桥巧飞渡，
气死日伪军。

老大哥，八路军，
英勇善战早驰名。
跋山涉水到敌后，
人人夸神兵。

中原会师为我们继续南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全

体指战员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也极大地鼓舞了豫鄂皖湘赣边区以及敌后的广大军民。对于这次会师的意义，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华日报》，曾作了这样的报道：

一支保卫中国人民的武装，一支收复广大国土的武装，一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教育出来的劲旅——八路军南下支队，战胜了冰霜，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封锁和困难，到达了五省边区的基地，和新四军第五师兄弟作光荣而骄傲的胜利会师。

这一会师，使五省边区有了通陕甘边区的直达交通线，使华北、华中人民的武装连接了起来；这一会师，扩大了华中解放区，缩小了华中沦陷区；这一会师，打击了敌人，减杀了日寇在正面战场上的气焰！现在，五省边区不再是在日伪顽夹击包围孤立的形势之中了。

我们一踏上中原解放区的土地，立刻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五师的战友和边区的人民待我们比亲人还亲。他们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房子，治办了锅碗瓢勺等一应用具，送来了柴草、木炭和许多猪、牛、羊、鸡、鸭，还有各种蔬菜。我们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收到了慰问袋，里面装着边区人民自己生产的“女将军”名牌香烟以及花生、麻糖和慰问信。每一封信，

都表示了热忱而真挚的感情。一位老太太在信中写道：

“只有你们和我们的‘四老板’（当地人民对新四军的爱称）才真正是为我们穷人做事的。我希望能有你们这样争气的儿子。”

会师大会的第二天，支队司令部等直属机关移驻五师驻地白果树湾，同时决定部队在此休整一个时期。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五师和边区党委为欢迎我们而发出的《为庆祝大会师慰问八路军兄弟书》。慰问书的内容摘要如下：

八路军南下支队同志们：

豫鄂边区的人民以及子弟兵多年渴望着你们的来临，现在你们终于在千百万人民与数万兄弟部队殷切热望之下来临了。我们仅代表全边区的军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欢迎的敬礼！

同志们！你们胜利的完成了全国人民付托你们与党中央给予你们的伟大任务，到达了久已渴望着你们的豫鄂边区了。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大胜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大胜利！我们谨代表着全边区的军民向你们致以真诚的亲切的慰问！

由于你们带来了新的力量，这力量象征着广大敌后的新发展、新胜利。黑暗在下降，光明在上升！千百万被侮辱与损害着的沦陷区的

兄弟姐妹们必然振奋起来，都会联想到，是起来的时候了！是奴隶做主人的时候了！是大翻身的时候了！

由于你们带来了新的力量，使孤军苦战七年的边区军民不再孤单了，就地建国的信念已最后确立了，而且将必然使边区抗战局面全然为之一新，伟大的战果将随着你们的足迹而不断地涌现出来，该有多少人流着欢欣的泪眼在期待着你们一展身手啊！

同志们！你们带来了新的力量，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已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以最虚心最赤诚的心来接受，来向你们学习，这将必然使边区各方面的工作迅速的走上更巩固的道路！

同志们！让我们紧密地携起手来，让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们将肩并肩的为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而共同奋斗！

祝你们胜利！祝你们健康！

郑位三 李先念 陈少敏

任质斌 张树才

一九四五年元月

二月一日，南下支队各大队干部来到八角门楼，参加五师在白果树湾礼堂举行的干部联欢会。王震同志在

会上介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他从大生产运动到整风运动，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以及我们出发前，中央陆续派遣部队和干部奔赴前方，迎接抗战胜利的有利形势，都一一作了详尽而生动的介绍。到会同志听了都异常兴奋，备受鼓舞。

尔后几天，我们相继听取了郑位三同志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经验的报告，李先念同志关于军事斗争经验的报告，陈少敏同志关于边区群众斗争经验的报告，边区政府主席许子威同志作了关于边区政权工作的报告。这些经验报告，都是我们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和军事教育的重要教材。

与此同时，我们也乘休整的机会，对全军的各项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各大队的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我军在前一段所取得的胜利，已为今后继续南征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争取更大胜利。对于部队中个别存在的打人、骂人、脱离群众等问题，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对于加强团结，改进工作，都有很大意义。

二月十二日是旧历除夕，鄂豫边区呈现一派除旧岁迎新春的节日气氛，部队里也喜气洋洋。我们住的老乡家把我们当作一家人，恳请我们一起吃团圆饭。王震和王恩茂同志住的一家，因王震同志外出办事，主人一直

等到半夜王震同志回来后，才一起吃年夜饭。第二天天还未亮，到处都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我们刚刚起床，老乡们就提着年糕，成群结队来给我们拜年了。乡亲们见面就作揖说：“恭喜！恭喜！”“恭喜你们兵强马壮大发展！”“恭喜你们出师大吉打胜仗！”我们也祝贺大家新春愉快，感谢乡亲们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援，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多打胜仗。

上午，李先念同志也带领机关干部和文艺队伍来给我们拜年。在南下支队的驻地，到处都有文艺演出，节目有旱船、高跷、花鼓、小调等。从早到晚，鞭炮、锣鼓和歌声不绝于耳。

在中原休整期间，我们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参加了鄂豫边区党委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研究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中原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发展为主，着重恢复与扩大鄂南根据地，同时兼顾现有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会后，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领导号召全体军民节衣缩食，以最大努力支援大军南下，为解放江南人民作出贡献。

在此期间，我们向边区和五师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取消了干部大队的建制，研究和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准备踏上新的征程。

第六章

南征北返（下）

飞越长江天堑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十七天，二月十四日告别了五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又向南进发了。

部队向鄂南挺进，必须跨越长江天险，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大悟山休整时，我们就和五师负责同志多次研究过渡江问题。五师战友为了保证我们胜利渡江，决定派十四旅旅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同志率领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我们，挺进鄂南建立敌后根据地。张体学同志是新四军五师有名的开路先锋，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将领，对长江沿岸的情况又很熟悉，由他率部协同行动，无疑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在祝家田，我们向五师第一军分区负责同志详细了解了南下途中的敌情。当时，从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几乎都被日伪军占领着。江北如团风、黄

冈(黄州)、兰溪、蕲春(蕲州)、广济、武穴以及黄陂、红安(黄安)、宋埠、麻城、新洲等地，江南从武昌、樊口、鄂城、大冶、黄石、阳新直至江西省九江市一带，都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在长江南岸沿江地区，力量比较薄弱；在北岸则据有大别山以南的罗田、英山以及浠水以北地区，守备军为桂系六十五军和鄂东挺进十六纵队。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我军南下渡江，不可避免将要同时穿过日伪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

国民党顽军获悉我军南下，有如芒刺在背，立即和日伪军暗地勾结，妄图凭借长江天堑，把我们消灭在江北沿岸。他们秘密召开军事会议，猜测我军将从团风、鄂城一线渡江，于是迅速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了这一带渡口，竭力阻止我军南渡。

我们从侦察和五师提供的情报中得知，从红安的大、小金山向南，有两条渡江路线：一条是从黄冈的长圻潦渡江，对岸鄂城、大冶一带是我新四军五师的游击区；另一条是从蕲春的田家镇渡江到阳新地区。后一条路线乍看很不安全，因为田家镇离蕲春只有十五里，而蕲春及其附近都驻有数量不少的日伪军。但从另一方面看，有些表面看来十分危险的地方，只要我们心中有数，行动隐密，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往往也能成为很安全的地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部队主力选择后一条

路线渡江。接着便制定了具体计划，把全支队分成三批：第一批，由支队副参谋长苏鳌同志率第三大队二营，偕同张体学同志所部，组成先遣队先行渡江；第二批，由支队副司令员郭鹏同志率第四大队和一部分支队直属机关随后渡江；第三批，由支队司令员王震同志亲自率主力第一、二、三大队和另一部分支队直属机关最后强渡。随即又派出一支侦察部队，预先插入蕲春县田家镇一带，侦察地形、敌情并为部队主力作好渡江的准备工作。

二月十八日，部队出发后日夜兼程，经李家港湾大休息，黄昏时通过黄陂和宋埠之间的公路，到张河口渡过倒水河，当晚抵熊家大湾宿营。李家港湾属黄冈县，过去曾是苏区。年纪较大的群众，都还记得土地革命时期的事情。他们听说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都上来紧紧拉住战士们的手，就象见到久别的亲人。

为了迷惑敌人，分散其注意力，打破日伪顽军阻歼我军的阴谋，我先遣队迅速进抵黄冈一线，抓紧时机，组织民船，在下巴河附近实行强渡。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迅速抵达江南，很快控制了南岸的滩头阵地。接着，他们又与当地的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留在南岸牵制敌人，准备随时策应主力渡江。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下。过了陈家寨，完全是在湖沿边沿穿插前进，下午四时到达余冲。在这里又兵分两路：郭鹏同志所率第四大队和一部分支队直属机关留在原

地，准备当晚在附近渡江；王震同志则率部队主力继续向东，再折而向南，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到主力行进方向，保证郭部乘隙安全南渡。郭鹏同志所部离开主力后，当即以神速的动作进抵黄冈县的下巴河。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大力协助下，他们利用夜色掩护，大胆、谨慎地在长圻潦渡口上船，顺利到达长江南岸的鄂城、大冶地区，同先期渡江的先遣队胜利地会合在一起。次日晚，支队司令部得到他们安全南渡并与先遣队会合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王震同志笑着说：

“都说日军据守大江两岸，鸟都难飞过去。如今我们两批人马都过去了，敌人吹的牛皮真是一戳就穿啊！”

我笑着点头说：“这个事实证明，只要有根据地，哪怕是很小的游击根据地，加上熟悉地形，有群众掩护，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们也有办法通过。”

在郭鹏同志指挥第二批部队渡江之际，我主力则继续向浠水以南、蕲春西南方向进发。二十日到达陶店地区，开始进入国民党军占领区。一路上都遭到国民党桂系六十五军和鄂东挺进十六纵队堵截尾追，我一、二、三大队交替掩护，且战且走。当时正值农历元宵节前，有些地方的群众正在敲锣打鼓地闹节。部队过巴河时，我左路纵队第三大队后卫营，发现右侧有二百余人，一边在锣鼓声中舞龙灯、踩高跷、跑旱船，一边向我过河部队步步进逼。开始我误认为是闹元宵的当地群众，虽

未予睬理，却也没有放松戒备。待到这些“闹元宵的人群”距我后卫营数百米时，突然向我过河分队猛烈射击，当即打死、打伤我战士四人。幸好我事先已有警惕，过河时早已派出警戒分队占领了有利地形。我指战员们怒不可遏，立刻组织还击，转瞬打死、打伤来犯者数十人，迅速将其击溃。经我审俘得知，来犯者正是国民党桂系六十五军，伪装成闹元宵的群众来偷袭我军。全军指战员弄清此事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有的战士忍不住跺脚大骂：

“反动派真是缺德透了！你不打鬼子，反倒打击打鬼子的人，这到底是为啥？！”

“为啥？为的是：鱼猗鱼，虾猗虾，反动派攀上鬼子作亲家呀！”不知是谁这么接了一句，逗得大家哄然大笑。

当天下午，部队经巴水驿进到张家湾。这里离国民党军占据的浠水县只有二十多里。鉴于我军在国民党占领区累遭顽军袭击的经验教训，宿营后，我们特别注意加强对浠水、罗田和黄冈等方向的警戒，预先派出部队占领了有利的主要阵地，防止顽军与日伪军勾结，对我进行突然袭击。

二月二十一日拂晓，我军从张家下湾出发，途经七里冲，到龙溪港渡过浠水。沿途又不断遭到顽六十五军和鄂东挺进十六纵队的堵击和夹击，我各部相互掩护，

边打边走，直到石嘴头才休息。这时，从浠水县出来的桂系六十五军等部顽军千余人，也尾追我到了石嘴头附近。王震同志飞马来到我的身边，双脚还没有落地就冲我大声说道：

“打吧，政委！不然，我们就要吃大亏了！”

从整个形势分析，如我这时再不组织有力还击，我军势必会在顽军前堵后追的夹击下遭致重大损失。想到这里，我毅然抬起头来说了一句：“对，打吧！”

王震同志一听，马上命令我第一大队从石嘴头掉转枪口迎击顽军。我第一大队二营最先与顽军遭遇。他们勇猛冲杀，连续攻下了三个山头阵地。接着一营也参加了战斗。一营二连战士如同猛虎下山，在连长朱新阳同志率领下，又一鼓作气地攻占了五个山头阵地。随后，第一大队全部投入战斗，打得顽军晕头转向，溃不成军。我军风驰电掣，猛打穷追，直到黄昏时分才停止追击。在战斗中，我先后杀伤顽军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五挺，步枪百余支以及迫击炮架、炮盘和其他军用物资。

与此同时，我第二大队进到界岭街地区也遭到鄂东挺进十六纵队顽军的堵击。二大队在界岭街西的马家港，与从界岭街出来的顽军一个排迎头遭遇。我前卫一营尖兵连，仅向顽军打了几枪，扔了几颗手榴弹，就迫使顽军全部缴械投降。二大队随即向界岭街发起进攻，以强

攻姿态接近了西南角的一个碉堡。突击班迅猛向前，搭人梯攀壁而上，把几颗手榴弹从枪眼投进碉堡，里面的敌人非死即伤，碉堡被我攻克。龟缩在其余三个碉堡和界岭街内的敌人见势不妙，乘黑夜掩护仓皇逃窜。界岭街据点，遂被我二大队拔除。从昨至今，是我军从大悟山出发后战斗最激烈的两天。大量事实说明，我军凡经国民党统治区，虽力避与顽军冲突而不可得，往往被迫无奈，不得不作自卫还击。

两天来由于连续行军，加上与国民党军不停战斗，指战员们都疲惫不堪。次日八时半，部队才从叶家湾出发，途经毛家畈、王官殿，到依家河徒涉蕲水，旋经八斗地、黄土坝、许家湾，从恒丰堤湖穿插过去，来到胡家湾一带宿营。三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蕲春县境内活动，前面离我原计划渡江地点田家镇已经不远。今天所过村庄，沿途到处是反动派强迫群众涂写的反共标语，什么“奸匪不灭，地方不安”之类，比比皆是；相反全无半点抗日救亡的气氛。外患未除，内难不已，全军将士，忧愤难平。

前奉王震同志命令，早几天到达蕲春县田家镇一带的我支队侦察部队，经过几天紧张工作，已将田家镇一带大江两岸的地形、敌情了解清楚。他们还在当地找到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船工，看外表神采矍铄，问年龄已七十开外。老人已在江上摆渡五十多年，对沿江地理人情

了如指掌。我侦察人员请他帮助我们寻找船只，开始他有些顾虑，说：“这一带到处都驻着日本和国民党军队，我送你们过江是要杀头的呀！”我侦察人员同他恳谈了一整晚上，耐心向他解释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是工农大众的子弟兵。我们渡江南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心只为解救江南遭受苦难的同胞。我们相信老大爷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决不甘心让日本侵略者骑在我们头上屎屎屁尿！”老人激于民族大义，答应替我们集中一批船只和送我们过江的船工。我侦察部队又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很快就解决了部队渡江的工具问题。

二十三日下午，天空突然阴沉下来。一霎间，瓢泼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大家正担心这一场大雨会给我们渡江增加不少困难，不料转眼雨过天晴，太阳又从云端里钻了出来。四时许，部队从胡家湾出发，翻过一片山地，到达田家镇以北的新桥。由于这里距离日伪军占据的蕲春县城很近，部队到达后很快在附近封锁了消息。为了分散目标，第一大队当天上午已进入新桥以东不远的亚口渡隐蔽休息。

黄昏后，夜幕徐徐降临。不久月亮出来，把横卧在我们面前的江面照得洁白如练。我慢慢走到江边，遥望大江南岸，只见前面烟波迷茫，无边无涯，一时心中不禁思绪万千。我眼前好象现出一双双求救的枯手，耳际

又象响起一阵阵嘶竭的呻吟。是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江南人民，正盼望着共产党去救他们出水火，领导他们奋起抗争啊！

部队已自动在江岸上排列整齐。王震同志亲自担任渡江指挥员。他仔细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然后由我和王恩茂同志向部队提出要求。我们号召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干部战士同心协力，保证部队胜利渡江。最后按大小船只，规定大船每只乘三十人，小船每只乘六至七人。把全体指战员编成若干小组，井然有序地先后上船。每人发给法币二百元和储币（伪钞）一百元，作为船费由各人下船时交给船工。为了防止在渡江过程中遭到敌人袭击，我们对掩护兵力、炮火配置都作了具体部署，并同先期渡江的郭鹏、苏鳌等同志所率部队取得联系，令其密切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渡江前夕，指战员们都集结在新桥附近的江边，大小船只则潜伏在芦苇丛中。大家都急切地等待着启航的命令。就在这时，从九江方向飞来了两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投下几颗照明弹，把整个江面和两岸照得如同白昼。不一会，敌机又胡乱投下几颗炸弹，有的落在江心，掀起一两丈高的水柱。部队听到飞机轰鸣，早已疏散隐蔽起来。敌机没有发现我军踪迹，很快就飞走了。战士们从地上一跃而起，拍了拍满身尘土，小声打趣说：“这鬼子飞机脾气忒怪。我们刚刚上船，他就飞

来送行；我们还没动身，他倒先飞走啦！”

时针指着二十点，王震同志发出了启航的命令，同时通知各部队：“敌人如不开枪，我一概不准射击。”转瞬，只见百多只大小船只一齐掉头向南，战士们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船工们使劲摇动船桨，江水在船底发出哗哗的响声。这一带江面大约有两三里宽，每只船摆渡一次约需二十多分钟。指战员们心里都异常焦急，一些南方战士都去帮着划桨。所有人都睁大两眼，警惕地注视着江面上的动静。

蓦然，从下游隐隐传来一阵马达声，渐渐由远而近。有的战士小声惊呼：“敌机又来了！”各船指挥员命令大家保持镇定。仔细观察，原来不是飞机，而是敌人的巡逻艇。开始只发现一艘，随后发现共有三艘。渡船这时正在江心。大家心里都在暗自嘀咕：在这时候和这样的地方遇上敌人，该是多么糟糕啊！有的北方战士，由于缺乏水上作战经验，神色不免有些惊慌，担心在水上难以施展自己的本领。多数指战员这时都很沉着。他们眼睛盯着敌艇，枪口对着敌人，只要一声令下，就立即投入战斗。

敌艇越来越近了，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战士都接着扳机，屏住呼吸，瞪大两眼看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半晌，敌艇上影影绰绰地有人上前厉声发问：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鱼的。”船工们镇定地回答。

“打鱼？哪来这么多船？”

“刚下过大雨，正好打鱼哪！”船工们确实大多是打鱼出身，雨后也正是他们捞鱼的好机会。过去他们在江心碰到敌艇非止一次，每次都是这样回答。敌艇上发话的声音沉默了。过了一阵，才又粗声恶气地说：

“哼！你们要有不轨行为，可得小心脑壳啊！”

“是咯——”船工们拉长声调回答，声音里掩饰不住笑意。

敌艇又停了一会，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也就不再问话。接着开足马力，耀武扬威地向西疾驰而去。顿时，我全体指战员都如释重负，一下驱散了紧张不安的情绪。

夜色渐渐深沉。满载着我指战员的最后一条船终于渡过了大江。战士们一边交付船费，一边向船工们表示感谢，连声称赞他们机智沉着地应付敌人。

这天晚上，我第一大队也在新桥以东十余里的亚口渡同时渡江。他们事先得知长江对岸有一个日伪军的外围据点，由一个班的日军和数十名伪军驻守。在该据点西南五里，还有一个日伪军的大据点，地名叫黄山口。一大队要在亚口渡渡江，必须先派一支精干部队将此外围据点拔除，才能保证全大队渡江无虞。从昨天起，大队长陈外欧和政委李铨同志就分头进行思想动员，侦察

地形、敌情，最后定出了一个缜密的渡江计划。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们才同主力部队同时启航南渡。警卫连迅速占领了北岸的滩头阵地，掩护大队安全渡江。紧接着，由二、三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组成的前卫营，首批鱼贯登船。他们破浪前进，顺利抵达南岸，直到距敌外围据点二三百米时，才被敌哨兵发现。前卫营按照预定方案，在轻、重机枪掩护下，飞快越过敌据点外壕，以奇袭方式，让少数战士在据点正面佯攻，大部分战士则分两路从右侧攻进据点。据点里的日伪军，在一片激烈的爆炸声中从睡梦中惊醒，丢下几具尸体，径向黄山口方向仓皇逃命。敌外围据点，很快被我前卫营占领。第一大队于深夜三时，安全渡过了长江天险。

二月二十四日拂晓，我南下支队全部踏上了长江南岸。战友们胜利地会合在一起，都忍不住欢呼雀跃，互相祝贺：

“好啊，天堑长江，到底被我们跨过来了！”

“原想在江上和敌人比试个高低，尝尝当海军的滋味，不料敌人不肯露头，咱们还是干自己的本行——当个陆军算啦！”

“哼！鬼子和遭殃军想用最后这道关卡消灭咱们，这一下可真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呀！”

早晨，王震同志穿着他那件破皮衣，轻快地走在队伍中间，他虽然脸上露着倦容，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

他一边迈着大步，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说得很对：长江自古被称作天险，敌人以为凭着这道天险就能阻挡我们，消灭我们，他们的阴谋到底破产了。我们渡过了南征途中的这道最大的、也是最后的障碍，敌人就再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继续南进了。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啦！”战士们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司令部参谋肖林达同志高兴地说：“司令员，我们应该打个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报喜。”

王震同志笑着点头说：“对，快向延安发报！”

报务员迅速打开发报机，向延安报告了我军胜利渡过长江的喜讯。不久，我们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

庆贺你们安全南渡长江，并预祝你们胜利前进！

战斗在鄂南

春雨霏霏……

江南大地，在苍茫烟雨中，现出一片鹅黄嫩绿。

南下支队在胜利抵达大江南岸以后，为了争取时间，当天即从短暂宿营的赵家湾出发，冒雨行军，继续南进。部队路过张家湾，发现不远的凤岗山上有一处碉堡，里面据守着十多名日军和七八十名伪军。我军虽在附近绕道前进，但仍在敌人重机枪射程之内。日伪军眼看我们大部队通过，却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动作。

鄂南，已被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糟踏得不成样子。部队途经之地，只见许多村镇仅剩下一堆堆焦土瓦砾，荆棘遍地，狐兔出没，一片荒凉景象。新四军五师的一位战友说：“这地方，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本地人，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都很清楚，我们通过他了解到不少情况。

鄂南地区东、北、西三面濒临长江，南部与湘、赣两省相邻。整个地区包括武昌、嘉鱼、咸宁、蒲圻、通山、通城、阳新、大冶、鄂城和黄石等十一个县市。境内交通发达，河湖港汊纵横交错，粤汉铁路穿插其间。物产资源极为丰富。南部大幕山，是幕阜山和九宫山的支脉，形成鄂南山岳地带。山上遍布密林，四季常青。从山巅到谷底，到处都有溪涧流水，可以种植水稻。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以致在武汉失守以后，大片鄂南土地相继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在我军到达时，日伪军不仅占领了十一个县市，而且在粤汉铁路和几条主要公路沿线，构筑了大量堡垒工事，建立了许多据点。广大山区和偏僻乡村，大多被汉奸土匪、灰色武装和国民党顽固势力所盘踞。汉奸陈渠的伪三师，控制着北部梁子湖以东长江沿岸，以及白沙铺与金牛镇之间地区。国民党地方势力周九如、熊彪等部，控制着南部大幕山地区。这些部队明里打着国民党“抗日挺进支队”招牌，暗地却与日

军紧密勾结，引狼入室，无恶不作。除以上两股势力以外，这里还有国民党鄂南专署以及湖北保安七团、鄂南挺进六支队等部，控制着通山、通城和崇阳边境地区。他们尽管名目各异，其实都是地主资产阶级顽固集团纠集的反动武装。

鄂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南部大幕山区，有着发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有利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我们和新四军五师战友一致认为，在这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既能巩固中原，威胁武汉，牵制敌人的正面进攻，又可继续向南发展，成为对日反攻作战的前哨阵地。因此，我们决定以大幕山为中心，建立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打开南北通道，把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成一气。

二月二十五日，部队经过石盆头、汪屋镇，在白沙铺以南通过阳新和大冶之间的公路，迅速向三溪口地区前进。下午，正当我跨越公路时，突然三辆汽车疾驰而来，上面载着数十名日军。王震同志命令第一、三大队留下少量部队与敌人战斗，主力则继续翻山，从魏家湾绕道至陈家湾。日军当即被我击毙五名，击伤若干，拖着尸体狼狈溃逃。为了防止敌人报复，部队第二天提前从陈家湾出发。走到程风寺，果然得到二大队后卫报告，三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开到白沙铺附近，下车后即窜入我

军驻地。我第二大队派出一部分部队阻击敌人，其余仍按原计划翻过大同山，进抵大田畈、团陵湾一线。

这天中午，我第一大队来到大田畈，准备进村宿营。由于在渡江前后七八天中连续行军作战，指战员们都异常疲劳。但是，大队长陈外欧同志考虑部队初到江南，对当地地形、敌情都不熟悉，坚持按照我军在长期斗争中总结的一套成功战术动作，亲自布置宿营：一、陈大队长带领各营、连长，勘察、了解大田畈周围的地形和敌情，规定各营派出警戒分队的位置和方向。二、根据踏勘地形和侦察敌情的结果，命令五连占领大田畈东南三里左右的一处山岗，立即构筑工事，作为防御敌人突袭的主要阵地。三、五连在进入主阵地后，立即向敌情比较严重的阳新和三溪口方向派出一个侦察组。四、在各警戒分队分头进入阵地和哨位后，大队各营、连有秩序地进入宿营地，然后约定紧急集合的场地和联络信号。五、从连一级开始，层层都向上派出联络人员，保证在紧急情况下，全大队上传下达准确无误。

第一大队选择的主阵地，是大田畈地区的制高点。山岗上松、竹成林。五连构筑的工事，全部覆盖在茂密的丛林之下，只要稍加伪装，即与自然景色一样。山岗下，从大田畈通往阳新和三溪口的大道依稀可见，山岗正是扼守大道的咽喉要地。进入阵地不久，五连即派四班长曾世勇同志率本班四名战士，向阳新和三溪口方向

侦察敌情。侦察组刚走出几里，就发现敌人正从三溪口方向直奔大田畈而来：前面是五六百名日军，后面紧跟着七八百名伪军，最后还有一队日军的炮兵。

“同志们！”曾世勇同志两眼监视着大路上汹涌而来的敌人，小声对身边的四名侦察战士说，“这里离我们主阵地很近，回去报告已来不及了。你们说怎么办？”

一个侦察员说：“打吧，班长！只要枪一响，就给我主力报了警；我们在路上，再设法拖住敌人，我主阵地守军，就能争取时间巩固阵地。”

曾世勇同志当即决定：“好，准备射击！”说着，马上将四名侦察员分成两组。鸣枪之后，他们互相掩护，边打边往后撤。

前哨战就这样打响了。

骄横的日军，依仗他们有大炮和其他先进武器装备，有恃无恐地直向大田畈猛扑过来。他们既迷信自己信奉的武士道精神，又迷信自己手里的武器装备，根本不问前面到底有多少敌人，只顾胡乱打枪放炮。一时间，步枪、轻、重机枪和大炮一齐开火，各种爆炸声响成一片。但是，那些枪弹和炮火不是打在山岩上，树干上，就是呼啸着从空中飞过，丝毫未伤我战士的一皮一毛。在班长曾世勇同志指挥下，我四名侦察员机智、勇敢地且打且走，诱使敌人如临大敌，展开战斗队形投入战斗。

我第一大队二营听到从前面传来的激烈枪炮声，营

长立即跑步来到五连占领的主阵地上。他在指挥所内用望远镜观察了日伪军进攻的阵势后，发现这次不象过去那样，让伪军在前面当炮灰，而是日军自己打头阵。他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五连长，问：

“你说说，敌人这是捣的什么鬼？”

连长想了想，说：“自从我军进入河南、湖北以后，鬼子跟咱们干了几仗，一次都没讨着便宜。这会儿它学乖了，知道靠那些无用的伪军打头阵，根本对付不了从华北过来的八路军；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前冲。”

“对，但这只是一个原因。”营长思忖着说，“还有一个原因是，鬼子被咱们打毛了，它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妄想鄂南歼灭咱们。你要告诉所有战士，赶快加固工事，准备跟鬼子打一场狠仗！”

二营长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的具体战斗部署，也使据守主阵地的五连能争取更多时间巩固阵地，随即下令二排推进到主阵地前三百米的无名高地上，继续同敌人打一场持久的前哨战斗。

五连二排接到命令后，迅速在无名高地上摆开，用步枪和轻机枪杀伤敌人，迫使敌人较早地展开了进攻的战斗队形。曾世勇同志带领的四名侦察员在同敌人周旋将近一个小时后，这时也退到无名高地上。敌人怪声吼叫着，不断向我无名高地冲锋。我二排指战员连续打退

敌人三次冲锋，坚守了两小时，最后从容不迫地撤回主阵地。

下午五时，日伪军占领无名高地，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又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开始向我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五连指战员在营长亲自指挥下，遂令一排配合从无名高地上撤回的二排，在主阵地前山脚下早已挖好的阵地上阻击敌人。三排作为预备队，继续在主阵地上加强工事，并以火力支援前沿。日军仗恃武器优良，分成两路，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主阵地。弹丸象一阵阵黄蜂似地飞来，打在山岩和墙垣上，溅起满天碎石泥土，不断落在我战士们的身上。开始，我方只是五连在阵地上阻击敌人；随后，一大队二营全部投入了战斗。日军先后向我主阵地冲锋十次，都被我一击退。敌人的一具具尸体，横躺竖卧在我军阵地前面。

天黑了。敌人的炮火，继续猛烈地轰击着。一串串耀眼的弹光，交织着从夜空划过。阵前的山岩，被枪弹打成了蜂窝；山上的房屋，被炮火炸成了焦土。到处都弥漫着浓黑的硝烟。我指战员们英勇地坚守着阵地，顽强地同敌人对峙着。敌人眼看夺不下我主阵地，马上又调一大队伪军来增援。日伪军潮水般地不断向我主阵地发起冲锋。我一大队这时全部都投入战斗，同敌人展开一场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战士们沉着地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杀伤敌人。有的战士每射倒一个敌人，就痛骂一

句：“不要命的，来吧！尝尝八路军的小黑枣儿！”

午夜时分，王震同志得到我前沿战报后，决心痛歼这股来犯之敌。他一面派第二大队一、三连驰援第一大队，一面亲自给第一大队写信，命令他们坚决消灭敌人。

第一大队二连连长朱新阳同志接到王震同志的命令之后，立即大声向战士们宣布：“同志们！王司令员命令我们，坚决消灭进犯大田畈的敌人。大家快带好武器弹药，准备向敌人冲锋！”冲锋命令刚一发出，朱连长首先一跃而起，冒着密集的枪弹，带领战士们向前猛冲。日伪军喘息方定，原本打算重新组织力量向我发起攻击，不料突然受到我军勇猛冲击，顿时乱了阵脚，转瞬就被我军追过几个山头。最后，有一部分敌人被压缩在一条小山坳里。一时杀声震天，刀光闪耀，一把把仇恨的刺刀，刺进敌人的胸膛。朱新阳同志拚弯了刺刀，只听他大叫一声：“同志们，杀呀！”随即冲进敌群，从敌人手中夺下一把战刀，英勇地截住了敌人的退路。“杀！杀！杀！”朱连长紧握着那把明晃晃的战刀，上下挥舞，左右劈刺，一连砍倒八个敌人，他身上也被敌人刺伤七处。最后，一粒罪恶的子弹向他飞来，从后面穿腹而过。当他用手去捂伤口时，肠子已从肚里流出。他咬了咬牙，左手按住伤口，右手高举战刀，继续坚持指挥战斗。

与此同时，从驻地赶来增援的第二大队一、三连和

第一大队的指战员们，也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打得敌人伤亡惨重，仓皇溃逃。一部分日伪军退到东山上，龟缩在四座碉堡里负隅顽抗。我军一鼓作气，开始攻打敌人的碉堡。

在南下时，我们随身携带的都是轻武器，不仅没有大炮，连迫击炮也未带一门。敌人凭着坚固的碉堡和密集的火力，使我扔出的手榴弹难以发挥效力。怎么办？陈大队长和各营、连长心里都异常焦急。他们马上召集了一个紧急战地会议，号召大家出谋献策。指战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想出了很多巧妙的攻坚办法。在打第一座碉堡时，大家搜集了许多当地特产的干辣椒，同干稻草捆在一起，用火点燃丢在碉堡附近上风处。转瞬间，一股股浓烟顺着风势涌进碉堡，呛得里面的日伪军又流眼泪又打喷嚏，纷纷从碉堡里跑了出来。我指战员趁势一拥而上，一排手榴弹扔过去，迅速占领了第一个碉堡。攻打第二座碉堡时，战士们先用机枪把碉堡的所有枪眼都封锁起来，同时将许多炸药装在一个煤油桶里，由几名爆破手抱着煤油桶，匍匐前进到碉堡旁边埋好，点着导火索后迅速退回我方阵地。霎那间，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半边碉堡一下被掀到半空，躲在里面的四十多个敌人全部丧命。攻打第三个碉堡时，我指战员们又换了火攻法。大家就地找来大量干柴枯草，成捆成捆地抛到碉堡四周，随后放一把火，顿时风助火势，使整

个碉堡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烧得里面的敌人呜哇乱叫，有的逃出碉堡，又被我军扔出一排手榴弹炸得东歪西倒。最后一个碉堡共分里外三层，建筑特别坚固，又配备了很强的火力。我军接连采用了以上几种办法都不能奏效。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一部分战士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挖成一条几丈长的地沟，一直通向敌碉堡的基础部位，在里面埋上大量炸药，点火以后，轰隆一声，碉堡从中间开花，几十名日伪军，全被炸得血肉横飞。

当东方现出鱼肚白色，这一场恶战终于结束了。我指战员们欢天喜地地打扫战场。这一仗，我军共歼日军三百多名，伪军二百多名，缴获大炮七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手枪、步枪、手榴弹、望远镜等武器和军用物资无数。在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中，我先后伤亡优秀战士和干部三十名。二连连长朱新阳同志由于伤势太重，在战斗胜利结束后，终于为党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这位出生在贵州的苗族雇农，从小饱受欺凌和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红军长征时路过他的家乡，他勇敢地挣脱了剥削压迫的锁链，参加革命，跟随部队到达延安。在革命的熔炉里，他从一个普通雇农锻炼成为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从战士成长为连长。直到最后倒在祖国的土地上，把美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全部奉献给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

大田畈战斗，是我军渡江后打的第一场大仗。这一仗，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鄂南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鄂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斗过程中，当地人民群众积极要求参战。他们主动在枪林弹雨中为我军送弹药，抬伤员，还做了烧饼、稀饭送到我指战员的手中。他们纷纷高兴地说：

“打日寇，也应该有我们的份！这是我们出气的时候了！”

“打得好，打得好！你们是英雄好汉！过去从没有见过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打过这样的恶仗！”

大田畈战斗以后，我军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大幕山地区挺进。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周九如、熊彪等部，长期以来勾结日军，游而不击，凶残地盘剥和蹂躏当地人民。广大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我军打击凶顽，为民除害。为了打开鄂南地区的斗争局面，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五师张体学同志所部决定主动出击，协同作战。遂由第二大队四个连和张体学同志的四十团共同消灭周九如部，由第三、五大队消灭熊彪部。

三月二日晚十一时，第三、五大队同时出发。经过整夜行军，于次日拂晓到达大幕山的西坑，迅速向顽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拿下西坑后，接着又打下东坑等地。这时，三、五大队又分头出击。三大队先从西迂回至南，再从南直扫到北，纵横驰骋，打得熊彪部四散奔逃，缴

获人枪一百五十余。五大队则兵分三路：一路打泉山口，一路打月塘，一路打周冲，三路都一一攻克。同日，二大队和四十团奇袭周九如部，也一举将其歼灭，俘获副团长以下官兵二百多名，缴枪一百多支。

战斗结束后，我们从咸宁县蔡家湾地区进驻到通山县的山口铺。这里离日伪军占据的通山县城只有二十里，因此不能久留。当晚二时部队出发，时值狂风暴雨，天黑路滑，部队乍到江南，全无雨具。在风雨浇灌下，指战员们不断摔跤，一个个都全身湿透，泥水横流。部队一路上行动缓慢，直到天亮，才在神堂铺附近越过公路，进至崇阳县杨芳林西南的西庄宿营。

三月六日，我们继续对盘踞在大源、金塘、高枳的国民党鄂南专署以及鄂南挺进六支队、湖北保安第十四和十五大队等部反动顽固武装，坚决予以打击，借以发动当地群众，组织抗日力量。第一大队在大源消灭顽军一部，缴获人枪一百余。第三大队向金塘进击时，顽军早已闻风逃窜。第五大队也在高枳将顽军击溃。这些反动顽固武装有如乌合之众，一经打击则作鸟兽散，四散躲进深山密林，因而打败容易，肃清很难。第二天，我军乘胜追击，遍山搜索，为地方肃清匪患。随后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进至崇阳县所属的大源。不久，我们又消灭了九宫山和药菇山的反动顽军，为建立鄂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此期间，日伪军乘我立足未稳，图谋将我军赶出鄂南。他们倾咸宁、通山、崇阳等据点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军进驻和活动地区进行“扫荡”。我军侦得敌人活动的情况之后，立即会同新四军五师第四十团、四十一团和鄂南地方抗日部队，再次进军通山山口铺一线。由于我军未雨绸缪，战前已作充分准备，等到日伪军一到，就被我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鄂南地区的日伪军遭到我军一再痛歼后，从此一蹶不振。占据附近据点的敌人，先后都被我当地军民挤了出去。

进军鄂南以来，由于战斗频繁，流动性大，部队政治工作有所放松，部分战士只讲打仗勇敢不勇敢，不注意遵守革命纪律。支队司令部决定在大源进行一段休整，抓紧整饬纪律，教育部队。王恩茂同志为司令部和政治部起草了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命令。他还深入到三、五大队去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王震同志和我也到各部讲话，强调执行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各连队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矛盾，运用典型事例，逐条对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全体指战员克服不正之风，发扬革命正气，提高执行革命纪律的自觉性。经过一段整顿，不仅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且进一步密切了部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

三月十日，我军在大源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我们向大家说明了我军的宗旨和挺进华南的目的、意义，

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广大群众亲眼看到我们进军鄂南后痛歼日伪，为民除害，累战告捷，然后对照我们的宣传，深感我们的每一句话都讲得实实在在，入情入理，真挚感人。他们高度赞扬我军的英勇、顽强，把部队当作自己的亲人。战时为我们送情报，当向导，抬伤员；平时给我们送来大量慰劳品，把好房子腾给我们住。当地党组织不仅在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我们，还大力协助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我们从斗争实践中深深感到，鄂南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不仅是我们的真正耳目，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靠山。

转 战 三 边

三月初，南下支队在进抵通城、崇阳地区之后，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惊慌和恐惧。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火急电令其副司令长官王陵基实施所谓“堵击奸匪计划”。尔后十余天，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在各地对我进行堵截尾追，分别遭到我各部的有力回击。

仲春时节，鄂南地区阴雨连绵，一再延宕了部队的行军作战计划。按照中央指示，下一步我军即将进入湖南。支队司令部仔细分析了湘北的敌情。当时，在临湘、岳阳地区仍有相当数量日伪军，国民党地方势力王剪波

的第四挺进纵队也在这一带活动。而稍向东南的平江、浏阳地区，日伪军已于二月底先后撤走；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未进到这里。土地革命时期，这一带曾是苏区，有一定群众基础，对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十分有利。因此，我们决定雨停之后即向平、浏进军。同时，又派比较熟悉当地情况的杨宗胜、吴光远同志，带领一支部队挺进湘阴、岳阳地区，相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

三月十七日天气转晴，部队从大源出发，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向南行进。当晚到达江西修水的全丰。次日移驻水口坳，又遇大雨如注。第三天依旧下雨，部队军政委员会在此开会，具体讨论了全军的行动部署和入湘政策。鉴于我军南下之后，不少国民党地方武装纷纷同我联络，为了体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决定一概不打同我联络之顽军。会议又决定，在入湘前后，要在全军开展一次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绝各种违反犯律的不良现象。

由于阴雨不停，我们在水口坳又一连被阻隔了三天。二十三日部队出发，先在修水西北的黄龙山和幕阜山交界之处，从江西进入湖北；接着在通城南部的大坳，又从湖北进入湖南。一天之中竟走了三省。路上山高林密，坡陡路滑，崎岖难行。当天晚上到达幕阜山西南的沙铺里。这里属平江所辖，距平江不过五十余里。沙铺、平江以及两地之间的南江桥、梅仙和虹桥等地，均于去年

五月失陷。当时，面对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队未放一枪即望风溃逃，致使当地人民猝不及防，惨遭日军屠杀，仅南江桥一地就被杀死一百多人。二十多天以前，这一地区各据点的日伪军慑于我军威势，加上他们兵力不足，都几乎同时撤走。

我军入湘以后，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和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经报请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简称南下支队）”的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并以原第一大队二营、原支队直属警卫连和侦察连，以及第二大队一连为基础，扩编为第五和第六支队。到达沙铺里第二天，我们原定移驻桥背，由于这里处于平（江）通（城）公路之侧，遭受敌人破坏极为酷烈，当地群众大多逃亡未归，部队无法解决食宿问题，只得改到汪坪宿营。

平江是湘北的重镇。东北毗连鄂、赣两省，四面依山傍水，地形十分险要。据说汨罗江上游浪大流急，流到这里却异常平静，这就是“平江”一名的由来。城东天岳山滨水而立，三月间半山开着茶花，清香泻满全城。平江附近，盛产布、茶、油、麻。这里特产的平布，长期行销两湖地区。过去几乎家家都有织机，到处一片机杼声。自从失陷以后，经过日军疯狂掳掠破坏，一个

富庶之县已变得满目萧条，毫无生气，几乎没有一个不闷闷的住户，没有一家不歇业的店铺。今年二月日伪军撤走以后，国民党顽军早想乘虚而入，其五十九师一七七团很快进驻三眼桥一线，顽平江县警察部队奉命固守县城。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我军南进的阴谋，三月二十六日，我军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南进：左路纵队由第一支队二营、第二支队三营和第五支队组成，经钟洞，歼灭据守三眼桥的国民党顽军；右路纵队由军直机关和第一支队一营、第二、三支队组成，经梅仙直下平江。两路大军拟从两翼迂回运动，相机夺取平江，直捣浏阳，力求造成威胁长沙，发展湘北，打通南下通路的有利态势。

部队出发不久，时值大雨倾盆。我两路纵队冒雨前进。左路纵队在钟洞、斑竹等地向顽军进攻，缴获人枪五十余，三眼桥之顽五十九师一七七团残部仓皇向长寿街溃逃。右路纵队穿过梅仙，兵临平江城下。当时，平江驻有顽警察三中队两个分队。我事先早已查清，县警察局长是我党一位领导同志的亲属，过去同情革命，对国民党一向不满。我们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派人同他取得联系。我军一到，他即率领警察部队虚放几枪，迅速撤出城外，使我军顺利地占领了县城。当晚，除司令部和政治部搬进东门外的天岳书院故址外，部队大部都在

街头露营。

天岳书院是平江县有名的地方，是当年红五军举行平江起义的所在地。记得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即于翌年七月在这里领导了平江起义，迅速占领平江、浏阳、万载、修水、铜鼓、通城、崇阳等十余县，发展并扩大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这次我们南下，彭德怀同志极为关心，亲自找我们谈话，并让他的侄儿彭启超随军南下，接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延安出发前，有一次彭德怀同志和我谈话后去小食堂吃饭，我见他的侄儿站在身旁，就顺便招呼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彭德怀同志立即严肃地说：

“让他到大食堂去吃，不能特殊化！”在去食堂的路上，他又一再告诫侄儿说：“这次南下，你在部队不能象在家里，一定要听司令员、政委和部队首长的话，虚心向所有同志学习。不能因为你是我彭德怀的侄儿就搞特殊。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不能搞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我想起这一切，置身于彭老总当年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址，心里很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早晨，部队指战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去刷写标语，公开张贴了《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阐明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便团结一切爱国志士仁人，孤立一小撮反共顽固势力，彻底打败

日本帝国主义。布告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 | |
|--------|--------|
| 去岁湖南沦陷 | 日寇肆虐横行 |
| 皆因抵抗不力 | 政府抛弃人民 |
| 本军奉命援湘 | 消灭万恶敌人 |
| 实行统一战线 | 团结一切好人 |
| 工农商学各界 | 军队地方士绅 |
| 不分阶级党派 | 皆愿相见以诚 |
| 一致联合对敌 | 展开民族斗争 |
| 独裁贻误国事 | 专制违反民心 |
| 唯有迅速改革 | 方能耳目一新 |
| 实行三民主义 | 恢复中山精神 |
| 建立联合政府 | 制止一党横行 |
| 取缔贪官污吏 | 扶持好人正绅 |
| 厉行减租减息 | 改善社会民生 |
| 取消苛捐杂税 | 买卖务求公平 |
| 反对强迫兵役 | 欢迎志愿从军 |
| 保障人权财权 | 维持社会安宁 |
| 严惩汉奸特务 | 悔过可以宽容 |
| 中国有共产党 | 华北有八路军 |
| 满布大江南北 | 则有新四大军 |
| 广东广西一带 | 抗日纷纷起义 |
| 德寇正在瓦解 | 日寇亦将土崩 |

苏联英美中法 保障战后和平
世界进步很快 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 一致义愤填胸
起来保乡卫国 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 敢于阻扰军容
自当痛击不贷 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剴切布告 仰各一体遵循

司令 王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

人们看了这张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布告以后，都兴奋地奔走相告：“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这张布告，博得了城乡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烈拥护，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热忱和革命觉悟。几乎全城的人都先后来到了几条通衢大道。一部分围着正在刷写标语、讲解政策的宣传员，一部分拥向城东的部队司令部。有的老人紧紧拉着我指战员的手，热泪盈眶地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伢子啊，真是没有想到啊！……”是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昨夜被他们关在门外的，原来是十几年来盼也盼不到的老红军！

三月二十八日，我们在景福坪体育场召开了平江全县的民众大会。附近乡村的贫苦农民听说红军回来了，都扶老携幼地赶来参加大会。王震同志操着浓重的浏阳

乡音对乡亲们讲话。他从抗日战争的有利形势讲起，形象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痛歼日军的英雄事迹。他讲得生动活泼，充满激情，始终紧扣人们的心弦。当他昂首仰面嘲笑敌人的时候，全场都禁不住跟着他哈哈大笑。他说：“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的。过去的斗争事实说明，我们湖南人民从来是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时，一位中年妇女高声问道：“还搞不搞妇女会、儿童团啊？”王震同志笑着回答：“要搞，一定要搞！妇女、儿童都要组织起来。可是，第一步，先要有自己的政府，要有真正领导抗日的政权机关。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会，就是要选举自己的县长、城关镇长和县政府的委员。”

王震同志讲完后，由我讲解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意义，我说：“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想要绞杀中国的革命，想把我们共产党人统统杀光。我们被杀光没有呢？我们要正告反动派：我们没有被杀光，也绝不会被杀光。现在，老的还活着的不少，年青的也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人更多了。过去，我们是青年，老年人怕我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如今我们也长了胡子了。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我们已经长了见识，有了各种各样的办事的经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再也休想消灭我们了。你们看，王震同志的胡子不是长得很长

了吗？我们部队上上下下都叫他‘王胡子’！”大家的眼睛都一下转向王震同志，同时爆发出一片笑声和掌声。

我最后说：“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不利于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全国民众在一起，把日寇赶出去，解放全中国！”接着，我又请王震同志向群众推荐了平江县政府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中有参加过平江暴动的老战士，有长期当牛做马的工人农民，有素不为人尊重的妇女代表，也有抗日爱国的开明士绅。王震同志念完名单后，全场一致举手通过。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由人民自己选举的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今天诞生了！”全场骤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经久不息。

当天，我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致电报喜，并报告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三月三十一日，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电。电文说：

你们占领平江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的根据地（包括崇阳、通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然后继续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进占平江的消息，很快就在湘北传开了，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但是，顽固坚

持“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反动国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对我又恨又怕。他们宁可将江南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而决不允许我军到江南守土抗战。我军入湘不久，蒋介石就严令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率部在平、浏地区夹击我军。据我缴获的国民党顽军的命令说，薛岳、王陵基的“进剿”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由顽七十二军和湘北各纵队（第三、四游击纵队和警察民防大队）全力“剿办”，这一步已开始实施；第二步，由梁汉民的九十九军和鲁道源的五十八军会同“剿办”，这两路顽军的先头部队也到了浏阳一线。

薛岳是一个顽固的反共老手。早在红军长征时，他曾率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还编了一本名为《追歼共匪纪实》的所谓“战史”，来炫耀其反共的“功绩”。四川军阀王陵基也是一个反共顽固分子。蒋介石为了使其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接连委任他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和湘鄂赣“剿匪”总司令，其防区从赣西北一下扩大到鄂南、湘北和湘中，直接指挥新三军、五十八军、九十九军、第三和第四游击纵队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其具体作战部署是：首先以七十二军打头阵，着令十三师、十五师、三十四师从修水、武宁、铜鼓、万载、宜春地区集结，进攻平江、临湘和岳阳；九十九军之九十二师、九十九师和五十八军，分别在浏阳地区和吉安、泰和、永新地区集结，从南面和东面进攻平江、岳阳；

新三军之十六师进攻通城和幕阜山；第三和第四游击纵队则配合其主力，分别在驻地对我军进行骚扰。总计，在我军入湘仅一周多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就集中了四个正规军、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团队约六万兵力，妄图乘我立足未稳而一举歼灭之。

四月初，国民党顽军开始向我大举进犯。顽九十九军、五十八军从浏阳地区进逼平江。顽七十二军之十三和十五师从长寿街一线进攻南江桥，企图夺取该地后，再调头向南，合击平江。顽王剪波之第四游击纵队九、十支队，为了配合长寿街之顽军主力进攻平江，也进到太平墩、罗家坪、月形湾和汪坪一带，威胁我军在夹石洞的后方。这时，我军既要同日伪军作战，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形势对我极为不利。我们在冷静分析了整个敌我势态之后，当即决定：一、从各支队抽出一批副职干部，迅速组织一支武装工作队，由第三支队政委曾涤同志领导，深入到平江西北、岳阳东南的广大地区，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二、根据敌情重新调整战斗部署：命令第四支队留守平江，第五支队移驻三眼桥，第六支队仍驻安定桥，王震同志则率主力第一、二、三支队北进，集中兵力首先歼灭王剪波部，粉碎顽军围歼我军的罪恶阴谋。

四月一日，我军主力部队在梅仙集结。四日，在清水岭至芭蕉坳一线消灭王剪波九、十支队各一部，缴获

人枪百余。后两天因遇大雨，部队在芭蕉坳休息。天晴后，王剪波已退至其老窝大云山和药菇山一带。我军乘胜追击，又在车廖家、杨威家山和黄金坑一带歼敌大部。当日又遇滂沱大雨，我指战员奋勇前进，敌残部溃不成军，遂向药菇山方向落荒逃遁。

正当我军继续向药菇山追击时，获悉顽王陵基之七十二军已向南江桥进犯，企图配合顽九十九军一举夺取平江。根据敌情变化，我主力到虾蟆石以后，决定挥师南下，痛击来犯之敌。

顽七十二军充当“进剿”我军的先锋，由十三师和三十四师一个团，分两路呈钳形攻势，合击南江桥：一路沿幕阜山西部进至西岭，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步步为营，直逼南江桥和操溪；另一路由龙门厂、虹桥抄袭南江桥。集结在大云山地区的我主力部队，迅速作出了迎敌部署：以第二支队作为前卫，先在南江桥、操溪地区阻止顽军前进，待第一、三支队到达后，再相机消灭顽七十二军之一路。

四月九日拂晓，我第二支队从虾蟆石出发，取捷径经孟城、毛田、小港、小水岭，迅速抢占南江桥及其南面与东南面的阵地，控制了天笑尖高地，与进犯之国民党顽军互相对峙。我指战员进入阵地后，大声向顽军喊话：“我们应该团结抗日！”“大敌当前，不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国民党顽军经我反复喊话后，

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我指战员们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还击，连续打退了顽军的四次进攻。我第一、三支队于次日中午也先后赶到南江桥一线，并很快进入了阵地。下午二时，我军司令部决定当晚二十一时，向顽十三师先头部队发动攻击，力求歼灭其一部。同时命令一支队二营，于二十时穿插到顽十三师纵深部位，对顽军之战斗部署实行分割，配合正面主力围歼敌人。当晚二十时，一支队二营插入顽军纵深。正当我主力从正面发起攻击时，顽军却很快紧缩回去，集中固守其有利阵地。经过全面权衡，我如继续强攻，也很难大量杀伤敌人。于是司令部决定停止攻击，并于拂晓前主动撤出阵地，尽快脱离顽军。我二营在顽纵深处，二十一时听到双方枪炮声激烈响过一阵后随即停止，直到二十四时仍不见我正面主力大举进攻，营长何家产同志判断敌情已发生变化，主力可能改变了攻击决心。他们也在次日零时后巧妙、隐蔽地退出了顽之纵深，安全地脱离顽军，同主力会合后一起撤出了战斗。

顽十三师在遭到我迎面阻击后，自感兵力不足，也于第二天拂晓前撤出幕阜山一线，暂时向虹桥、天岳、浆市街方向退走，但其“进剿”我军之企图仍未放弃。

南江桥战斗虽未大量歼灭顽军，但是打退了顽七十二军的进攻，这就为我争取了一段宝贵时间，以便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

作。

南江桥战斗后，我军旋经杉树坳、铁炉坪和大洲，进驻汪坪一带。在大洲，时值新近起义参加我军的张雄部住在这里。张雄本名张利仁，所部原为平北自卫队，共二百人枪。过去纪律很坏，群众极为反感。由于我军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率部起义参加抗日。为了抓紧对张及其部队进行改造，王震同志和我趁此机会一起找张谈话，随后又向其部队讲话，勉励他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教育，力争尽快成为群众欢迎的抗日部队。

四月十三日，我们在汪坪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更好地开展湘鄂赣边的对敌斗争。后经报请中央批准，于四月底正式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会、湘鄂赣边军区和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以王震同志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同志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同志为副司令员、王恩茂同志为副政治委员、聂洪钧同志为行政公署主任；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通山、嘉鱼、蒲圻、崇阳、大冶、鄂城、阳新、咸宁等地的斗争。这次会议还研究了军事问题，决定我军要尽快肃清王剪波残部，并选择有利时机，打击向我进犯之顽七十二军和九十九军。

这时候，国民党顽军仍在疯狂执行其“进剿”我军的罪恶计划。顽九十九军和七十二军已从东、南、北三面向平江逼进，三眼桥已被顽军占领，三墩、虹桥等地也有大量顽军集结，平江已陷入顽重兵包围之下。为了明确表示我军团结抗战的正义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枪口对内的可耻罪行，我军在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了事态发展的真相以后，遂于四月十五日忍痛撤离了平江城。

为了阻滞国民党顽军的“进剿”行动，我军分别派出一部分部队，在西岭、小水岭、芭蕉坳、清水岭、孙家原、九峰山等地，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扼守险要，掩护我军有计划进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司令部又把各侦察部队一部分派往临湘、岳阳、长沙、湘阴、汨罗等方面，侦察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另一部分派往修水、铜鼓、万载、浏阳、平江等方面，侦察国民党顽军的阴谋部署。由于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我们从群众中也能及时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因而随时都可以了解和掌握日伪顽军的各种动向。

不久，我军主力都迅速分散到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之间广大地区内，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府和抗日人民武装，很短时间里，以上各县都组织起县大队抗日人民武装，我们除将南渡长江后历次战斗中缴获的一千多支步枪和一部分轻、重机枪，都

分发给他们之外，又从部队抽调了一批营、连副职干部去参加领导、指挥和训练工作。

我军从南渡长江至今，后勤工作全体同志努力克服物质困难，保证军需供应，做出了可喜的成绩。首先他们将过江后数十次战斗中缴获的数十挺轻重机枪，千余支步马枪，经过修械所检修，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使用。缴获的十余万发各种子弹，按口径区分并经过擦拭大都可以供战斗应用。此外还收集和购买了一部分粮食、油盐和被服等军用物资，有计划地供给了部队。卫生部在部长潘世征同志领导下，在我军控制大幕山后，就立即建立了野战医院，以后又建立了几个适应当时战争需要的随军医院。他们除把在战斗中缴获到的医药、器械充分应用于我军伤病员的治疗外，还托可靠的商人，从敌占区大中城市，购进了一部分急需药品，解决了当时医疗上的实际困难。当樊湖解放后，很快在樊湖内中心岛上，建立了综合性的医院，不仅边区党政军的伤病员来此治疗休养，还为边区群众医治各种疾病，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四月下旬，正是江南夏季农作物收割的季节。分散在湘鄂赣边区农村的我各部指战员，纷纷帮助当地农民群众抢收小麦、豌豆和油菜籽。对缺少劳力的农户，我们从收割、搬运、打晒直到收藏，一概负责到底，而且做到精打细收，寸草归垛，颗粒入仓。在和农民群众共

同劳动中，我指战员又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大讲国际、国内时事，大讲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大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故事，并说明我军就是十年前从湘鄂赣长征北上的红军。由于我们宣传的内容深刻感人，形式生动多样，因此在广大群众中反应强烈，收效很快。特别是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际行动，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一地区，很快出现了一派军民亲如一家，人民群众踊跃参军支前的大好形势。

回 师 鄂 南

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撤离平江以后，留下了少量部队在平北广大农村坚持游击战争和开展群众工作，并派第三支队颜龙斌同志到这个地区加强军事指挥。部队主力则向谈家坪一带转移，军部指挥机关随之移驻张谷英。

四月十六日，王震同志在谈家坊召集第四、五、六支队负责人开会，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部队的行动计划。我军自从南渡长江以后，日伪军马上在湘北紧缩据点。到三月初，从醴陵至岳阳一线，敌人只是在铁路以东三十至六十里的狭长地区内设有据点，而在南北五百里和东西二百里之间，均无重兵把守。

这时候，国民党军如能同我并肩抗战，一致对外，那么整个形势将对江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十分有利。我军可乘日伪军内部空虚，迅速越过平汉铁路，沿湘江向西发展。这样不仅部队的粮食和财政问题不难解决，而且矛头可以直指粤、桂两省，早日解放华南地区的广大人民。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违背民心，不顾国难，硬把枪口对准我军和我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因此，我们决定首先肃清顽王剪波残部，对其他向我进攻的顽军，则待其疲惫之后，选择时机给予有力还击。当天下午，我第三、四、五、六支队合击洪源洞，顽王剪波部近五百人很快被我打垮。

在张谷英驻扎的十多天中，我们邀集各阶层代表人物座谈，召开中小型会议，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广大群众纷纷控诉国民党顽军烧杀掳掠的罪行。他们说：顽军不敢动日军一根毫毛，只会敲诈勒索平民百姓。他们一到，就要鸡子、鸭子、猪子、票子和婊子，老百姓都叫他们是“五子军”。乡亲们拉着我战士的手说：“伢啊，三月间听说你们要回来，百姓们一个个喜在心里，笑在脸上，都说你们一来，我们有了靠山，腰杆子就硬了。”我们乘此机会，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妄图歼灭我军的阴谋，进一步宣传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一贯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衷心赞助；许多青年经

过我们宣传教育，都踊跃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在张谷英召开了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听取了第二、三支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决定部队要扩大新兵，注意纪律教育，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攻势。第二天司令部继续开会，成立了情报处、副官处和参谋处。王震同志在会上讲话，要求全军指战员狠狠打击向我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巩固我鄂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军继续南下，有一个坚实的跳板和立足点。会后，部队很快进到岳阳、临湘一线，准备选择有利时机迎击国民党顽军。

王陵基指挥的顽七十二军和九十九军在合击平江扑空后，获悉我军在岳阳、临湘地区活动，又举兵北犯。就在我召开司令部会议这一天，顽七十二军十三师正沿幕阜山西进，其先头部队在西岭遭到我第一支队五连阻击，激战四小时，打退了顽军的六次进攻。以后两天，我五连一直扼守着阵地。与此同时，顽七十二军十五师也从龙门厂、虹桥向南江桥进攻。次日占领南江桥后，又与我驻守小水岭的第一支队三连发生战斗。两天中，顽军连续冲锋十余次，均被我三连一一击退。接着我第一支队全部进入战斗，很快，一营除三连外，占领了月田北山的主阵地和前哨阵地，二营占领了孙家原的主阵地。

二十五日，顽九十九军九十二师兵分三路同时推进：

左路经团山向联改港，中路经大峰山向洞坳，右路经西岭向板江，企图一举将我歼灭。王震同志决定在月田、江埂和孙家原一带，集中我一、二、三、四支队主力，歼灭顽十三师之一部或大部，粉碎国民党顽军“围剿”我军的阴谋。我一支队在西岭和小水岭正面阻滞顽军，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夜深。顽方由于增援部队源源开到，逐渐向我阵地两侧迂回，对我第一支队三、五连形成了包围之势；加上我两处阵地上的工事堑壕遭敌炮火轰击，破坏极为严重，很难重新修复。根据司令部命令，我三、五连从西岭和小水岭隐蔽撤出，分别加入了一、二营的战斗部署。

二十六日天亮以后，顽十三师小心翼翼地向西岭和小水岭进攻，直到接近两处阵地后，才发现我军早已撤出。占领西岭的顽军，随即向孙家原进攻，不料在孙家原前哨阵地却遭到我第一支队四连守军的迎头痛击。顽军连续发动四次冲锋，死伤百余，也未能夺取阵地。他们为了与进攻月田的顽十五师配合，接着以一营兵力投入进攻，最后三个团都参加了战斗，除了占领我四连主动放弃的前哨阵地之外，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从清晨至黄昏，我军一直巍然屹立，牢固地扼守着阵地。占领小水岭的顽军，马上向月田进攻，也遭到我一支队一连的阻击。我军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处处设伏，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顽军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才能占

领一个阵地，但又不知道我们的另一个阵地设在哪里。直到午后三时死伤数百人后，才进到月田附近。顽四十三团由于伤亡惨重，已失去进攻能力，由顽四十五团接替，继续向我据守月田北山主阵地的一营发动进攻。顽军一连冲锋了七次，先后都被我守军英勇击退。天黑以后，顽十三师和十五师的进攻渐渐停止，只用各种大炮向我阵地盲目轰击，一则借以壮胆，二则也可阻止我军发动反击。

本来，这天上午我军已向黄岸市集结完毕，决定给顽军一次严厉反击。为此，军部由张谷英移驻国清门。但是，我们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发现，顽九十二师、九十九师就已进至月田、孙家原的顽十三师、十五师在黄岸市一带对我形成包围之势。在这样狭窄的区域内，面对数倍于我之几路顽军的合击，我不仅已完全失去歼敌一路的可能，而且还有陷入重围的危险。情况十分紧急，王震同志和军部各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我军必须在顽军紧缩包围圈以前，主动撤出现有作战区域，暂时向鄂南地区转移。当晚，部队主力按照第三、四、一、二支队的次序，隐蔽而有计划地撤出了战斗。第二支队在陈东尧同志指挥下，担负后卫，掩护主力部队北撤。他们在芦家墩以北到南坡里、杨家墩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各营交替掩护，同顽军周旋战斗了一整天。顽十三师的疯狂进攻受到我军的巧妙伏击，伤亡惨重，随即停

止追击。我主力部队安全地摆脱了顽军的几路包围，途经傅家堤等地，进到湖北通城的黎家大屋，回到了我鄂南抗日根据地。

在湘北期间，我们曾多次收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来电，询问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并及时给予指示。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采取跳跃前进及留少量兵力在鄂南设立小后方的计划，指示我们入湘后，要相机公开宣传，扩大影响，“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不犯，团结一切好人”。

部队重返鄂南后，为了打乱国民党顽军的“围剿”计划，减轻鄂南根据地的压力，湘鄂赣边区党委和部队军政委员会共同决定：由王震、王恩茂同志率领第一、二支队楔入赣北之修水、武宁地区，直捣王陵基后方，迫使其主力东调，以解我后顾之忧；由我和军直机关以及第三、四、五、六支队留守鄂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

四月三十日，王震同志率部由高柳出发，向江西修水、武宁地区挺进。开始，路上未遇顽军正规军阻击，仅在大源同蔡文宿的湖北保安团三个大队发生战斗，我第二支队迅速将其击溃。五月一日，部队冒雨行军，经港口、沙垄、高坑到大岭坳，又遭到当地顽军赣北游击第一纵队数百人的阻击。我第二支队又将其击溃，俘大队长李振焜以下十余人，缴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

据李供称：赣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有四个支队，共计两千余人，分散驻在修水、武宁、瑞昌地区。自成立以后，从未和日军作战，只知敲诈勒索人民。李和部下十余人经我宣传、教育后释放。第二天雨过天晴，一、二支队分成两路纵队，同时向修水、武宁之间的船滩前进。一支队从中流出发，进至曹坑即与顽三十四师一〇〇团遭遇。这时，顽军在山上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在山脚处于不利位置。一支队前卫一营迅速抢占了左侧一个山头，开始与顽军激战。不久，我二营攻下顽军一个山头阵地，也与顽军发生激战。一小时后，我第二支队赶到，从左面高山上向顽军猛烈攻击，接连攻下两个山头阵地。在我一、二支队夹击下，顽一〇〇团狼狈向东溃逃。

修水、武宁是顽七十二军的老巢，这一带大凡好一点的民房都被顽军军官及其太太们所霸占。抗战以来，这些军官有的连日军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只知道躲在山里替自己筑安乐窝，抽大烟，玩女人，过着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我军在这里突然出现，有如从天而降，吓得那些贵太太们魂不附体，穿着旗袍、连衣裙和高跟鞋向山林深处四散奔逃，不一会都当了我们的俘虏。我们派干部把这些特殊俘虏集中起来，向她们宣传我党政策，着重说明：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日军是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敌人。国民党七十二军全体官兵应该去打日本鬼子，不应该打我们湖南人民抗日救国

军。我们希望她们转告自己的丈夫，再不要去打我军，否则，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外，对她们的私人资财秋毫无犯。经过宣传教育后，将她们全部释放。

五月三日，部队继续东进，旋经梅溪、木皋、毛铺街、邓家源和童子岭，到达大洲、郭坑地区宿营。途中，我捉获一名顽军送信人员，获悉顽三十四师一〇一团驻扎在九宫山、东港泉一带，当天拟到三都或船滩堵击我军；昨在高坑被我击溃的一〇〇团也向我尾追而来。我原计划通过进军赣北调动顽军主力东移，但是几天战斗实际上未能达到这一目的，主要原因是顽军后方有一整套完善的情报系统，通过电讯联络，消息比较灵通，容易发现我之意图。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在此长期统治，特务遍地横行，群众对我缺乏了解，使我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得挥师北上，翻过九宫山，重返湖南阳新、通山一线。这次行动的实际效果是，拖住了顽三十四师全部和顽十六师大部看守巢穴，使他不敢贸然倾巢出动，这就大大减弱了顽军对我鄂南根据地的直接威胁。

五月五日下午，我军进至阳新、西坑和鲁家一带，又遭到国民党顽军的两路夹击。我指战员们奋勇迎敌，一直战至黄昏。午夜，我军主动撤出阵地，迅速转移到毛家畈一线。在这次战斗中，我先后伤亡指战员二十余

人，第二支队三营营长詹金甫同志壮烈牺牲。九日，我第一、二支队终于摆脱了顽军的堵截尾追，在通山县山口铺同部队主力会合在一起。

在王震同志率部向赣北进军之际，我带领军直机关和主力部队在鄂南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在灯条曹家，召开了一次边区党委会议，决定将鄂南划分为四个分区，边区党委随即转到咸宁、崇阳和蒲圻地区工作。

在此期间，一系列特大喜讯不断从延安传来：五月一日，德国法西斯匪首希特勒、戈培尔等在柏林自杀毙命，意大利法西斯匪首墨索里尼等十三人被爱国者捉获后枪毙。二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七日，在雷姆斯城，签订了德军投降的初步议定书；第二天，德国总司令部代表签署了最后投降书。处于苦战奋斗中的中国抗日军民，听到这些特大喜讯，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来电指示我们：

一、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

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

我们收到电报后一、两天，正值王震、王恩茂同志

和我、张体学、聂洪钧、刘型等同志会合在一起。我们立即在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决定今后的军事行动。根据敌情，进攻湘北的顽军，这时已大部调至鄂、赣边境，并有继续“进剿”鄂南之趋势，这对我根据地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当即决定，由王震同志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我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五月十日拂晓，王震同志率领部队主力出发，当天进至崇阳县境，第二天在前沙坪组成了前方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等机关。部队继续南进，从敌人据点中间穿插而过，两天后到达湘北的岳阳、临湘地区。十七日，又进抵平江文昌阁以南的桃花山。经过研究，当天部队仍按来路北返，通宵行军，次日天明到达湘阴县的智源洞。

湘阴是我杨宗胜、吴光远部活动的地区。三月间，他们带领一支小部队来到这个地区，排除当地顽军干扰，积极开展敌后工作，很快成立了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后，他们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一部分当地顽军归正，不断壮大抗日武装，以桃花山为中心，建立起湘东抗日根据地和湘东军分区，由杨宗胜同志任司令员，吴光远

同志任政治委员，胡政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支队伍纵横驰骋在湘阴、汨罗、岳阳、平江、浏阳之间的广大地区内，迅速发展三千多人，扩编为三个大队。他们象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到敌人的要害部位。直到八月，他们才奉军司令部命令，撤离湘东地区北返。

部队在湘阴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北上，直指顽王剪波部的老巢大云山。五月二十一日从高家桥打到草鞋岭，接着移驻黄金坑，又在石庙击溃顽军一部。二十三日向大云山发起猛攻。王剪波残部凭险顽抗，我军从四面紧紧形成包围圈，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这时，王剪波龟缩在山头一座古庙里，一面命令部下死守，一面绝望地给他的老婆写下遗书，要她天亮后上山收拾他的尸体。我军乘胜攻击，很快攻下了山上的堡垒。当大家冲进古庙搜捕时，不料这个顽匪头子却乘黑夜掩护，用一根绳子滑下悬崖后，落荒逃走。

大云山战斗告捷以后，我军计划在原地稍事休整，即向湘中日伪后方挺进。但是，王陵基唯恐我军在大云山建立根据地，马上调集顽九十九军之九十二师和九十九师向我“进剿”。其全部“进剿”计划分为三步：一、歼灭我第一、二、五等三个支队，活捉王震，全部占领大云山区；二、歼灭我湘阴杨宗胜、吴光远部；三、歼灭我湘北之第三支队和鄂南之第四支队，全部占领鄂南抗日根据地。六月四日，王陵基命令各部同时出动。三天后，

顽军开始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日伪军一个联队当天也从岳阳进至黄岸市一带，事先同王陵基取得联系，联合向我军发起攻击。我司令部估计顽军必定进占黄岸市，于是决定将部队分为几路，以第二支队为主力，王震同志率军直基干力量随第二支队之后跟进，于六日下午赶到顽军途经之小湄村附近隐蔽，当晚趁其不备，断其一路，予以彻底歼灭，打破顽军的“进剿”计划。正当我军向伏击区运动时，不料情况发生变化，国民党顽军已在我之先到达，而我侦察处又未及时向上传报，以致我主力第二支队到达伏击区后，突然与敌遭遇。这时，我后续部队又没有赶到，第二支队成为孤军，与一个师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恶战。

这一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国民党顽军依仗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连续向我发起攻击，密集的枪弹炮火不断向我阵地上倾泻。听到枪声以后，王震同志冒着枪林弹雨，率领军部直属队很快赶来。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找到第二支队队长陈冬尧和政委罗章同志，以便迅速摸清情况，指挥战斗。但是，当时正值夜间，四周一片漆黑，敌人在我军猛打猛冲下四散溃逃，双方阵地犬牙交错。王震同志当机立断，一面派人继续联络陈、罗，一面组织直属队和身边的同志投入战斗。他亲自带领直属队一直冲到了顽军师部附近，同敌人争夺一处制高点。结果我军捷足先登，占领了制高点。王震同

志这时正走在最前面。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对面飞来，正落在他的脚下，眼看就要爆炸，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警卫员尹光普同志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猛地把王震同志推倒在路边的一个小土坑里，自己顺势扑在他的背上。轰地一声手榴弹爆炸了。弹片从他们身边飞过，参谋处副处长陈实同志受伤，王震同志滚了一身泥土，安然脱险，尹光普同志受了一处轻伤。

午夜，战斗进入最激烈阶段。敌人的炮火映红了天空，枪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上，弹片和爆炸的尘土在指战员们身边飞舞。顽军分路多次向我发动猛烈冲击，都被我英勇的战士们打了下去，阵地前面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这时，第二支队长陈冬尧同志决定到前沿钟善声同志的二营去了解战斗情况。警卫员拉着他说：“支队长，不能再往前走，那里太危险了！”陈支队长怒目圆睁地说：“我打了十八年仗，从来就在最前线。怕死，就不配当战士！”说着，他向副支队长贺盛桂同志作了交代，就和支队政委罗章同志一起到二营去。一路上，他们仔细观察了顽军进攻的态势。正当爬上一个小山包时，前面一颗子弹向陈支队长飞来，一下穿腹而过，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裤子。他用手紧紧按住伤口，强挣着想站起来。警卫员连忙上前，用急救包把他的伤口扎好。他躺在草丛中，血不住地往外流。他紧咬着牙，连哼也不哼一声。罗章同志紧紧地搂着他，眼里满含着泪水，问道：“支队

长，你感觉怎么样？”

陈冬尧同志两眼瞪着他说：“不要管我！命令钟营快从右面山头运动过去，马上和五支队取得联系，看看敌人还往哪里跑！……”

罗章同志安慰他说：“钟营已开始运动，你放心好了。”

“走，你快到前面去……”

“支队长，我不能离开你，我有责任照护你！”

“不，不……”陈冬尧同志无力地推了罗章同志一把，立刻昏了过去。

罗章同志和几个战士马上用马刀砍了几根竹子，做成临时担架把他抬到司令部。由于流血过多，他脸色惨白，全身不住地颤抖。他拉着来看他的马寒冰同志的手，呼吸急促地说：“快找……王胡子，……我要见他！”

“已派人找他去了！”马寒冰同志说着，忍不住哭了。

这时，王震同志正在前沿指挥直属队向敌人猛烈攻击，连续抢占了两个山头，同第二支队会合在一起。当他听到陈冬尧同志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消息后，不禁悲愤交集。他大声命令各部坚决消灭敌人，替战友报仇。冲锋号吹响了，愤怒的喊杀声震荡着山谷，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扑向敌人……

拂晓前，我军击溃敌人一个营，俘获副营长以下百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数十支。最后，在组织突围时，罗章、贺盛桂同志命令青年连：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重伤垂危的陈冬尧同志和另两位受伤的营长抬出去。天亮以后，大家把陈冬尧同志抬到一个半山腰上，王震同志特地从山上下来看望了他。陈冬尧同志看见王震同志，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情激动地说：

“司令员，我没有完成任务。……”

“冬尧同志，你不要难过，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王震同志仔细查看了陈冬尧同志受伤的部位，亲自为他盖好军毯，鼓励和安慰他好好治伤，并再三嘱咐身边的干部和战士，一定要精心护理，保障安全。

战斗结束以后，青年连的战士们抬着陈冬尧同志，经过一天行军，跟部队转移到一个小村里。陈冬尧同志的伤势迅速恶化。晚八时许，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隐约听见身边发出了一阵阵哭声。他突然睁开眼睛，深情地把每个战友都看了一遍，然后竭尽全力说：“不要哭嘛！人总是要死的，为党和革命事业牺牲，这不算什么！……我只是太惭愧了，没想到死得这样早，……本想为革命再多做些工作，多打几个胜仗。……现在不行了，我对不起党和毛主席。……请你们见到毛主席，替我说，……陈冬尧向他致最后的敬礼！……”

“冬尧同志，我来了！”王震同志听说陈冬尧同志生命垂危，匆匆走进门来，凑近陈冬尧同志耳边说。

陈冬尧同志勉强睁开两眼，嘴唇轻轻翕动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叫了一声“司令员”，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的警卫员猛地扑到担架上失声痛哭。巨大的哀痛，使从不流泪的王震同志泪如泉涌。他久久地望着陈冬尧同志熟悉的面容，只说了一句：“他死得慷慨！”马寒冰同志把一条红被单轻轻覆盖在烈士的身上。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命令：“立正！向人民英雄致敬！”

时隔一个月后，当王震同志回到鄂南，谈起陈冬尧同志的壮烈牺牲，不禁引起我的无限怀念和哀思。我看见王震同志脸色沉郁，心里还留着难以抹去的悲痛。

部队摆脱敌人以后，王震同志率领军直机关和第二支队进入一片密林中休息。王震同志把贺盛桂等同志找去，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当时，摆在我军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到桃花山，一是返回鄂南。贺盛桂同志提议到桃花山去，因为这时后有追兵，如我顺敌人追击方向返回鄂南，将对我军极为不利，而到桃花山，则是向敌追击相反方向前进，可将敌人甩得更远。王震同志考虑后，决定当天即向桃花山开进。到达桃花山后，经过短期休整，王震同志又将队伍分成两部：由罗章、江勇为二同志率第二支队主力留在桃花山，协助杨宗胜等同志继续开展桃花山根据地；由贺盛桂、刘发秀二同志率四个步兵连和二营重机枪排，于六月十三日出发，跟随

王震同志第二次返回鄂南抗日根据地。

在王震、王恩茂同志率领主力挺进湖南期间，我和张体学同志留在鄂南的部队也不断向四周发展。五月中旬，我们一举攻克了樊湖，随之向梁子湖地区推进。下旬，我率军直机关和第四支队越过崇阳和通山之间的公路北上，进抵崇阳、蒲圻和咸宁一线。过去，这一带的革命力量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殆尽，我军进驻后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党的组织。经过研究，我们立即派出一批干部，积极发展党员，通过他们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靠近日伪顽军占领区的边缘地带，通过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动抗日斗争。我们还抓紧一切机会，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和开明绅士，不断壮大抗日力量。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我们很快在这一地区站住了脚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拥护。在樊湖召开的一次各界代表座谈会上，我曾听见一位皓首银须的开明士绅慷慨陈词，十分感人。他说：“我堂堂华胄，开化极早，历史文明。近世只缘内忧外患，落于人后。今遭日寇内侵，实有亡国灭种之虞。贵党贵军决策英明，勇猛御敌，风靡天下，实不愧当世英雄。此次南来，历尽艰辛，不计旧时积怨，深明大义，为国为民，余人不胜感激之至。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朽年迈，虽不能驰驱沙场，但愿奉献余生微力，以期早日驱逐日伪，复兴中

华!”

我军在湘鄂赣边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宣传、发动了群众，壮大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给敌顽以应有的打击。当时，《晋察冀日报》曾作了这样的报道：“我军先后和敌伪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毙俘敌伪三千余名，收复大小城镇乡村二百七十多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这一期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为了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中国在抗战胜利后实现一个光明的前途，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听取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于六月十一日胜利闭幕。

六月中旬，红色电波传来了党的七大闭幕的喜讯，全军上下欣喜若狂。随后，从延安又发来了大会的各项文件。我们立即召开了一次湘鄂赣边区军民庆祝大会，并组织广大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七大文件。我还委托周立波同志主办了一份油印的《解放报》，专门出版了庆祝党的七大的专号。在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中，大家深为这次团结、胜利的大会感到欣喜鼓舞。通过学习讨论，

全军指战员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我军的奋斗目标。普遍认识到，党的七大提出的政治任务，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纲领。大家坚决表示，要为实现七大提出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任务而英勇奋斗。

挺 进 华 南

六月下旬，我主力部队从湘北的湘阴地区第二次返回鄂南。二十五日晚，在通山县山口铺附近一个叫半坑的地方，主力部队和鄂南留守部队会合在一起。两天后，又移驻到咸宁县的董家祠堂和郭家祠堂。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正确制定部队的行动计划，我们决定在此休整一段时间。

这时，江南地区进入盛夏季节，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自从来到湘鄂赣边以后，我军同国民党顽军反复周旋，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这使所有指战员都感到焦躁不安。大家都思虑着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不到十天中，接连给我们发来了三份电报。来电肯定我们“数月来在湘鄂边区行动是有成绩的”；同时指出：由于“王陵基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余地小，已处被动。”中央还提出两个行动方针，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仍在现地坚持；二、

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1）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2）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分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中央意见，希望我们率主力大部分，以三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到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建立南方局面。同时告诉我们：为了执行以上任务，扩大华南解放区，中央军委决定将三五九旅留在延安的部队，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以刘转连为司令，张启龙为政委；将延安警备第一旅之一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以文年生为司令，雷经天为政委。第二、三支队共计六千人，作为第二梯队南下，其时已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预计年底前即可到达湘粤之间的五岭地区同我们会合。以后由于日本投降，局势发生变化，第二梯队只进到河南就奉中央命令北返了。

党中央及时发来的几次重要电报，宛如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风，驱散了我们心里的焦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为了贯彻党中央有关南进的指示精神，七月四日，我们在咸宁县的胡家街召开了一次边区党委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边区的工作和部队的军事行动。通过反复讨论研究，大家普遍认识到，在当前情况下，象我们这样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打大仗，不仅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我军的战

略方针应是：在日军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日军、伪军与联日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则不应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事，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并取得胜利。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军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因此，我们不应在干部和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要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日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大家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会后，我到王震同志的驻地郭家祠，一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由王震同志和我一起率主力继续南下。我们的具体计划是，以现有主力取道日、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我们还准备根据中央指示，将兵力和干部分成几个部分，在以江西的龙南、全南、定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区，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柳州、道州、临武、盐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县、恭城为中心的湘桂边区，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军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进而发展。毛泽东同志收到我们的电报后，马上

回电说：“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我们随即决定：杨宗胜、吴光远同志所部继续以桃花山为中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张仲瀚、左齐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协同张体学同志所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王震同志和我率领主力继续南进。

在鄂南休整期间，我们还组织全体指战员在学习党的七大文件的基础上，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前一阶段部队行军、作战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通过总结，使大家清楚懂得，我们组织军队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人民，保卫人民的利益，坚决反对压迫、剥削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唯一的、直接的依靠，就是加强内部团结，坚决执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坚决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和团结人民的政策。同时，大家也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干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不断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在敌人无比猖獗时，部队党组织就用事实揭露一切反动派的虚弱本质，说明反动派的表面强大只是暂时现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在斗争极其艰难时，我们就号召广大干部、党员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激发战士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

英雄主义气概。广大干部、党员总是战斗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行军中，他们给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作战时，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宿营后，他们争相站岗、放哨，宁愿自己露宿，也要把房子让给战士。正因为这一切，我军才能在长途远征和频繁战斗中拖不垮，打不烂，并且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意志和饱满的战斗热情，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部队主力即将南下，政治部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号召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勇敢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针对部队下一阶段是在夏季的江南地区活动这一特点，政治部要求大家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吃大苦，耐大劳，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要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战胜炎天酷暑、狂风暴雨、蚊叮蝇扰以及南方夏季流行的各种疾病，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最后又着重指出，部队在敌后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宣传党的七大的路线，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七月七日，我主力部队从咸宁县的茶地铺地区出发，连续行军十天，途经蒲圻、崇阳、临湘、岳阳、湘阴等地，到达平江的两开堂和金岗坪。这十天，气温一直在摄氏三十八九度以上，烈日当空，炎热难行。行军途中，每天有不少同志掉队，病员逐日增多，中暑晕倒甚

至牺牲生命的事不断发生。部队在金岗坪买到不少大米，出发时按伙食单位发给大家携带，第一支队司令部最后剩下三十多斤。司务长周星桥同志舍不得丢掉这些大米，就连同自己的行李一起背在身上，跟随部队走了六十里路。快到福临铺时，他突然晕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经抢救无效，牺牲了生命。

在长沙以北的福临铺，我们仔细研究了粤汉铁路、湘江两岸以及湘粤边境的敌情。当时，日军在衡阳除有二十军驻防外，还有第六十八师团驻在衡阳附近，第六十四师团驻在衡阳以西，三处兵力不下四万余人；在宝庆（今邵阳市）除有第三十四师团驻防外，还有第一一六师团驻在宝庆附近，两处兵力超过三万人；在粤北的曲江驻有第一三一师团，兵力约一万三千；在粤北的源潭地区，包括花县、英德、增城等地驻有独立步兵第八旅团，兵力五千四百余人。在长沙以北的湘江以东和粤汉铁路以西一线，日军数量不多，戒备比较松弛。从宁乡到衡阳，从湘潭到宝庆的广大地区大多处于敌后，国民党顽军力量薄弱。据杨宗胜同志估计，我军若在这一地区渡江，问题是不大的，他们正在湘江沿岸进行准备。

七月二十一日，部队从福临铺出发，乘着夜色掩护，在栗桥和青山市之间通过了长沙与岳阳之间的公路，旋经赛头市、陈家冲和张家冲，到达吴家墩。杨宗胜、吴

光远同志为了迎接主力，早已将湘东军分区的指挥部移驻到这里。他们率部离开主力已四个多月，这次战友重逢，大家不由喜出望外。第二天，我们在此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长沙、湘潭、岳阳、平江、浏阳等地的工作，决定留熊晃同志率第五支队四连在长沙、浏阳地区活动，部队主力准备迅速穿越粤汉铁路和西渡湘江。

二十三日傍晚，部队经过土地坳、唐家洞、任家冲到达排栖屋。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青年农民，当他知道我们要到南方去打日军，马上答应带我们通过铁路。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许多这一带的情况。过去，日伪军常到这里掳掠，老百姓早就忍耐不住了。不久前，他和几个年青人在附近山上偷偷打死了三名日军，事后他们故意放出风声，说这里到了抗日队伍。从此以后，小股日军再不敢到这一带来骚扰了。他很高兴地说：“冒（没有）想到，你们说来倒真的来了。你们这一来，硬是壮了我们的胆！”

次日，部队到达长沙以北的铜官、下洞子一线，准备在这里西渡湘江。入夜，晴空上升起一轮圆月，湘江上闪耀着银白色的波光。指战员们踏着月光，迅速奔向渡口。蓦地，从铜官方向传来了一阵枪声。一个侦察员很快跑来报告：几十名国民党的武装特务“正义军”，企图夺我集中的船只，阻止我军渡江。王震同志厌恶地把手一挥，说：“快赶走他！”我军前卫很快将这股顽军击

溃，俘其中队长一名，随后开始渡江。在下洞子渡口，我另一路纵队正要上船，驻守在对岸白沙洲的伪军慌忙赶来阻击，两军发生激烈战斗。伪军用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封锁江面。顿时，一颗颗炮弹落入江心，激起了一两丈高的水柱。一串串白色的弹光嗖嗖地飞来，划破了晴朗的夜空。王震同志考虑时间紧迫，简单和我们商量几句之后，马上布置第二支队二营五连担任东岸警戒，防止敌人从我侧后偷袭；二营其余各连组织火力，压住对岸敌人的炮火。一切准备就绪后，王震同志向湘江对岸一指，大声命令说：“先头部队强渡！”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先头部队奋勇向前。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在江心负伤，仍坚持战斗。半小时后，我军强渡成功，旋将白沙洲伪军打垮，迅速占领了西岸渡口。部队主力乘胜渡江，几十只渡船往来如梭。午夜，正当我后续部队赶到东岸渡口时，突然从长沙方向开来十余艘敌艇。我一部分指战员这时正在江心。他们紧握手中武器，一边奋力前进，一边迎击敌人。不久，远处又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三架飞机转瞬飞到我们头顶。船工们估计这是盟军飞机，可能是来轰炸敌艇的。但是，此时江面已形成一片混战局面。这三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多时，接着扔下几颗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几乎在同一时刻，几颗重磅炸弹先后落入水中，掀起一阵阵冲天似的巨浪。为了减少无谓伤亡，我们决定暂停渡江。飞机和敌艇相

持约摸一个小时后相继离去，江面复归平静。我后续部队接着渡江，直到第二天拂晓，终于全部到达湘江西岸。

当天，我们在长沙附近的杲山寺稍事休息，随即顶着火一样的烈日，连续行军两天，于二十七日进抵宁乡县所属之新田湾。这一带，沿途都有国民党地方顽军驻扎。他们一面伙同当地乡镇自卫武装，不断对我进行袭扰，一面造谣“日军来了”，恐吓群众不敢接近我军。我们本着自卫原则，有节制地予以反击。对其被俘人员，在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之后，一律发还枪支，将其释放，以示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诚意。

在新田湾，我们又收到毛泽东同志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询问我们沿途情况如何？估计何时到达五岭山脉？接着告诉我们：日军为了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五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战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不过至少他要固守广州以及整个粤汉铁路。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

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毛泽东同志最后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要有精神准备，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为了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的指示，我们在新田湾只停留一天又继续出发了。部队经李家湾，在排仙桥穿过湘潭和宝庆之间的公路，徒涉涟水，到达湘潭附近的石潭、上桥一线。途中遇雨，而且越下越大，眼前白茫茫的，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随身携带的雨伞或斗笠，在这样的倾盆大雨之下，只能遮住胸前的一小块地方，腰部以下转眼就被淋得里外湿透。这里的土地是红壤，只要见水就变得又粘又滑，即便加倍小心也难免摔跤。走到宿营地以后，指战员们全都摔成了泥人。第二天又下了一天大雨，部队走了十五里路，比平日几乎多费两三倍的时间。

八月一日天气转晴。为了纪念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十八周年，早饭后，我们把部队集合在一片山坡上，请王震同志给大家讲话。雨后的早晨，空气格外清新。王震同志披着一身霞光，显得格外威武。他走到队伍前

面，高声问道：

“勇士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八月一日，建军纪念日！”全体指战员同声回答。

“对，今天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生日。”王震同志笑着说，“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出生整整十八年了。过去，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军队：有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军队，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军队，有为官僚、买办集团服务的军队，就是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军队。二十四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它是决心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党手里没有军队，革命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后来我们总结了血的教训：要闹革命，手里不能没有枪杆子、刀把子，不能没有军队。‘八一’枪声一响，一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战的军队从此就诞生了。”说到这里，他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我们部队的直接领导者——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的高大形象。王震同志接着说：

“去年冬天，我们从延安出发的时候，贺龙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靠自己的双手起家的。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全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的军队，才发展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今天，我们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我们这支军队还要继续发展、壮大；否则，我们就担负不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靠什

么去发展、壮大呢？还是要靠自己这一双手！我们要到湘、粤边境去会合广东部队，创造五岭根据地，前面有不少敌人，有很多困难，正等着我们去消灭它、克服它。我们要用英勇杀敌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我军的生日！”

王震同志讲完后，部队立即出发，途经射埠、锦石等地，当晚到达盐埠的黄家湾。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周里）和张春林同志亲自来和我们接上了关系。我们一起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决定，南下支队到达湖南后，即成立湖南省委，由我任书记，周礼、张春林、刘亚球、谷子元等同志参加省委工作。会上，省工委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湘潭地区的情况：这里杂牌队伍很多，如湘潭第四纵队、湘潭奋勇部队、湘潭国民抗敌自卫团，等等。第四纵队也叫大公部，下辖三个支队，共有一千多人。奋勇部队现改名湘衡永指挥部，是国民党七十三军的外围组织，以下也辖三个支队，共有三千多人。国民抗敌自卫团下辖八个大队，因与顽七十三军有矛盾，已被七十三军打垮几个大队。其他还有什么正义军、温支队以及其他地方武装。在我进驻黄家湾以后，这些武装先后都来和我们联络，愿意靠拢我军。考虑到这个地区处于敌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真正的抗日武装又寥寥可数，我们决定把徐国贤、廖明等同志领导的第四支队留在这一地区，以便宣传组织群众，团结争取当地自卫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实行统一领导和

指挥，经过和省委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由周礼同志兼任第四支队政委，廖明同志改任副政委。

八月五日，我们和第四支队告别，由黄家湾出发向南。次日到达湘潭与衡山之间的龙船港，准备再次东渡湘江。为了确保安全，副司令员郭鹏同志亲自带领几个侦察员，化装到江边了解敌情，准备船只。通过侦察，发现敌情并不严重。在当地群众热情支持下，很快集中了一批船只。这天正下着大雨，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又罩上一层雨幕，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好的渡江条件。王震同志立即下令部队火速赶到渡口，分批上船，经过一夜摆渡，我们又第二次胜利渡过了湘江。

八月十一日，部队沿粤汉铁路南下，正走到衡山附近的南湾一带时，收到了中央发来一份电报：

王王：

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中 央

八月十一日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顿时使全军上下欢喜若狂。大家尽情欢呼，互相拥抱，有人欢笑着，雀跃着，眼里忍不住流下了欢乐的泪水。八年了，多少战友奋战苦斗，多少烈士流血牺牲，才赢

得了今天的胜利！八年了，多少同胞惨遭杀戮，多少家园妻离子散，才迎来了今天的胜利！八年了，做梦都在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内战迫近！”在欢乐声中，好象同时响起一阵阵警钟。内战的阴云顿时压在人们的心头……

同一天，我们又收到了从延安发来的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无条件投降所缴出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我们原定在南湾休息，由于时局变化，迫使我们必须赶在暴风雨到来之前，迅速插入湘粤边境。我们预计，在日军投降后，国内形势可能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已不宜分散活动。因此，马上命令留在湘潭地区的第四支队随后跟进。全体指战员满怀胜利的信心，迈开坚定的步伐，又向南进发了。

八面山中突重围

华南的盛夏，烈日如火，部队冒着酷暑向南进发，指战员们一个个挥汗如雨。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念头：快走，快走！全国内战迫在眉睫，一定要在国民党反动派行动之前，尽快赶到湘粤边境，和我广东部队会合。

我军迅速挺进华南，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心腹之患。还在日本投降以前，蒋介石即已电令国民党第七、

九两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薛岳，组成联军，在湖南的安仁、永兴、耒阳、酃县、桂东、汝城，江西的崇义、南康、信丰，广东的仁化、南雄、始兴等地严密布防，妄图从三面包抄夹击，将我消灭在湘粤边境。

八月十二日，部队连续行军十二小时，到达安仁西南的南雷庙和下铺头一线。我们在此发现，国民党暂五十二军两个师和四军一个师，已在永兴、资兴一带布防。第二天，我前卫第一支队，在车桥附近与国民党四十四军一个团遭遇。顽军一触即溃，当即被我打死十余人，打伤二十余人，俘获十余人。从审俘中，我们又获悉顽军的部署情况是：四十四军驻茶陵、攸县和安仁；暂二军驻永兴、资兴，军部在资兴；暂七师驻永兴，暂八师、九师均驻资兴。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如从永兴与资兴之间直下郴州、宜章和乐昌，势必遭到顽暂二军截击。因此，我们从原拟走西南，改为走东南，遂由石门楼经过天里坪，进至离永兴不远的石柅一带。

接连三天，部队都是急行军，平均每天走七十里以上。天气闷热，山路崎岖，每天到宿营地时，大家都疲惫不堪。十五日，部队在石柅休息，下午第一支队报告，顽便衣侦探已进入我警戒线，并开枪向我射击。晚上，从第一支队驻地方向，不断传来步枪和机枪声。次日拂晓，部队继续南进。原定向汤边圩前进，走到皮石，得知那里到了国民党暂二军教导队，不远的中村驻有顽军

一个特务团，船形圩也从茶陵开来了四十四军一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奉命前来堵击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改变行军路线，避实就虚，从新祥经下堡、云头，到达资兴的疆家洞宿营。这天走的全是山路，有人统计一共翻过了十四个山头。不少同志整天只吃了一顿早饭。到了宿营地，房子又少，大部分同志都在野外露宿。有个战士开玩笑说：“里头饿，外头冷，这真叫里外夹攻啊！”另一个战士马上接了一句：“这只是小意思，厉害的还在后头哪！”

部队过云头时，看见路旁不远有一排矮屋，门关着，里面无声无息。开始大家都没注意，第二支队走过去两个营都没看出问题；直到第三营经过时，才发现屋里驻着顽暂二军一个新兵连。三营马上派两个连去包围了那一排房子，顽军的新兵们一个个吓得筛糠似地发抖。我未费一枪一弹，即将那一连新兵悉数俘获。

为了摆脱敌人的堵截尾追，十七日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部队迅速向桂东以西的四都圩进发，途经大寨坪和顶寨，翻过两座大山，进到西水一线。正下山时，忽然大雨滂沱，大家都被淋得里外透湿。当时，第二支队二营五连担任前卫，他们拟去四都圩宿营。傍晚时分，副支队长龙江云同志率领五连战士走进四都圩，发觉敌人已经宿营。这时后退已来不及了。龙江云同志小声命令战士们：“大家注意：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一边说着，

一边继续大摇大摆朝街里走。暝色四合，前面的敌人没有看清我们是什么部队，就大声喝问：“哪一部分的？”龙江云同志粗声恶气地回答：“什么哪一部分的，你瞎了眼啦？！”顽军的一名团长一听口气不小，立刻跑过来和龙江云同志握手寒暄。我五连战士乘机很快穿过了街道。二营进街，发现满街都是敌人，立即停止前进。侦察参谋何占魁同志马上向贺盛桂同志报告。贺盛桂同志和他一起上山一看，果然五连已被隔在对面一座山上。

“不能把一个连白白丢掉！”贺盛桂同志当即决定：以二营和一营二连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打响以后，二营向街心突击，一营二连从街东迂回。敌团长看到我们向街上冲锋，一时吓得手足无措，正打算躲进一个旧碉堡，我先头部队手疾眼快，一枪将其击毙，紧接着向敌群扔出一排手榴弹，顿时打得敌人乱成一团，仓皇溃逃，四都圩被我占领。顽暂二军和四十四军发现了我军主力，一下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军星夜出发，迅速向桂东以西的八面山地区转移。

八面山是湖南境内南岭山地的主要山脉之一，海拔一千多米，纵贯于桂东、资兴、汝城之间。部队走进山里，只见山势巍峨，有如陡梯。山上山下，到处林莽葱郁，荆棘丛生，几十里不见人烟。那绵延不绝的山峦，爬上一层，上面又出现一层，一层比一层险峻。爬到第七层，好象一下钻入了云雾之中。天色渐渐晴朗，太阳

透过云层，照得山野金灿灿的，耀人眼目。大家走得又累又饿，巴不得听到一声休息的命令，有的在草地上一坐，有的往树上一靠，许多人一眨眼就睡着了。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我进入八面山之后，立即调动四军、暂二军和四十四军等部共八个团的兵力，重重包围，步步进逼，企图一举将我歼灭在八面山中。顽军军官忘乎所以地对其士兵打气说：“王震匪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如今又走进一片荒山野岭，被国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了。他们即便不被消灭，也会在山里困死、饿死！”

我们面临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敌人占领了所有山隘、险要和通道，然后派兵前堵后追。部队进山以后，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光，山里又渺无人迹，指战员们饿得走不动路，只得采些菌子和野果充饥。有的战士偶而在山涧里抓住几只青蛙，也用罐头盒子煮熟吃掉了。副参谋长苏鳌同志看见战士们脚都抬不起来，只得忍痛把自己的马杀掉，分给每人一小块马肉。

山区的天气变化无常：白天赤日炎炎，晒得人头晕眼花，灼热难当；到了夜晚，又突然风雨交加，冷得人直打哆嗦。在一个临时搭起的窝棚里，王震同志正趴在一盏油灯下察看地图。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两只本来很有神采的眼睛全熬红了。我真担心他拖垮了身体，就过去劝他休息休息。他摇了摇头，慢慢直起身来说：“睡

不着啊！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战士们。”

山野黑沉沉的。大雨之后，天空露出了几点星光。战士们烧起了一堆堆篝火，有的在烤马肉，有的在烤衣服。王震同志指了指前面，说：“你看那边，好热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前面有一堆火烧得光焰四射，一群战士正围坐四周，凝神听一个胡子拉碴的老战士在讲什么。我告诉王震同志，那老战士叫刘志禄，原在新四军五师。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以后，他跟随蔡会文将军在此地打了三年游击。蔡将军牺牲以后，所部就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王震同志和我轻轻走了过去，听见老刘正讲得有声有色：

“……那时候，反动派跟眼下一样，今天‘围剿’，明天‘清乡’，恨不得一口吞掉我们这支红色游击队。那结果嘛，不用说你们也知道，当然是枉费心机！后来他们组织什么‘跟脚队’，发现哪里有脚印，马上派兵来追踪。我们对付它的办法是：分散出去，到大路上集中；分散回来，到茅屋里集中。一计不成，他们又生一计，又搞什么‘看火队’，每天到高山顶上瞭望，看见哪里冒烟，立刻派兵来包围。哼，这也治不住我们：山里每天清早总是雾蒙蒙的，我们就在起雾时点火，烧不冒烟的干柴做饭。我们就这样在这一带大山里跟敌人周旋了三年。这里的老百姓简直把我们传神了。他们说，蔡会文将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人人能飞檐走壁，个个会腾云驾

雾。……”

王震同志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大家回过头来，看见是王震同志和我，都站起身来让我们坐。

王震同志对刘志禄同志笑着点了点头，说：“你讲得好，快接下去讲！”

老刘笑着说：“刚下了场大雨，大伙儿身上里外都浇透了。我怕小伙子们睡过去着凉，就给他们谈天儿混时辰。”

我问老刘：“我们这一回，有你们那阵子苦吗？”

“说到苦，那倒是一样的。”老刘想了想，说，“大不了就是受冻、挨饿，加上没日没夜地行军打仗。我在艰难的年月里就学会了一条：遇到困难只要把心一横，牙一咬，到头来总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我听老刘说得有理，就对战士们说：“老刘说得对，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又有人民群众支持，在我们面前，就是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王震同志问大家：“这两天，你们都没搞到饭吃吧？”

大家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一个青年战士轻轻叹了口气，小声说：“人要能够不吃饭、不睡觉就好了。”

大家一听都笑了。我笑着对那战士说：“你想做神仙，不食人间烟火呀？！”

王震同志看见周立波同志坐在身边，马上笑着对他说：“周立波，你日后要写小说，就把我们这些人写成不

食人间烟火，这样才有意思！”

大家听了，不禁大声笑了起来。

有个小宣传员，记得名字叫徐立，这时从另一堆火旁跑了过来。他爱唱爱跳，是部队有名的“活跃分子”，不论环境多艰苦，斗争再激烈，平日总是乐呵呵的。部队在行军途中多次轻装，他身上什么都扔光了，唯独一把曼陀林琴还带在身边。他走到王震同志和我面前，滑稽地鞠了一躬，笑着说：“司令员、政委，你们辛苦了！我唱一支歌慰劳你们！”

“好嘛，你给大家唱一个！”王震同志看着这小战士，爱抚地笑了。

小宣传员轻快地拨动琴弦，唱起了一支自编的歌曲：

红红炉火炼成钢，
江南杀出龙虎将。
若问健儿从何处？
陕北出发到三湘。
打得日伪转了向，
连说“神兵从天降”；
打得顽军哭爹娘，
大喊“饶命我交枪！”……

深夜，王震同志和我回到窝棚里，连夜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会，研究军事问题。会上，王震同志说明，目前

我已处于顽军四面包围之中，敌情异常严重，我军不能束手待毙。经过讨论，大家坚决表示，一定要英勇战斗，突破重围，并建议用王震同志和我的名义，马上向全军发布一道命令。王震同志倏地站起身来，果断地说：“好，我们马上草拟命令。刚才我跟政委到下面转了一圈，战士们虽说又累又饿，但是士气很旺盛。我们写的命令，要有点革命精神，把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反映出来！”我立即拿起笔来拟了一道命令。

通信员把命令送走以后，王震同志靠在文件箱子上打了个盹。十八日拂晓，部队又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前进。大雨之后，路上泥泞不堪，一步一滑。我们站在山顶向南远眺，看见一队队顽军象无数黄色蚂蚁，正从资兴开往桂东。敌人虽未发现我们，但离我们很近。因此，我们只能在半山的灌木丛中隐蔽前进。先头部队在前面用马刀开路，主力随后踩着杂草荆棘穿行。天亮后又下起雨来，山路越发难走。队伍翻过山头，走进了一条山沟，我的骡子忽然陷进一块水田里，几名战士一起上前帮着卸下驮子，好不容易才把骡子拉了上来。由于敌情紧迫，那满满一驮从延安带来的毛主席著作和革命书刊，不得不忍痛委弃，作了紧急处理。

队伍从横坑经双坑、钓勾寨来到湖洞与下坑之间的一处山口。由于两三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加上日晒雨淋，连续行军，指战员们都精疲力竭，每走一步都很

困难。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仍旧搞不到粮食。我站在山坡上，看见周立波同志一步一挨，慢慢爬上山来。我向前走了几步，迎上去问：

“老周啊，你还能走吗？”

他点了点头，又有气无力地说：“政委，这一回，我可真把娘胎里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他从昨天到现在，只吃了一片生南瓜和一只干辣椒，一对本来深度近视的眼睛，眼窝更加深陷下去。

王震同志在一间茅草矮屋里打开地图，仔细察看了路线。他很快走出屋来，招呼路过的战士们进屋休息，自己靠在一棵树上，仔细考虑部队的行动计划。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已封锁了五条下山的道路。部队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从八面山突破重围，赶到湘粤边境。休息以后，队伍来到一片缓坡上，王震同志立即召集各支队长开会，再次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严重情况，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战斗准备，尽量精减轻装，销毁机密文件，精心照护伤员，注意群众纪律，准备今晚冲出重围。

会后，我们通知前卫部队在山沟里集合，由王震同志亲自交代任务。这时，雨越下越大。王震同志戴着一顶斗笠，全身早已湿透；很久没有剃过的胡子上也不断滴着水珠。他大步走到战士们面前，沉默了一下，接着就用高昂的声调开始讲话：

“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想把我们困死、饿死，消灭在八面山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坚决打出去！”战士们的吼声在山谷中回响。

“对，我们要打出去！”他举起拳头，沉着而充满感情地说：“十多年来，我们这些肩扛七斤半的人，历尽了人间的艰难险阻，牺牲了无数亲爱的同志，为的就是解放千百万受苦难的人民大众。过去的斗争，已证明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哪怕环境再艰险，斗争再残酷，我们也要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把红旗插遍祖国的大地！”

王震同志要我也给部队讲几句话。我走上一步，大声说道：“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挺进华南，对我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我们要为党的事业，不惜流血牺牲，前进！前进！再前进！王司令员号召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有！有！”战士们响亮地回答。

部队又冒着风雨出发了。王震同志走在队伍的前面，亲自指挥部队摸索前进。不久，侦察员在山里找到一位老人，大家立即围了上去，请求他给我们指一条下山的道路。

这老人看上去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王震同志和我一起上前和他握手问好。王震同志亲切地拍了拍老人的肩膀，说：“老人家，我们是当年的红军，是毛泽东领导

的队伍!”

老人指着自己的耳朵，说：“你说么子？我耳背，听不见哪！”但是，从他脸上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多少有些疑虑。

王震同志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老人沉默了半晌，自问自答地小声咕哝说：

“红军？么子红军？当年的红军，不是都走了么？不是都到北边去了么？如今这里只有国军，哪来的么子红军啊……”

王震同志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张毛主席的照片，双手递了过去。老人把照片捧在手里，睁大眼睛看着，看着，眼里忽然闪着光彩，口里喃喃地说：“啊，这是毛主席！唉，一眨眼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冒（没有）福气见到他，如今看到这相片，晓得他还在为我们穷苦百姓打天下，我这就放心了。……”接着，他象打开了话匣子似地告诉我们：他当年当过赤卫队员，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后来红军走了，他只得躲进深山，靠打猎为生。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王震同志说：

“这几天，我一看那么多白狗子开进山来，心里就猜到八九分：山里准是来了我们的队伍。果不其然，是你们来了。你们想出去吗？”

“是呀！”侦察员问，“老大爷，从凉水口能到田庄吗？”

“昨天，白军已到了那里。”老人说。

“还有路能到田庄吗？”

老人摇了摇头。

“老人家，你在这山里多少年，必定能找到一条下山的路！”王震同志无限信任地望着老人。

“路是有一条，”老人想了想说，“十二三岁时我走过一次，又窄又陡，十有八九根本就不算路，不晓得如今还能不能走。离凉水口五里上山，下了山就是大路，白军的么子长官署离那里只有三四里路远，你们敢不敢走啊？……”

“敢走！”王震同志充满信心地说。

老人一听这话很高兴，笑着说：“好，你们跟我来！”说着，迈开大步就朝前走去。

我们跟着那老人走哇，走哇，不知究竟走了多久，前面的山依然一眼望不到尽头。老人说得一点不假，我们走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在部队走过以后，几千只脚终于踩出一条路来。遇到陡坡，大家就手脚一齐着地爬上去；看见深沟，大家就双手紧抱两腿滚下去。谁也不愿意掉队，有病的同志由身体好的同志扶着走，烂脚的同志自己拄着棍子走。带路的老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派几个战士搀着或背着他走。天黑了，队伍走进一片森林，有些战士实在走不动，渐渐掉在后面。我站在路边，竭力给大家鼓劲：“共产党员们，革命战士们，

大家都鼓起勇气来！前进就是胜利，前进就有希望！”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艰难地从地上挣扎起来，大口喘息着说：“政委，我真觉得长征时也没有这样紧张、这样累过！你说得对，只要还有口气，我们就要走到最后一步！”说着，他又一步一步地慢慢向前走去。

王震同志看见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心里十分难过。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走得动的，就跟我走，实在走不动，歇口气再慢慢跟上来！”

我们就这样艰难地走了一个通宵，破晓时分，部队翻过帽子峰，旋即向田庄前进。带路的老人在这里和我们告别。他依依不舍地拉着王震同志的手说：

“我老了。要是由着性子，我真想再跟你们出去扛几年枪！”

我见老人身上衣衫褴褛，马上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塞在老人手里，说：“老人家，留着买件衣服穿吧！”

“你们这样做，是小看我！”老人把银元一下又推了回来。

王震同志笑着说：“你这个老赤卫队员怎么忘记了，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啊！子弟的心意，老人家怎么好推却呢！”

老人听了，顿时热泪盈眶。他一直站在山坡上目送着我们。当部队走了很久，我回过头去，看见他还在山坡上站着，频频地挥手……

凌晨，我先头部队走到一个叫板寮的地方，突然与敌人的一个排哨遭遇。大家蜂拥而上，很快消灭了敌人，并抓住几名俘虏。据俘虏告诉我们，他们是九十师一个团的排哨，这个团昨天才赶到这里；另有两个团刚到南冲，离此只有五里。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决定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王震同志当即率领一部从左面穿出密林，迅速将敌人击溃。我和参谋长朱早观同志率领另一部，用马刀开路进入右面的密林。南冲之敌随后分两路扑来，王震同志一面指挥部队后卫阻击敌人，一面命令部队主力从两路敌军间隙地带向前猛冲。随后，部队又爬过一座山峰，来到大路上。这时，敌军正在我前面不远准备炸桥。我侦察员开枪射击，将敌驱散，并俘获三人。顺利从桥上过河以后，接着翻山又打掉敌人一个排哨。从俘虏口中获悉，田庄守敌为顽六十师。第二支队正准备打仗，王震同志和我赶到前面。经研究，决定从田庄东北方向迂回过去。第二支队从前卫改为后卫，抗击尾追之敌和从田庄出击之敌。他们与进攻的敌人对峙了一天一夜，击退了敌军的无数次冲锋。与此同时，我主力部队已从大森林中绕过田庄，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当太阳升上半空，我军终于在八面山取得了突围的胜利。部队摆脱敌人以后，来到汝城以北的开山一带宿营。这时，山坡下到处炊烟袅袅，营地上又传出一片歌

声笑语。指战员们怀着胜利的喜悦，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蒋介石想把咱们消灭在八面山中，这回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我们这回胜利突围，真得感谢那位老赤卫队员！”

“昨天情况紧急，可惜我们都忘记了问他的名字。”

王恩茂同志插进来说：“老大爷的具体名字我们虽然没问，但是有个总名字我们是知道的，这就是‘人民’。同志们，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这支队伍才能无往不胜啊！”

长征故道忆征程

在湖南汝城所属的开山之下，有一个叫淇江陇下的山村。我军在八面山突围以后，就在这里宿营，司令部设在村里的一间小茅屋里。

傍晚时分，我到附近检查部队宿营情况。走到村后，只见一块场坪上盘腿坐着十多名穿黄军衣的国民党军的俘虏。前面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虽然故意撕了领徽肩章，但是从神情举止上，也可以判断出他是个中、下级军官。我司令部的一个青年战士正在向这些俘虏问话。他理直气壮地问那个军官模样的人：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我们和你们一样，是蒋介石

公开承认的抗日部队，我们到湖南来打日本鬼子，你说说，到底错在哪里？到底冒犯了你们的哪一部天条？”

军官模样的人缩成一团，低垂着头，连连小声回答：“不敢，不敢！”

“什么不敢不敢。”我们那个战士很不高兴地说，“你一个当官的，应该懂得我们革命军队的俘虏政策。你心里咋想，嘴里就该咋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是，是是。”军官模样的人答应着，胆量好象大了一些，“兄弟听我们的薛长官……不，兄弟听薛岳说，这一带是我们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绝对不允许他人染指。……”

“笑话！整个抗战期间，日寇一直打到了资兴、酃县、茶陵一带，打到了你们的大门口，试问薛长官为什么不发怒？为什么不去围剿？相反，为什么抗日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到，薛长官就象嗓子眼里卡了刺，非得拔出来才睡得着觉呢？”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薛……薛岳也是受上峰派遣，身不由己。……”

“得了吧！你别尽为你们的薛长官说好话了！蒋介石是个反共头子，他有他一笔账；可你们的薛长官，在反共上也积极、主动得很，算得上是个急先锋呢！”

“不敢，不敢！”

“就拿你来说吧！眼下，你手里的枪被我们缴了，

不得已只得满口‘不敢、不敢’；等到你手里有了枪、你手下有了带枪的兵以后，天晓得，也许你什么都‘敢’呢！……”

“不敢，兄弟不敢！……”

俘虏群中，不知是谁首先嘻嘻笑了一声，接着就爆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

八月二十一日拂晓，我们又从淇江陇出发了。大雾笼罩着山野。前面的队伍走不多远，很快就消失在云雾之中。回头一看，后面的队伍又不断从云雾中钻了出来。走过大屋山和濠头圩，前面就是汝城通往桂东的大道。侦察员报告：左面山上有一小股敌人，看样子是四军九十师的，但他们伪装成乡公所的乡丁。王震同志笑着对侦察员说：“你们索性将计就计：他们伪装乡丁，你们就冒充国军嘛！乡丁归国军管，你们就要他们给你们带路，去追击王震‘匪军’。他们要是不去，马上就露了馅；要是肯去，你们就在路上相机缴掉他们的武器！”侦察员们一听都笑了，立刻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去执行任务。不一会，山上的一连顽军就被我侦察队解除了武装。

由于连日大雨，横在我们面前的汝河涨了水。过河以后不远，部队在绿荫覆盖的山坳里，搜到顽第九战区司令部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大米、食盐堆积成山。这对于多少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们，真象是探险者一下发现了巨大的宝藏一样兴高采烈。部队司令部命令每

人带足三天粮食和三斤盐，最后还剩下很大一部分，我们决定全部分给附近的群众。当老乡们带着箩筐和布袋来分东西时，一个个都不由高兴得眉开眼笑。

第二天，部队经过牛子堂、文子岭、白石坳和欧家洞，从湖南的汝城走进了江西的崇义。一路上，指战员们走得热渴难忍。少数战士累得走不动路，就把身上带的食盐倒在山坡上。王震同志看见了，立即让警卫员用手捧起来，包在一块毛巾里，自己亲自提着走到村里，送给穷苦农民。部队在傅家村宿营以后，我和王恩茂同志抓住这件事，找了几个政治干部开了个会。我们在会上指出：一定要教育战士懂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要象王震同志那样，时刻都惦记着群众。王恩茂同志列举自己看到的事例说：“在白石坳，老百姓看见我们背这么多盐，都羡慕地说，他们好些日子没吃盐了。我们一个战士跟老乡开玩笑说：老表，我们用盐跟你换鸡，好吗？老乡连说：好哇，好哇！我们那个战士连忙说：老表，我是跟你说笑话，我们哪能要你的鸡呢。盐，你就拿去吃吧！这说明老乡们简直把盐当成了宝贝，我们怎么忍心把它扔在路上呢？”我接着说：“恩茂同志说得很对，由于日寇对食盐实行专卖控制，许多穷苦乡亲常常几个月吃不上盐。国民党反动派囤积这么多食盐，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血汗。人民的血汗，革命战士应该格外珍惜！”

部队到傅家村不久天就变了，转瞬下起瓢泼大雨来。我们在这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一份电报，报告我们连日遭到国民党四军、暂二军和四十四军围攻，被迫转入资兴、桂东之间，二十二日已脱离顽优势兵力包围，到达江西境内的丰洲地区。请求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给予指示。

次日上午，雨渐渐停了。部队随即出发，经过皮石、丰明、高溪、王家洞和棉家洞，翻过一座小山，到达崇义县所属的文英圩。

文英圩，多么熟悉的名字！记得在长征时，我们曾到过这里，想不到今天又回到了十年阔别的旧地。十年前，为了北上抗日，我们跟随党中央、毛主席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迈开双脚经过这里走到陕北。十年后，同样为了抗日救国，解放全国人民，我们又从延安迈开双脚走到这里。如果在地图上把我们过去长征和这次南下走过的道路画出来，在广阔的国土上恰是一个四万多华里的大圆圈。

想起那些峥嵘岁月，我心里不禁思绪如潮。十年前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地从眼前掠过。……

记得在长征途中，我在中央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首先在安远、信丰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大庾横渡章水，进到广东北部的南雄、仁化地区，十一月

到达湖南的桂东、汝城一线。这就是我们现在南下所在的地区。十年前，工农红军在这里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再向西越过粤汉铁路，又接连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随即向西推进，直逼广西边境。十一月底，中央红军打破了薛岳、白崇禧、何键等部的围追堵截，渡过湘江，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战略转移中惊慌失措，出发前不作政治动员，出发后又不指明进军方向，加上大批辎重和后方机关的拖累，以致行动犹豫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很快从出发时的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余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才否定了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新领导。从此，红军一改故辙，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奠定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础。

我还记得，在突破敌人的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时候，尽管四面都是国民党军队，但是当地的人民群众却冒着生命危险来迎、送我们。这一带早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创立的湘赣苏区，工农群众都无比热爱自己的军队。乡亲们听说红军要从这里开始长征，纷纷带着草鞋、鸡蛋和米饭团子，等候在村边路口。当他们看到一队队红军从面前走过时，就站在路边不停地喊：“同志，歇歇再走吧！”“同志，喝碗家乡的水呀！”老大爷、老大娘流着眼泪说：“盼着你们快回来啊！”战士们被感

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也不停地向乡亲们挥着手说：“乡亲们，再见了！我们会回来的！”“老人家，多多保重啊！”

……

十年后，我们终于肩负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又回来了。但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片衰败、凄凉的景象。在白石坳，警卫班长又惊又喜地指着一堵矮墙说：“政委，你看！”我抬头一看，只见墙上还模模糊糊地留着一条土红色的标语：“实行分配土地！”我沉思着，对警卫班长说：“这六个字，就是历史见证。它记录着，这里的人民曾经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红军北上以后，还乡团接踵而至。他们凶残地提出：“茅屋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无数参加过或者同情、支持过革命的群众，都遭到了血腥屠杀。反动派除了烧、杀就是抢。他们把能够吃、穿、用的东西，包括小孩的尿布都抢走；带不走的就一概砸烂，剩下的只是家畜、家禽的毛和内脏。他们还丧心病狂地把屎尿故意拉在群众的床上和锅碗里。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打来了，反动派又在“抗日”的招牌下，更加疯狂地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抓丁，派款，搜粮，这些就是他们对付群众的惯伎。现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了，眼看国民党反动派又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疯狂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准备再一次把人民推入全面内战的血海。……

警卫班长见我久久站在矮墙前面不忍离去，不禁感

慨地叹了一口气，说：“一转眼十年了，革命真不容易啊！”

我轻轻点了点头说：“革命，这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去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阶级要取得胜利，不仅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还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你不是学了党的七大文件吗？我们今天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和一千多万自卫军，我们解放区的面积已达到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解放区人口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的革命事业能够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这正是无数先烈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

“政委，革命很快就能在全国取得胜利了吧？”警卫班长激动地问。

“快了。”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走过来，扶正了自己鼻梁上的眼镜，笑着对警卫班长说，“你好好读一读毛主席在七大的闭幕词吧！二十多年来，毛主席一直号召、组织和领导我们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现在，全国人民都觉醒了，行动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愁这两座大山挖不平了！”

文英圩原来设有乡公所和警察局。我军到达后，国民党顽军和警察都跑光了。我们原计划在此至少休息一天，一则设法改善生活，让指战员们换洗一下汗渍发臭

的衣服；二则治疗病员，组织大家打草鞋和调整武器弹药等。但是，我们刚在文英圩落脚，顽四军九十师二七〇团就从上堡经丰洲，尾追到了文英圩，九十师其他各团也跟踪而来。我后卫第二支队节节抗击。到文英圩后，又英勇扼守着城北一带山岗，保护全军安全宿营。这时机枪、步枪和炮弹一起从敌阵上打来，顽军开始逼近我方警戒线。二支队当时只有一排兵力部署在阵地上。顽军气势汹汹，分两路冲上来，很快被我守军打了回去。敌人随后投入了更多兵力，仍分两路向上猛冲。我增援部队适时赶到前沿，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迅速从两翼包抄敌人，机枪不停地吼叫着，手榴弹接连在敌群中开花，火光照红了半个山头，整个山谷都在剧烈震动中颤抖。经过一场激战，我指战员终于将顽军彻底击溃，俘虏顽军数十人。不久，顽第四军一〇二师也从汝城方向直插到文英圩西南，遭到我第一支队的坚决阻击。我军虽然在两边阵地上都打得很好，但从整个战场形势分析，敌人以优势兵力从两面夹击，已使我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决定于当晚一时许退出战斗，继续向粤北挺进。

最近一段时间，王震同志由于过度劳累，腰疼的老病又发作了。我让警卫员硬把他按在一副担架上，让他多少能得到一些休息。当担架从队伍前面经过时，指战员们一下都沉默了。有的战士忍不住小声嘀咕：“情况这样紧张，司令员可不能病倒啊！”卫生部长潘士征同志走

过来说：“大家放心，王司令员是腰疼，没有别的病，不要几天就会好的。”大家听了，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我们从八月中旬进入八面山，八月二十日突破重围，至今已十多天了。在这十多天里，全体指战员都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这些日子，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十数倍于我的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敌人妄图在文英圩、四都圩和田庄一带消灭我们，但是，他们的阴谋计划终于破产了。在文英圩，我们击溃了顽军两个营，把敌人赶到山下。在四都圩，顽军一个团被我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死尸和伤兵随处可见。在田庄，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使顽军始终龟缩在阵地上不敢动作。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打仗，也使我指战员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大家疲乏困倦到了极点。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常常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有的不小心摔进水田里，竟倒在水田里睡着了。在露天宿营时，不少人就在滂沱大雨中呼呼入睡。恶劣的自然条件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白天，红日如火，热气炙人。指战员们一天行军下来，里外衣服都被汗水沤透了，几乎天天都有人中暑晕倒在路上。夜间，毒蚊成群叮咬，许多同志手上和脸上都被咬得红肿一片。其中有的害了伤寒、霍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加之南方天气变化极快，经常上午烈日当空，下午狂风暴雨。大雨之后，山洪暴发，小溪变成洪流，

部队只能徒涉泅渡。走到山上，羊肠小道上泥滑路烂，走不了几步就是一身大汗。王恩茂同志的骡子就是从一处险道上滑到山下摔死的。老饲养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这匹骡子经冬历夏，爬山过河，闯过无数封锁线，经受千难万险，为革命立了大功。如今革命还没成功，骡啊，你怎么就不再尽一份力量呢！……

部队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当地语言不通，又找不到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常常为了询问道路和敌情，费去不少时间。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顽军几万人又从几个方向追了上来，我军也随即出发。部队途经梧桐港、聂都圩，原拟在这里宿营休息，由于反动派造谣威吓，当地群众逃走一空，我们只得继续前进，旋经斗石、长陇和初陂，最后走到沙村。一听“沙村”二字，许多同志顿时活跃起来。大家还记得，一九三四年，我们这支队伍的前身红六军团长征时，曾经经过这里。

一夜大雨，把尾追之敌阻隔在三十里以外，大家少有地睡了一夜好觉。次日拂晓出发，开始进入大庾山区。队伍沿右源河逆流而上，过了三次河，翻越一座大山，到达右源宿营。部队原来计划在此休息一天，但到下午五时许，后卫第二支队报告，尾追之敌已进到沙村，与我警戒部队遭遇发生战斗。我们分析：尾追我之顽军均系湖南、江西驻军，我如进入广东，就已走出其防地，他们可能不会迅速追过大庾岭南。因此，我们决定次日

继续向南，翻过大庾岭，在粤北山区恢复疲劳，治疗伤员，补充粮食和调配武器。

当天，我们收到了中央的一份电报，同时拍发给我广东东江纵队负责人曾生、王作尧、林平等同志：

王、王兼告曾、王、林：

二十二日电悉。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东江纵队一部正北上中，现在何地，望曾、王、林速告，并与二王联络。

中 央

八月二十五日

党中央的指示和我们的计划不谋而合。第二天清早，部队出发。走出右源，就开始攀登大庾岭主峰。这时，天空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转眼间大雨下个不止，而且越下越大。部队就在倾盆大雨中，继续向粤北山区前进。

挥 师 北 上

晨雾迷漫。缕缕的金色阳光，从参天的树林枝头叶隙透射下来。指战员们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沿途人烟稀少，偶而见到几处破败的断垣残壁。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家，遭受国民党政府如狼似虎的苛政

煎逼，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得悉我正向粤北山区进发，慌忙调动第九战区薛岳三个军的兵力，在湘东南的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及赣西南的莲花、永新、遂川、上犹、崇义、大庾等地区，实行围堵和追击；与此同时，又急令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以曲江为中心，在粤北乐昌、仁化、始兴、南雄一带部署重兵对我迎击，企图趁我饥饿疲惫之时，一举围歼在湘赣粤边三角地区内。

我军主力于八月下旬来到湘赣粤边境五岭山区。举目远望，只见山深谷幽，青峰入云，眼前一片郁郁苍苍，景色分外壮丽。为了摆脱尾追的敌人，尽快地和我东江纵队会合，指战员们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饥饿和疲惫，英勇地朝广东方向疾进。部队越过五岭帽子峰，进入粤北南雄县境的北乡后，马上报告党中央：

毛并林平：

一、我们二十六日到达南雄北乡，南雄驻顽一八七师及一八六师一部。

二、顽第四军仍在尾追我们。

三、我们取不得一天休息，无草鞋，甚疲劳，拟直奔罗浮山与林平会合。

王 王

二十六日

王震同志和我当即向部队作了政治动员：我们已胜

利地进入了粤北，要争取一个星期内和东江纵队会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甘心让我们会合的，情况肯定会比我们预料的严重。我们要采取英勇果敢的行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和东江纵队会合的光荣任务。

东江纵队是我党领导下坚持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广州，国民党守军不战自溃。我党领导广东人民，用国民党军队抛弃的武器武装自己，积极活动在惠阳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终于迫使日军退出了惠阳。

一九四一年，他们与东莞、宝安等地的一支游击队联合，正式成立“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广九铁路两侧及珠江三角洲为根据地，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施行减租减息、武装群众的政策，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有效地展开了抗日斗争。

从东江纵队诞生的那天起，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支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消灭而后快。日伪军不断轮番向东江纵队发起进攻，并且把对付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扫荡”、“清剿”等方法，用来对付我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军则声言要“取消”东江纵队的抗日活动，经常

玩弄各种手法，不让东江纵队获得给养，妄图迫使东江纵队在频繁的战斗中得不到休息补充，最后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合围中被消灭。

多年以来，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之所以消灭不了东江纵队，是因为这支队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一面坚持根据地斗争，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扫荡”、“清乡”和夹击；一面则以主力挺进敌后，展开外线作战，主动向敌之交通线出击，对日伪军形成严重威胁，也使国民党顽军失去进攻他们的口实。

八月二十七日，我军越过五岭进入南雄所属的上碓。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严重情况并未消失，不仅后有国民党第九战区顽军薛岳部之追兵，而且前方又发现国民党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一个军的番号，切断了我们与东江纵队会师的道路，对我形成又一次的重兵合围，妄图在这里歼灭我们。

同时，当地环境对我们也很不利。过去，粤北人民为了防范盗匪，多聚村而居，以砖石修建成三四层坚固的碉堡炮楼，用以自卫。部队初到，人民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常常闭寨门，在寨墙上巡逻防守。部队宿不了营，搞不到粮食，行军也不易找到向导，加上当地说客家话，我指战员向群众喊话作宣传，他们也听不懂。我因会讲几句客家话，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几个贫苦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

队，是工农的子弟兵，为抗日救国从陕北到广东来。当群众知道我们就是当年红军的队伍时，眼里都满含着欣喜的泪花，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这样才算搞到了一点粮食。

不久我们收到了东江纵队的电报，知道他们根据中央指示，也进入了南雄、始兴地区。我们都为即将能与久已盼望的兄弟部队会合而欢欣鼓舞。很快我们又进一步了解到，东江纵队的情况也和我们一样困难，他们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目前根本无法提供我们迫切需要的粮食、被服、药品以及休整部队和安置伤病员等方面的条件。

在上碣休息时，部队分头派人向百顺、白云等地购粮。当天下午二时，第二、五支队送来报告：顽九十师已进到牛碣，并向上碣前进。尾追之敌很快和二、五支队的警戒部队发生战斗，枪炮越打越激烈。下午三时，二、五支队开始向百顺方向转移，由第一支队在北面和东北面担负阻击顽九十师的任务，命令他们抗击到天黑以后，再向百顺方向跟进，并相机在百顺附近宿营。二支队从上碣东北撤退后，旋经百顺向分水和黄岭洞方向前进，但在路上又与从始兴方面开来的第七战区顽军遭遇。部队当即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敌人。第五支队奉命向东南古市方向前进，他们向行进方向派出了侦察部队，前进不远就发现顽一八七师正从南雄、

古市方向迎面而来。途中，我侦察队捉获一个从南雄经百顺送信的信差，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密信说：“从南雄至始兴一线，国军已周密布置就绪，待王震部来，即全歼之。”

处于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的紧急情况之下，我军如何摆脱这一不利态势，这是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王震同志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我和王恩茂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出路，要么上山，要么打出去？”

看着他那双劳累过度、充满血丝的眼睛，我心里真为他的身体担忧。他是我们这支部队的指挥员，现在整个部队的重担都在他的身上啊！我想了一下说：“为了保存力量，完成任务，我们还是走小路上山为好。”王恩茂同志也点头同意这个意见。接着，我们又全面分析了整个敌情，发现西北方向还没有被敌人封锁。王震同志亲自询问了一位老农，找到了一条从西北上山的小路。部队必须立即突出重围，但是各支队这时正与前堵后追之敌周旋，一时难以撤离。为了使战斗部队减轻压力，我们决定部队机关和直属之警卫队、参训队和通讯队首先突围。

我们跟随向导从西北方向未被敌人封锁的一条小路上山，很快就进入了茂密的山林。黄昏渐渐来临，夜色转眼笼罩了整个山林，指战员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突然山风四起，雷电在山林上空咆哮，暴雨霎时象天河

决口似地倾泻下来。大家在狂风暴雨中，一个个都淋得浑身透湿，上下没有一丝干缕。大家手牵手地走着，在陡峭泥泞的山道上，不时有人摔跤滑倒，迅速爬起来又跟上队伍。有的同志掉队了，前面的人喊，后面的人催，互相搀扶着前进。最艰苦的是通讯队和机枪手，他们肩扛几十斤重的电台和机枪，和大家一样在悬崖边溜滑的山路上急走着，稍不小心，就会失足跌下深谷。

部队在这不辨方向的漆黑夜里艰难地走了一夜，才走了二十五里路。天色微明的时候，我们又走了二十五里，停在半山处的小山村中休息。这时，后面各支队也接到了司令部通知，按二、五、一支队的顺序，尾随在直属队之后，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部队休息的小山村叫沙坑，只有十几户人家，依山傍水，掩映在一片苍翠的丛林之中。村子里凡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部队。路边、门前、屋檐下、柴堆上，到处都睡着饥饿疲惫的战士。

是继续南进呢，还是调头北返？眼前的严重情况，迫使我们必须作一抉择。

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地图上，王震同志俯身凝视着部队目前所在的位置，手里燃着一支烟卷，久久的沉思着。直到烟蒂烧到手指，他才顺手一扔，说：“政委，这事关系重大。我提议部队军政委员会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好好研究研究。”

“好。”我点了点头说，“让大家全面摆一摆当前的形势、敌情，然后慎重考虑，决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军政委员会成员到齐以后，王震同志在会上首先告诉大家：昨天，我们从电台收到了毛主席由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陪同抵达重庆的消息。毛主席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是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坚持维护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国内和平，防止新的内战爆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接着，会议分析、讨论了当前的敌情。根据侦察，现在我军前方从南雄到始兴一线，已查明有余汉谋两个军的番号，后面湖南薛岳的尾追部队也紧追上来，左翼江西方面也发现敌人正在逼进，周围已有五个军的兵力正向我们合围。仅南雄至始兴公路两侧地区内，敌人就集中配置了第七战区的一六七、一八六、一八七等四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的已和我军靠得很近。整个军事形势对我极为不利，情况十分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湘粤赣边创建根据地和东江纵队会合，其困难远非我们这样一支小部队所能克服。退一步讲，即使我不惜付出代价和东江纵队会合，但在敌强我弱，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不仅东江纵队难以存在，而且对我们这

支南下部队也十分不利。与会者认为，从整个形势分析，日本投降后，时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我们可以利用的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军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对付我军。而我则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粮食供给困难，指战员们极度饥饿疲惫，哪怕是短暂的休整亦不可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以疲惫之师抗击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我之强敌。反之，我军如毅然北返，避开顽军优势兵力，避免内战，配合我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这样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迅速摆脱对我极端不利的局面。据此，会议一致决定立即北返中原，与新四军五师会合。

根据会议的这一决定，我们马上草拟了一份向中央请示的电报：

毛主席并中央：

一、我入湘、粤、赣以来，连续跋山、涉水、战斗、露营、受饿，忍受种种痛苦，一致为达到与我粤军会师。惟此境是顽七、九战区之后方，敌为实现其剿共目的，所有村、镇、乡电话网和特务组织十分严密，使我们行动极为困难。日本投降后，形势根本变化，我在广东五岭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

二、昨（二十八日）顽九十师、一六七师

各一部及地方武装三路合击我于始兴、百顺，我被迫北返。

三、我们对会合广东力量的中央指示，是抱极高热情和决心去执行的，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对我极为不利。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二十天行程可达湘鄂边。

四、群众被迫上碉，部队无粮，所携款项即将用完。我如上山搜粮将脱离群众，而不能给群众实际利益以争取群众。

五、根据我们经验，我广东部队将被迫不能北上，在华南基础地区保存力量，或转入秘密，较为有利。

所呈请示即复。

王 王

八月二十九日

电报拟就，立即交机要参谋送译，并令电台当天发出。

为了迅速摆脱顽军的前堵后追，我们决定当晚即向江西大庾地区行动，并对部队进行了北返的政治动员，提出“走到五师根据地就是胜利”的口号。王震同志还命令部队彻底轻装：砸毁缴获的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和多余的电台，全体指战员只穿一件外衣，王震同志虽然有

病，却把仅有的一床被子也轻装了。

沙坑这个小山村，平时粮食就很困难，现在要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增加当地群众的负担，我们用钱买了少量粮食，合着南瓜、野菜煮熟，分给大家聊以充饥。出发时，我听见身边一个战士问：“今天几号了？”

“八月二十九日”。

我把这个日子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不久，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

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

望着这青翠的重峦，清涓的山溪，我心里默默地诵念：“再见了，广东！再见了，亲爱的东江纵队的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我们满怀无限深情，惜别了广东人民，昂首阔步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北 返 途 中

我军果断地决定挥师北返，一下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如意算盘，他们立刻大叫大嚷：“不可放虎归山！”

除了严令从湘南尾追我们到大庾岭地区之顽第四军、暂二军等继续尾追之外，又慌忙调动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亲率平（江）岳（阳）地区的顽九十九军、七十二军等部在沿途实行堵截和侧击。与此同时，顽第四军之五十师进至遂川左安镇，顽第四军五十九师和三十七军之六十师进至七岭一线拦阻。

在湘赣粤边，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经过内良又回到聂都圩通文英圩的公路上。侦察员侦察到驻聂都圩的国民党军一个团，今天已向文英圩开动。顽军纷传：西边又开来一股约千余人的“匪军”。顽军所说的“匪军”，肯定是我们的友军或兄弟部队。到底是谁呢？我们估计：最大可能是八月初留在湘潭地区开辟工作的第四支队。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以后，我们曾去电命令他们随后跟进，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原来，这支部队确是徐国贤和廖明同志领导的第四支队。他们过了草市以后，由于电台没有电池，就和主力失去了联系。恰巧，在安仁潭湖地区，遇到了主力部队的直属侦察队。原来，直属侦察队比主力提前一天出发，在通过安仁至衡阳的顽军公路封锁线时，也与主力失掉联系。他们一面派人寻找主力，一面返回潭湖一带等待南下的第四支队。这两支队伍会合后，在当地地下党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安（仁）衡（阳）公路，跟踪主力南进。八月三十日，他们进入江西崇义之芦柴。九月一日拂晓时分，尾追之

顾余汉谋所属新二军袭击其驻地。支队警戒部队与之战斗约一小时，掩护全队安全撤出，继续南下。十时许，忽闻西北方向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侦察员报告说，听老乡讲，可能是麟潭方向的枪声。徐国贤、廖明等同志分析，此地附近没有别的部队，枪炮声可能是我主力部队与敌作战。于是断然决定改变南进计划，向枪炮声方向前进。途中，又听沿途脚夫讲：看到穿同样衣服的部队向思顺方向去了。这使他们更加坚信与敌交火的部队即我主力部队。当天下午四时许，他们在顺利到达麟潭后，又进一步了解到，尾追主力之敌距此不远。因此决定紧急行军跟进。当天渡过上犹江，星夜急进。次日拂晓，在快到思顺的大道上，发现路上有排哨哨位和一堆堆柴草余烬，他们判断主力昨夜即在思顺宿营，现已距离自己不远。指战员们的精神为之大振，饥饿、疲劳之感顿时烟消云散。大家怀着急切的心情，继续大步前进。不久便发现了主力的后卫部队。王震同志和我们曾因很久得不到第四支队的消息而担忧焦急，现在听到很快就要和离开主力快一个月的第四支队会合，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也忘记了饥饿，加快脚步迎向自己的亲密战友。

王震同志一面先后派出邹毕兆副参谋长、何家产营长带着队伍去迎接第四支队，一面沿途张贴布告和标语，让他们知道主力北返的消息，并请当地可靠的乡亲分途

送信找他们。部队突破麟潭敌军，随后向思顺进军。第一支队在麟潭迎接到了和第四支队一起行动的我英雄侦察队。九月二日早晨，在上犹地区墩头，王震同志和我听到第四支队回来了，都抑制不住心头高兴。我们坐在一个茶亭里等待着。王震同志从公文皮包里抽出一张白纸，用红蓝铅笔重重地写上“庆祝与四支队会合的胜利！”几个大字，贴在茶亭的前面。行进中的战士们经过这里，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这条显目的标语。

徐国贤、廖明等第四支队同志朝我们跑来了，王震同志和我们欢呼着，大步迎了上去，紧紧地把他们抱住。喜悦和激动的感情禁不住使大家热泪盈眶。第四支队的同志们在离开主力以后，战胜了敌人的堵截追击、封锁围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又和主力会合了。这一事实说明，我们这支经过党的教育和培养，在革命的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钢铁队伍，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垮的。王震同志兴奋地称赞他们说：“四支队的勇士们，你们已经在世界上找不到的中国式的大学里毕业了，考上了‘状元’了，你们是无敌的英雄啊！”

我军自从在百顺摆脱国民党第七、九战区十倍以上的顽军合围以后，几天来都是在大庾岭和诸广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向北急进。从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二日，在这五天中，由于我军的行军速度大大超过顽军，尾追之敌一时都没有追上来，行进前方也未遇到顽正规军的阻

拦，沿途虽有少数当地保安部队阻挠，均被我前卫部队打垮；加上与第四支队会合后，又增强了我军的力量。但是这五天都是在山地行军，每天都要爬几座山，大家脚上穿的鞋子都已磨得不能再穿了。在这人烟稀少的山区，连草鞋都难以买到，很多同志只得赤脚走路。

九月三日五时，部队由上犹的黄沙坑地区出发，迅速向左安圩前进。当前卫第二支队前进到左安圩时，遇上顽第四军五十九师的一个步兵营堵击，顽军已在街口修筑了工事。二支队的指战员们以迅猛的动作，在轻、重机枪掩护下，一举冲进了左安圩，和堵击我军的敌人进行巷战。我第二支队在支队长贺盛桂、政委罗章同志的亲自指挥下，运用各种武器有组织地抵近射击的火力，向敌人展开了勇猛冲锋，很快占领了一些便于发扬火力的房屋，进而运用对敌人实行分割、穿插、包围的战术发动攻击。敌人支持不住，有的向后溃逃，有的钻进房屋。我先头部队紧跟敌人也冲了进去，向敌占据的房屋投掷了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在屋里鬼哭狼号地喊叫：“救命呀，不要打了，我们缴枪呀！”首先解决了敌人一个连。在随后的纵深战斗中，第二支队又把进入左安圩的敌人全部歼灭。战斗很快结束，顽军一个营除打死的和少数逃遁之外，其余全部被我俘获。

敌人被消灭以后，我们军直机关也到达左安圩。按照原定计划，我军当天要在这里宿营。但从审俘中获悉：

被我打败之顽军是从遂川的彭竹开来的先头部队，由于左安圩正处于桂东通往赣州的大道上，顽五十九师后续部队很快就会赶到，他们的任务就是赶来堵截我军。据此，我们决定改变计划，继续前进，改由第一支队担任前卫，旋经枫树墩和牛墩，进抵中坑和原明淹一带宿营。当前卫第一支队进到中坑时，又遇到顽军一个连阻击。一支队二营向顽军发起攻击。二营五连很快就冲进中坑街里，顽军招架不住，惊慌溃逃。我主力就在中坑及其以北地区宿营。这一天我军与顽军打了两仗，翻越三座山，行程九十里，突破了顽敌在赣南对我军堵击的第一道防线。

部队根据侦察报告和当地群众提供的情况，结合俘虏的供述，对当前敌情作了综合分析：判明顽第四军五十九师和三十七军之六十师，正继续向井冈山及其以南地区集结，企图配合尾追我军的顽暂二军和九十师，围歼我军于井冈山以南地区。从地形道路情况看，在向北前进方向上，三十里就是湖南桂东通往江西遂川的公路，顽军正在公路沿线组织重兵堵截。根据这一情况，我军必须利用顽军堵截兵力尚未部署就绪以前，迅速通过桂东至遂川的公路。因此，部队决定一时出发，争取在拂晓前通过公路封锁线。各支队接到命令后，均按规定时间出发。担任前卫的第一支队，前进到丘平遇上顽军一个连。战斗打响后，我一支队趁黑夜向顽军猛烈冲击。

顽军一向害怕和我进行夜战，因而被我军一冲就垮，四散溃逃。我一支队当即占领丘平，并向桂东和遂川方向各派一个连向公路两侧警戒，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公路。拂晓，部队进到牛岗圩，又遇顽第四军五十九师一七五团二营两个连的堵击。顽军发觉四周山头均被我攻占，便在黎明前的一片漆黑之中逃走，我军顺利地通过了桂东到遂川的公路。

我军粉碎顽敌在赣南堵截的第二道封锁线后，进到龟洞休息，顽一七五团又搜集其残部向我骚扰。我军随即向北前进，翻过上洞山到达七岭，又与顽第三十七军六十师一七八团第一营遭遇。我第二支队向敌进攻，一举攻占街头，转眼控制了七岭街之大部。我一支队一营随后赶到，立即参加战斗，日落前将顽军逐出七岭。敌人控制七岭以西一线山头与我军对峙，战斗仍继续进行。这时，王震同志和我一起来到前沿了解战斗情况。我们研究后认为：目前在七岭附近堵击我军的，只是仓促赶来的顽军先头部队，其主力尚未到达，我军当天凌晨一时出发，沿途打了三仗，爬了大小五座山，边打边走了六十里路，连续战斗，十分疲劳，故决定在七岭及其以南就地宿营。着令第五支队担任后卫。不久，尾追我到湖背坳之顽一七八团又与我五支队警戒部队打了起来。为了脱离顽军的堵击，我们决定九月五日从宁冈至永新之间北进。部队二时出发，天亮前通过了顽一七八团之

堵击地区，预计到上七附近地区宿营。

七岭的右边，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大山。一个战士指着那座大山问：“前面那是什么山啊。”

“井冈山！”政治部副主任李立同志兴奋地回答。

一听“井冈山”三个字，我身上猛然滚过一股热流。日夜思念的井冈山啊，今天我又看到了你！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国土地上最早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之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能勾引起我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无限亲切的怀念。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红六军团，就是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和我们有着血肉一般的关系。自从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以后，我们已经离开井冈山十一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井冈山饱经人世沧桑，革命人民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骇人听闻的屠杀和洗劫，他们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钻进了井冈山，人民群众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之下，境遇更加悲惨不幸。“红军打回来了！”的消息，闪电一般在老苏区传开了。当部队来到永新与遂川交界的黄坳时，一群挑盐贩米的乡亲听说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一下就把我们围了起来。他们中很多是妇女，纷纷上来打听他们的亲人的消息。乡亲们虽然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是看见子弟兵光着脚走路，竟心疼得忍不住掉

泪。部队宿营以后，驻地附近的乡亲们除了给我们端茶送水，还连夜赶打出一双双草鞋，送到我们手上。许多人高兴地围着战士们，唱起了老苏区的民歌：

半夜三更出太阳，
我们红军回井冈。
漫山鲜花夹路开，
十里红来百里香。

唱完一个，接着又唱老苏区的少年先锋队歌：

走向前去啊！
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
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

部队从左安圩出发后，三天中打了六仗，增加了不少重伤员，井冈山地区的乡亲们立刻组织了担架队，帮助我们把伤员抬到井冈山中心遂川地区。这些重伤员，在井冈山父老乡亲的关怀爱护下，有计划地分散安置在离开公路和集镇较远的偏僻山村，隐蔽在群众中养伤，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部队的负担，也使伤员们得到了治疗休息的场所。

九月六日，我们从上七岭出发，继续北进，当天行程七十里，进抵湘州、车坳一线相机宿营。走到黄坳时

又发现新的敌情：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又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连日来不断向井冈山增加兵力。顽三十七军从莲花开两个团到大小五井，两天前茨坪和茅坪已各到顽军一个团。我军原拟进到湘州宿营，但在途中获悉，敌人从茨坪开来一个营已到湘州。因此，只得绕道进到车坳一带宿营。

近日天不作美，经常刮风下雨。由于昼夜行军打仗，指战员们大多丢了雨伞，没有丢的也被打坏了，一下雨许多同志就被淋得浑身透湿，加上没有换洗的衣服，唯一办法只得等雨停以后，借着风吹日晒把衣服晾干。因为多雨，道路泥泞难走，许多赤脚走路被磨破脚的同志，伤口经泥水一泡，大多中毒溃烂，患疟疾的病员也日渐增多。而且祸不单行，这些天，由于部队一直在山地行军，卫生部驮药品的骡子连同所驮的药品，大都被摔到山沟里去了。医治伤病员的药品，全靠医务人员随身携带的少量药品。全军各级医务部门所存的药品，已缺乏到极点。尽管如此艰苦，广大指战员都咬紧牙关，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层层堵击，奋勇前进。

国民党顽军眼看其层层堵击均未得逞，便在拿山地区以重兵设防，修筑工事，设置路障，切断交通，企图阻击我军前进。我们为了争取时机，打破顽军的阻击，动员战士们昼夜兼程，迅速前进，比顽军抢先赶到拿山

一线。第五支队这时担任后卫，当他们进入拿山街以后，敌人的前卫连也接着进了街，面对面碰上了。敌连长问他们是哪一部分？支队长苏鳌同志回答说：“老八！”

“哦，第八军来了，辛苦，辛苦！”敌连长误认为他们是国民党第八军，立刻敬礼并和苏鳌同志握手。

苏鳌同志机智地说：“我们前面队伍已经走了，恕不奉陪，后会有期。”一面示意后卫部队快走。

“再见，再见！”敌连长连连说，一面让开了路。

苏鳌同志带着后卫部队从敌人队伍中间穿了过去，就在敌人眼前大摇大摆地走掉了。

部队通过永（新）宁（冈）公路时，恰好与顽三十七军六十师遭遇。我们当机立断，拦腰截断了敌人师部，组织轻、重机枪火力猛烈射击，敌人被我杀伤甚众，敌师部也被我打散，失掉指挥，仓皇逃跑，我军则乘此时机迅速越过公路，在黑夜中冒雨急进。

这次战斗以后，我们估计敌人势必再次调集兵力对我实行堵击，被我击溃的顽六十师，也有可能从后面尾追而来。因此，我们决定改变行军路线，不走正北永新方向，改向西北宁冈的古城方向前进。部队经黄竹岭、泮中到元里宿营，行程一百一十余里，有的夜半二十四时以后才到宿营地，又遇大雨，衣服淋得里外湿透，一夜没有睡觉，极度疲劳。九月八日，部队从曾南地区渡过禾水。两天后，行经高坑一线北进，侦悉顽四十四军

由茶陵开往莲花，莲花也有顽军往茶陵开，拟在茶、莲公路上堵击我们。我军在通过莲、茶交界的界化陇时，我前卫第一支队与从茶陵开往莲花堵击我之敌一搜索排遭遇。我第一支队前卫部队迅速将其歼灭。正在国民党顽军频繁调动时，我军为了赢得时间，不停地快速北进，在敌人赶到之前，迅速通过了莲花之界化陇。

部队由于不停地行军和战斗，有时一天打几仗，经常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大家处于极度饥饿疲惫之中。加之战士多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气候和环境，生疮、肿脚和发疟疾的病员很多。但是，同志们都咬紧牙关，拄着棍子，艰难地跟着队伍前进。苏鳌同志的一双脚板上走得烂了两个洞，不断地向外渗着脓血，他仍一拐一瘸地跟上队伍。李立同志发疟疾时，看见部队出发，马上找了根棍子，挣扎着跟了上去。王震同志也生了胃出血病，当他看到高铁同志病重躺在路上，自己就从担架上爬下来，硬要高铁同志坐上。司令员和大家一样，没有任何雨具，天一下雨，雨水就顺着他那几个月未理的头发、胡须上流下来。他打双赤脚，高卷起裤脚，脚上沾满了泥巴，和大家始终走在一起。领导干部的艰苦奋斗和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行动，给部队树立了榜样。特别令人难忘的是，第二支队五连连长林才千同志受了重伤以后，竟自己护着伤口，紧跟着队伍徒步行进。女战士沈平是南下湖南后参加部队的，在一次夜行军中不慎

跌伤了膝盖，第二天肿得挪脚都困难。她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死也不肯离开部队，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往前走一步。最后走不动就爬，她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跟上了队伍。这些激动人心的英雄行为，鼓舞、激励部队克服艰难困苦，勇敢地冲锋前进。全体指战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对自己的事业怀着必胜的信念，蔑视难以想象的困难，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我们的战斗生活：

一天一顿饭，

两头不见天，

哪条路小走哪条路，

哪里山高往哪里爬，

拖死、饿死国民党军一群大坏蛋！

部队顺利通过萍宜铁路以后，进入湘东北，这一带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维埃区，沿途村庄房屋墙壁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年用土红和石灰水写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彻底实行分配土地！”“武装保卫苏维埃！”等等。人民群众听说当年的红六军团回来了，纷纷提了饭罐给部队送饭，战士们给饭钱，都不肯要。在街上买东西，店铺老板也不肯收钱，说你们就是先前我们这里的红军，你们为老百姓打仗这样辛苦，让我们表表心意吧！老苏区的人民群众和地下党组织对人民军

队的真挚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我军始终遵循党的指示，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调查了解群众情况，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军民之间，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无产阶级情谊。

九月十五日，我们进至湘北浏阳通往江西铜鼓大道上的达浒，在这里堵截的顽九十九军，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封锁渡桥和街口。王震同志眼看顽军气焰如此嚣张，按捺不住胸头怒火，亲自指挥战士们英勇冲杀，强占了桥头。我军有如滚滚巨流，汹涌向前。当天，部队急行军翻越九岭，走了一百多里，深夜以后到达九岭下宿营。次日七时继续出发，在长寿街与嘉义之间渡过汨罗江，进到周方之嘴头和横江。十八日四时继续北进，十二时到达三墩。这时，前后侦察部队同时报告：顽九十二师正向三墩尾追而来，前进方向之梅仙、南江桥都到了敌人。部队因故改道经黎树坳到达上大洲。为了迅速摆脱敌人的堵击和追击，第二天三时出发，继续紧张的急行军，经板江、月田、国清门到茅田宿营，当天走了八十里山路。宿营后，侦察队从通城方向派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湖北通城地区有七十二军十五师等重兵拦阻。”王震同志找到我和王恩茂同志共同研究了敌情和我军行动，大家一致认为：我军如取捷径从通城、崇阳直插长江南岸，可近二百里路程，但是这一地区都是连绵的山区，所有山隘、路卡和要塞都被顽七十二军占领，若走

这条路线必遭顽军围追堵截。尾追我之顽九十九军也已跟踪而来。加之我军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现已疲惫不堪。为了摆脱顽军堵截，顺利渡过长江，我们认为上策是在二十日拂晓前突破敌通城至桃林的公路封锁线，跨越粤汉铁路以西，绕道至鄂南根据地的咸宁、鄂城间之大和岭和大吉堂地区，与副司令员郭鹏率领的第三支队会合。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

二十日二时，部队出发，拂晓前顺利通过了顽军设置在通城至桃林的公路封锁线。前面就是粤汉铁路，火车的轰鸣声阵阵传来。部队静悄悄地在夜色掩护下向蒲圻行动。侦察员报告：前方羊楼司西北大小村庄都住满了投降的日军，今晚路过此地前往汉口集中遣返回国。日军发现我们是八路军，非常害怕，以为我们是来缴械受降的，一再解释说他们是被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正准备回国去，请求我们优待。王震同志为了顺利通过铁路，命令参谋和翻译前往日本兵驻地宣传我军对投降日军的政策，并交涉过路。当我们通过日本兵驻的村子时，日本兵向我们立正敬礼。我指战员们英姿飒爽地从日本官兵面前走过，深感中国人民作为胜利者的光荣和骄傲。这一带正处于粤汉铁路两侧，由于遭受日伪军摧残，田地荒芜，人民逃亡，变成了凄凉悲惨的灾区。看到这些情景，我们心里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部队从咸宁向东越过粤汉铁路及咸楠公路，进入鄂

南地区，争取在鄂南大和岭作北渡长江向鄂豫皖边区推进的准备。

与我主力挺进湘赣粤边和北返的同时，原活动于鄂南的我部队及湘北桃花山我杨宗胜部，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一再遭到国民党顽军的进攻，难以继续开展根据地工作。因此，王震同志命令将桃花山之杨宗胜部队北撤，唯张体学和张仲翰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和五师四十团，仍在鄂南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吸引和钳制顽军。这样不仅减轻了顽军对我主力北返的压力，而且可为主力北渡长江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他们的艰苦斗争对配合主力南征和北返，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主力进入鄂南以后，顽七十二军的三十四师和新十三师沿九江至武汉一线，严密封锁了全部长江渡口，顽九十九军的九十二师、九十九师和顽十五师等，也分别从崇阳、咸宁、通山几个方向尾追逼近，妄想最后把我们消灭在鄂南地区。二十三日，我主力在大吉堂与第三支队和四十团会合，果断地取道梁子湖水路，到达殷家店和樊湖之间的渡口，向长江边进发。

我们从大和岭东港坐上小船，顶风冒雨在梁子湖上的芦苇丛中进行。

梁子湖上雨雾蒙蒙，渔帆点点，好一幅美妙的江南图画。我们在湖里遇上一只打鱼的小船，眼见鱼网中鳞光闪闪，大小鱼儿欢蹦乱跳，大家都不禁欢快地笑了。

司令部的司务长一路上看见我们几个领导同志指挥行军作战，个个都熬瘦了，心里很难过，总想搞点东西给首长们补养身体。他看见渔船上刚网起的活鱼，决定买一条给我们改善生活，于是大声招呼打鱼的老信子：“老人家，卖一条鱼给我们，好吗？”

“不卖！”打鱼的老信子冷冷地回答，一面不住地打量我们。

“老人家，我们是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啊！我们公买公卖……”

“啊喏”，没等司务长说完，打鱼的老信子开怀大笑起来，“原来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我更不能卖了。”说着，他从船舱里挑了一条二十来斤的活鱼送了过来。

“老人家，这鱼钱你可得收下啊！”

“钱，我不要，交个朋友嘛！”他笑着把司务长的手往回一挡。

“老人家，鱼钱一定请你收下！”司务长着急地说。

打鱼的老信子推托不掉，只好笑咪咪地道谢：“那就多谢了，哎，真是好队伍啊！”

王震同志见了大鱼，高兴地说：“好极了，今天让我来露一手！”说着，借了船上的灶具，有的生火，有的涮锅，大家一齐动手。王恩茂同志卷起袖子剖鱼，正要把鱼肠扔掉，王震同志忙阻止说：“不要扔了，这时候的鱼，肠子里没有屎，全是油。”王震同志会做菜，尤其会烧鱼。

他亲自掌勺，把鱼烧得又香又好吃，大家一面吃一面啧啧称赞王胡子手艺高。

穿过梁子湖，我们接着乘大帆船渡过长江，到达江北鄂豫皖边区。敌人企图消灭我军的阴谋又一次落空了。王震同志这时心情特别愉快，他立在船头回首向着南岸笑着说：“让那帮国民党的蠢猪们在那里傻等吧，恕我们少陪了！”

过了梁子湖，第五支队在掩护主力渡江时，和追击的敌人打了一仗。在这次阻击战中，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连长刘顺清同志以惊人的勇敢，奋不顾身端起机枪，象巨人一样站立着，向蜂拥而来的顽军扫射。不料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英雄倒下了，他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土地。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至二十七日上午，我们从鄂城一线全军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天险。

重 聚 中 原

我军北渡长江以后，即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报喜。中央很快复电，庆贺南下湘粤赣的人民武装南征北返的胜利：

首道、王震同志并转全体指战员：

申感电悉，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五

师主力会合，甚为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中央军委

九月二十九日

在等待后卫部队渡江时，战士们疲惫得抱着枪躺在大路边，一闭眼就睡着了。王震同志担心后卫部队渡江的安全，轻轻地从战士们身边走过。他一面望着这些可爱的战士，一面摇手要走路的同志们脚步放轻一些，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一会。

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我们终于回到了民主、自由的鄂豫皖边区。同志们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它包含着对自己胜利的欢欣，对牺牲同志的怀念，对万恶敌人的蔑视。王震同志走到一匹低头在路旁吃草的骡子跟前，充满感情地轻轻抚摸着它的脊背。随我们部队南下的骡马，在长途行军作战中，有的精疲力尽倒下了，有的在悬崖陡壁上失蹄坠下山涧摔死了，有的在受伤后适值部队断粮宰杀了，有的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死了，最后只有卫生部剩下这匹骡子，它很听话，服从战士指挥，战士们都很爱护它。王震同志风趣地对大家

说：“应该给这匹骡子授奖，它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恩茂同志感慨地说：“在大牲口中，骡子算最能吃苦耐劳的了，一点不娇气。部队去冬从延安出发时带了那么多骡子，如今只剩下这么一匹。这说明我们面临的艰苦环境，连骡子也经受不住，而我们的干部战士到底挺过来了。”

我轻轻点头说：“单从体力上看，我们当中大概谁也比不过骡子；但是，我们具有崇高的信念，远大的理想，加上无比的聪明智慧，这就使我们能够克服任何人间的困难。”

回想部队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从延安出发迄今，历时将近一年。在此期间，我军在日伪顽军的封锁、围堵与合击中，抢渡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巨流，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罗霄、九岭诸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四条铁路，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各省，跋涉祖国河山一万五千多华里，浴血苦战一百余次，在这样复杂、紧张、艰险的斗争中，部队经受了严酷的锻炼和考验。这是我们这支部队的第二次长征，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光荣而艰巨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

部队根据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敌后分散的隐蔽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指示，挺进敌后英勇奋战，严重打击了盘踞在我华南地区的日伪军，坚决消灭了在湘鄂赣边

勾结日军祸国殃民的反动武装，解救了在日伪顽军残酷统治下的广大人民。我军不畏流血牺牲，维护国土，保卫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团结组织敌后人民，胜利地开辟了鄂南、湘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我军在敌后广大城市和乡村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以及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光辉思想深入人心，使敌后人民看见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曙光，提高了抗日的胜利信心。

我军在南征和北返途中，国民党军无耻地勾结日军对我实行阻击；日本投降后，则倾全力以对付我军。我在北返途中，敌在湘赣粤边调动第九战区全部（六个军）和第七战区一部兵力十万余人对我施行“围剿”合击，以后又在我北返途中层层设防，尾追不舍，意欲置我军于死地。然而，由于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独立、自由，为着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不惜一切牺牲，以坚决的战斗行动回击了敌人，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军在极度艰险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友爱的光荣传统，创造了夜行军一百八十华里的惊人速度，雪地行军三十九天，抢渡长江、湘江和翻越八面山等天险。特别是在八面山

突围后，转战湘赣粤边及北返行动中，连续行军战斗四十二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部队经受着饥饿疲惫的威胁，不得不以生甘薯、生南瓜、生豆角充饥；在荒无人烟的山区，我们甚至整天吃不上饭。由于经常日晒雨淋和露宿，患严重疟疾、痢疾、疥疮、烂脚的同志比比皆是。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模范带头行动，彼此帮助，互相爱护，全军指战员充满胜利信心，始终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和毅力，克服了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物质生活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十月三日，主力在黄安县庙基湾与先行北撤的杨宗胜部会合。久别的战友们遇到一起，大家都互相拥抱着，跳跃着，胜利的欢呼声此伏彼起。当年二月十六日，我军在南渡长江前夕，曾在这里举行新年团拜；今天，全军指战员为了庆贺我们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进入鄂豫皖边区，又在这里举行了一次会师祝捷大会。会上，王震同志要我讲几句话。在热烈的掌声催促下，我走到场地的中央：

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同志们：

为时将近一年的南征北返，现在已经胜利地告一段落。在这一年中，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英勇果敢的行动起了什么作用呢？

这是我们在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时，应当认真总结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这次深入敌后，打击和杀伤了日伪军，减杀了日本侵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气焰，解放了敌后广大人民，创造了湘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日伪顽军的围追堵击，胜利地回到鄂豫皖边区。谁敢相信，象我们这样一支人数不过几千人的孤军，竟敢在日伪顽军兵力众多、碉堡林立的地区如入无人之境呢？谁敢相信，象我们这样一支人数不过几千人的孤军，竟敢同比我们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各种敌人打了一仗又一仗，并使自己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呢？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次行动是一个壮举，是一个奇迹。这个壮举和奇迹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实现的。铁的事实已经证明，我们这支部队称得上是一支英勇无敌的战斗队。

同志们！我们这次胜利地南征北返，同时又说明我们是一支矢志不渝的探险队。我们深入大江南北广大敌后，具体、深刻地了解了我们民族的敌人怎样残酷屠杀中国同胞，亲眼看见了无数荒芜的田园，焚毁的村镇，凌辱致死的妇女和惨遭屠杀的同胞……敌人的凶残教育

了我们，人民的血泪激励着我们。我们把仇恨化为力量，和万恶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一年，我们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正如毛主席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所作的概括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而在“大后方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句话，就是祸国殃民的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法西斯黑暗统治。

我们这次南征北返，同时又当了宣传队。我们每个人都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以及其他重要文章和宣传材料，向湖南、江西、广东、鄂南等地城乡人民作了广泛的宣传。我们还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敌后、英勇抗战和解放区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自由民主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沦陷区的人民。日寇投降以后，我们又宣传了我党关于在战后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它给江南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和为之奋斗的方向。

同志们！我们的南下抗日斗争在艰苦奋斗中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日本投降以后，中国人民迫切盼望国内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但是美帝国主义

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磨刀霍霍，加紧准备新的内战。作为人民的战士，我们肩上的责任还很重，我们一定不要放松自己的警惕，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我们和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第二次胜利地会合在一起。半年多以前，当我们从延安南下，路经鄂豫皖边区的时候，新四军五师战友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动人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我们两支兄弟部队又在中原重聚，鄂豫皖边区的人民和部队和上次一样，再一次热烈欢迎我们归来。

江北的十月，天气开始转凉，我军指战员这时都还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单裤，换洗的衣服和被子，早已在几次轻装中送给了当地群众。部队渡过长江以后，越往北走，就越感到冷风侵入肌肤。李先念等五师领导同志早已估计到南下支队亟需补充被服。他们一听到我们北渡长江到达黄冈的消息，立即命令五师所有部队一律停发棉衣，把他们自己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首先发给我们。而他们自己却仍然穿着单衣，在料峭寒风中守卫着边区。我们穿上新棉衣，盖上新棉被，全身充满了战友的温暖，革命的情谊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深感李先念同志和五师的战友们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他们自己不穿让给我们穿，自己不吃让给我们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内部，才能具有这样真挚无私的无产阶

级感情。

鄂豫皖边区军民早已得知我们北返。他们天天盼望我们胜利归来。当我们北渡长江不久，胜利的消息很快在鄂豫皖边区传开了。边区军民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地方，都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热烈欢迎南下支队抗日胜利归来！”“辛苦了，南下抗日的同志们！”“热烈庆祝南下抗日支队与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南下抗日支队与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万岁！”边区地方政府还特别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地方组织了供应，村边、路口都设立了茶水站和担架运输站。一队队群众扛着欢迎的大旗，挥舞着彩色的纸旗，高呼着欢迎的口号，吹奏唢呐，敲打锣鼓，鸣放鞭炮，喜气洋洋地欢迎我们。人们还高声唱起广为流传在鄂南和这里的民歌《毛主席派来了一支兵》：

东方太阳红又红，
高山流水响咚咚，
毛主席派来了一支兵，
两岸人民夹道迎。

大田一战敌胆惊，
全歼日寇数百名；
南下开辟根据地，
去会东江纵队亲弟兄。

冲破关山万千重，
打败日伪百万兵；
南征北战立大功，
深入敌后救人民

人人都夸王将军，
个个争着去劳军；
百姓见了八路军，
好象久别见亲人。

五师的战友们把他们的营舍让给我们住，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贴上红对联，窗上贴着红喜字，伙房里准备了锅灶，水缸里挑满了水，灶旁堆着高高的柴禾，肉、鱼、鸡、蛋、蔬菜放满了一屋。

五师兄弟部队和边区政府、群众团体还纷纷派出代表来慰问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封封慰问信，带来了丰盛的慰问品：鱼、肉、麻糖、香烟、肥皂、鞋袜、毛巾……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吃的、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每到一地，慰问队不断地来，一批批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战士们互相打趣说：

“过长江以前，我们只有一身单衣单裤，脚上连双草鞋也没有。可现在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俗话说革命者四海为家，这话一点不假。叫我说，自己的小‘家’可没有革命的大‘家’好啊！”

“既是革命的大‘家’比你那个小‘家’还好，那你就一辈子打光棍，啥时候也不许离开这个大‘家’啊！”

“这有什么！只要革命需要，一辈子不离开也没啥！”

“大家作证：他这话说了可要算数的。日后他要是想讨老婆，谁也别饶了他！”

大家哄地一声都大笑起来。

快到五师驻地礼山县了。路上耸立着松枝扎成的凯旋门，两边张灯结彩，上面书写着两行大字，右边是“南下抗日，日伪悲泣末路至”；左边是“北上重聚，军民欢庆凯旋归”，上面横挂着一排斗大的横批：“胜利归来”。

化了装的文艺宣传队，扮演着踩高跷，撑旱船，舞蚌精和老汉推车等民间文艺节目。锣鼓声、乐曲声和鞭炮声不绝于耳，路旁欢迎的群众不断地高呼着欢迎口号。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等同志，都从司令部赶来欢迎我们，向我们道贺。我们长久地、热烈地握着他们的手，战友们真挚的情谊和盛大欢腾的欢迎场面，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正如战士们所说的：我们回到五师鄂豫皖边区，就象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温暖。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也曾无数次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从没有象这次这样使我们深受感动。每一个指战员

都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保卫边区、保卫人民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制止美蒋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争取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而英勇奋斗，要用更加辉煌的战果来回答五师战友和鄂豫皖边区八百万人民对我们的真挚的革命情谊。

眼前的这一幕幕热情动人的情景，深深地感染着我，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站在我身边的周立波同志，按捺不住心里的感情，眼里噙满了泪花。我忍不住深有所感地说：

“立波啊，你把这些都写出来吧！”

“政委，我是要写的。”周立波同志点了点头，脸上满含着笑容说，“我只担心这一支秃笔，难以深刻地反映出这样生动丰富的斗争生活啊！”

周立波同志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他在入党以前，参加了党领导的文化工作。以后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不久被吸收入党，成为左联的党团领导成员之一，编辑《每周文学》，积极推动革命文学运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立波同志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抗日战争中，他深入八路军抗日前线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作为战地记者，在炮火纷飞中，走遍华北前线，写出了《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散文特写。在这些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本质，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

力量，宣传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一九四二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发表的讲话后，努力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进行创作实践，积极要求参加南下支队，随军南征，深入华南敌后参加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王震同志和我热情地欢迎他，让他在司令部担任秘书。部队南征北战，行程一万五千里，这个文弱书生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在鄂南樊湖，我们派他办报纸，他自己写稿编辑、刻写蜡版，辛勤地日夜工作，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油印的《解放》小报。记得他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守着电台，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记录电文的身影，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份在江南敌后传播延安声音、宣传我党我军方针政策的报纸，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

在湖南的行军途中，部队在一个小山村里宿营，天下着倾盆大雨，所有能避雨的地方，大门口、屋檐下，都挤满了战士，立波同志就在老乡门口的鸡窝边蹲了一夜。一次夜行军中，他跟着机要参谋肖林达同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走着走着，肖林达同志听不到后面他的脚步声，急忙回去找。找了一会，没有看见他，只听见稻田里沙沙作响，走近一看，原来是他丢了眼镜，正在稻

田里到处找眼镜。肖林达同志忙下田去帮他找到眼镜，扶着他走上田埂。部队在八面山突围的那一天，山高路险，风雨交加，战士们饥饿疲惫得连空手走路都走不动了，王震同志下令轻装突围，立波同志把一切都轻装了，唯独舍不得把日记丢掉。这些日记是他沿途蹲在墙根下，靠着石头上，用纤细的字写成的，忠实地记录了南征北返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情景，成为这次英勇战斗历程的珍贵历史纪实。……

十月中旬，部队在黄陂县所属的孙家畈进行了恢复“三五九旅”原名的整编工作，正式撤销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同时与我原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抗日的新四军五师以及由于敌军进攻而从豫西撤出的豫西支队，共同组成中原军区，三五九旅从此加入了中原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序列，保卫军区的西部和北翼。

在日军投降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进一步消灭我党我军，他们使出了各种阴谋诡计，中原地区更是他们的必争之地，我们军民一心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几次进攻，并曾派王震同志去汉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以后，国民党仍处心积虑地妄图消灭我中原地区部队。党中央根据当时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对中原我军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为了彻底揭露美蒋企图违反停战协议消

灭我中原部队的阴谋，五月五日，周恩来同志力促美蒋双方同意派出三人小组赴宣化店观察。在观察过程中，周恩来同志除在谈判桌上尽情揭露了美蒋的内战阴谋外，並及时视察了我中原部队，对我军的胜利转移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和周密的部署，大大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不久，我中原部队即按照中央的意图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胜利地进行了突围战斗。我则根据组织的安排，转移到了另一战场——参加了军事调处的工作，同国民党展开说理斗争的战场。

第七章 在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这块祖国宝地，曾经是日俄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进兵东北，同时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一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发布了向东北进军的战斗命令。冀热辽、晋绥、晋察冀和山东等解放区迅即派出大批部队和干部开往东北。九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同志任书记。到十一月底，开赴东北的部队已达十三万余人，党政干部二万余人，包括二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一百个团架子的干部。

当时蒋介石在东北无一兵一卒，日本投降两个月后，他在美国援助下，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向人民手里来“接收主权”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定停战协议时，蒋介石仍在做抢占东北的迷梦，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当他们进攻遭到我军有力抵抗和沉

重打击后，又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下，蒋介石才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了一个东北停战协议。

军事调处执行小组

自从周恩来同志视察宣化店时决定调我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后，我辗转到了汉口，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从汉口乘飞机到达北京。四月上旬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沈阳成立第二十七执行小组（简称“东北小组”）。开始，东北小组我方负责人饶漱石和李敏然（李立三），下设几个分组，分别由耿飏、张经武、许光达、莫文骅、萧华等同志为我方负责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央决定伍修权同志和我接替了饶、李二人的工作。当时，我党对于和谈和军调处的方针，中央交代得十分明确，为了实现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我党是真诚地力争和谈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同时，对于蒋介石企图通过和谈来争取时间，调集部队以便最终消灭人民力量的险恶用心，我们也是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可以做某些让步，但绝不允许他的阴谋得逞，而且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他。如第一执行小组处理集宁问题，就可窥见军调处工作的一斑。按照国共协议停战命令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二十四点即零点开始生效，国民

党方面的傅作义部队收到了，我晋绥部队却未及时收到，傅部于十二日倾巢出动，乘机强占了我们的集宁。因为蒋介石有密令，要力争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占战略要地。我广大指战员对于蒋介石耍的阴谋十分气愤，硬是把集宁又夺了回来。十八日在归绥的第一小组赶到集宁，向群众了解，老百姓谁也说不清零点确指什么时间，更无从说清零点前后的具体情况。按道理讲，集宁一直在我军手里，国民党部队是提前乘机发起突然袭击抢占去的，我们收复集宁确实是在停战令生效以后。结果，双方各执一词，最后闹到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还是扯不清。东北的各执行小组更是做不成什么事。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的停战，蒋介石坚持不包括东北，他认为他在东北的进攻力量已经准备好了。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受阻，他才同意签订为期七天的“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只过三天，国民党军队又开始向四平、鞍山等地重新发起进攻。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又达成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由于国民党对发起新的进攻没准备好，实际停战延续了四个月。可见蒋介石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就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对待执行小组也是别有企图的。比如四平、营口、本溪小组，三方面早已协议派出，国民党方面为了便于他取得军事上的进展，拖延到四月才派出本溪小组和平四小组。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要求，我们是坚决抵制的。

如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和美方代表借口苏军已撤出长春，即刻要求派小组去，我们则不能同意。根据我的记忆，我在沈阳小组期间只处理过法库县的一次争执，当时在法库地区发生摩擦时，国民党吃了点亏，被我军消灭了一个师，于是就哇哇叫，坚持要求去调查，三方代表的几辆吉普车必须通过双方阵地的前沿，国民党代表要我派人到我方联络。由于我方代表也穿着和国民党军队相同的服装，佩戴同样的军衔，可能发生误会。虽然事先已发了电报，又担心是否已传达到我前沿阵地，于是我们找了当地老乡带路。结果很顺利地就联络好了，三方代表坐的吉普车都开了过去。事后据参谋李荣春说，我军战士们看见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人员很反感，当前沿连队的指导员说明情况后，战士们又反为我们的安全担心，怕我们遭到什么不测。多么好的战士呀！当然，调查的结果仍然是各执一词，不了了之。其实如果大家都有诚意，那么至少发生过争执的地区经三方人员察看，双方据守的地点均已记录在案，哪一方如再推进，就没什么可说了，问题在于国民党自恃力量强大，又有美国撑腰，根本没有停战的诚意。此外，阜新、鞍山、新民、铁岭等地执行小组的情况也差不多。

上边提到战士们对我们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蒋介石历来不讲信义。碍于国内外舆论，他还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加害于我方参加军调处的人员，但还是要利用各种

阴谋手段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的处境是十分恶劣的，行动也极不方便。电报联系也不灵通，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亏。从北京来沈阳时，当大家都到机场后，美国、国民党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同上了飞机，我方代表却只让张经武、许光达、耿飏和我四人上机，其他同志在机场冻了很长时间才作了安排。我们到东北小组以后，我方除我以外还有翻译戚慕光，参谋李荣春，还有译电员、报务员、警卫员等共七八个人。开始时三方人员统一住在沈阳奉天北楼（即沈阳旅社），这座七层楼的旅社是当时全市最高建筑。为了便于监视，又把我方代表单独搬到励志社去住。国民党便衣特务几乎是公开的跟踪，只要看到我们的人一出去就立刻跟着走，相距只有十几米左右。使我们工作很困难。但有些事又必须去办，比如电台的真空管坏了，得派人出去利用各种关系去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几个人一同出去，到外边大家一分散，特务就不知跟谁好了。同志们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我外出时坐美国吉普车，本来前边是正座，但大家总让我坐在后座，以防坏人打冷枪。美方代表很不理解，为什么长官坐在后面，而让下级坐在前面。有一次他们突然把我们的电台连同报务员一起带走了，借口是我们利用联络电台搞他们的情报。其实各方都有自己的电台，这是协商好了的，经我们正式提出抗议后，他们道歉说是下边乱搞的，立即把电台和人员送了回来。

根据我们的保密规定，电台一出问题，译电员马上得销毁密码本子，报务员是不知道密码的，电台虽退了回来，害得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向上级重新要来密码。最严重的事件，是国民党派便衣特务组织一些逃亡地主和本地流氓到我代表驻地捣乱。有一次有许多人围在门前叫喊要中共代表出来，我正好遇到，就毅然走了出去。这些人马上把我围起来了，乱喊乱骂，主要内容无非是诬蔑我们的土地改革。我当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国民党代表有意躲起来不见。我们只好找美方代表。一般说来，美方虽处处偏袒国民党，但在明显没有道理的问题上，也不得不讲点道理。在一般礼节上，他们还是尽量表现出友好的姿态。我记得这个小组的美方代表是诺尔曼中校，当时我是佩带少将军衔，他见到我总是先敬礼。还请我们吃饭，气氛是融洽的。国民党方面的翻译是黄裳，是位作家。他家乡是在解放区，很有礼貌，不断在私下向我们表示友好。总之，美方还比较通情达理。美国飞机来往延安时，也多次为我们带材料、物品和人员，一般都安全无误。林海、沈为士等同志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就是坐的美国飞机，后经长春、北京，安全到达延安的。

国民党方面经常找麻烦，日子久了，大家也就司空见惯不在乎了，照样办我们的事。比如，东北根据地的有关单位经常从哈尔滨给我们送来大量国民党纸币，有时

成麻袋的送来，要我们代购黄金、药品和通信器材等紧缺物资。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国民党特务见我们到某商店买一次东西以后，就威胁这家店主不准再卖给我们。后来我们就尽量避开特务，而且不只到一处去买。他们只能用隐蔽的手段限制和干扰我们，我们就利用合法和协议不够完备的空子来进行我们必要的工作。我们利用在敌占城市居留的机会，可以从各个侧面了解一些有关的军事情报，通过电台报告给我方军事单位负责人。如在街上遇到的国民党军队有几种不同番号，配有何种武器装备，有无大规模调动的迹象，给养情况如何等等。

执行小组唯一有点成效的是国共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由小丰满水电站给沈阳送电的协议。当时，小丰满水电站在我军控制之下。给沈阳送电的线路已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国民党代表郑介民找我提出，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双方各自修好自己控制地区的线路，顺利地实现了给沈阳送电的任务。对此，上海文汇报（徐铸诚是主编）还作了客观的报道。我记得文章里说，“夫妻吵架，不要把锅砸烂”，反映了一般老百姓反对内战的呼声。后来小丰满水电站虽经易手，但谁也没有进行破坏。只是在国民党占领时，曾经切断了向北满解放区的输电线路。

东北执行小组在军调处的本职工作基本上是无事可做的，当时到东北后，给我的最突出的印象是，东北工业是比较发达的。尽管形势十分紧张，我仍然坚信

东北迟早要回到人民手里的。因此，我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尽量了解一些有关工业的情况，增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在沈阳附近看了一些工厂外，当时鞍山钢铁厂已经是闻名中外的钢铁联合企业了。因此，我想到鞍钢去看看。国民党方面不敢公开限制我方代表的行动，他们只是以保证安全为借口，要求我方负责人离开驻地城市时，须由三方代表议定。如按此行事，势必会长期议而不决，因此，最后我决定带上参谋李荣春直接到鞍山去。当时有一个方便条件，我佩带少将军衔外，还挂有一枚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证章。小李佩带的是少尉军衔。我们一走出去，国民党一般的军警特都不敢正眼相看。我们还事先打听好到鞍山火车时间，利用国民党军人乘车不用买票的规定，径直上了火车。跟踪我们的便衣特务却着了慌，因为车站不知他的真实身分，照章办事，无票不得乘车，他在检票口纠缠期间，火车已经开动，“尾巴”甩掉了。我们估计那个特务肯定会向其上司及有关方面打招呼，因此预计到鞍山下车时准有麻烦。果然，车到鞍山站气氛十分紧张，出站口有国民党军队站岗，要查通行证。小李抓住国民党兵怕官的通病，立刻把站岗的骂了几句后说：“这是李将军。”当兵的看惹不起，马上跑回去报告，我们赶紧跳上一辆三轮车一直拉到鞍山执行小组张经武同志的住处。张经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国民党代表交涉我们参观的事以后，对方

虽满口答应，并表示很热情的样子，我们并未放松警惕。我们告诉他第三天乘火车回沈阳，但在第二天我们就悄悄乘一列货车离开鞍山返回了。当我们回到沈阳不到一小时，国民党方面的抗议备忘录就送来了，大意是说：贵代表未经各方协商一致即擅自携同李参谋到了鞍山，贵方的安全我们无法负责云云。如果不是精心安排，倘若在途中被他们以某种借口扣留起来，是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实践证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搞的所谓和谈、停战，已经昭然若揭。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全国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我们虽然积极进行和平谈判，但从未幻想凭借什么协议来达到制止内战的目的。唯一的依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同他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蒋介石发动了全面的内战以后，我们参加东北军事调处执行小组的全体同志就全部搬到了长春小组我方代表伍修权同志处。一九四六年八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根据地工作，并将我

爱人易纪均同志调哈尔滨,由李初黎接任二十七组组长、高铁同志任三十五组组长。

富饶的大地，破碎的山河

关于争取东北的工作方针和部署问题，早在我军进入东北之初，中央就曾多次指示，人民军队进入东北以后，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由于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控制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是国民党用美国的军舰、飞机把大批军队运进东北，从而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二是国民党当局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利用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向苏方施加压力，苏军答应从东北撤退，并将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给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改变了在东北的战略部署。

在山海关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以后，于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及时指示东北局要把“长春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迅速在东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十二月二十四日，少奇同志电示东北局指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据情况的允许去

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因此，他提议，要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而不使全局陷于被动。现在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在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并着重指出：“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当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向东北进攻开始后，我军逐步后撤。东北党政军的领导机关逐次撤离沈阳、本溪，到达抚顺。一九四六年一月初，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抚顺会议后，根据中央的方针，考虑到北满形势比较好，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区都连成一片，东北局决定将指挥机关向北转移。不久就转到梅河口建

立了新的指挥机构。四月二十八日我军进驻哈尔滨，并于五月下旬撤出四平、长春、吉林等地。六月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的进攻达到了顶点，攻占四平、长春、永吉后沿中长路北窜，进抵松花江南岸。当时除北满有比较完整的一块地方外，其他各处都陷于分隔、动乱的困难境地。

我是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到达哈尔滨的，领导上即确定我做财经工作。根据地初创，各方面均未走上正轨，八月，东北局成立了财经方面统一的领导机构——财办处。这时，我们才开始通过实地考察并参考敌伪留下的资料，对东北地区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东北工业相当发达，不仅关内的许多根据地无法与之相比，就全国来讲也是重要的工业基地。据资料记载，在“九·一八”的前一年，东北煤的产量，以抚顺煤矿为中心，年产不过1000万吨。自一九三七年由于敌伪开发了各地的新旧煤矿，到一九四四年增至2653万吨。在发电业方面，一九四一年的发电量为3520万度，到一九四四年又增加到4481万度。在钢铁方面，一九四一年的生铁产量为138.9万吨，较一九三〇年增加了3.5倍。钢铁产量由一九三五年的35.4万吨增为一九四一年的57.6万吨。工作母机的生产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年生产能力达到1300台。生铁和钢的产量由于联合国的轰炸，一九四四年分别减少为118万吨和28万吨。同时酸、碱、纺织工业等，由于原料不足或转产军用品等原因也都从一九

四〇年前后为最高点而开始缩减。总之，敌伪在东北强行工业化的结果，把东北造成为全国的高度工业地带。以一九四三年的产量计算，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的49.5%，发电能力占78.2%，生铁产量占87.7%，钢材产量占93%，水泥产量占66%。据推算，东北工矿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价值的比重，在一九三一年工矿业约占29.4%，农产品约占70.5%，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工矿业则上升为59%，农业为41%。应该指出的是，东北工业发展中的殖民地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落后性与不平衡性。比如一九三九年在日本本土工业中使用原动机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83%，而在东北工业中，一九四〇年只占到39.4%。日本的机械工业一九三九年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2.5%，东北一九四〇年只占到13.5%。同时，在农业方面，虽然在使用机械，化肥和商品化方面较关内为优，但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如一九四三年时各种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一九三五年相比，高粱仅及一九三五年的89.4%，谷子99.1%，玉米88.3%，棉花70.9%。

为此，东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凶残的法西斯暴徒，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抚顺平顶山大惨案。一九三七年后，加紧在东北实行“三光政策”，对东北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反满抗日”的爱国者进行疯

狂的“检举”（即逮捕）。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日伪在“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地区大搞白色恐怖达四个月之久，除射杀武装抗日人员外，还绑架屠杀和平居民，在肇源三江口将十九名和平居民用铁丝串在一起投入冰窖里。在“三肇惨案”中，使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断送了生命。日伪在热河地区制造的白色恐怖更为残酷。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共进行“一齐逮捕”11次，被捕18000余人，其中两千余人惨遭杀害。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普遍建立所谓“集团部落”，到一九三九年共建立13451个。办法是强迫人民离开家园，到指定地点“归屯”居住，迁出的村屯一律烧毁，建成“无人区”，因此受害的达500万人。日寇还在东北大搞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试验，仅在哈尔滨的“第731部队”这座杀人工厂中，至少有3000名中国人被活生生地用于细菌试验而死于非命。日伪还实行所谓“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是给东北人民制造的最深重的灾难之一。东北人民负担着沉重的苛捐杂税，日伪还实行掠夺劳动力的血腥的“劳工”政策，其残暴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大批“劳工”在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折磨中死去，因而在各个役使“劳工”比较集中的煤矿和建筑工程的工地附近，都有埋葬中国工人尸骨的“万人坑”。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日伪残酷统治下的痛苦生活和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反侵略是‘国事犯’，吃

米面是‘经济犯’，说实话是‘思想犯’，不去劳工是‘抗日’，穷难交税算‘反满’，死的是良民，活的都危险，特务是‘好人’，汉奸最得脸，好人难保命，坏蛋死不完。这是什么世界呀，一锤把它砸烂！”

可见，日伪在东北的工业是靠了掠夺性的税收制度来积累资金，靠了残酷的“劳工”制度来获取廉价劳动力而发展起来的。东北工业的发展史也就是东北人民的一部血泪史。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和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过程中，东北工业遭到了普遍的破坏。据东北解放后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共损失各类机器40269件，发电设备1537046瓩等，共计折合美金352815851美元。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毁于战火或散失原因不详者，计有各类机器29369件，发电设备381046瓩，变电设备909873千伏安，车辆2257辆等，共折合135129331美元。

(2) 苏军拆走者，计包括钢铁生产，有色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以及水泥、化工、橡胶生产等各类机器设备9999件，发电设备1148500瓩，变电设备440000千伏安，钢铁材料158300吨，共约合189934947美元。

(3) 国民党搬走的，计各类机器812件，车辆348辆等，共约合899800美元。

(4) 我军移出的，计各类机器89件，发电设备7500瓩，车辆175辆等，共合12151773美元。

另据美国鲍来的调查统计,工业总损失远不止3亿多美元而是8.9亿多美元。日本技术者的调查统计则又高达10亿以上。

因此,我军进入东北初期,富饶的东北还是一片破碎的山河。而我们的家业尚未建立,国民党即开始进攻。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工作,一是招兵买马动员群众参军,一是搞物资为部队提供给养、补给。其它工作尚未着手办理。为了支援前线,被服粮草、枪炮弹药、车辆运输、民工担架、军费开支等等,都要求经济上的支持。但东北是新的解放区,没有什么家底可言,工矿企业遭到破坏尚未恢复。东北人民生活贫困负担能力薄弱,且尚未真正发动起来,部队战斗频繁也无力负担生产任务,因此,财政供给问题从体制上说,只能是分散经营,主要经济来源,只能依靠没收敌伪物资的办法。

我军先头部队进入东北时,在苏军的同意下,打开了日本关东军几个很大的用品仓库,接收了许多武器和装备,还包括大量的服装等各类物资,部队趁机装备了一下。不久苏军担心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部队,临时变卦不准我们再拿了。因此,当时我们的各部队之间,确实存在苦乐不均的情况。

我们刚进入东北,铁道线皆为苏联红军掌握。当国民党进攻,我军撤出沈阳时,接收的部分工厂、仓库及其他物资器材,须立即撤走,从此,后勤军运工作

一直成了后方机关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一九四六年三月间，集中仅有的一些汽车和征用民间大车共抢运出各种机器、材料、器材约折合五十多车皮；服装、布匹、弹药和其他物资计五千辆大车，但仍有大部物资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未能运出。这一教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久各部均有汽车队或大车队成立。东北局亦接收部分铁道，并争取与苏军共管一部分。此后连续撤出长春、安东、通化，均有大量的物资运输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抢运物资约五千车皮。与此同时，支前任务也相当繁重，如支援四平保卫战，自通化一带运往前线各种弹药20列车（约两百余车皮），其中光子弹即达8400余万发。此外还购买和集中运输粮食600万公斤，构筑工事用的木材、铁轨等30车皮。

根据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东北局认为，应把清理没收敌伪的资财，作为解决困难的主要途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暂时的困难，同时也直接有利于打击敌伪残余势力。为此，当时在各省市都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清理的主要对象是敌伪储存或散失在各地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这些物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根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仅吉林市在这期间所清理的物资，总值即达100亿元以上。

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的经济困难，同时更是为了从政治上深入发动群众，东北解放区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开始，

即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的运动，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各地都清算了一批汉奸、恶霸分子。如通化、辑安、柳河、临江、长白、抚松六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开会185次，参加人数达8万人，共获得斗争果实5560余万元，粮食近15万公斤，土地668亩。绝大部分已分配给群众。一九四六年春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彻底实行了二五减租，保证了佃农的土地使用权，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东北局公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问题的指示”，普遍开展了分配日伪土地运动。

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一方面使群众得到了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改善了生活，初步发动了群众，提高了群众觉悟，扩大了党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效地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削弱了城市与农村的封建势力，提高了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打击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但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尚未来得及很好恢复，财政经济和物资供给上的困难局面尚未有好转。各方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乱派税收，滥发纸币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纸币一项就有许多种，除了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券，还有一些地区自己发行的货币，苏联红军也发行有红军券。因此，物价上涨，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市场混乱的现象相当严重。随着军事形势的稳定，逐步有所好转。

东北局领导上，在建立健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同时开始筹建财经工作机构，整顿财政经济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各省市的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以后，东北各地人民代表即曾在沈阳召开一次会议，拟解决建立东北一级的民主政权问题。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向山海关进攻，根据中央关于暂不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便暂时休会。为了会议在以后时机成熟时再行召开，大会推选了林枫、吕正操、张学思、栗又文、白常清、于清原、扎木苏七位代表为主席团，并推选林枫为主席团主席，负责继续筹备开会，并与各省代表保持联系，研究建设东北的计划。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至十一日，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东北工作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和东北的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进攻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的认识。七月七日，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同志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澄清了干部中的混乱思想，明确了斗争任务，为迅速扭转当时东北面临的敌强我弱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接着，根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和扩大会议的指导方针，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在东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于哈尔滨市道里兆麟大街第一中学礼堂隆重开幕。在第一天的预备会上，张学思将军代表筹委会主席团作了会议筹备经过的报告。次日召开大会，由高崇民致开幕词。八月十五日，正是东北人民胜利解放的一周年之际，林枫致了闭幕词。大会胜利结束。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抗日联军代表周保中将军，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的代表彭真及各界代表都先后致了词。七日大会决议，为统一全东北领导，成立最高行政机关，定名为“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以后为了行文方便经第八次行政委员会决议，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起更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

大会选出林枫、吕正操、张学思、周保中、车向忱、邹大鹏、冯仲云、高崇民、万毅、阎宝航、栗又文、刘澜波、唐洪敬、于毅夫、陈先舟、李壮、金光侠、李延禄、关俊彦、宁武、韩幽桐、周琼文、哈丰阿、徐寿轩、朱其文、宋慎德、特木尔巴根等二十七人为行政委员组成行政委员会。根据我党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经行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林枫、张学思、高崇民、车向忱、吕正操、陈先舟、邹大鹏、冯仲云、周保中、栗又文、韩幽桐等十一人为常委。选出林枫为主席，张学思、高崇民为副主席。栗又文为

秘书长。并于十五日宣誓就职，启用关防，执行政务。

根据九月十二日会议通过的“组织大纲”，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设各委员会等直属机构，即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崇民兼，副主任委员魏震五暂代；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云；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车向忱；建设委员会暂由财政委员会兼管；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吕正操，副主任委员陈先舟；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哈丰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邹大鹏；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洋，副处长陈龙；办公厅主任栗又文兼。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开始逐步把各项政府工作建立健全起来。财经工作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统一领导和协调党、政、军各系统的财政经济工作，经东北局讨论同意成立财经委员会，由我和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栗又文、徐林、钟赤兵七人为委员，我任主任、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为副主任，是为党政军民的统一财经的行政权力机关，对外仍称财办处。自此，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进入初创阶段。

财经工作的初创

在财经工作方面，东北同关内的各个根据地的最大的不同，是它有着各地所没有的现代化工业，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特点。因此，

完全照搬陕北等老根据地的工作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对此，富春同志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在陕北，生产是自然经济，原始农业和小手工业，运输靠毛驴，打仗主要是小米加步枪的游击战。东北有了大工业，农业用火犁，运输靠铁路，战争是小米加大炮的运动战。东北局分工是由陈云同志和富春同志负责抓财经工作的，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陈云和富春同志分别担负起南满和西满分局的全面工作。财政经济工作便暂由我们财经委员会具体来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我们首先召开了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上由我传达了关于东北局批准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的意见和组成人员的任命。东北局并同意了我們提出的会议汇报制度。就是：

（1）财经委员会会议：两个星期开会一次。由各处正副处长、各公司正副经理及其他有关人员共约二十人参加。主要是互相交换情报和意见，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问题。

（2）工作会议：A、金融贸易会议，由叶季壮同志召开，星期五下午三时开会。B、财政会议由徐林同志召开，内容包括秋收工作、粮食问题、后勤供给等。主要研究财政工作和部队的供给。C、后勤部下属的会议，包括卫生部、军工部、供给部等，主要是军队系统的有关单位参加。

会上讨论了实业管理的问题。提请有关方面进一步考虑。财经委员会设有工矿处，并正在建立农业处。是否还需建个实业处，尚未考虑成熟。会前我曾同林枫同志商量，实业管理工作是否统一由财政管还是分开。当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管理各项财政经济工作，不得不采取党政军民统一领导的组织形式。同时，为了便于党外人士参加，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更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是否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经建委员会，或者是建设处，实业处统一这方面的领导，下边也可设矿务局、工业局、农林局，或者只分工矿、农林二局。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虑出成熟意见后再提交东北局。

另外，为了打开局面，经东北局批准，计划召开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目的是听取各省的财经工作的汇报并交换情况，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税收问题，现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感到“国家”太多，由哈尔滨到图门要上六次税，手续麻烦，流通不便。但另一方面西满等地则认为他们非收税不成，因为没有财政的统一，就不可能有税收的统一，所以要在会上谋求妥当的解决办法。此外，对外贸易，对内贸易，以及农贷问题、征粮工作，都要在会议上解决。要分头准备好会议文件。参加会议人员议定每省二人，财政厅正副厅长一人。

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

五日正式召开,到二十一日胜利结束。在会上我做了“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李六如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林枫作了“关于政权改造与生产问题”的报告,吕正操、叶季壮也做了有关问题的报告。彭真同志到会,并做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

一月二十一日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我在报告中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和财经委员会议定的原则,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目前环境特点与财经工作方针”。

我首先讲了一下目前东北解放区的基本特点。

“我认为东北解放区是新区,要着重在这‘新’字上看问题,因为它不同于老解放区和游击区。东北解放区又是一个大的解放区,也要着重这‘大’字。因为是大,所以地域广阔,有各种不同情况,即使根据地也包括不少游击区和边缘区。因为新,未经过反复斗争的考验。

“东北地区的另一特点,就是它尚处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运动的环境中。由于土地改革尚未深入,尚未成熟,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的只占60%至70%,正须大力地、普遍地深入和巩固,夹生饭、半生饭必须做熟,否则就经不起考验。比如康平法库,虽已有了一定基础,但仍经不起考验,垮了。所以要认识到,我们工作如果做

不好，就有垮的危险，革命战争也是正在进行之中，敌人尚有强大力量。杜聿明部是蒋介石精华的精华。敌人是在用最大最硬的力量来对付新建的东北解放区。我们还处在敌人的进攻中，不是谈和平建设和生活享受的时候，而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进攻，并准备我们的反攻。因而，我们的财政政策也只能是战时的财政政策，建设也要围绕着战争的需要。比如，我们既要建设自己的铁路，也要彻底破坏敌人的铁路。

“东北的经济更有其突出的特点。过去我们对东北的认识只是抽象的模糊的富庶。东北确实是富。土地肥沃，工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但这些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该恢复的尚未很好恢复，可开发的尚未开发。东北人民经过敌伪十四年的剥削压榨，已是极度贫困，有些地方十七八的姑娘还没裤子穿，这能说不穷吗？因此东北人民特别穷，负担能力很弱。”

关于财经工作方针，总方针是：“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后方节约，支援前线。”

“第一，要经过对外贸易以解决军需民用中的紧缺物资，并通过贸易积累的资金和换来的物资为本钱，建立财政基础。银行发行工作也应该是投资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过去几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谓财政只是‘抓一把’，以后又靠发票子，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要搞好贸易，要发展生产。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开

辟财源，财政一定要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当时许多单位为了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自己盲目办的企业很多，而且大部分是商业，已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我在会上提出：

“我们要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现在我们的国营经济是否太多了呢？现在各省所办的国营经济是否太多了呢？现在各省所办的国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是必要的。但如果是城市里做商业的垄断，那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说来，私人经济仍应占一定位置，如何发动和组织人民生产，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合作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在这里，我强调的是，为了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私人经济和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合作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执行了这样的正确政策，东北解放区的经济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行财政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并吞’。是由不统一到统一，由紊乱到有计划。大统小不统，上统下不统。银行、铁路、矿山、对外贸易要统一管理。有些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如小规模工厂企业、副业、农业，必须分散经营。统一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便于统一调剂。如南满

缺粮就要设法给他们调剂粮食；辽西地区负担重，又是边缘区，西满就应给以一定的支援。统一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支援主力部队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当然下边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单靠上边调剂。要注意贫富之间的调剂，但不是搞绝对平均，也不可能绝对平均。”

在财经会议的基础上，东北局于三月一日发出《关于一九四七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决定当前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是：“作长期打算，努力发展生产，恢复与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以达到保障供给、支援战争，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争取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与建设根据地之目的。”

“指示”中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要把财经建设当作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实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建立分局与各省委的财经委员会（对外称财政厅），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因此，东北财经工作，集中了党政军民各方的力量，协同努力，共同把工作做好。当时除我们主管财经工作的干部有分工外，彭真亲自抓工业，林枫抓农业。

为了深入贯彻东北局上述指示，东北行政委员会连续发布了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指示和命令。四月十一日“关于目前春耕工作的指示”；三十日发出“农业生产奖励令”；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做出“关于增发辽北辽东农贷的决定”；五月六日发布“东北解放区

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生产节约奖励暂行办法”；十七日发出“关于发展纺织工业问题”的指示。七月，东北财经干部学校成立，于七月七日举行开学典礼。七月十五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布告：为调剂金融市场，便利商旅携币及兑换破损券用，责成东北银行发行少量五百元券，并对各省发行之省钞，与各省会商有效办法予以整顿。

在东北财政经济联席会议以后，为了初步建立财政经济方面比较正常的工作秩序，我们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和支持之下，在开展各项业务和突击紧急任务的同时，也着重注意了组建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建立健全财经工作制度，整顿财经纪律等。这里应该提到的是，由于东北现代化经济比较发达的特点，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更需要较高程度上的集中和统一。

在东北统一政权建立之前，东北局虽已成立了东北银行、东北军区军工部、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东北贸易总公司等单位，并分别由曹菊如、何长工、伍修权、陈云、李富春、吕正操、叶季壮等同志负责和兼管，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无法进行统一的管理，直到中央号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东北的财经工作体制才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开始走上正轨。前边提到的，一九四七年一月召开的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可以说是东北解放区着手建立

财政经济体制的开始。会议前后，预决算制度，对内、对外贸易制度，经济计划制度等逐步进行了制定和完善。一九四七年四月，设置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由我任主任，叶季壮、吕正操、李六如同志任副主任。自此，统一管理东北财经工作才开始由政府出面，不再由东北局直接管理了。

当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敌伪物资已经用尽，货币发行平均每人在1300元以上，已达到饱和，而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仍然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加。当时的战争环境，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包括各省在内，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三以上。为此，我们在大力抓好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家务。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举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记得我进入哈尔滨时，就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为了掌握市场动态，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情况简报。我们管财经的同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搞商业，如当时开办的松花江银行进行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高达一二十万元。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了必要的资金。

为了保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在

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随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正式建立和充实，逐步成立了有关财政和生产管理机构。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通过“组织大纲”，设立组织机构。九月十二日建立了以陈云为主任委员的财政委员会，以吕正操为主任委员、陈先舟为副主任委员的交通委员会，但这时整个财经工作仍然由东北局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正如前边已经提到的，一九四七年四月设置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开始以政府名义管理财经工作以后，到同年九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了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并正式任命了有关的负责人。任命叶季壮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乃德为东北税务局局长，李十中为副局长；史敏为东北粮食总局副局长；张瑞、陈明升为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兴让为东北贸易总局局长，易季湘为第二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曹菊如为东北银行总经理，王企之为副经理；王首道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为副主任委员兼工矿处处长，邵式平为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各个委员会本身的机构也逐步充实健全，如经济委员会所属处（或局）最后发展到将近十个。直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东北行政委员会又正式建立了部的组织，相应的委员会

都改建为部了。有关财经方面的计有：财政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徐林；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陈郁、邵式平、后又增吕东；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五；商业部部长叶季壮（兼），第一副部长王兴，第二副部长易季湘；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余光生；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副部长陈先舟；劳动局局长唐宏经。并增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李富春，后又增洛甫、叶季壮。至此，机构设置算基本完善了。

在这时期我们着重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整顿和逐步统一财政并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第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我把关于整顿财经工作的初步打算向会议作了汇报。这次会议出席的常务委员有高崇民、栗又文、车向忱、陈先舟、冯仲云等同志，叶季壮、汪金洋、王焕文等同志列席了会议。当时我在汇报中主要就财经工作方针和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简单讲了我们在统一整顿财经工作方面准备采取的方法和步骤。

我谈到东北根据地财经工作应采取什么方针时说：根据各根据地的一般建设规律，大体上是先由军事方面打开局面，再发动群众，第三步才是建设问题。东北根据地已初步建成，群众也已初步发动，财经建设这一问题要提到民主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方针，用几句话来说就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障供给，

初步改善人民生活，从长期打算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我们应该大力宣传这个方针。我们开展工作的步骤，第一步实际是用各种应急措施在经济上向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争生存的斗争，比如初到东北采取的没收敌伪资财和发行纸币以解决紧迫的供给问题，以至大力开展对外贸易换取必要的物资问题，都是刻不容缓地为了免除“冻死、饿死”的问题，现在，第二个步骤，就是争取在地方财政自给的基础上实行财政统一的问题，或者叫做大的统一，小的分散，或者叫做统筹调剂。总之，要统一的是对外贸易、金融、银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税收也要统一管理。但目前只能先做到关税统一，产业税先以省为单位求得统一。财经会议决定先要做到一物一税，即只能上一次税，禁止复税，以保障内地顺利流通。粮食如要统一调剂就必须实行统筹。如哈尔滨牡丹江市和南满缺粮，我们要给以调剂。大奸商囤积居奇要禁止，但小商人要允许其进行自由贸易，不得阻碍。要进行调剂就必须要有统一管理。比如现在出口粮食，要以大豆为主，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小麦、大米等细粮则可少许出口，但高粱、小米则绝不准出口，以保证必需的军食民用。第三个步骤，就是必须厉行节约。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工厂尚未开工，东北富源尚未到人民之手，中国整个处在经济危机之中，因此，今天必须经过节衣缩食，紧缩开支，再到丰衣足食。故财

委决定，在经济费、特别费上要紧缩开支，各机关厉行节约，要克服机关庞大，手续繁琐的现象，必须实行精简。

第二个问题，我讲了财政本身实行统一的具体措施。根据财经会议决定，实行统筹分管，财政任务分担。要由东北根据地政府统筹的有粮食，这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二十五；被服，这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五十。大的经济贷款，如农业贷款、水利贷款，要东北行政委员会负责。总司令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兵团归我们负责供给。这任务很大，但也必须供给。而各省份，各大单位要做到自给，比较好的省份要做到伙食费自给，办公杂支自给。地方建设要各省自行筹划，由地方税收、省营企业和部分省营贸易的收入作为经费来源。但地方财政自给要分别各省的不同情况分步做到。首先是划分几个财政单位实行自给，即按西满、北满、东满、南满四个财政单位，在分局领导下，争取本单位统一起来。西满的黑龙江、嫩江两省较有基础，辽北省就需要西满给以调剂补助。把西满剩余的公粮和对外贸易统一起来，我们在被服上再给以补助，可给他们8万套单衣料。工业投资则由他们自给，因为他们财政有基础。北满的松江、合江、牡丹江三个单位的统一，但不要太绝对了，可先做到以省为单位的统一。东满的吉林一省要实行自给，必须加以帮助，粮食一项即需我们补助一万石。南满则

在粮食、经费上都需要给以支援。总之，地方自给也要逐步达到。

第三个问题，我谈了关于金融贸易方面的统一问题。为了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和对内贸易的自由，同时国家要控制粮食和重要的物资。金融问题，首先要稳定东北券，限制地方券并不准再发，并逐步用东北券和实物收回地方券。下一步准备出新版东北券，以清理一下假冒的问题。

此外，对于企业管理也在大的统一小的分散的原则下逐步做到分级管理，如关系到整个经济命脉的如铁路、矿山、电厂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管理，有些公营企业则由省管理。民营企业则要限制，如“老巴夺”“双合盛”等大的企业的垄断行为。对一般中小企业要扶助其自由发展，农村手工业要大力提倡。

为了切实整顿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东北局正式发布了“东北局关于一九四七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其中“关于整理财政问题”一节，讲得非常明确具体：

(1) 整理财政的主要步骤是首先实行以省为单位的财政统一与地方财政自给，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上，逐步实行整个财政统一与合理的调剂。除南满东满实行必要的调剂与补助外，在情况许可、财政工作有基础条件下，则可逐步实行大部统筹，小部自给的财政方针。

即在公粮与对外贸易等几项主要收入统一之后，则可在统一供应标准原则之下，实行公粮与被服的统筹统支。总部所辖的野战兵团及大的经济建设等经费，须由财经办事处统一筹划。各省区党政军民的伙食办公杂费及地方事业与地方费用，则须实行地方自给原则。但地方预决算及收支状况应定期报告上级，以便做通盘的筹划调度与指导。

(2) 从组织上贯彻精简，实行统一编制，是整理财政的必要步骤。必须切实执行东北局关于精简与统一后方领导的决定，按照编制，大量精简勤杂人员转入战斗部队及生产事业，对于无法改造的旧职员，必须坚决地裁减，务使每个机关都有一定的业务，没有一个闲员。

(3) 掌握粮食的统一筹划与各地军食民食的调剂。严格管理公粮，减低食粮供给标准，实行粮票制，严禁任何机关部队开白条子乱支公粮的贪污浪费现象。

(4) 检查与整理所有部队机关学校的资财，实行妥善的登记保管，合理使用，务使变为各单位生产事业的资金。

(5) 实行关税的统一管理与税收政策的统一领导，实行物物一税制，取消各自为政的重复税卡。整理税收工作，在较大的城市应开征营业税，取消机关部队向人民征收和摊派的现象。

(6) 整理村财政、清算村公款，号召人民检举贪

污，反对浪费，民兵不要脱离生产，确定村脱离生产人数及人民负担原则。由政府颁布人民参战勤务条例。

(7) 建立各种财政制度，普遍厉行节约。实行人员马匹的精确统计与预算决算制度。从今年一月份起三个月不报销账目者，停发经费。今后凡虚报人数浮支经费者以贪污论罪，并实行首长负责制。

“指示”中并就“加强财经工作的组织与领导”问题，做出如下具体规定：

(1) 各级党政机关要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要把财经建设当做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实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建立分局与各省的财经委员会，健全各级财政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

(2) 按照行政系统与财政供给单位，规定各系统各单位今年生产节约的具体计划。

(3) 有计划地培养财经干部，加强财经政策的教育，使之能够掌握政策，精通业务，开办训练班，培养从土地改革运动中出来的当地干部，审查与改造旧职员，贯彻精简，提高效能，打破依靠旧职员的错误倾向。

(4) 检讨过去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报纸刊物交流各地生产运动与财经工作的经验。

以上的原则和计划是很切合实际而且是合理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仍很多，因为收上来的财权和财源都涉及到各省的具体利益和具体困难，因此很难一下子收

上来，而我们答应支援地方的经费和物资又往往由于手中缺钱缺物而不能完全兑现。应该说只有通过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我们经济上有了盈余，手里有了大批进口物资，才保证了统一财政工作的比较圆满的实现了，而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还是在总的军事形势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以后才真正实现的。

此外，就是整顿财经纪律的问题，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上一贯是十分重视的，在有关财经工作的任何会议和任何指示和决议之中都无例外地强调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东北地区明显地给人一种富庶的感觉，这种环境助长了某些人的铺张浪费，求阔气讲排场，公开流行的就有所谓“会餐政策”和“用光政策”。他们片面强调丰衣足食，甚至什么“干部保健”、“家属待遇”等等成了某些人的时髦口号。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风气下，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腐蚀，滋生了腐化思想，走向了贪污犯罪的泥坑。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突出强调艰苦奋斗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必须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如果不能建设好根据地，全力支援前线以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那么一切都将是空的，再富庶的地区也不能保证掌握在人民手里。同时，在端正风气的同时强调开展反对贪污腐化斗争的重要意义，奖励埋头苦干克己奉公的财经干部，严惩贪污分子。在东北第一届财经会议，除了表扬了一批表现好的干部外，

并点名批判了北满贸易公司副经理王文的严重贪污行为。同时也公开批评了李镇的假公济私的不良作风，随便拿公家的东西，光自己的警卫员就擅自配备了一大批。对于许多人变相贪污的行为也提出了警告，如利用职权地位接受商人礼物，吃回扣，因而给对方以种种方便和便宜。教育财经工作人员划清界限，开展经济坦白运动，以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加强财经纪律。“东北局关于一九四七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严惩贪污，批判与克服财经贸易系统中官僚主义与享乐腐化的不良倾向与作风，发扬与奖励勤俭朴实、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作风。加强政治教育，建立检查工作的经常制度，以防止贪污浪费的发生。”

开展对外贸易和恢复生产

单靠没收敌伪物资和发行纸币，不是长久之计，只能是应付一时的急需。根本出路还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东北根据地首先面临的是恢复并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做为东北一级财经机关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工作则必须由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去抓。特别是我们的贸易对象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更需要统一对外。

由于东北地区商品化生产已较普遍，不仅城市经济

离不开正常的商品交换，就是农村也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胀死、堵死，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正常生活就难以维持。国民党进犯东北以后，占据了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解放区被分割，国民经济各部门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和必要的器材，尚未恢复正常生产，许多重要物资无法自己解决，如布匹、食盐、火柴、某些药品、汽油和许多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不仅是政府、部队和城市居民需要，农民也要这类生产生活必需品。手中的农产品销不出去，要求的東西就换不进来，一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有的地方民主政府已把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当作“救济问题”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我曾视察过一家被服厂，他们用再生布造的军鞋，用手一掰鞋底就断，穿着这样的鞋子怎么能打仗呢。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必需品是多么重要。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一项基本的原则：在现代化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幻想都是行不通的。要想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障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要，就必须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业品。流通渠道不畅，致使农民手中大量的大豆无有销路，有些地

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不去收割。由于大豆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作燃料。在当时东北解放区的条件下，只有同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而从实际的经济效果来讲，主要是同苏联的贸易。

对苏的贸易，本来早有这个打算，一九四六年苏联因春旱秋涝谷物歉收，需要进口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和十月间，两次向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代表伊克商洽，要求进行贸易，都遭到拒绝。直到十一月份，我们又派刘亚楼同志赴苏联直接与其有关负责人面谈，苏才同意开始谈判。苏方开始只要15万吨，后来突然要求增加到每年100万吨。我方代表叶季壮只答应再给50万吨。苏方又进一步要求每月30万吨。后来我们根据自己的在调集、运输等各种具体可能，最后决定年出口量为100万吨，总值当时市价为1000万万元。主要是用大豆、粮食、肉类换回食盐、布匹和机器零件。对这样巨额的贸易，有些同志产生各种怀疑和议论，可是得到彭真、陈云同志等的积极支持。如陈云同志决定到北朝鲜并去图门、大连等地了解情况，也就是与萧华同志一道去南满的前一天，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亲笔给我、季壮并邵天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于用5000吨麦子，2000吨肉类向苏军管理的大连换取食盐、火车零件、布匹等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

东北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内部分工由我和叶季

壮负责。但是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且难度很大，因此一开始就在东北局的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比如，首先是这么多粮食的运输问题如何组织就是个大难题，为此，东北局专门讨论了四个钟头。一九四七年一月又专门召开了省委书记会议专门部署了购粮工作，各省县区都成立了购粮委员会，派得力干部以加强具体领导。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召开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外贸工作。

当时，第一批粮食已经运交苏方，第一批进口物资约600多吨已经运抵绥芬河，主要货物布、盐和燃料油，还有器材机器零件等。东西虽不多但发生了问题，据说是我方的干部不肯接收，苏方对此很有意见。经过了解，实际上是由于没有经验，很多困难问题没有预先解决。比如油没有桶，盐没有袋，怎么接收呢？于是会议上议定：装盐的布袋、麻袋好解决；装油的桶，由牡丹江、哈尔滨设点收购旧油桶解决。而这些问题如能预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会议决定调配干部加强牡丹江、绥芬河、哈尔滨的外贸工作。

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出口粮食的运输问题。在会上我传达了东北局的有关决定，并根据具体决定的精神讨论了以下的问题。

东北局决定：财办处的中心工作是围绕着运输起卸完成运粮计划。苏方开初只要15万吨粮，后又要求增加

到100万吨，叶季壮答应再给50万吨，因为按运输情况100万吨是不能完成的。而现在苏方要的更急了，因为他们已接到上方命令，每月要30万吨，并即开始运交。数量多少关键不是有没有粮食，而是在运输。运输的首要问题是增加火车头。为此，苏方要求把已经搬到牡丹江的修理火车的机器再搬回哈尔滨，但我们不同意。吕正操说，十二月份可突击修复280台火车。另外，由于经过协商，贸易工作苏方用“秋林公司”面目出现，我们用“东兴公司”名义出现，故此，牡丹江、绥芬河的贸易机关全部更名为“东兴公司”。

运输工作中的第二个问题要煤。鹤岗煤矿原生产能力每天可产4000吨，现因有部分机器正在修理，每天只能产2000吨，决定派刘向三同志出发到各地具体解决煤的问题。

运输中的再一个问题，是为了保证运输任务的完成。根据苏方要求，决定由苏方参加中长路和煤矿的共同管理工作。我为了打通对外贸易、打通运输线，打下长期工作的基础，在经济上不得不和苏方采取合作态度。同时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弱点人家已经看到，比如由东安到牡丹江一段有一千九百多辆车厢装的物资至今尚未卸完，一定要组织力量突击解决。李立三同志已经带刘向三、苏进等同志前去牡丹江全权解决苏方提出的这些问题。

会上并讨论了干部的配备问题。首先绥芬河要有一

个人具体与苏方联系，要事先弄清对方运来什么货物，并能及时将货物分配下去；牡丹江也需要一个人专管转运工作，哈尔滨同样需要这么一个专人。另外，还要两个翻译（绥芬河已经有了一个），要装卸工人。翻译市委答应给我们两个，由丁克坚同志负责去接头。装卸工人据苏方说，哈尔滨有600多名处在半失业状态的人，他们可找到300人给我们。押运工作也需要大批人，东北局已答应由军政大学调三百名毕业生给我们。不过外贸工作需要动手动脚的事多，学生干起来不大合适，我们在具体分配时要注意一下。另外还要设法招收一批小学毕业生来训练一下以应急用。此外还需要兵。贸易总公司需要一个连，决定由淞江军区抽调。

其次是物资准备，光说麻袋，单是北安来电就要108万条。秋林公司有10万条，已给了3万条，我们已发电报向大连购买50万条。为了把粮食及时装运，还要发动各地政府自行想办法，打草袋子也可以考虑。据说淞江省可收集100万条麻袋，要抓紧联系。民生公司还有原料，亦可赶织一批。

运粮的次序决定先运吉北、海拉、三肇的。西满的7万吨，决定由富春同志负责由满洲里直接出口。

最后大家算了一年总账：现有粮食20万吨（其中收购的11万吨，公粮9万吨）。准备在北安再买30万吨，黑龙江买25到30万吨，故年出口100万吨问题不大。如果按苏

方要求，每月30万吨，不仅买不来，装不上，也运不出去。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各省在支援外贸完成购粮任务工作中是尽了全力的。如合江省委在有关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总之，由于上下一致同心协力，顺利完成了外贸任务。当然，它的直接效益是通过出口多余的粮食和肉类换回紧缺的食盐、布匹、燃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保证了东、西、北满各根据地的军需，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许多农民都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称颂“共产党真有办法”。通过外贸除了增加财政收入、积累资金和支援工农业生产外，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支援了同蒋管区的经济斗争，二是有利于加强对整个经济的统一领导。

通过对外贸易，我们进一步理解到现代经济对于商品交流的依赖，从而认识到解放区同犬牙交错的蒋管区政治上处于水火不同的境地，但做为市场经济也是不能完全摆脱相互影响的，因此，必须重视对蒋管区的经济斗争，开展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贸易工作。其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和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有效地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于敌人的经济封锁。

由于对外贸易工作任务重涉及面广，必然牵扯到其他有关工作的相应开展。其中最突出的是燃料问题。运

粮需要火车，火车需要煤，而其他军需民用也必须要一部分煤，既要保证运粮，又要兼顾其他，就必须有一个统筹解决的办法。为此，财经委员会专门做了研究，制定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财经委员会做出了“关于燃料问题的几项决议”。到会的除了我和叶季壮外，还有刘向三、余光生、郭洪涛、张化东、曹洵、刘达等同志。大家一致认为燃料问题已是一个关系到金融、物价、财政、贸易等各方面的问題，铁路局、工矿处与燃料公司应在照顾全局利益同时保障本企业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由燃料公司统一解决燃料的合理分配。根据这一精神当时做出的决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东北财经委员会工矿处所属之鸡西煤矿，在导火索、炸药问题获得解决后，每月应提高产量到9万吨。铁路局所属之鹤岗煤矿，亦须在不增加工人的条件下每月提高产量9万吨以上，在提高产量与运输能力条件下，争取完成城市用煤40万吨的计划。为增加产量，矿山必须的建设费用须适当解决，鸡西煤矿所需经费，除卖煤所得外，不足时可由财办处补助，预算须经财办批准。

(2) 铁路局应乘新运粮任务未到来之前的七、八、九、十四个月份，除鹤岗等矿铁路局自定运输计划外，每月须从鸡西矿区运煤13万吨到燃料公司指定之各城市。

在矿山装煤时保证按时调车不耽误装卸。押运与卸煤由燃料公司负责。

(3) 在东北贸易总公司下组织东北燃料公司，自现在开始，所有哈、齐、北安等城市用煤均由东北燃料公司负责统一计划分配与统一市价拨发各地。工矿处及铁路局非得燃料公司许可不得另外进行煤的买卖。

此外，并决定组织燃料委员会，由张永励、曹洵、黄逸峰、刘向三、刘达、齐齐哈尔与北安市政府各一人等七人组成，以张、曹二人为正副主任。

从当时情况来说，确实解决了问题，同时也带动了某些业务的开展。

在整个财经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应该说是最带根本性的工作了，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紧迫的是解决粮食问题。

东北解放区初期的生产工作，仍是实行农业第一方针。因解放区主要在北满，工业城市较少，而且只有首先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障战争的供给，才能奠定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当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外贸问题，同样是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资本的。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东北局负责人在《论东北一九四七年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而当时土地改革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力组织和发动农业生产正是继

土改后广大农村的基本工作任务。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召开的第一届财经会议上，我所做的关于“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中，根据领导上的指示意图，适当地把农业生产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农业生产是整个生产的主要部分，要求各省委、政府，订出人民的生产计划。今年农民已分到土地，粮食又有销路，生产情绪是很高的，进行大规模生产运动，有很有利的条件。东北土地肥沃，要很好地动员与准备春耕的工作，是有把握的。马赛同志说，阿城可增产一倍，高岗同志认为农业增产可以普遍的提出增产三分之一。

农民已分得土地，生产情绪高。我们的口号：“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提倡吴满有运动，很好地进行宣传组织动员工作。可以普遍提出要求，但要把重心放在安全的地区，肥沃的地区，特别是水稻地。要精耕细作，施肥锄草，农贷要很好的掌握，要注意解决农民的耕牛、种子、农具。

农业生产要特别侧重种水稻，增产细粮。水稻产量高，又可改善我们的生活。其次是纺织原料——亚麻，和试种棉花。

大力提倡副业生产。所谓“半年耕作半年闲”，东北耕种时间短，空闲时间多，特别是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无所事事。冬天可组织打猎、捕鱼，组织运输合作社、副业合作社，提倡畜牧业，喂养马牛羊猪鸡兔等

我认为“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的口号，在当时来说提的还是很适时，很有动员力量的。首先从当时政治形势来讲，在土地改革以后提出劳动致富的口号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及时打消某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虑。有利于使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划清剥削致富和劳动致富的界线。我们反对的只是封建剥削致富，而不是一概反对富。另外根据东北地区寒冷地带，冬闲很长，所以要提倡“四季发财”。东北又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地区，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发展民营工商业，主张贸易自由，因而“四季发财”的口号也有利于鼓励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某些商业性活动。

东北解放区于一九四七年春，及时结合土地改革与支援前线等项任务开展了春耕生产运动。民主政府帮助农民解决和调剂牲口、耕具，组织换工互助，发放大批贷粮、贷款。农民生产情绪非常高涨，一九四七年当年就恢复和扩大耕地面积80万垧（按：每垧合15市亩，等于1公顷）。

尔后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东北根据地领导把重点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上，不仅保证了军需民用，有力地支援了战争，而且为后来接管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后保持物价的稳定，恢复城区人民的正常经济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物资。

工业生产的恢复要比农业生产复杂。就我们领导来

说，农业生产主要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出正确的号召，具体工作实际上都落在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肩上，而工业生产则需要我们财经委直接做具体细致的工作。我们的许多同志，原都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我个人更是这样。因此一到东北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尽量多看一些现代工业。正式到财经战线工作以后，我几乎跑遍了北满的重要工矿单位。记得我到二道河子金矿时，那里的矿井非常简陋，人们只能坐一副柳筐用绳子吊着下去，而且因流砂为害随时有塌方的危险。矿上的负责同志很担心我的安全，一再劝阻，但是我总想下去看个究竟。经过一番努力总算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

我们恢复生产，最初是直觉地从战争供给的需要出发来抓起的。最早是各单位先抓运输工具，建立自己的汽车队。很快就是大家抓军事上急需的被服生产和军火生产。有一个时期，各工厂矿山几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火车间，最多的是手榴弹生产和枪械修理。开展对外贸易后需要火车运输，机车要用煤，生活也要用煤，于是大抓煤矿的恢复和发展。外贸需要黄金做资本，又抓金矿。电力也是生产生活急需的，自然又必须抓电力。因此逐步认识到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必须有节奏地恢复和发展。直到第一届财经会议我的报告中提到工业生产时，还主要是讲的被服和军工生产，这一部分的全文如下：

“工业生产——主要是解决穿衣问题。中央指示：

工业建设须特别注意在山地及比较安全有保障的地区建立各种小规模工厂，并提倡手工业。我们要发展手工业生产及小规模的工厂生产。辽西的方向很好，可以大大提倡，人民自己动手解决自身的困难。同时我们有半数的妇女没有事做，可以提倡纺织，发展棉纺，亚麻可以织布，与发展妇女纺织配合，机器电气化与手工业结合起来。农民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利用，但他不能与机器工业竞争，可采取保护政策。

“军工生产——适应战争之需要，解决弹药为主，特别是手榴弹。一切产品都要求质量要结实耐用，并节省材料。要有计划，实行严格监督检查。鞋子要做得好，美观耐用。

“一切公营事业，一切企业实行核算制度，实行企业化管理。”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时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发动工人群众。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并具体解决工人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企业的主人，生活上有了初步保证，很快提高了觉悟，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当时工人群众对于恢复工业生产是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开始时一年能供给四百斤粮食，一般工人都会欣然接受分配给他的任何工作任务的。

再一件是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当时技术人员很缺，为此我们在北满还接收了200名日本专家。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做好动员，我们许多同志都曾登门到户耐心地向这些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做工作，解决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由于对现代化生产中技术人员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例如有的企业在民主改革中，把一些没有多大恶迹，在工人中尚有一定影响的把头，乃至一般职员也搞了一下，以致影响到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问题。象鹤岗煤矿就曾一度执行了过“左”的政策，致使生产一直恢复不起来。我们派去的副矿长闵一帆同志一直反对这种过“左”的作法，认为只有团结广大职员和技术干部，才能稳定形势恢复生产。我们到那里以后，支持了这位副矿长的意见，生产马上恢复，工人群众也很满意。随着工作的进展，技术人员作用越来越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越来越感到技术力量的不足。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随着许多重要工业区的收复和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各个工业领导机关和工矿企业，已普遍感到技术力量的不足已成为所谓发展工业中遇到的“三缺一怕”中的一“缺”。这一方面反映了技术力量的确实不足，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却把技术力量抓在手里不放，上级要想调用，兄弟单位要求调剂，都非常困难。为此，当我们接管沈阳等大城

市工作中，基本上原封保留了原有的工业管理机构，认真接收和利用了几乎所有的各种技术人员。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团结利用技术人才，一直是东北局领导上十分关心的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专门做出了《中共东北中央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的是采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引导他们前进，引导他们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重视他们在革命中及各种工作中的作用”。并具体规定在各种改造教育和审查工作中，对于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要看他本人在工作中的表现如何而定，凡在工作中表现好者，一律应采取教育继续改造，不要洗刷，给予工作，并在工作中继续考验，如果目前的工作对他不适宜时，可以调动另外的工作。在工作中表现不好者也要分别轻重，批评教育。只有对那些进行破坏活动，反抗土地改革，为国民党作特务活动以及无法争取改造者，才必须加以洗刷。”“对技术专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应争取其继续工作，并根据其技术能力给予适当的优待。他们之中过去某些人曾借伪满势力欺压过工人者，在他们诚恳向工人坦白反省承认错误后，仍应争取其继续工作。对于那些阴谋破坏及为国民党作特务确实有据者，则应分别轻重加以处理”。可见，除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以外，一律应团结争取。

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期间，政府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私人企业尽力解决好劳资关系，凡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解决人民需要的，就给以各种帮助，促其发展。如北安大火磨年加工量可达5万吨小麦。政府即保证其原料，帮助他们维持正常生产，光是税收就可解决全省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东北局关于一九四七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为了逐渐增加对军民工业品之供给，除努力恢复或开办一切可能与必须恢复开办之公营企业，发展家庭副业外，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奖励与扶持私人工厂作坊及手工业生产。这一支很大的生产力量，目前尚在半停滞状态中，政府、贸易机关、公营企业应从各方面扶植并帮助其恢复与发展。在工运中必须坚持一面改善或适当保证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一面又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必须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与团结的基础上注意调节劳资关系，决不应以对待封建地主的办法去对待民族资本家。”到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统计证明，东北各地私营资本一般占到30%以上，比解放前有不少增加。而哈尔滨和安东两市，私人资本则占到83%，公营仅占16%，合作社占0.49%。

经过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根据地的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一定的发展。首先是直接为

战争服务的军火工业，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已先后建立起各种军事工厂有十三处之多。除军工部直属厂外，还有哈尔滨、北安、鹤岗、鸡西、牡丹江、琿春和大连等地的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〇炮、雷管、火药等。其中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是在苏军管制下的大连建立的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对外称“建新公司”。这些军工单位，虽不能简单地算为恢复和发展，但都是在原有工业基础上扩建或改建的。

由于日伪在覆灭前夕对工矿、电力工业的有组织的严重破坏，机器设备不足，技术力量缺乏，使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战局开始稳定，各生产机关开始在佳木斯、鸡西、图门、哈尔滨等安全地带进行恢复建设。如煤的生产，一九四六年鹤岗、鸡西、蛟河、通化、赛马各矿产煤74万吨，一九四七年增加到235万吨，如以一九四六年为100，则一九四七年为317.5；纸以一九四六年为100，则一九四七年为144；橡胶以一九四六年为100，一九四七年为565；纺织品一九四六年为100，一九四七年为196。国营工厂的职工人数则由一九四六年的1.3万人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5万人。

解放区的工业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根据地的迅速巩固和扩

大，党对工业生产的要求，也迅速从解决当前急需的军需民用狭隘范围内摆脱出来，向着有计划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向前进。而党和政府对工业生产建设的领导机构也从整个财政经济统一的领导机构中相对独立出来，成立经济委员会，不久又正式改组为工业部，我也就主要负责工业生产方面的工作了。为了深入了解一下有关全面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问题，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和刘向三、陈康白曾到吉林、通化、临江、西安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回来后于五月十八日向陈云、富春同志写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看来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这个报告主要谈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吉林工业区和电解铜问题。

报告中说道，吉林适于发展化学工业的条件是很好的。“八·一五”以前，日伪在此地设有比较大的电化、液化、造纸、水泥等工厂。其中电化工厂从它的装备和附属设施，如焦炭、石灰、碳化钙、氨化石灰、甲炔等制造装置综合来看，大约可年产5000到10000吨人造橡胶，并可合成酒精、醋酸、丙酮各几千吨，合成树脂、醋酸纤维、人造羊毛各几百吨，还可制造其他少数有机化学产品。这些产品已设有工厂，或仅有实验设备。除人造橡胶的全部重要设备和制造甲炔、酒精的部分重要设备被苏联红军拆走以外，其他各种生产设备虽曾受到相当的破坏，但厂房建筑和主要设备大体还在，所有发

电、给水、运输等附属设备也大体还在。液化工厂的煤焦油工厂和分馏工厂还完整，有关的附属设备，如制氢、脱硫、氢化、压缩、高压反应塔、洗油、精馏、触媒制备等显然是在建造过程中中途停下来的，尚不完备。造纸厂较完整，共有五台长网机，一台已完全装好，一台已大部装好，每台每天可产纸十吨。其余三台的设备大多在露天堆放尚未完全装好，如安装起来，每天最少可出纸50吨。水泥工厂规模很大，但破坏相当严重，电气设备大部分被破坏，只是原料积存的还相当多。以上四个厂，纸厂恢复最容易，电化厂除橡胶外也有希望，水泥厂如补充些设备亦可部分复工，液化工厂因缺设备太多，短期内恐无恢复希望。但总的来看吉林地区有低廉充足的电力，丰满水电站已可发电15万千瓦，如全部恢复最高可发电60万千瓦，有丰富的原料，舒兰的煤，明城子的石灰石，敦化的木材，还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故吉林是发展化学工业的理想地区。上述四厂是日伪在东北的初创化学工业基地，应很好的保存，有计划的恢复利用。根据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已就地决定，立即恢复造纸厂，有步骤地恢复焦炭、碳化钙、氮化石灰、煤焦油、黄磷等的制造，并计划将天宝山的电解铜工厂搬到吉林。这样可以做到电源近，厂房完备，原材料可就地提取，运输方便，和工业联系方便。根据从各方面了解的材料看，在吉林范围内包括含石咀子附

老牛沟(接近夹皮沟)、天宝山三处每年可共产矿石7.8百吨,电解后可得6.7百吨精铜,占目下需要量的60%多。根据日伪矿山钻采的资料,石咀子铜矿埋藏量已确定为15万吨,可采三年,矿山采选设备大体完备,复工不难。老牛沟机电设备虽有破坏,但也争取在三个月内复工。两处每天共计可产矿石300多吨。为解决铜的全部需要量,还必须着手恢复辽南的熊岳城华铜沟铜矿和庄河的芙蓉山铜矿,上半年做出恢复计划。此外,同吉林化学工业有关的是四平的石炭液化工厂,根据我们派去调查的黄伟、吴锦等同志的汇报,该厂设备大体完整,现有液化厂、空气压缩厂、轻油吸收厂、分馏厂、洗油厂、煤气发生炉、脱硫室、反应塔、300吨原油分馏厂、酒精制造厂、修理厂、触煤制造室和给水供电装备俱全,并存有大批备件和修理器材,所有设备的机械部分均经检查并无大的损坏。据说该厂设立的初期是利用西安煤矿的煤进行液化,日处理240吨,以后改用抚顺石炭液化工厂所炼的煤焦油和重油作原料,专制汽油,年产10000吨。从这些情况来看,该厂不难恢复。第一步可利用吉林液化厂所产煤焦油,进行提炼汽油,第二步再恢复石炭液化工作,这样就可以部分解决东北液体燃料的供给问题。

我在报告中说的第二个问题是:通化矿区和生产钢铁问题。

通化矿区的主要矿产,有大栗子、七道沟、二道江、

八道江、老岭的铁矿，铁厂子、砬子、五道江、石人沟、八道江、烟筒沟、松湾的煤矿和大栗子、七道沟、铁厂子的石灰石矿。根据调查材料，铁矿储藏量共约9000多万吨，其中可开采的富矿，仅大栗子一处即达2800万吨，内含锰矿50万吨。煤的储藏量约2.54万吨，其中可供炼焦的约7000万吨。这些矿都经开发过，有贯通全区的铁道运输线、输电线、变电站等设备。并在铁厂子矿区设有炼铁厂，二道江设有发电厂和电气炼钢厂，构成了通化钢铁生产基地的轮廓。大栗子铁矿的采选设备规模相当大，大约年产量可达80万至100万吨，其选矿设备，凡输送、破碎、分离、供料等，机械和手选厂，精矿、粉矿仓库等都十分齐备，其产品分粉矿和25至50筛眼的精矿两种。其他采选运等有关的建筑物、大型机器、矿工宿舍等大部分都在。但修理厂、变电所、矿车、采选材料等因屡经破坏已十不存一，故恢复大量生产尚需相当时日。此外，较大的铁矿应数七道沟，采选设备、变电所、机械厂、化验室等也相当完备。煤矿则以砬子、铁厂子、八道江三处的最适于炼焦，为炼铁提供焦炭不成问题。铁厂子煤矿的对山就是石灰石矿，日伪在当地设有十五吨熔矿炉两座，年产铣铁（即生铁）约1.5万吨。铁厂的碎矿、卷扬、熔炉、热风、除尘、送风、给水、烟筒等设备都很齐全，炉子本身仅缺可以移动的零件如水套、水管、风筒、盛铣桶等，修理配齐即可使用。卷

扬机缺少电滚子及钢丝绳。三个送风机中有一台200马力的机件安好，只缺电滚子，一台100马力的已拆去一半，50马力的机身已破碎。抽水机缺唧筒。以上所缺机件，除200马力电滚、100马力送风机是大设备以外，其他缺件都可就地解决。恢复生产困难不大。当地并有转炉机件四套和洗煤机一部闲置未用，都可修复使用。二道江电气炼钢厂共有5吨电气炼钢炉两座、3吨电炉一座，除后者破坏严重外，其余两座大体完好。该厂附设的变电所尚在，并有一部完好的11000伏特的变压器。耐火砖和铜铁材料随地都是。厂房房顶和门窗都被拆毁、墙壁和高车尚不难修复。鹤岗炼钢厂现有的一套设备绝大部分就是从这里搬去的。如果再搬回来，恢复年产1.5万吨钢材是可以办到的。就是不搬回来也不妨碍该厂的恢复。在电力供给方面，原设有二道江火力发电厂有1.5万千瓦发电机二台，并在二道江、石人、临江三处设有66000、33000、22000伏特的大变电所，分别往大果子沟、烟筒沟、八道江、通化城、铁厂子、五道江、大庙沟等地送电。各处所有小型变电所和线路设施都较完备，没有大的破坏。可惜的是在战争中对二道江电厂本身破坏很大，发电机已无法修复。通化地区煤铁储量丰富，品质也好，是建设钢铁生产的良好基地。日伪曾经根据该地区的矿藏条件推断，每年可产50万吨焦炭，因此决定建设年产30万吨铁的钢铁厂，现在看到的铁厂子的炼铁厂和二

道江的炼钢厂就是他们的试验设备。他们曾将此地铁的生产计划提高为年产70万吨，准备在“双·一五”前两年建成，结果未能实现就投降了。这就是为什么此地铁矿石厂规模很大，而钢铁厂规模很小的原因。我们正可以利用敌人丢下的基础发展自己的钢铁生产。如果单就铁厂子、二道江现有钢铁冶炼设备规模恢复生产，只从大栗子和七道沟的铁矿上拾点残余就可满足需要。所用电力全年不到5千万千瓦小时。但如果要建设生产二三十万到六七十万吨钢铁规模的企业，就必须从钢铁冶炼设备、炼焦、供电、水量、热力、交通等各方面重新计划，投入人力物力。首先必须引来小丰满水电站的电力，方可敷用。辽东财经办事处曾建议在梅河口建立15万或20万变电站，从梅河口到二道江架设高压送电线130公里，以将小丰满电力送到通化，这是一个基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至于如何从鸡西或哈尔滨搬两部发电机，从西安煤矿搬一个锅炉，从吉林、鞍山凑合几台变压器，先求得现有设备的复工，再谈扩大生产规模，这只是个方法问题。我们的方针还是应该向着把通化建成相当规模的钢铁生产基地的方向上去努力。

我在书面报告上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拾破烂、收破烂和保护矿山工厂问题。”

对于保护矿山工厂，党中央曾经适时地来电提起我们注意，东北局和总部也经常指示各方面注意掌握城市

工业政策，并做了部队打开城市即撤离城市的决定，各地党和政府都已开始密切注意这一问题。因此已取得了相当成绩。例如，吉林、四平、阜新的收复，工厂设备就得到了有力的保护。前方部队首长对这一工作已开始进行教育解决。如六纵政委赖传珠最近曾将该纵队从鞍山带出的机器、图表等集中装箱送到东北财经委员会，这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各方面在思想认识上还不够普遍深入，破坏情形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特别是我们在通化看到的情形，是比较严重的。大栗子铁矿的矿山设备，可以搬得动的器材几乎都搞完了。据说最初是总军工部在那里抓了一把，珲春鹤岗还有那边的机器和物资。目前辽东军区军工部的兵工厂仍旧设在大栗厂。他们是用矿车的车轴和车轮做炮弹的零件和炮弹，电车的摩电线、坑下防潮电力线和电滚平角线、机件上的铜板，化成铜锭翻砂做炮弹尾管。高压电线化成铝锭配装零件。至于从机器或建筑物上拆一根轴承，取一根钢管，剥一块铜板，弄一副钢梁，卸一个机件作为武器装配的材料都是任意拆取的。工厂矿山主管人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情况直到我们前来视察时还严重地存在着。这种深入到工厂矿山内部，有组织、有目标、有任务的经常不断地拆毁，比起战争中的破坏和群众的拾取后果是更严重的，如不制止，设备材料再多也会毁完的。如鸡西城子河煤矿在地方机关搞生产的名目下，把电线杆锯下当枕木，电线

化成铜块出卖，高压线化成铝块翻制脸盆、痰盂、碗筷、汤匙，水管暖气包拆下做火炉，大房拆了盖小房，机器拆了拍卖或送人。结果只剩下搬不动的大电滚、大马力机和少数厂房。天宝山铜矿也是在地方机关拾破烂搞生产的题目下，几乎连可以住的房子和砖瓦都拆用光了。开山屯和敦化两大巴尔布制造厂情形相同，吉东分区生产队仍常驻在那里当场拆卖。发生这类事情的地区多半是在解放区内没有人保管和抓紧恢复的企业，相反，新从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地区反而好些。例如四平的石炭液化工厂曾是敌我激烈争夺的目标，经派人去了解，国民党接收后曾派有厂长并复了工，生产了汽油，败退时也未带走什么东西，搞什么破坏，是我们目前接管的现代化工厂中比较完整的一个。西安煤矿也没有什么破坏，不仅很快可以恢复生产，而且该矿发电厂发出的电除满足矿本身用电外，尚可保证四平、梅河口、夹皮沟等处的电力供应。小丰满水电工程，敌人退走也未破坏，只因停电不能抽水，淹了地下室，抽光水很快即可恢复供电。吉林各厂情况也相同。石咀子铜矿国民党接收后进行了整理工作，抽了半年的水，补充了一部分机器，恢复了生产，皮带电机的被破坏反而是收复后我们自己搞的。老牛沟和夹皮沟金矿情况也差不多，也是经我们收复后被我们二十四旅弄得一塌糊涂的。不久前收复的营城子、九台、阜新、辽阳、鞍山等地，敌人占领期间都已

开工生产，敌人败退时也无大的破坏，都是我们收复后自己人去乱抓乱抢了一阵。总之说明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占领期间破坏不大，唯独我们收复后未认真管起来的地方破坏最为严重。但这方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机关部队出于本位主义思想，顺手拿走的一些现成器材，数量虽大但对矿山工厂都不是毁灭性的；而经过机关部队以生产为名，住进去拆毁机器设备当作生产原材料，经过这样毁灭性破坏过的工厂矿山，是根本谈不上恢复生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同志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缺乏对现代化生产认识，以为把机器拆毁做原料就是正常的利用。有的同志是为了眼前的具体生产目标，只好挖肉补疮，杀鸡取蛋，另有一些同志知道城市政策，不敢自己去拆，却以收破烂为名高价收买，实际上是鼓励老百姓去拆。有的则是群众看到机关部队在拆毁工厂，他们也参加拾捡其余，乘机捞一把。甚至把厂房墙里的钢筋、地下的水管都拆走了，如哈尔滨香坊西车站旧兵工厂就是如此。总之，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禁止这种拆破烂、卖破烂、买破烂的败家子气，以坚决保护工厂矿山免遭破坏。当然，上面所提到的情况中有些是军工部门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对于支援战争有一定作用，不能苛责这些同志，但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干了。也犯不着用这样大的代价来搞那样一些小的生产了。同时，对于军工生产

的原材料供应问题也要给以切实的解决，有效的保证。从以上情况就可看出，如何按管现代化生产的科学方法，克服临时观点，使工业生产走上正轨，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经过一段切实的努力，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一九四八年秋后收复南满工业区以前，我解放区的工业以北满为主，其恢复和生产的情况大致如下：钢铁工业以鞍钢为最大，当时是东北对煤，当时是我解放区最大的重工业。北满煤矿曾经日伪有计划的破坏，后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因此，我们的恢复工作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取得的。一九四六年底有鹤岗、鸡西、蛟河三矿，其中仅鹤岗一处尚能比较正常的生产，一九四七年收复西安、通化、赛马三矿，一九四八年则增至九矿，其总产量，一九四六年为74万吨，一九四七年235万吨，一九四八年包括新收复的南满各矿达到546万吨。一般说来北满老解放区各矿的生产已走上正轨，恢复了“八·一五”以来的生产，加强了长期打算的掘进工作，提高了质量，并且培养了干部。电力工业国民党占据小丰满水电站后即切断了北满的电力供应，给解放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及时修复了哈尔滨火力发电和镜泊湖水力发电。一九四七年秋重建了通化发电厂。一九四七年总发电量达到17522万度，一九四八年收复小丰满后即及时修复发电，一九四八年发电量达到41408万度。

金矿：开工的金矿有合江之乌拉嘎、驼腰子、都鲁河、七星河等。黑河、八面通等处“八·一五”后仍由当地工人手工开采，半年后由省政府经营，一九四七年九月全部金矿改为国营，小矿仍由省管。一九四八年各矿职工总数达两万人，管理方法是产品全归个人，政府以实物定价收买。一九四七年总产量4万两，一九四八年达5万两。八面通驼腰子通电后实行部分机器开采。

机械：象样的只有瓦房店滚珠工厂，“八·一五”后由我第四纵队接收做军工配件。一九四七年二次解放后，先由辽南行署实业处接管，改名民占滚珠工厂，后由辽南实业公司接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由工业部接管。此厂当时为我国唯一的滚珠轴承工厂，对工业发展上占重要位置，但收复后一直生产军工产品未进行滚珠的生产。

水泥：一九四八年恢复了哈尔滨水泥厂，年产量达18541吨。

造纸：一九四六年我在安东开工的鸭绿江、六合成、安东造纸厂，生产钞票纸、烟纸、有光纸等，对供给部队及各解放区需要的纸张作用很大。十月安东放弃，造纸厂只余石岫一地。一九四七年六月安东收复，对已经几乎全部毁灭的造纸事业又全部恢复，当年复产。一九四八年春营口、吉林等地纸厂收复，造纸产量乃成倍增长，计：一九四七年产纸2101吨，一九四八年产4053吨。

橡胶：主要有安东的橡胶厂及鹤岗之胶鞋厂，对供

给军鞋起了不小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六年产胶鞋8万双，一九四七年产55万双，一九四八年202万双。

纺织：解放区的纺织业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底之安东及瓦房店纺织厂。一九四六年十月敌占安东、辽南，除瓦房店之15000锭运到大连转到北满外，一九四七年安东辽南收复，又续运18000锭到北满，一九四八年春营口辽阳收复后，将该地纺机移至安东、瓦房店。纺织工业是东北解放区工业重点，一直是大力加以经营。棉纱产量一九四七年达到1818件，一九四八年36797件。

林木：一九四七年度林木产量不足50万立方米，当时主要是由铁路从通化、合江、松江、黑龙江各省运输伪满时旧有木材。一九四七年确定林业国有省营，并成立林业局，一九四八年林木产量达145万立方米。

综合这一时期东北解放区的国营工业特点是：

第一，这一时期首要任务是争取东北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工业建设必须为战争服务，国家的财政必须首先用到战争上去，工业建设还谈不到大规模的恢复和发展，而是为了急需急效，仅限于战争和民用必须进行而又有条件有力量进行的工业。

第二，工矿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沈阳还在敌人手里，若干重要重工业城市虽逐步解放，但还有反复的可能，解放区工业比起国统区来，还只占东北工业的一小部。而且解放区还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物资不能交流，

更增加了解放区工业生产的困难。

第三，虽在战争和困难的条件下，东北解放区的工业建设还是稳步向上发展的，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工业产量逐年增加而且逐步走向正轨。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组织上曾要我以“东北解放区国营工业概况与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做了个汇报。主要谈了当时我们负责管理工业生产的同志，对东北工业的地位和今后发展方向以及当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一些看法，现在看来这些看法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其主要内容概况如下：

一、东北工业的地位及发展条件。

东北的工业资源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都比关内解放区为优，特别是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占着首要的地位。

东北局曾经讨论了工业问题，认为东北有发展工业的基础和便利条件，过去我们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经验。因此决定：“从东北全党来说，应以工业与农业并重，但领导上要更加重视和更好地掌握工业，把工业放在第一位。”

虽然目前以沈阳为中心的主要工业区还未恢复，但我们已经收复了绝大部分矿区和许多中小工商业城市。已恢复的工业产品的总价值虽比农业产品的总价值小，但它对于战争的作用与社会使用价值是很大的。如果把东北全部工业生产恢复并组织起来，将会超过农业

生产的总值。我们有了产业大军，掌握了电力与机器生产，就能创造比同等数量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要大若干倍的劳动价值。掌握了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就能增强我军的技术条件与战斗力。

东北工业建设有许多便利条件，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有丰富的工业资源，而且有许多开采的设备和可供利用的条件与技术条件。过去常说“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其实东北地下的宝藏很多。工业资源差不多应有尽有，而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可以说有四大宝：第一是煤，据现有资料总藏量约200亿吨，占当时已探明的全国储量的三分之一；第二是铁，总藏量约30亿吨，占全国三分之二；第三是木材，森林总面积2100余万垧，木材总蓄积量35亿立方米，占全国四分之三；第四是盐，南满沿海大量产盐，今年完成40万吨，明年可产60万吨以上。此外，各种金属矿，如金、银、铜、铝、锌、锡、钨、锰等；非金属矿，如石墨、云母、石棉、石灰石等，藏量都很多。丰富的农业资源中，南满的棉花、烟草，北满的亚麻，西满的皮毛，都是宝贵的工业原料。

第二是有比较充足的电力设备。我们管理的就有两大水力发电厂和六十二处火力发电厂。虽遭到严重破坏，但重要电站都已恢复，对铁路沿线的城市 and 市镇中都能

送电。解放区现有的发电量已占全东北的77%。

第三是有机械化的条件。东北的工矿业生产主要是电动力的机器生产，现在军工、交通、工矿都已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机器。

第四是有比较发达的交通工业和便利的运输条件。有8千公里的铁路，有海口和内河的航运站，以及普遍的公路。这是东北工业、农业和贸易的发展条件。

第五是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据统计，在职的产业工人已有30余万人。各种技术人员分散在各个系统中也还有相当数量，但还没有很好的使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六是国营工业规模宏伟而且集中，有大规模的矿区和工业区。东北的四大煤矿除抚顺外，西安、鹤岗、阜新均已恢复。东北工业的心脏是沈阳及其附近的工业区，鞍山是全国最大的钢铁中心，号称中国的钢都。此外，大连、安东、营口、锦州等都是工业城市。

目前工业建设的困难，就是我们还处在战争条件下，许多工业经过几次严重的破坏与迁移，南北满铁路交通尚未全通，各种优越条件尚未很好利用起来。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国营与公营（即地方国营）、合作经营、私营工业尚未结合起来，缺乏资金器材和某些原料（如棉花和硫磺）。因此还不能有计划的进行正常生产，还没有把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成有机的整体。

二、一九四八年国营工业计划执行情况。

东北解放区的国营工业，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东北第三次财经会议才决定统一的方针，制定了一九四八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并逐步把煤矿、金矿、电业、林业、纺织、水泥、造纸等较大规模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基本工业实行统一管理经营。总的来看，东北工业是随着战争与人民的需要，在原有敌伪产业残破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奋斗才逐渐恢复、改造或重建起来的，是从分散逐渐走向统一的，是从军工与军事交通工业逐渐注意基本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发展，是从无计划到局部的有计划。现在军事形势发展，基本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要求进一步统一与加强工业管理，要求全面的计划性与管理。

一九四八年的计划大纲，是根据当时情况第一次做的一个粗糙的计划。今年上半年几种主要国营工业执行情况尚好。煤炭原计划总产4百万吨，上半年鹤岗、鸡西、蛟河、西安四大矿已产212万吨，加上南满和其他煤矿共约完成3百万吨，即完成计划的75%。下半年四大矿加上阜新和其他矿可争取再完成4百万吨。即是今年可完成7百万吨，预计明年可实现8百万吨。总之煤矿生产的恢复是很快的，生产效率也有提高。伪满时期全矿人均产量为0.33吨，现在我们鸡西鹤岗已达到0.4到0.5吨。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事故多质量差，主要原因是主观上忽视技术和器材缺乏。今后应努力改进技术，进行正

规化采掘。钢铁，通化的炼铁炼钢正在恢复，今后应以鞍钢为中心，争取明年至少炼钢4万吨。炼铜已开始恢复，吉林、安东的厂矿，明年计划炼精铜1500吨。金矿，合江、龙江、牡丹江、吉林的主要金矿已统一经营，预计可超过原定产金计划。电力，一般工矿及铁路沿线城市都已恢复电力供应，今后除保证安全送电外，并有重点地建立电气材料工厂。林业，今年十月前完成145万立方米。中心是加强冬季作业，准备明年完成250万至300万立方米。纺织，北满原定产军用布70万匹，后改为40万匹，全由东北第一、第二纺织厂完成。南满纺织厂规模较大，南北满共有26万锭子，今后计划全部开工，争取东北地区布匹大部分自给。盐，原定年产30万吨，上半年已完成35万吨，下半年可再完成15万吨。明年预计产60万吨，主要是运销问题。水泥，上半年已恢复哈市水泥厂，下半年要恢复庙岭水泥厂，计划产3万吨，明年可产10万吨。造纸，上半年完成1200吨，下半年可再完成7300吨。明年预计可产1万到1.5万吨。以上工业生产的共同问题是事故多，质量差，不能正常生产，浪费严重，中心原因是没有贯彻企业化管理。

三、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即：一是工业计划问题，东北局已决定全东北和各省市都要制定两年工业生产计划，这需要很好努力。二是资金、原料、材料与技术人员问题。有些同志说，发展工

业生产是“三缺一怕”。就是缺资金，缺原材料，缺技术人员。“怕统”，就是怕把工厂矿山辛苦经营起来后被上边统去了。资金困难是暂时的，需要大家动手筹集，可吸收机关部队的游资，保证给予一定的利润，并吸收私人资本投资工业，例如公私合股经营林业等。解决原材料缺乏的问题，除发展原材料的生产外，还要改变不少单位从本位主义出发，过多地囤积紧缺的原材料的不良现象。技术人员的问题，过去分散使用各抓一部分，不愿交出来统一集中使用，致使很多技术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今后解决专门技术问题或特殊困难的技术问题，必须有计划地集中使用技术专家，要大胆使用旧有的技术人员，提拔技术人员参加企业管理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金待遇。工业部和各工业区都要设立短期的工业技术学校，抓紧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怕统”的问题，主要是不明白我们是统一领导分工经营，实行国营、省管市管县管的计划分工，要全党办工业，自然不应说怕统了。

工业生产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加强工业的科学管理与企业化问题。我们要管好工业，改善经营管理，就是要求达到：“原料足，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好，销路广”的目的，企业化的内容就是要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制定精密的生产计划。因此，要管好工业必须学习业务，对旧的业务知识，旧的规章制度，不能一律否定，

必须加以分析研究，分别情况加以采用或改进，并注意总结经验。应该说，我们过去的工业管理，在恢复生产，发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对于改进技术和提高质量则不重视或重视不够。今后必须注意，既要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就是说，我们须要加强工业部门的政治工作，也要加强经济管理工作，我们不仅要作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且要做无产阶级的企业家。

从战争走向建设

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非常快，根据中共中央“迎接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东北局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五五”决议。决议指出：“东北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很大变化”，“目前东北党正处在一个新形势的面前”，全党的任务就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在此决议之后，我东北野战军在“四保临江”的胜利基础上转入反攻。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即向敌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夏季攻势，收复城市四十二座；九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发动了秋冬攻势，收复城市十五座，我全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接着于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攻克了敌人巩固设防的四平街及收复的其他城市共十八座。至此，敌人基本上只剩下了沈阳、长春等几座孤城和锦州附近一些地方。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我军开始包围长春。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了。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自然也同时给我们带来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城市政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针对我们连续接管许多城市过程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东北局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发出了《中共东北中央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指出：“从去年夏季攻势后，东北许多城市相继为我军收复，蒋军现在困守的几个孤城，亦即将为我军所全部收复。过去在我军游击战争时代，我们基本上是依靠广大农村，占领的城市不但比较少，而且常常不能保住这些城市。所以虽是我们从来即注意城市政策，反对乱抓、乱没收，但在占领城市之后，从城市中有政策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搬运出某些必需的物资，是必要的、正确的，现在形势已经根本变化了，我们不仅占领了很多城市，而且这些已巩固地为人民所有。”“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观点，还以旧的观点来看待城市，那就是错误的了。”指示规定了应遵守的事项。如，对于攻城及入城部队规定：“必须普遍地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进行党的城市政

策、工商业政策的教育”。“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之权”，“可以俘掳的敌方人员，只限于敌方武装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其他一切守法的敌方公务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和警察等，不应加以俘掳和逮捕……”，“可以处理的物资，只限于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对后方党、政、军、民机关亦规定必须注意遵守的事项：“在军事管制时期，除派往新收复城市担任一定工作者外，均不得派人到新收复城市购买物资或做生意”，“各地党委、政府、农会，尤其是该城附近县、区组织，不得进城自行逮捕人犯及没收物资”等。这些指示保证了有秩序地完整地接收新收复城市和迅速恢复工业生产。

到一九四八年秋季，东北解放战争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主席复电林、罗、刘，制定了著名的《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我东北解放大军随即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进行部署。十月十二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辽沈战役开始。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十九日收复长春，二十日辽沈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十月二十七日，东北局决定了军管会人选，并决定抽调四千名新老干部，由陈云同志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二十八日从哈尔滨动身，于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战斗结束的当天即进入了沈阳市。

这次接管大城市，我们工业部的人员差不多都参加了。从哈尔滨坐上汽车一直跑到沈阳，十一月二日我们进去后还可听到零星枪声。进城后我们住在大和旅馆，当时沈阳街上到处是抛下的东西。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原来是坏人把一个炸药库炸了。接着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三天，一座兵工厂被炸了。沈阳车站遭到了一些破坏和抢劫，敌官员住宅和一些小仓库有少数被抢劫，主要是国民党散兵和流氓所为，附近居民也有乘机捞一把的。当时估计市内还有三、五千国民党散兵游勇。大小商店虽未开门营业，但整个接管工作秩序是井然的。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是人心向我，欢迎解放，和“八·一五”后我们到沈阳时已有了十分明显的不同。许多机关工厂的公务人员都能有条不紊保存物资文件等待接收。我们从北满带来参加接收的旧职员表现都很好，忠实努力，勇于负责。再就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和受过我们影响的各种关系的人员，在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号召敌伪人员保护资财等待接收，起了不小作用。总之，全市绝大多数居民均能处变不惊，秩序井然，即使是伪市政府各局长，工厂正副厂长及其他负责人，均能出面办理交代，市商会也答应借粮七十万斤以应急需。当然也有些事先无法估计到的小事须要临时决断，例如，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办法，车辆一律靠左行驶，但沈阳已由国民党政府改为靠右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交通就乱套了。接收工作

头绪本来很多，各机关又纷纷派人前来定房子找办公地点，结果是打不完的交道，直到东北局领导明令后才平静下来。

我们工业部是做为沈阳军管会的经济处，负责接收国民党的四大企业系统，即：原资源委员会、资委会东北电力局、生产管理局、中纺公司。根据陈云同志和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保存了原来各级管理机构，因此接管工作是顺利的。我们找到了一本电话簿即可向有关单位通话，给他们解除些顾虑，布置些注意事项，询问些情况。而且各单位都派有军代表。我们具体接管的有以下单位：

(1) “资委会”所属计二十八个单位，在沈阳的十五个单位，其中有八个是直接生产单位，都是基本工业，是精华。除机车车辆公司由铁道处接收外，其余如机械、冶炼、化学、橡胶各厂均由经济处接收。此外在沈阳外围各地的有十三个单位。其中除鞍山钢铁厂、瓦房店滚珠厂早已解放外，此次由经济处直接接收的有抚顺及烟台煤矿，本溪钢铁公司；与当地政府共同接收的有锦州地区之油厂、酸厂及水泥厂等。资委会系统此次共接收机器设备6042台，动力设备997台，运输设备170台。在沈各厂职工共1782人，内有技术人员47人。接收的各主要工厂的设备状况和生产能力是：

沈阳机器厂：拥有十二个分厂，共300部机器，每月

可生产弹簧29吨，钉21吨，滚珠100个，火车铸件10吨，矿山机器零件3吨，轮轴装配20吨，空气压缩机及火油机2部，低压锅炉60个，暖气片2千片，氧气180瓶。

沈阳制车厂：有机器设备150部，月可产自行车200部。

沈阳冶炼厂：分为冶炼、加工及选矿剂三个部分。各式熔炼炉17座，电解槽8具，各种机器设备600吨。每月可生产电铜60至150吨、电银100到500公斤、金子10至40公斤，每月能加工铜板、铜梗25至80吨。

沈阳化学厂：有四个分厂，包括电解食盐、制油、酒精、肥皂、焊条等部。有电解槽104个，机床35台，蒸气罐4台，蒸气锅9台，碱化釜5台，盐酸合成装置2台，甘油、汽缸油、黄油制造设备各一套。每月最高产量：火碱180吨，漂粉250吨，盐酸180吨，汽罐油120吨，硬黄油150吨，油精10万加仑，肥皂456吨，甘油45吨，硬脂酸100吨，焊条30吨。

沈阳橡胶厂：有四个分厂，共500台机床。每月可产汽车内外胎1500只，传导皮带、运输皮带、三角带及人力车带4000套，胶皮鞋5000双。

(2) “资委会东北电力局”系统。除接收东北电力局及其沈阳分局和在沈阳修理厂材料库、营业所等九个单位外，原沈阳“中央电工器材厂”及抚顺电瓷工厂亦由经济处接收。这一系统此次共接收各种机器设备82

台，动力设备55台，运输设备8台。在沈各单位职工共1351人。内有技术人员107人。电工器材厂分为电线、电机、变压器及电照四部，有机床43台，化玻璃炉3座，每月可产裸铜线与纱包线8000斤，变压器100台，电灯泡5万个。

(3) “生产管理局”系统：国民党时期原从日伪接收东北各城市工厂共1307家，其中在沈阳435家。在沈工厂有案可查已由“生产管理局”处理的为406家，尚差29家无着落。这406家中已被“生产管理局”出售交给其他机关者共是283家，其余为我接受。总共接受机械设备2812台，动力设备630台，运输设备45台。在沈各单位职工1832人，内技术人员49人。这些工厂中以沈阳玻璃厂及东亚烟草公司比较重要。玻璃厂有粗碎机1台，熔解窑1座，熔解平炉1座，自动制瓶机2台。烟草公司有卷烟机33台，最高日产量200箱，现日产50箱。

(4) “中纺公司”系统的有沈阳纺织厂及沈阳染整厂，“生产管理局东北纺织公司”系统的两个纺织厂及染整厂、帆布厂、纤维厂等五个单位。共接收机械设备3556台，动力设备23台，运输设备6台。职工1979人，内技术人员83人。沈阳纺织厂与苏家屯纺织厂共有纱锭46522锭，织机2045台，线锭2400锭。沈阳染整厂有织机258台，染缸16个，干燥机2台，每月可产细布2300匹。沈阳帆布厂有织机130台，线锭3304锭，每月可产帆布2000

匹。

除上述四大企业系统外，另接受工业学校三所，即伪东北政委会直属之高职学校和伪辽宁省立之第一、第二工科学校。各学校共有机器设备24台，动力设备23台。教职学员共1863人，内学生1777人。

以上四大系统工厂和三所学校共接收机器设备12519台，动力设备1728台，运输设备229台。职工、技术人员及学生总数为7807人，内技术人员286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工业部按照东北局和沈阳军管会和市委领导的要求，专门写了“接收沈阳国营企业工作总结”。在总结中除了将接收到的产业概况作了系统的总结外，并专门谈了“接收工作的经验教训”：

“此次沈阳接收比较顺利，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条件极端有利，沈阳未经激烈战斗，我军纪律良好，再加上人心向我，故极少破坏。另一方面则由于进城较快，接收迅速及领导方针正确，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兹将此次接收之主要经验教训分述如下：

(1) 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接收。我们执行了军管会的方针，保持一切统一于军管会的领导下，打破了多头制与本位主义。经济处内部各个系统亦能在统一领导下分头负责，故能避免混乱，减少损失。

(2) 工业部充分执行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受的方针。执行这个方针的好处是：第一

使原有人员感到责任关系，便于完整移交。第二保持原有系统不乱，便于了解情况，考查问题。即令已经打乱一点，亦仍应尽可能保持原有系统。第三规定原有人员各回岗位，如遇问题，即有案可查，有人可问，组织恢复生产亦较易。除利用原有人员外，我们另派军事代表实行监督。现在全国接收工作都采用军事管制的办法。在接收中打乱原来机构是错的，但完全用旧人也不行，必须在我们老干部监督下运用原有人员。

(3) 接收要抓住时机。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三日早经济处即进城。接收亦较快，电业局进城第二天即恢复送电。抚顺、本溪等地亦能及时接收。辽阳鞍山稍迟一天遭到一些抢乱，有些损失。

(4) 接收工作应有步骤有计划。一般接收约经如下几个步骤：一，护厂。军事代表到厂后即召开留厂职工会议，宣布接收方针，办理职工报到，恢复上班，组织护厂委员会看管工厂仓库，禁止移动机器物资。组织护厂一般在三五天内即告一段落。二，点交。要按照原有行政系统及原有底册分别将资产档案人员有系统的接收，点收须抓住重点，首先须点收库存原料成品及化验仪器等。三，复工。复工对团结职工、安定人心及保护工厂有很大作用。并且是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根本办法。过去有相反的经验证明，凡是没有复工或没有职工群众保护的工厂，都很容易遭到损失或破坏。如因原料等困难

未具备复工条件者，即斟酌采取局部复工或暂时采取雇佣职工保管的办法。四，清理和调整。在军管会批准下已将“生产管理局”的专业小厂提交沈阳地方经营。其他个别急需解决者，也需经过军管会批准提出。五，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应开始建立正常的组织。军事代表制应改为厂长制。工业部亦按照接收后的工作需要，很快建立专业局及企业公司的新的管理机构。

（5）在接收阶段亦要注意做职工群众工作及宣传政策。此次接收有工会及市委派很多职工工作干部配合起很大作用。沈阳全市工人参加大课者达5万人，工人短期训练班亦达4千人。较有基础的工厂都已建立职工代表会议。仅有自下而上按照系统原封不动的接收，而无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工作配合是不行的。我们曾有类似华北汲县的错误，未先和工人见面，工业部直至旧历年才召开工人座谈会。

（6）在接收工作中必须及时注意解决目前职工生活问题，军管会决定首先发给每个职工10万元生活维持费，是取得群众拥护的。但后来在确定发给十一月员工临时工薪办法时，规定工薪太低，发放太迟，粮食质量差，冬季燃煤没有发给，使职工群众生活没有保证，情绪低落，这是由于当时过分强调了财政困难和缺乏群众观点而产生的。到十二月份提高工薪标准，实行预支工薪办法，现在职工表示满意，生产也逐渐提高。惟支付

实物工资办法必须改善。

(7) 此次接收的主要缺点，除军管会指出者外是准备工作不够，还有个别不守纪律抓一把的现象，对接收房子及汽车问题等发生一些混乱，准备工作有些不够。1000干部不够。此次调干部先来后到，参差不齐。必须以有经验的行政干部为骨干，掺以党群干部及东北本地老区职工。电业局等机关带一部分北满老工人作用很大。二是思想准备不够。特别是陆续来沈的一些干部，事先未对其进行必要教育，对沈情况不清。有些干部在执行紧急战斗任务之前还在讲价钱。三是武装及交通工具不够。曾有人怕武器带多了会闹本位，要领导思想与组织纪律上解决问题，现在可以证明，各个接收单位应该带一部分自己建制的武装。”

此外，总结中还谈到“目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简单提到军管会逐步把权力移交给政府机关问题，接收工作中的奖惩问题以及原有公私债务只承认不作清理，原有的公私合营和租营约定暂予照旧执行等问题。其中关于对待职员问题是做为重点提出的：

“关于职员问题，基本方针仍按‘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职工问题的决定’及六次劳大决议中关于职员问题的方针执行。根据军管会报告，原沈阳职工及工教人员总数约近9万人，其中包括公营企业职工5.4万人，政府系统公教人员3.5万人。原职工及公教人员报到者8.5万

人，即占95%。此次政府系统经过集训会遣散一部。全沈阳职工公教人员免职者约6700人，其中警察占50%，政委会及市政府占30%，最少的是公营企业及学校教育机关各占0.3%。处理公营企业职工问题与处理警察及政府人员问题不同，接收企业一般不应打乱原来机构，但必须经过改造，今后处理公营企业职工问题的方针是：

(1) 对反动分子（包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特务分子）必须弄清面目，利用庆祝平津胜利发动群众运动，号召有枪者缴械，有党证团证者缴党团证。最近仍不断发生特务暗害破坏事件。有些同志缺乏警惕性，对走火事件不追究，有的留技术人员有单纯技术观点，不注意审查政治面貌，这是麻木右倾的表现，必须提高警惕性，发动群众配合公安局加强国营企业中的保卫工作。

(2) 对一般旧职工应采取思想改造的方针。可以洗刷个别官僚分子，对具有技术和业务者须继续留用。管理人员班长以上多有业务知识，须要留用，但大多数需要调动岗位。工人对职员班长有意见，须适当解决，可让工人开会批评、指责、控诉，并由职员自己坦白。改造职员完全靠教育不行，必须加上发动群众斗争，具体处理须看罪恶大小、群众觉悟及干部力量（对政策的认识）而定。要分先后缓急轻重，有准备有组织的发动斗争，要掌握政策领导，不要斗得太苦，不要乱打乱抓。

如确有特务破坏行为者须报告公安机关适当处理。”

总之，此次接收沈阳是很顺利的。但这也是长期和多方面的积累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们进入东北三年来可以说没有一天不与接收工业城市打交道，有向日伪接收的经验，也有向国民党接收的经验，也有向苏军接收的经验。有的城市还曾反复几次易手。接收后有何经验及教训在以后实践工作中都会鲜明的表现出来，前边提到的，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吉林通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次接收沈阳工作中所以要抓紧工矿企业的及时管理和尽可能的复工，就是由于我们看到了过去收复的城市中未加以管理和复工的工厂很容易被毁掉，散失机器设备，分散技术力量。再者，鉴于过去一个城市收复后，部队任意拿走设备器材的问题带来的损失很大，这次解放沈阳前，领导机关就事先向所属部队认真地进行了城市政策教育，因而入城部队都严格做到了不搬用机器器材，而且对生产设备、仓库物资都加意保护，有些部队因一时缺粮，从库中拉些细粮的问题虽有发生，但属极个别现象，而且情有可原，并非任意乱拿，故各方对我军纪律极为满意。再者，此次我们实行按旧系统接收的方法，就是借鉴了三年前苏军和国民党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只派军事代表，命令旧人员留职，呈报情况，等待接收处理。

此次接收沈阳，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不仅保证了接收工作本身顺利圆满的完成，同时也为关内各地继续接收新解放城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东北中央局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东北局《关于沈阳接管经验之补充报告》，作了及时的总结。其中有关于工业接管方面，虽然文字不多，但十分重要。总结中论述到怎么才能迅速恢复秩序，提到有五个关键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关工业的：

“1.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就没有电灯、自来水、电话等，电车与火车也无法开动，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十一月三日先解决了抚顺送电，群众甚为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这次哈尔滨各系统共带来的技术干部数百名，他们忠勇而熟练，十一月二日晚，在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困难情况下，开出装有弹药的火车疏散，使本地人员敬服，一扫其‘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的想法。

“接收之工厂，愈快复工愈好，最好是立即复工。这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的基本环节（否则工人不安，必生偷窃），生产出来的东西，总会有用处。首先复工，其次再解决订生产计划等问题。”

这段是直接讲工业的，其他部分涉及到工业的还有

不少，比如，有关工资问题：

“目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80斤至400斤（按：指粮食）。已比围城时提高很多，故一般已满意，高级技术人员工资应高一些。”

特别是关于如何对待旧职员问题：

“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10万，等于四十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在避免紊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是整理人员。”

“此次税务局因带干部太少，怕旧人员贪污（一定贪污），最初一时期，税收中断，约损失100亿以上（每天最低4至5亿），这是因小失大。因此在我干部来不及配备时，一般旧税务人员可暂时利用一下，使税源不断，以便再逐渐更换旧人员。”

总之，通过接收沈阳等大工业城市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现代化工业生产与小农自然经济有着十分巨大而又细致的区别：

首先，现代化工业城市和农村、小县城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需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性管理。在农村，无论地主官僚以及旧政府的一切人员，都不是生产本身所需要的，可以含糊地说，他们不过是老百姓身上的一

些吸血虫。把他们一体扫除，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在现代化工业城市不同，绝不是一切旧政府机构，特别是名为官方机关实为工业管理设施的各种机构，尽管有许多问题，但这种机构都只能用新的相应的机构加以代替，但绝不能一概扫除，有的甚至一分钟也不能缺少，因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化城市一时也离不开这样的管理职能。

第二，现代化工业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生产，同一个人就可动手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比较起来，其复杂程度是无法简单加以估量的。因此，原有的管理机构、职能和社会机制，那些应该改变，那些必须保持，那些应该发展，绝不是可以凭着主观的良好愿望可以任意决定的。从广义上说，直到现在有些细微的地方我们尚未能完全加以把握，这也正是我们目前大力进行的改革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管理和发展现代工业生产，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要的。完全可以说，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就等于没有现代化工业生产。这种需要同小农经济的需要来比较，绝不止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不同。

当然，对于这些道理，在两三年中逐步接收城市和恢复发展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是不断有所体会的，但从来没有象在我们接收沈阳工作中体会得这样深，可以说在接收这个中国当时少有的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中，这些问

题才空前集中地尖锐地暴露出来。因此，接收沈阳本身，就是如何管理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工业城市的一个绝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沈阳的收复也就标志着东北的解放。当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更加胜利地迅速发展，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的淮海、平津两个决定性的战役即将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已挥师入关，其他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崩溃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最后胜利的局面，已经注定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根据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形势的变化，东北局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作出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东北党内正式下达。

“决议”强调指出：“在东北解放区内部以人民战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力剥夺封建地主富农以及敌伪官僚资本的财产的任务，已经或即将完成了，现在已经开始新的时代，即是在新的条件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的时代。”同时，“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并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成这双重任务，“其中心环节，为发展东北经济，建设东北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要以动员12000干部下乡搞土改的劲头，来配备与加强经济建设的干部，特别是工业建设与合作社建设的干部，来动员千百万人民的劳动大军进入生产的热潮中，为增加东北的物质财富与军事供应品，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决议”是在新形势下及时地决定把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使东北解放区由战争走向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开始了带计划性的经济建设时期，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

东北解放区的工业可以说都是先后从日伪和国民党手中接管的，总的是破坏严重，但情况也各有不同。沈阳未经激烈战斗，敌人已穷途末路，高级官员率先逃命，未来得及进行有组织的破坏，我们军管和接收人员进去的又快，故均保持完整无损。长春情况就不同，长春被国民党统治三年随意破坏，解放时已是劫余残都，百废待举。鞍山又是一个情况，“八·一五”后苏军占领时期，鞍钢一部分设备被拆除运走，总的设备能力损失在二分之一以上，而选矿、炼钢、轧钢设备损失则达三分之二。国民党经济部接收时残留设备大部尚称完整，后因战事关系，一、二、四炼铁炉又遭炸毁，国民党曾有修复计划未能如期完成。记得我们派去负责恢复的同志看了后很有畏难情绪，富春同志前去视察时，曾亲自给以鼓励。

东北全境解放，大城市经我们接管后，据有关资料了解，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工业生产情况大体如下。

国民党进入东北后，大致由经济部东北办事处、中纺公司、东北生产管理局三个官僚资本的系统接收了东北原属敌伪的企业。经济部东北办事处接管的主要是重工业、矿业和较大的造纸、橡胶等工业，共有23个大企业单位、39个厂矿，中纺公司接管的全部是大纺织厂，最多时有9个单位。东北生产管理局属于国民党东北政务委员会，它接管的多为轻工业或较小的工厂，而且大部分在沈阳地区，共77个厂。一九四六年东北工业生产下降到最低点，如煤产量300万吨，只有一九四四年的12%。其他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橡胶等几乎全部停顿。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以前，国统区工业有了一些恢复，为国统区工业生产的最高点，以后由于其统治区逐步缩小而不断下降，其主要工业生产情况大致如下：

钢铁：国民党鞍山钢铁公司于一九四六年底拟定了年产20万吨的修复计划，一九四七年四月将原计划减半，五月修复完成75%。我发起夏季攻势后，煤电两缺，交通时断，计划流产。一九四七年八月开了一个一百吨的平炉和一个炼焦炉，一九四八年二月鞍山就解放了。以钢锭为例，一九四六年产108吨，一九四七年产65890吨，一九四八年184吨（而伪满时最高年产则为84万吨），职工最多时两万人。

有色金属：由东北金属矿业公司管理。沈阳、吉林、辽南、安东共33个厂矿。并部分恢复了青城子、杨家仗子等矿的生产。一九四七年沈阳冶炼厂产电解铜237吨，电铅540吨，焙烧镁品422吨（计划为一千〇八十吨，一百吨、六万吨）。一九四八年全部停顿。职工最多时1300人，一九四八年只100余人。

煤：共辖抚顺、阜新、北票、西安、本溪、烟台、营城七处矿山及其附属工厂。一九四六年五至十二月产量为170万吨，一九四七年为378万吨，一九四八年一月至十月为130万吨。职工最多时为10万人。到一九四八年，除抚顺、本溪、烟台三处外，其余均被我解放。

“八·一五”后东北煤矿遭严重破坏，国民党未做正式修复，又迫切需要煤，因而不做掘进，不作剥离，甚至不挖保安露柱，只图取煤，使各矿生产条件十分恶劣，不花大力气，无法恢复正规生产。

电：国民党在东北最盛时所辖发电设备不及50万千瓦，发电最高容量不及20万千瓦，所辖发电厂为丰满、抚顺、西安、北票、长春及鞍山、本溪。除鞍山、本溪外，皆由资源委员会的东北电力局管辖。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七年的电力计划五年之内达到发电量50万千瓦，三年来实际最高负荷量：一九四六年是18万千瓦，一九四七年是18万9千千瓦，一九四八年是5万8千千瓦。发电量一九四六年是1亿7千6百万度，一九四七年6亿

8千4百万度，一九四八年1亿8千9百万度。电气部门职工最多时9000人，一九四八年最低时3000人。一九四七年我夏季攻势中，丰满送电线一度被切断，最高负荷量由18万9千千瓦减至6万1千千瓦，以后继续维持在5万千瓦水平。由于水电断绝，火电缺煤，电力不足，国统区工业动力供应一直处于绝望状态。

电机工业：由其中央电工器材厂、绝缘公司等几个系统管理。出品为变压器、电滚（即电动机）、铜线纱包线、电炮绝缘磁瓶等。一九四七年为生产最高年度，产电线215吨、变压器6786千伏安、电滚1583马力，一九四八年则分别减至55吨、1254千伏安、94马力。

机械：由中央机械公司及机车车辆公司两个系统管理。前者为伪满时24个会社，后者为4个会社合并而成。职工最多时4470人，最低时2千余人。机械产品一九四六年为170吨，一九四七年为1172吨，一九四八年为373吨。货车一九四七年为258辆，大小机车25辆，一九四八年则为77辆和6辆。

化工：主要为沈阳化工厂，葫芦岛硫酸厂，东北炼油厂，抚顺矿务局炼油厂等单位。职工最多时2600人，一九四八年大部停工，只余职工150人。一九四七年的主要产品为火碱390吨，盐酸753吨，硫酸1348吨，粗油8798吨。锦西炼油厂一九四七年曾炼原油3000吨。一九四八年大部分工厂实际处于停工状态。另有若干工厂由国民

党接管后一直未修复开工。

水泥：分由辽宁水泥公司，华北水泥公司锦西分厂，抚顺矿务局水泥厂三个系统管理。一九四七年修复开工仅将库存烧块粉碎出售，当年产量为41877吨，一九四八年为20318吨。职工人数最高时为1500人，最低时150人。

造纸：除生产管理局的两个及几个省营纸厂外，全由资源委员会之辽宁纸浆造纸公司管理，计辖锦州、营口、辽阳、安东、鸭绿江等厂。一九四七年五月锦州厂日产12吨，营口、辽阳亦可日产4至5吨。安东、鸭绿江二厂因遭炸毁，正在修复。夏季攻势，安东营口为我收复，辽阳、沈阳因电源不足停工。历年产量为：一九四六年130吨，一九四七年975吨，一九四八年无。职工人数最高时一九四七年为1600人，一九四八年最低时45人。

橡胶：辽阳、沈阳的九个大厂由资委会沈阳橡胶厂接管，职工1100人。此外生产管理局接管沈阳一个胶鞋厂，安东伪省政府接管一个胶鞋厂。一九四七年产品为汽车内外胎200余件，自行车胎83000条，皮带1749万米，三角带372万A吋，各种鞋20万双。安东厂于一九四七年解放，辽阳分厂并未真正开工，沈阳各厂则都开工到解放为我接收。

纺织：各工厂先由“联勤”接管，后分由中纺公司及生产管理局接管。属于中纺的，最盛时有辽阳、营口、锦州、安东、复州（即瓦房店）五个厂，其中锦州厂始

终在国民党手中，开工时间最长，锦州战役中被毁；营口、辽阳、安东、瓦房店屡经反复，一九四八年即全被解放，瓦房店的纺织厂被我迁走两次，安东的纱机亦被我迁走一部，并炸毁16000锭。生产管理局所辖五个小厂共16000余锭，700台布机，沈阳被我包周时，曾运至天津1万锭。总计国统区的棉纱生产量为一九四六年3712件，一九四七年5592件，一九四八年7638件。

总之，国民党由于企图把东北变成反苏及军事经济基地，因此同军事上一样，也曾把其重要的经济力量和技术人才用在东北，只是由于其政治上丧尽人心，军事上节节失败，其三年经营可谓一事无成。

总之，三年战争中东北工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境解放后，修复开工的尚不及伪满时期最高生产水平的40%，因此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立即提出“开始工业建设的新时期”。为此，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首先加强和充实了工业部的机构，在工业部之下成立了煤业、电业、机械、化学、纺织、企业、金矿、有色金属、林务等九个管理局。十二月二十八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刘向三为煤矿局局长，孙然为副局长；李华为有色金属局局长，孙鸿儒为副局长；赵濯华为企业管理局局长，梁成恭、林华为副局长；聂春荣兼机械工业管理局局长，赵一鹏为副局长；赵书杨为纺织管理局局长，罗日运、张永清为副局长；叶和玉为金矿管理局局长，刘炳华为

副局长；荆杰为电业管理局副局长；杨纪高、张子良为林务局副局长。

另外还有直属工业部的鞍山钢铁公司及本溪煤钢公司。并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开始制订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修建计划，要求于一九五〇年度平均达到伪满最高生产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为此，国家对工业投资达200万吨粮食。一九四九年工业产品总值计划达到650万吨粮食，鞍山、本溪钢铁生产力争年内恢复，有色金属将有十四处矿山开工，煤炭产量超过900万吨，电力30万千瓦，机械工业在服务于各厂矿修复任务的同时力争打下独立自主的机械制造业的初步基础。其他如化学、水泥、造纸、橡胶、林木、盐田等业均要积极恢复并改善管理。计划到一九四九年底，属工业部系统的国营企业职工总数达到30万人（不包括铁路、军工、军需及林业工人）。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进程中并要继续克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重要的是要建立经济核算的思想和制度，厉行节约，克服浪费，充分发扬民主，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努力虚心学习，保证生产计划的顺利完成。

大力发展生产，加紧经济建设，我们经济还是相当困难的。当时，东北虽解放，但全国尚未解放，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陈云同志《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要“忍

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职工要团结一致，搞好生产”。东北担负了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几十万人的全部费用，并支援关内80万吨粮食、150万立方米木材、20万吨钢材等物资。

离开东北南下长沙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我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上递补为正式委员。会后决定我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三月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东北局根据中央决定抽调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还决定抽调城市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各500名，长春学生300名，到三月底整训完毕随军南下，以支援开展新区工作。

我深深感到东北的现代工业基础相当雄厚，特别是重工业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因此，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阅历，在我离开东北前，又对沈阳等各工业重镇巡视了一遍。出发时，组织上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车厢，同行的有杨晋、李清等同志。纪均和孩子们没有同行，当时，我的在延安出生的男孩子只有五岁，哈尔滨出生的女孩子刚两岁。等我到湖南安顿下来后，才接他们

母子前去的。

我们坐上火车以后，走走停停，经过十几个昼夜，终于到了武汉。当时四野总部设在武汉，我军先头部队已进到平江一带。我们虽同四野总部住在一起，但算湖南班子。中央决定黄克诚同志为省委第一书记，我为第一副书记，准备主持省政府工作，袁任远同志将是副省长。我们主要参加了争取长沙和平解放的有关工作。那时，湖南白崇禧的部队已撤到衡阳、宝庆一带，其主力是在以后我军发动衡宝战役时才被歼灭的。长沙是由陈明仁的部队驻守，国民党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则是程潜。我军进入湖南后，程潜即通过长沙地下党送来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和平解放。我收到后送给林彪，马上发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回电说，程潜是孙中山老部下，要很好对待，如能争取程潜和平起义，将对西南地区产生好的影响。决定李明浩南下协助和平解放问题，李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还附有毛主席发给程潜的电报，是用弟毛润之的名义。我们就着人用正楷誊写好，一起送给地下党，请他们开始同程潜谈判。当时国民党长沙驻军的领导人是陈明仁，程潜计划争取与陈一起起义，但国民党当局要陈明仁率部撤走，并派邓文仪前往长沙专门做陈明仁的工作。陈虽已向程潜表示“以程主席的意志为意志”，但也不无顾忌。这时我地下党放风说，“飞机场附近发现了人民解放军”，街上一乱把邓文仪吓跑了。经

过谈判,陈明仁提了一些条件。我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解放军不进长沙,由他们的部队维持秩序。我们认为其他条件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一条不能让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是要进长沙的,否则无法维持好长沙的秩序,陈要求担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我们都同意了。记得最后一次同长沙地下党联系,是派我的秘书李荣春去的。他是位苗族,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他带了警卫员,是坐余秋里同志的车去的。车是美国吉普,司机是一名日本人,会中国话。联络地点是长沙湘雅医院,任务是送一封信给金明同志的信,这次联系好了,解放军就可以进长沙了。据小李回来说,他们那次去长沙,路上汽车掉到一个小坑内,请老乡帮助抬上来后,车子碰坏了,又修了一些时候的车,来回一路上没搞到吃的,日本司机又累又饿,回到武汉时昏了过去,亏得小李在哈尔滨时自己摸索着开过汽车,只好由他将就把车开了回来。由于司机表现很好,还给记了一功。

我们从武汉到长沙坐的汽车,是在沈阳缴获的,和闷罐子救护车差不多,车上除秘书、警卫,还有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谭余保同志。司机老崔是朝鲜人。中途因为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汽车倒在了公路边上,好在没有翻过去,大家都没有伤着,只有谭余保被滚动的汽油筒碰了点轻伤。把车子扶起来以后又赶路了。当时由于各方面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都很缺,不少司机都是从

俘虏中选拔的。自己培养的也不很熟练。如何进行交通管理也不太熟练。记得在武汉时一位日本司机由于汽车刹车失灵碰死了一位市民，差一点给枪毙了。保卫部请示林彪和罗荣桓、邓子恢，才准其戴罪立功。

我军初进长沙，肖劲光是军管会主席。原定我主持省政府工作，因已同意陈明仁任临时政府主席，就未到任，我是一九四九年底才任职的。陈明仁被任命为兵团司令。当时我接手的工作最感到忙乱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1) 是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的一些北方同志，不少人要求仍回北方工作，主要是从晋东南、晋冀鲁豫一带抽调来的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一般是副区长、副科长等，到湖南均担任了相应的正职。主要原因是湖南多是新区，老百姓说话听不大懂，好多事不好处理；不服水土，潮湿、蚊子咬、闹肚子，个别的未打招呼自己就跑回去了。一位原山西省计委的副处长私自回去，把党籍也丢了。经过工作，不少同志逐渐安下心来，对身体弱适应不了的才批准回去。

(2) 是每天都有老乡、亲友、同学，以致沾亲带故或同革命有过些联系的人来找我，要求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承认革命历史等等。很多人都不认识，或者原有一面之交但已经记不起来了。比较重要的是丁玲同志的爱人陈明同志来要求函请当地政府帮助照顾丁玲的老妈妈，我就给县政府写了信。

(3) 是老百姓告状的多。由于原国民党起义的部队调到浏阳一带驻防，民主改编工作尚未进行好，政治工作人员还未派进去。因此，难免有些抓鸡摸狗、买东西不给钱等问题。老百姓不买帐，就到省里来告状。

后 记

近几年来，应有关报刊和出版单位的邀请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并先后汇集了两个集子，即《怀念集》和《忆南征》，但还没有系统地写回忆录的打算。今年是我军建军六十周年，也是开展抗日战争的五十周年，为此，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于去年初夏曾登门约稿，希望一些老同志撰写回忆录以示纪念。特别是王长龙编辑更是热情关怀，大力支持，实在是盛情难却。我想自己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如能把建国前艰苦战争年月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对青年一代起一些传播党的光荣传统的作用，对伟大的建军节和抗战的纪念日表示自己虔诚的敬意，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于是经反复回忆，多方搜集，并整理一些已发表过的文稿，总算勉强成书了。这中间，应首先感谢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的全力支持；而本回忆录的第一、第二两章的资料收集和初步整理等工作则是柯蓝、文秋同志的辛劳；有关东北一章的资料大半得力于乔顺发、李荣春同志的协助收集；至于全书的整理、核查、润色等整个写

作过程一直得到了杨旭章、冯丽生同志的关心和协助。对于以上这些同志和有关单位，我的感谢之情是不待说的了。还应该提到的是，虽经各方大力协助，但某些事实仍可能有不确之处，认识亦难免有不当之点，唯望读者随时指正。

作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封面
目录
正文